



DAVID ABULAFIA

THE CREAT
SE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史

地中海人类史

〔美〕大卫·阿布拉菲亚 著
徐家玲 译 朱寰 校

DAVID ABULAFIA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伟大的海

[上]

地中海人类史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著
徐家玲 等 译 徐家玲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让我们一起追寻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Text Copyright © David Abulafia, 2011, 2014

First Published 2011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11,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Allen Lane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本中文版根据 Penguin Books 2014 年版本译出。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的先祖

本书荣誉

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

这是一项可以为普通读者接受的非凡学术成就，任何一个因分散的地中海历史碎片而产生兴趣的人在阅读此书后都将获益匪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出现能够与本书抗衡甚至类似的作品。

——罗杰·克劳利，《文学评论》

一本具有轰动效应的书……这部恢宏的历史著作展现了一片狭长的海域是如何变成人类文明的交汇之地的。

——汤姆·霍兰，《观察家报》

在世最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者。

——安德鲁·罗伯茨

在评价阿布拉菲亚取得的成就——他对史诗场面的描绘、对细节的敏锐观察与清晰的语言风格——时，任何评论都显得苍白。他在书中描写了大量无畏的探险者、焦虑的朝圣者、勇于进取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战战兢兢的难民……

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人文关怀和洞见……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在这本杰出的权威性著作中，地中海显得前所未有的迷人、重要。

——BBC 历史频道

这本新的历史巨作歌颂了由多种血统和族群混合而成的航海民族……令人着迷。

——伊恩·汤普森，《独立报》

如果今年夏天想找本历史书读，那就读这本吧。

——弗兰克·特伦特曼，《星期日快报》

研究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卓越之作。

——托尼·巴伯尔，《金融时报》

今年出版的最好的历史类图书……引人入胜。

——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观察家报》

一项惊人的成就……叙述清晰且十分权威。

——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

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富有学术价值，笔触幽默，展现了作者对细节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赞颂了地中海沿岸人与自然的

曾经美妙的共生关系中的“易变性”。一本好书。

——乔纳森·基特斯，《星期日电讯报》

权威性的……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部跨时四千年的
史诗之作。

——大卫·吉尔摩，《展望》

书中的叙述雄心勃勃、令人叹为观止且十分专业……一本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

——蒂姆·威特马什，《卫报》

绝妙至极……他是一流的作家，善于用清晰的语言压缩历史，
且观察细致入微。他的作品配得上心怀感激的广大读者。

——《大西洋月刊》

-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9. 石棺中的早期腓利士黏土人面
[Israel Museum (IDAM), Jerusalem.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10. 迈锡尼武士瓶, 前 12 世纪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Photograph: akg - images)
11. 上埃及拉美西斯三世哈布神庙雕带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12. 诺拉的腓尼基铭文
(Roger - Viollet/Topfoto)
13. 迦太基石碑, 约前 400 年
(Roger Wood/Corbis)
14. 腓尼基船只模型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Beirut. Photograph: Philippe Maillard/ akg - images)
15. 腓尼基银币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Beirut.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16. 维爱城附近出土的基吉陶瓶, 约前 650 年
(Museo Nazionale di Villa Giulia, Rome. Photograph: akg - images/Nimatallah)
17. 巴拉瓦特亚述王宫的青铜门饰, 约前 9 世纪
(Musée du Louvre, Paris.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18. 狄奥尼索斯兑酒器，前 6 世纪晚期
(Staatliche Antikensammlung & Glyptothek, Munich. Photograph:
akg - images)
19. 塔尔奎尼亚墓画，前 6 世纪晚期
(Photograph: akg - images/Nimatallah)
20. 马尔西利亚那书写板，前 7 世纪
(Florence Archaeological Museum. Photograph: akg - images/
Album/Oronoz)
21. 皮尔吉金箔记事板，前 6 世纪晚期
(Museo Nazionale di Villa Giulia, Rome. Photograph: akg -
images/Nimatallah)
22. 伊特鲁里亚壶盖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3. 撒丁岛奥罗洛石塔
(akg - images/Rainer Hackenberg)
24. 撒丁岛人的青铜船，约前 600 年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Cagliari. Photograph: akg -
images/Electra)
25. 佩里安德胸像
(Vatican Museum)
26. 亚历山大大帝胸像
(Print Collector/Heritage - Images/Imagestate)
27. 埃切尔夫人
(ullstein bild - United Archives)
28. 萨拉皮斯胸像
(akg - images/ullstein bild)

29. 迦太基的麦勒卡特钱币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30. 尼禄铜币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31. 克莱奥帕特拉钱币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32. 纪念奥斯蒂亚新港落成的尼禄钱币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33. 罗马五列桨船浮雕
(akg - images/Peter Connolly)
34. 那不勒斯周边港口 (可能是普特奥利) 壁画
(Museo Nazionale Archeologico, Naples.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35. 克拉西斯的拜占庭船队镶嵌画, 6 世纪
(akg - images/Cameraphoto)
36. 奥斯蒂亚犹太会堂的飞檐, 2 世纪
(Photograph: Setreset/Wikimedia Commons)
37. 奥斯蒂亚犹太会堂的铭文
(akg - images)
38.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金箔画 (局部)
(akg - images/Cameraphoto)
39. 阿马尔菲, 1885 年
(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 Berlin. Photograph: akg - images)
40. 马略卡陶盘

(Museo Nazionale di San Matteo, Pisa)

41. 阿克廊柱客栈

(Photograph: Ariel Palmon/Wikimedia Commons)

42. 威尼斯四骏

(Mimmo Jodice/CORBIS)

43. 中世纪晚期地图 (仿伊德里西图)

(Wikimedia Commons)

44. 马略卡波托兰海图, 14 世纪早期

(British Library)

45. 描绘马略卡城 1229 年被攻破的壁画

(Museo de Catalunya, Barcelona. Photograph: akg - images/
Bildarchiv Steffens)

46. 卡马格的艾格莫特

(Photo: Bertrand Rieger/Hemis/Corbis)

47. 哈特曼·舍德尔《纽伦堡编年史》中的热那亚

(by permission of the Master and Fellows of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Cambridge)

48. 杜布罗夫尼克

(Photograph: Jonathan Blair/Corbis)

49. 马尼塞斯装饰碗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50. 用于献祭的货运船模型, 约 1420 年

(Maritime Museum, Rotterdam)

51. 巴伦西亚交易所

(Photograph: Felivet/Wikimedia Commons)

52. 《海事代理法》的早期手抄本

(Album/Oronoz/akg - images)

53. 穆罕默德二世像，真蒂莱·贝利尼绘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54. 描绘围攻罗德岛的法兰西微型画（局部）
(The 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
55. 海雷丁像，1540年，纳凯普·雷斯·海达尔绘
(Topkapi Palace Museum, Istanbul, Turkey/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56. 安德里亚·多里亚像
(Palazzo Bianco, Genoa. Photograph: akg - images/Electra)
57. 描绘西班牙人攻占哥莱塔的挂毯画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58. 摩里斯科人被驱逐，1013年，雷·奥罗米格与弗朗西斯科·佩拉塔绘
(ullstein bild - Asia)
59. 威尼斯舰队1661年战胜土耳其船，威尼斯画派佚名画家绘
(Museo Correr, Venice.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60. 袭击马翁，1756年，法国佚名画家绘
(Musée de la Marine, Paris. Photograph: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61. 处决海军将领宾，约1760年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London)
62. 海军将领费奥多·乌沙科夫像，19世纪佚名画家绘
(Central Naval Museum, St Petersburg. Photograph: akg - images/RIA Novosti)

63. 海军将领萨缪尔·胡德像，1784年，詹姆斯·诺斯科特绘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64. 斐迪南·冯·霍姆佩茨像，安东尼奥·苏埃雷布绘
(Presidential Palace, Valletta, Malta, Photograph by and courtesy of Heritage Malta)
65. 斯蒂芬·迪凯特像，约1814年，托马斯·萨利绘
(Atwater Kent Museum of Philadelphia/courtesy of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66. 赛义德港，1880年
(Wikimedia Commons)
67. 劳埃德公司在的里雅斯特的码头，约1890年
(adoc - photos)
68. 亚历山大大广场（也称穆罕默德阿里广场），约1915年
(Werner Forman Archive/Musées Royaux, Brussels/Heritage - Images/Imagestate)
69. 意大利占领利比亚，1911年
(akg - images)
70. 米尔斯克比尔港的法国战舰遭受攻击，1940年10月
(Photograph: Bettmann/Corbis)
71. 英国军队登陆西西里岛，1943年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A17918)
72. 海法的犹太难民船，1947年
(akg - images/Israelimages)
73. 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1958年
(akg - images/Erich Lessing)

74. 滨海略雷特沙滩

(Frank Lukasseck/Corbis)

75. 试图登陆西班牙海岸的非洲非法移民

(EFE/J. Ragel)

第 825 页 1936 年刊于《巴勒斯坦》的讽刺画

转写与纪年体系

在一本跨越时间如此之长的书中，文字转写是令人纠结的事，完全一致几乎不可能做到。我已经尽力做到了信与达。对于希腊名称，我拒绝了被长期使用的不合理的拉丁化形式，除非是像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这样的人物；对于这些人，如果换一种写法，一些非专业人士可能就会无法辨认。因此，我使用了 Herodotos（希罗多德）和 Sophokles（索福克勒斯），并使用了 Komnenos（科穆宁）而不是 Comnenus 来指代伟大的拜占庭王朝。在描述此后几个世纪时，情况更为复杂。古代的 Thessalonika（塞萨洛尼卡）成为奥斯曼人的 Salonika（萨洛尼卡），然后又是当代希腊的 Thessaloniki（塞萨洛尼基）。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从 Epidamnos（埃比达姆诺斯），到 Dyrrhachion 或 Dyrrachium（都拉基乌姆），再到 Durazzo 或 Durrës（都拉斯）。我在提到不同时期时使用了不同的名称。相似的问题出现在希伯来语、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名称中。对克罗地亚和黑山沿岸，我更倾向于使用斯拉夫语名称，因为人们现在还在用它们，因此我使用了 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而不是用 Ragusa（拉古萨），但是（由于缺少对于这里的居民相对文雅一些的称呼）我称这里的居民为“拉古萨人”。

另一个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是否使用基督教的纪年方式，即使用 BC、AD，还是现代人的替代品 BCE 和 CE，抑或是（就像李约瑟曾经建议的那样）使用简单的符号“-”或

“+”。鉴于后面两种用法表达的意义同使用 BC 或者 AD 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不认为它们有什么优越之处；那些不喜欢使用 Before Christ (BC) 和 *Anno Domini* (AD) 的人可以选择用一些其他的词组来解读 BC 和 AD，如“Backward chronology”（有编年史以前的）和“Accepted date”（人们公认的时间）。

序

“地中海史”可谓寓意颇多。本书是一部地中海海洋的历史，而非其周围陆地的历史；具体而言，是一部穿行于大海之上、居住在沿海港口和海上诸岛之民族的历史。本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我将地中海的历史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第一地中海的下限为公元前1200年后的混乱，也就是传说中特洛伊（Troy）陷落的前后；第二地中海一直存续至约公元500年；第三地中海缓慢地出现，而后在黑死病时期（1347年）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在第四地中海，该地区不得不应对来自大西洋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大西洋势力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大约结束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时（1869年）；在第五地中海时期，地中海成为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通道，并在20世纪后半期确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身份。

xxiii

我的“地中海”完全是指洋面本身、其滨海地区及其岛屿，以及那些为穿梭于大海之上的人提供了出发点与停泊点的海港城市。与研究地中海史的伟大先驱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的定义——他有时会将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地方也囊括进来——相比，我的定义略显狭隘。布罗代尔以及后来大多数追随他的学者笔下的地中海均指远离海岸线的陆地和满是海水的海盆。另外还有一种趋势：一些学者对

地中海的定义会涉及橄榄树的种植及汇入海中的河流，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对沿着这些河流两岸定居的传统社会（它们生产的食材和原料是跨地中海大宗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进行考察，也就是将从未靠近大海的真正的“旱鸭子们”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内陆——很多事件发生于此，很多物品源自或经过此地——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本书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涉足大海，最好还能穿越大海进行旅行；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易，参与宗教或其他思想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控制海上路线，他们也许还会进行海上战争。

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本长篇著述中，决定什么内容应该包含进来，什么内容应该排除在外，着实困难。在书中，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地中海的描述中，我本应更多使用“或许”、“可能”、“也许”和“大概”等限定词，但这样做有令读者感到迷惑的风险。我的目的是描述那些使地中海发生完全或大部分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其周边的一系列微观历史（尽管它们可能也很重要）。故而我将注意力集中于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部分，如迦太基（Carthage）的建立、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出现、柏柏尔（Barbary）海盗的影响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宗教的相互影响需要留出探讨空间，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上将花费大量篇幅，但同时犹太教也将给予足够关注，因为在中世纪早期和早期现代，犹太人作为商人占有重要地位。当我写到古典时代时，我会大致平衡地论及每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写出一部“金字塔状”的书，这样的著作往往匆匆略过前情，以尽可能快而轻巧地写至现代社会。但是划归于各章节的时间断限是极为粗略的，且不同的章节有时会涉及于同一时期发生在

地中海不同区域的事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中海，其古代时期是由腓尼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塑造的；中世纪则由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塑造；在公元 18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的塑造者则是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实际上，1500 年之后，或更确切来说 1850 年之后，地中海在更为广泛的世界事务与商贸活动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在大多数章节中，我会关注我认为可以最好地诠释更广义的地中海发展的几个地点——特洛伊（Troy）、科林斯（Corinth）、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阿马尔菲（Amalfi）、萨洛尼卡等。但我强调的是它们在海上的来往，以及促成或参与了这些来往的人。这种写作方法的一个结果是，我不会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那样，花大量篇幅描述鱼和渔人。大多数鱼在海下生存，而渔人则往往从某一个港口出发，待捕到鱼后（捕鱼处通常离其家乡的港口有一段距离）再返航。总体来说，他们在航行于其他水域时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和文化建立联系。他们只是将鱼带回家，以某种方式加工——用盐做成腌制食品，抑或做成重口味的鱼酱——然后正如我在书中会经常提到的，商人们会把这些商品带到海外销售；在一般情况下，新鲜的鱼应该是海军船员常备的标准食物。坦率地说，直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潜艇战，我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中海的洋面之下。

我希望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能像我享受写作过程一样享受阅读的过程。在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先生与我的代理人海尔斯文稿代理集团（A. M. Heath）的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先生的诚邀和鼓励下，本书才得以完成，所以在此我要向他们表达万分感

激；同时我也要向本书的美国发行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金纳（Peter Ginna）和提姆·本特（Tim Bent）两位先生对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使我感到特别惬意的是能够拜访或多次拜访书中提到的一些地方。地中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很多好客的东道主使我获益良多：直布罗陀博物馆的克莱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与杰拉尔丁·芬利森（Geraldine Finlayson）像以前一样友好地接待了我，不仅让我再次参观了博物馆，还让我渡过海峡到达休达（Ceuta）；马耳他大学历史系的查尔斯·达利（Charles Dalli）、多米尼克·费内克（Dominic Fenech）及他们的同事，以及英国高级专员阿切尔（Archer）女士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罗尼·米卡莱夫（Ronnie Micallef）先生，他们在马耳他堪称好客东道主的典范；马耳他驻突尼斯大使维克基安·克雷莫纳（Vicki-Ann Cremona）也在突尼斯市（Tunis）和马赫迪耶（Mahdia）给了我极好的款待；穆罕默德·阿瓦德（Mohamed Awad）以热情好客而闻名，他带领我游览了亚历山大城；埃德赫姆·埃尔德姆（Edhem Eldem）带领我参观了伊斯坦布尔（和亚历山大城）一些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角落；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历史研究所（Croatian Historical Institute）的雷佳·塞斐洛维克（Relja Seferovic）也在黑山 [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和科托尔（Kotor）] 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特雷比涅（Trebinje）] 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爱德华·米拉（Eduard Mira）与我分享了其关于中世纪巴伦西亚（Valencia）原初位置的见解；奥利维塔·斯赫纳（Olivetta Schena）不仅邀我前往卡利亚里（Cagliari）参加为我已故的朋友、著名的地中海史学家马克·唐格罗尼（Marco Tangheroni）先生举办的纪念活动，还让我

参观了古代的诺拉（Nora）遗址；在赫尔辛基大学历史系与芬兰外交部的邀请下，我得以在一座经常被称为“北方的直布罗陀”的要塞城市阐述我自己研究地中海历史的观点；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准许我在其研究里窝那（Livorno）的杰出著作出版前先睹为快；罗杰·穆尔豪斯（Roger Moorhouse）帮我鉴别了一些适合本书使用的、非常难以寻找的插图；贝拉·库尼亚（Bela Cunia）是一个极好的文字编辑；我的妻子安娜则陪我一起考察了雅法（Jaffa）、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特拉维夫（Tel Aviv）、突尼斯市、马赫迪耶及塞浦路斯的很多地方。由于安娜的宽容，本来已经堆满了中世纪地中海研究资料的家里，又有了堆积如山的涉及古代与现代地中海的书。我的女儿比安卡与罗莎已经一起快乐地游遍了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并用各种话题帮助我充实资料，例如摩里斯科人（Moriscos）与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剑桥、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达勒姆（Durham）、谢菲尔德（Sheffield）、瓦莱塔（Valletta）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听我讲演的人，他们对我关于“如何书写地中海史”的讲座给予了非常有用的反馈。在剑桥，我收到了来自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简·伦福儒（Jane Renfrew）、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阿历克斯·穆伦（Alex Mullen）、理查德·邓肯·琼斯（Richard Duncan Jones）、威廉·奥莱利（William O'Reilly）、胡波特斯·杨（Hubertus Jahn）、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参考文献及其他方面的建议；罗杰·达维（Roger Dawe）则很热心地赠送了

我一册他精心校注的《奥德赛》。查尔斯·斯坦顿（Charles Stanton）阅读了本书初稿，并对很多地方进行了修订——当然，书中如果还有错误，皆应由我负责。埃利萨·班多（Alyssa Bandow）就古代经济与我促膝长谈，帮助我厘清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研究机构能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相比，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与其他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我还要向给予我激励的凯斯学院的同事们——他们中不仅有我的历史系同事，还有保罗·宾斯基（Paul Binski）、约翰·凯西（John Casey）、鲁斯·斯库尔（Ruth Scurr）、诺埃尔·苏吉姆拉（Noel Sugimura）、科林·伯罗（Colin Burrow）以及维克托利亚·贝特曼（Victoria Bateman）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评论让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米哈里斯·阿加萨克列乌斯（Michalis Agathacleous），他引导我参观了塞浦路斯南部地区，这给了我极大帮助；古典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我莫大支持，同时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图书馆的马克·斯坦森（Mark Stantham）及其他工作人员也给了我巨大帮助。在书稿即将完成的最后阶段，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那不勒斯了，因为那里发生了火山喷发（不是维苏威火山），当时弗朗西斯科·塞纳托尔（Francesco Senatore）及其好心的同事 [阿列桑德拉·佩里吉奥利（Alessandra Perricioli）、特雷萨·杜尔索（Teresa d'Urso）、阿列桑德拉·科恩（Alessandra Coen）等] 极为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帮助，包括让我使用那不勒斯腓特烈二世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并与他们近距离交流。在天气好转之后，由于卡特琳娜·弗莱明（Katherine Fleming）的好意，我有幸能在皮耶特拉别墅（Villa La Pietra），即纽约大学设在佛罗伦萨的学术中心的一次聚会

中讨论本书的一些主题。在受邀参加了2010年6月于卑尔根（Bergen）举办的纪念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获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的座谈会后，我在挪威对结语做了进一步完善。

谨以本书献给我已故的先祖，在几个世纪里，他们来往于地中海之上：从卡斯蒂利亚（Castile）到圣地的萨法德（Safed）和太巴列（Tiberias），其间在士麦那稍作逗留；而后，我的祖父再次从太巴列向西而行，然后我的祖母又经海上返回太巴列；他们的同行者中还有我的先辈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他从卡斯蒂利亚的马克达（Maqueda）出发，最终到达了萨法德——以及里窝那和遍布意大利全境的阿布拉菲亚（Abulafia）、阿波拉菲奥斯（Abolaffios）、博拉菲斯（Bolaffis）家族的成员。本书书名采用了希伯来人对地中海的称呼，它出现在一句人们在看见地中海时会背诵的祈祷词中：“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君主，您创造了伟大的海，您是配得称颂的。”

大卫·阿布拉菲亚

2010年11月15日书于剑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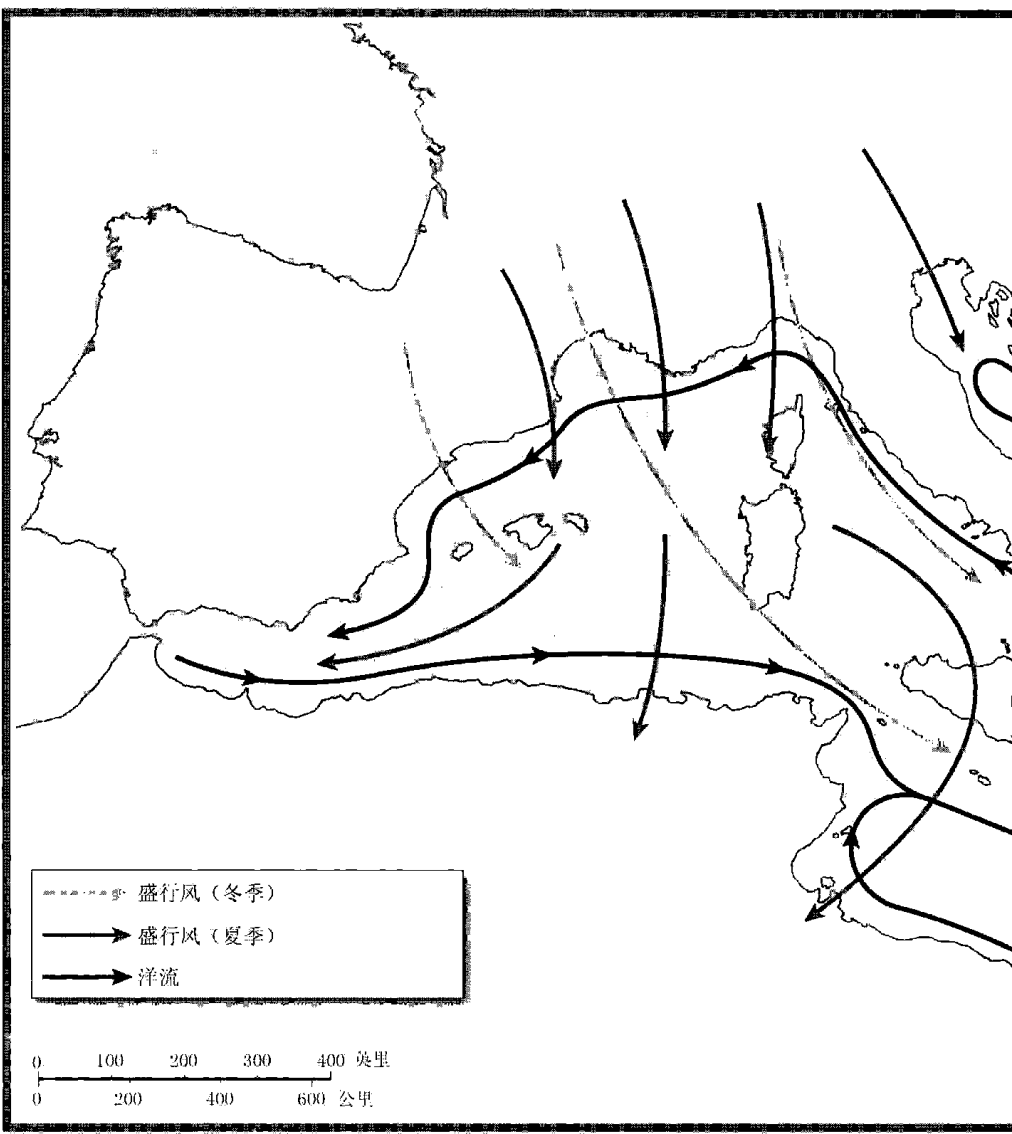
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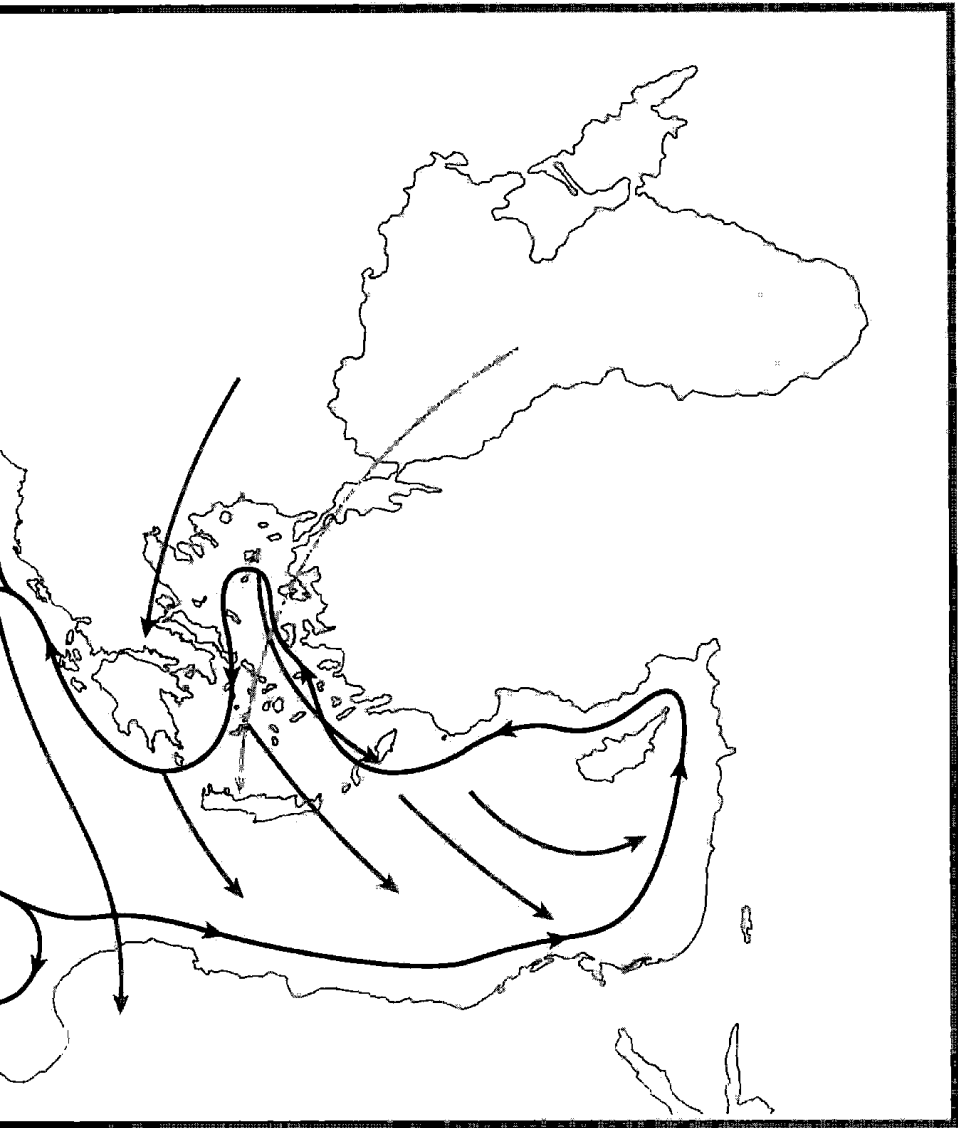
xxiii

在英语和罗曼语中，以“陆地之间”的海而著称的地中海已经被冠以多种称呼：罗马人将其称为“我们的海”（Our Sea），土耳其人将其称为“白海”（Akdeniz），犹太人将其称为“伟大的海”（Great Sea），日耳曼人将其称为“中部之海”（Mittelmeer），而古代埃及人则令人疑惑地将其称为“伟大的绿色”（Great Green）。当代作家进一步扩充了关于其名称的表示，赋予了它很多绰号，如“内海”（Inner Sea）、“环形之海”（Encircled Sea）、“友好之海”（Friendly Sea）、多元宗教的“信仰之海”（Faithful Sea）、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苦涩之海”（Bitter Sea）、因与邻近地区互通有无而微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被腐蚀的海”，以及像一块真正的大陆一样在具有精确边缘的空间内包含了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体的“液态大陆”（Liquid Continent）。因此，有必要在本书开篇对地中海的范围进行限定。自古代以降，黑海沿岸的谷物、奴隶、毛皮以及水果就源源不断地被运至地中海，但黑海是被地中海商人渗透的海，其居民并没有参与地中海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变迁。其与巴尔干半岛、欧亚大草原、高加索地区的来往穿越了陆地，黑海沿海因此形成了前景与特征与地中海不同的多种文明。而对于亚得里亚海的居民而言，事实则并非如此，因为在斯皮纳（Spina）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威尼斯人与拉古萨人（Ragusans），以及生活时间更接近当代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商人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地参与

了地中海的贸易、政治活动及宗教生活。本书中，地中海的边界首先是其自然边界，然后是人为的边界。这些边界线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也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达达尼尔海峡起到连接黑海与“白海”的作用，书中的描述偶尔也会涉及君士坦丁堡；还在亚历山大城至加沙和雅法的沿岸地区。在本书中，地中海的范围还包括地中海沿岸及海上的港口城市，特别是那些不同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的港口城市，如里窝那、士麦那及的里雅斯特等。一些岛屿，主要是那些当地居民放眼岛外的岛屿，也是本书的描写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本书中对科西嘉人（Corsicans）的描述要少于对马耳他人（Maltese）的描述。

与其他作者提供的关于地中海的视域相比，本书的视域可能相对狭窄，但它确实统一性更强。很多已出版的关于地中海的历史书籍的主题都是环地中海的陆地史，很自然，它们关注的更多是陆地间的相互影响。其中两部著述具有很强代表性。佩里格林·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与尼古拉·柏塞尔（Nicholas Purcell）2000年出版的巨作《被腐蚀的海》（*Corrupting Sea*）包含很多与地中海周边土地的农业史有关的观点，认为地中海史应该至少涉及近海十英里的陆地。他们阐述了地中海交通的一些基本方面：联系不同点之间的“通性”，以及当紧缩发生之时这种通性的“骤减性”。他们关注的基本是陆地上发生的事件而非海面上发生的事件。另一本是在众多地中海史学家间极负盛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该书于1949年首次出版，是20世纪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布罗代尔就引领了大批学者关注其所选时





代的地中海史研究，还引领了一些学者关注更早或更晚时期的地中海史。在他的影响下，还有很多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将研究拓展到了亚得里亚海及其他海域。之后，他成为深受尊敬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赢得很多荣誉，并在其于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创立的神秘“第六部”担任高职。但其思想的发展十分缓慢。一些法国文人，如受人尊敬的诗人、散文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945年逝世）对分布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本土的沿海地区及法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殖民地的“地中海文明”很是痴迷，认为存在“地中海文明”的观点在这三个国家的国民间十分流行。布罗代尔的书是他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及德国战俘营中长久深思后的产物，其间，布罗代尔的文化探索之旅开始于对过往政治关系（许多法国历史学家仍对这一话题抱有兴趣）的深入研究，途中经过了瓦莱里所提出的地中海文化认同，以写出上述从地理环境出发认识历史的著作作为终点。就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而不只是16世纪的地中海）而言，布罗代尔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位于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社会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他给出了一个新颖且令人激动的回答。布罗代尔方法的核心假设是“所有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且“人受制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¹ 本书在这两方面均持相反观点。布罗代尔呈现给我们的可以被称为地中海的横向历史，它主要研究该地区在特定时期的特征；而本书则试图呈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强调其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发生改变。

总体上，布罗代尔对政治史，即可被理解为“历史事件”（*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东西多少持轻视的态度。² 地中海的

地理环境被认为对于整个海域内发生的事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著作中将政治与战争置于接近结尾之处，而把重心放在其他部分，即环地中海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地中海本身的重要特征，也就是有助于人们决定海上航行路线的季风、洋流等自然因素。事实上，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地中海已经远远超出地中海本身，它包括所有那些经济生活受制于地中海的陆地：在书中多处，他都成功地将克拉科夫（Cracow）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纳入了探讨的范围。受他启发，约翰·普莱尔（John Pryor）将重点放在了季风与洋流带来的局限性上。普莱尔认为中世纪与早期现代的航海家很难在北非沿岸航行，强调在春秋两季间通航的重要性，因为这段时间的顺风有助于海上航行。与此相反，霍尔登与柏塞尔则认为，在季风和洋流不那么乐观，但在贸易和政治上有利可图之时，水手们会准备开辟新的航线。³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力造成的困难可以凭借技巧与机敏来克服。

当然，对于地中海的自然特征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地中海所拥有的一些特征均源自其内海性质。在久远的地质时期，它是完全封闭的；然后在一千二百万至五百万年前，水的蒸发达到了极限，地中海盆地变成了一个深空的沙漠；而后，这个盆地被大西洋的海水冲破，一般认为它在不久之后就装满了水。由于河流水系向地中海注水的速度远远不及海水的蒸发速度。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令人惊奇，要知道当时的一些河流流量极少，它们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上的一些小河细流，以及久负盛名但算不上大河的台伯河（Tiber）与阿尔诺河（Arno）（酷暑时分，阿尔诺河在流经佛罗伦萨之前只是一支涓涓细流）。事实上，也有一些大河汇入地中海，如尼罗河、波河

(Po) 及罗纳河 (Rhône)。在欧洲的河流中, 多瑙河与俄罗斯的河流体系也为地中海提供了间接补给。黑海从大陆深处的几个大河水系引入水流, 如此一来黑海就拥有了大量未经蒸发的水流, 它们形成的急流经伊斯坦布尔流入了爱琴海的东北部。但这仅能补充地中海损失水分的百分之四, 地中海海水的主要补充来源是大西洋, 它可以向地中海稳定地注入冰冷的海水,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地中海向外流出的水量。由于蒸发作用, 从地中海流出的海水更咸也更重, 流入的水因此浮在了流出的水的上面。⁴ 地中海两端都开放的事实对其海洋属性的保留至关重要。另一个开放的通道是苏伊士运河, 尽管由于河道极为狭窄, 苏伊士运河对地中海的影响十分有限, 但它为地中海带来了生长于红海与印度洋的鱼类。

从大西洋注入地中海的洋流阻止了中世纪的航海者经常性地从直布罗陀海峡出行, 但这并未阻止维京人、十字军及其他人进入地中海。主要的洋流自直布罗陀海峡沿非洲海岸东行, 呈环状绕行以色列、黎巴嫩及塞浦路斯, 而后环绕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第勒尼安海, 最终沿法国与西班牙海岸返回赫拉克勒斯石柱 (Pillars of Hercules)。⁵ 至少在桨与帆的时代, 这些洋流是一种重要的动力, 可以使船只在地中海上的航行更顺利。甚至有证据证明, 即使在多风的时节, 人们也可以利用洋流往返于地中海上。这一地区气候体系的运动倾向为自西向东, 故而巴塞罗那与比萨之间各港口的船只在春季可以利用季风向撒丁岛、西西里岛和黎凡特 (Levant) 航行。但在冬季, 西地中海主要受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影响; 在夏季, 它则受到停留在亚速尔群岛 (Azores) 上方的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将冷空气带入普罗旺斯 (Provence) 谷底的密史脱拉风

(*mistral*) 构成了冬季潮湿多风的气候的典型特征，但与之类似的还有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布拉风 (*bora*) 或屈拉蒙塔那风 (*tramontana*)。约翰·普莱尔指出，普罗旺斯近岸之所以被称为“狮子湾”，是因为密史脱拉风的呼啸声就像雄狮的吼叫声。⁶ 尽管现代人描绘的地中海都以阳光普照的形象出现，但没有人会低估地中海冬季风暴带来的忧虑和高度危险。有时低压天气系统会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形成并向北移动，形成令人不安的热风，它们被称为西洛可风 (*scirocco*，意大利的叫法)、西罗科风 (*xaloc*，加泰罗尼亚的叫法) 或喀新风 (*hamsin*，以色列与埃及的叫法)；大量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红色尘土可能会沉降至地中海周围的土地。只要船只的航行还需要依赖帆力，北风占优势之时北非沿岸的航行就十分危险，因为这些风可能会将船只吹向沙滩搁浅，而且可能使它们在南部地中海近岸触礁。正如普莱尔认为的，地中海北岸的很多险峻岬角以及一些小湾和海滨对航海者更有吸引力，但这些小湾也是海盗青睐的便于隐匿的角落或缝隙。⁷ 在中世纪时期，如果船只于春季自热那亚或马赛出发，沿地中海北岸航行，经西西里岛与克里特岛，再绕塞浦路斯到达埃及，那么著名的自西向东的黎凡特贸易通道会更易于航行。直到蒸汽机船的出现，才有了从克里特岛抄近路直达尼罗河河口的典型实践。尽管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地中海的风向与洋流是一致的，但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很多文献都提到了来自西北的波瑞阿斯 (*Boreas*) 风，这说明布拉风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xiv

气候的改变可能对近海地区土地的生产力有重要影响，进而也会对地中海的谷物贸易产生影响。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贸易十分重要，但之后其地位逐渐降低。公元 16 世纪与 17 世

纪的气候变冷可以解释为何粮田会荒芜，以及为何从北欧进口粮食变成了一种常见做法（导致荷兰与德国商人在地中海的实力获得提升）。沿岸地区的干燥可以表明气候发生了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人为的破坏通常也是明显的：11 ~ 12 世纪，北非发生了新一波的阿拉伯人入侵，很可能导致人们忽视了大坝和灌溉工程，农业也因此蒙受了损失。在罗马帝国晚期，小亚细亚半岛经济的衰落随着葡萄园和橄榄种植园的废弃进一步恶化，曾经由这些植物保养的土壤此时已经被冲入河流并形成了淤积。⁸ 在当代，一些大坝，例如上埃及著名的阿斯旺大坝（Great Aswan Dam），已经改变了水流注入地中海的模式，进而对洋流和空气湿度也造成了影响。尼罗河的季节循环在人类的作用下才发生了改变，这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埃及人的经济生活，结束了每年泛滥一次的、曾经被古埃及人视为神明恩赐的洪水。但另一方面，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夫（Alfred Grove）与生态学家奥利弗·莱克哈姆（Oliver Rackham）认为人类对地中海环境的影响远不及我们认为的那么严重，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显示，它对气候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及人为破坏有一种很强的恢复能力。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并不能决定气候的变化，或者说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不会；至于侵蚀，虽然要考虑人为的因素，但其发生也是符合自然进程的——其在恐龙生活的时代也曾发生。关于人类影响自然的方式，经常被提及的是森林的砍伐，其对西西里、塞浦路斯及西班牙沿岸有很大影响。砍伐的目的最初是获取用于船只建造的木材，而后则是清理土地以建设新城或扩建城镇与村庄，但自然的再生也在同时发生。尽管如此，格罗夫与莱克哈姆对地中海的未来却不怎么乐观，因为水资源和鱼类资源被过度开发，

一些地区还面临沙漠化的威胁，且关于全球变暖的诸多可信预言即使最终只有部分成真，沙漠化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恶劣。⁹ 回顾地中海的历史就是观察人与自然的共栖关系，这种关系最终可能会走向终结。

本书并不否定风与洋流的重要性，但我希望用这本书令读者关注人类穿越地中海的经历，或在以海为生的各港口城镇和岛屿生活的经历。在对地中海史的塑造方面，人类的影响力要远比布罗代尔所认为的更大。本书涉及了很多政治方面的决策：海军应着手征服叙拉古（Syracuse）还是迦太基（Carthage）？阿克（Acre）还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梅诺卡（Minorca）还是马耳他（Malta）？这些地方的战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周边的地理环境。这不仅和风与浪有关，还有一些其他限制性因素：一艘商船上的新鲜食物和淡水可以满足船上成员两周的生活所需，但战船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大量食物和淡水。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控制公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至少在帆船时代是这样的；如果船只无法进入一些友好港口获得补给和检修，任何国家（或者权力集团）——无论其拥有多少艘战舰——都无法在海路上畅通无阻。因此，应将控制地中海而发生的战争看作争夺沿岸地区、港口和岛屿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是争夺公海控制权的战争。¹⁰ 为了应对几乎一直存在的海盗威胁，与海盗及其头目进行一些暗地里的交易是有必要的：可以给予他们礼物和进行贿赂，以换取商船的自由通行。前沿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科孚岛（Corfu）由于其所处位置，已经被那些企图控制进入亚得里亚海的门户的人觊觎了几个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和英国人先后经地中海建立了一系列属地，它们可以很好地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然而奇怪的

是，那些被选为港口的地方通常并不是天然良港，这说明地理优势绝非唯一的考虑因素。亚历山大城因经常出现海潮而难以靠近；中世纪的巴塞罗那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片海滩而已；比萨只在靠近阿尔诺河入海口处才有些许泊位；甚至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到达雅法（Jaffa）的船只还需要在海上卸载货物；墨西拿（Messina）的港口则位于靠近激流之处，古典时期的评论家将其认定为两大恐怖海妖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所在地。¹¹

人类史涉及对一些非理性或者理性决定的研究。这些由个体或群体做出的决定在几个世纪或几千年后已很难为我们所理解，且它们在出台之时可能就已经难以理解。但是一些小的决定就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公元 1095 年，一位教宗在法国的克莱蒙（Clemont）发表演说，该演说话辞含糊却充满激情，进而诱发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不同于基督徒的魅力型领导者，土耳其互为竞争对手的将领之间的争斗导致 1565 年奥斯曼陆军与海军在马耳他出人意料地战败了——即使在这种时候，西班牙还是冒着失去其王牌据点西西里岛周围海域的危险，没有及时地派出急需的援军。地中海上还发生了一些以少胜多的战役：莱山德（Lysander）、劳里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以及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等有才干的海军将领的胜利改变了地中海的政治版图，挫败了雅典、那不勒斯或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的称霸计划。一些杰出商人将其利益置于基督教事业之前。历史的车轮在转动，未来还是未知数，人的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向前滚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注 释

1. F.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 Reynolds, 2 vols. (London, 1972-3), vol. 2, p. 1244; P. Horden and N.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2000), p. 36.
2. E. Paris, *La genèse intellectuelle de l'œuvre de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23-1947)* (Athens, 1999), pp. 64, 316.
3. J.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pp. 7, 21-4; Horden and Purcell, *Corrupting Sea*, pp. 138-9.
4.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p. 12-13.
5. *Ibid.*, p. 14, fig. 2.
6. *Ibid.*, p. 19.
7. *Ibid.*, pp. 12-24; C. Delano Smith, *Western Mediterranean Europe: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taly, 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since the Neolithic* (London, 1979).
8. See F.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 MD, 2008), and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1, pp. 267-75; C. Vita-Finzi, *The Mediterranean Valleys: Geological Change in Historical Times* (Cambridge, 1969).
9. A. Grove and O. Rackham, *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an Ecological History* (New Haven, CT, 2001); O. Rackham, 'The physical setting', in D. Abulafia (ed.), *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 32-61.
10.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p. 75-86.
11. S. Orvietani Busch, *Medieval Mediterranean Ports: the Catalan and Tuscan Coasts, 1100-1235* (Leiden, 2001).

目 录

图片列表 / 4

转写与纪年体系 / 1

序 / 3

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 10

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前 22000 ~ 前 1000 年） / 1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前 22000 ~ 前 3000 年） / 3

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 3000 ~ 前 1500 年） / 19

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 1500 ~ 前 1250 年） / 38

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前 1250 ~ 前 1100 年） / 56

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前 1000 ~ 600 年） / 81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前 1000 ~ 前 700 年） / 83

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前 800 ~ 前 550 年） / 110

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前 800 ~ 前 400 年） / 134

四 通往金苹果园（前 1000 ~ 前 400 年） / 161

五 制海权（前 550 ~ 前 400 年） / 180

六 地中海的灯塔（前 350 ~ 前 100 年） / 203

- 七 迦太基必须灭亡（前 400 ~ 前 146 年） / 227
- 八 “我们的海”（前 146 ~ 150 年） / 261
- 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1 ~ 450 年） / 291
-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 ~ 600 年） / 311

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600 ~ 1350 年） / 331

- 一 地中海交通（600 ~ 900 年） / 333
- 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 ~ 1050 年） / 356
- 三 地中海的变迁（1000 ~ 1100 年） / 374
- 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1100 ~ 1200 年） / 395
- 五 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 ~ 1185 年） / 419
- 六 帝国的兴衰（1130 ~ 1260 年） / 438
- 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1220 ~ 1300 年） / 461
- 八 “关闭”大议会（1291 ~ 1350 年） / 490

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1350 ~ 1830 年） / 513

-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1350 ~ 1480 年） / 515
- 二 西方的变迁（1391 ~ 1500 年） / 544
- 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1500 ~ 1550 年） / 574
- 四 白海之战（1550 ~ 1571 年） / 597
- 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 ~ 1650 年） / 632
- 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1560 ~ 1700 年） / 657
- 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1650 ~ 1780 年） / 682
- 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1760 ~ 1805 年） / 705
- 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1800 ~ 1830 年） / 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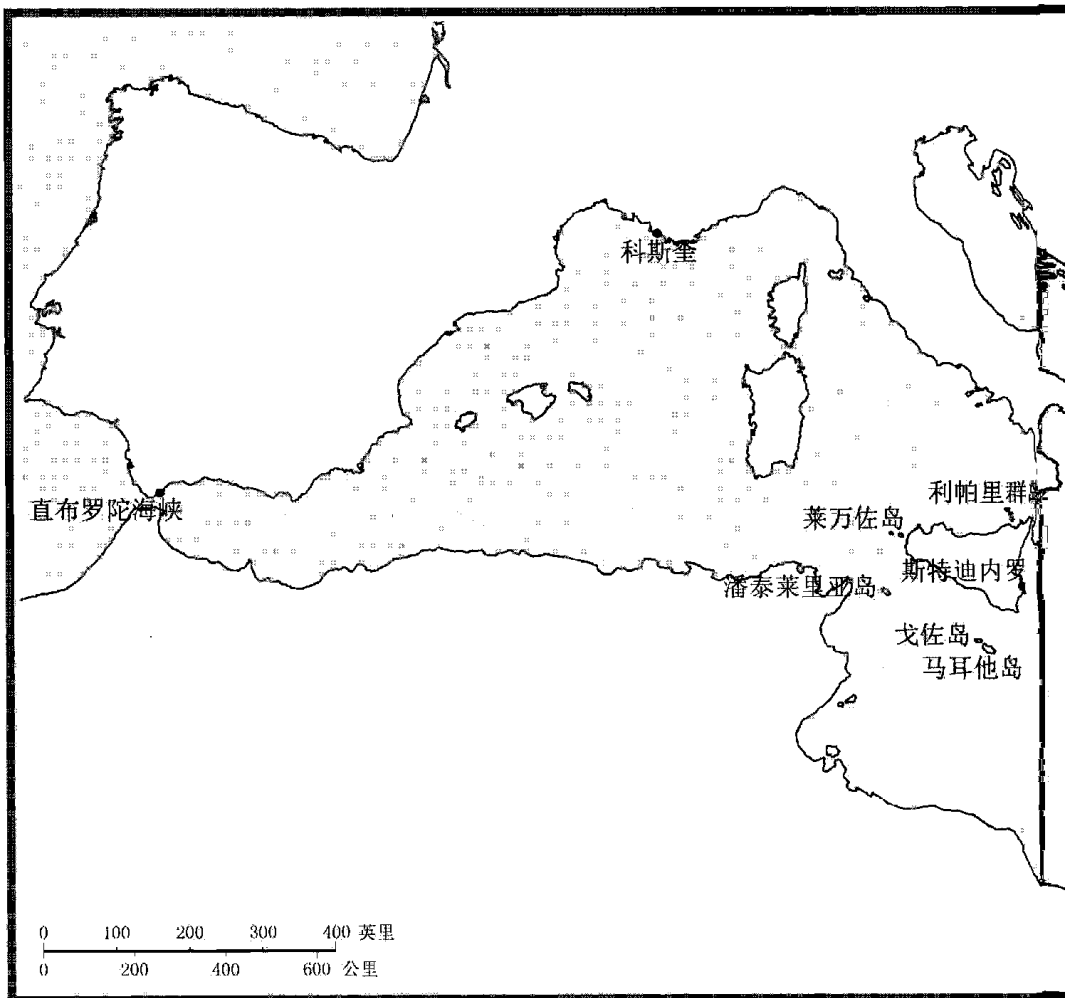
第五部 第五地中海 (1830 ~ 2014 年)	/ 757
一 昔日二者即将相见 (1830 ~ 1900 年)	/ 759
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 (1830 ~ 1920 年)	/ 781
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 (1900 ~ 1918 年)	/ 795
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 (1900 ~ 1950 年)	/ 808
五 我们的海——再现 (1918 ~ 1945 年)	/ 833
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 (1945 ~ 1990 年)	/ 849
七 末代地中海 (1950 ~ 2014 年)	/ 868
结语：穿越大海	/ 885
扩展阅读	/ 894
译后记	/ 898
索 引	/ 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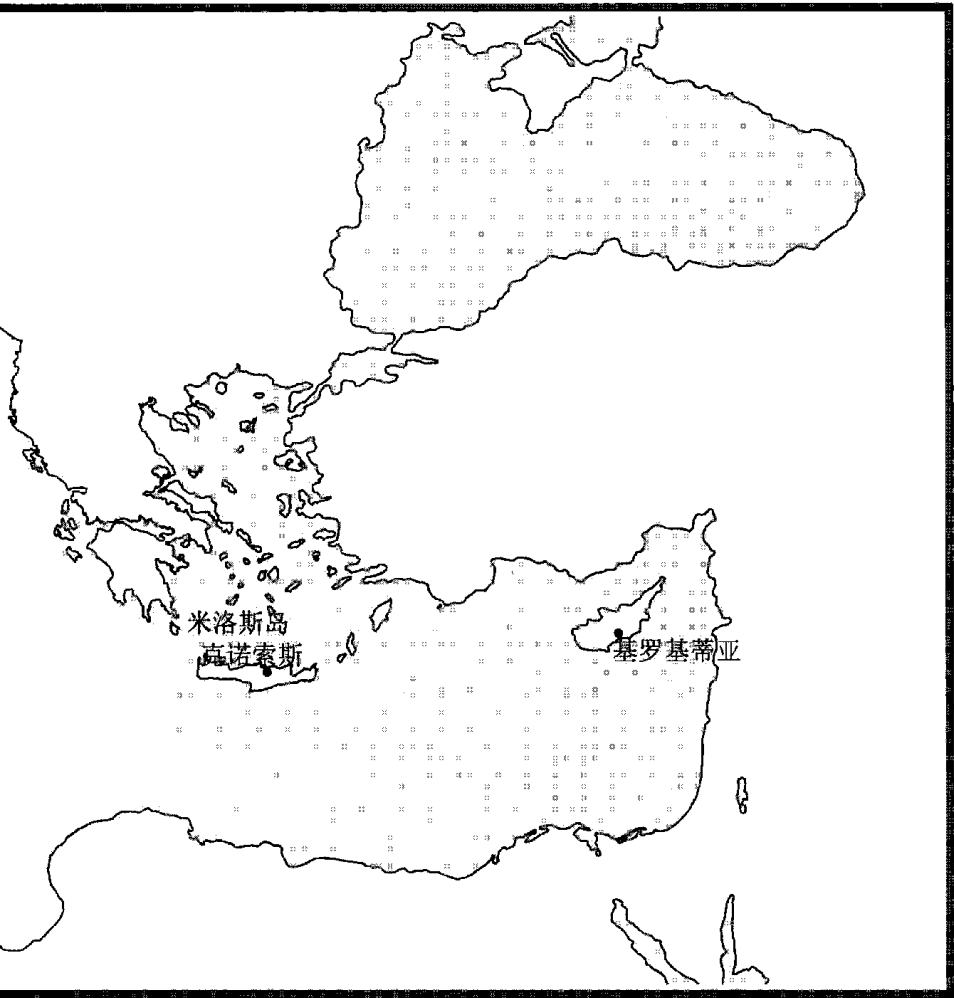
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
(前 22000 ~ 前 1000 年)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 (前 22000 ~ 前 3000 年)

1

在人类来到地中海之前，它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从人类在海上航行以寻找定居地、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之时起，地中海就成了联系此岸与彼岸的“陆地之间的海洋”。43.5 万年前，一些早期人类已经定居在毗邻地中海的土地之上，这一点可以由建立在现今罗马附近的一处猎人营帐证实。还有一些人在尼斯 (Nice) 附近的阿玛塔遗址 (Terra Amata) 用树枝搭建了简易棚屋，并在住处中央垒砌了灶台，他们的食物有犀牛肉、象肉、鹿肉、兔肉和野猪肉。¹ 我们并不知晓早期人类是何时冒险渡过海洋的。2010 年，雅典的美国古典学研究院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宣布，他们在克里特岛 (Crete) 发现了早于公元前 13 万年的石英手斧，这表明早期人类已经找到一些穿越海洋的方法——尽管他们可能也是无意间被风暴带至那里的。² 直布罗陀岩洞中的发现表明，在 2.4 万年前，有另一个人类种群在眺望大海另一端的摩西山 (Jebel Musa)，它清晰可见地耸立在对面的非洲海岸上：发现于 1848 年的首副尼安德特人遗骨属于一个居住在直布罗陀岩 (Rock of Gibraltar) 的洞穴中的女人。最初人们并没有马上鉴定出这些残骨属于一个新的人种，直到八年之后类似的骸骨在德国的尼安德谷 (Neander Valley) 出土，该人种才获得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这





一种群其实应该叫作“直布罗陀女人”（Gilbraltar Women）。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从周边海域获取食物，它们包括贝类和
4 甲壳类海洋生物，甚至还有海龟和海豹，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岩洞和海洋之间横亘着一片广阔平原。³可是在被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即我们所属的那个分支）统治的摩洛哥，并无证据显示当地曾有尼安德特人存在。显然，这两个人种被海峡隔开了。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在地中海上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今日的一些岛屿在当年可通过陆桥抵达，这些陆桥后来因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了。邻近马赛的科斯奎（Cosquer）洞穴内有智人制作的石雕，其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0年，而壁画的时间应早于前19000年。该洞穴现在位于海平面以下，但在当时，它距地中海沿岸还有几英里。第一个关于短距离航海的有力证据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the Upper
5 Palaeolithic），即约前11000年。当时，游访者已踏上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中的米洛斯岛（Melos），以寻找用来制作石器的黑曜岩，这种石材打制的石刃比燧石更锋利。在西西里岛我们已发现几十个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多沿海岸分布。尽管生活在这些遗址中的居民也猎杀狐狸、野兔和鹿，但他们以软体动物为主食。他们关注死者，会在死者身上涂一层赭石颜料，有时候会给死者戴上项链，然后再将其埋葬。在西西里岛西端，他们占据了现在埃加迪群岛（Egadian islands）最东端的几个岛屿（在当时可能是与西西里岛相连的小岬角）；莱万佐岛（Levanzo）便是其中之一，约前11000年，他们在那里用雕刻和壁画装饰了一个洞穴。凿刻的雕像中有鹿和马，其形象可谓栩栩如生。涂绘的壁画更具写意性，人

物的构图颇为粗糙，且被鉴定为较晚时期占据洞穴者的创作。⁶西西里洞穴的绘图和壁画说明当时存在一个成熟的狩猎采集社会，我们还可从其他证据得知他们用燧石和石英制造有效的工具，还创立了包括交感巫术在内的一些仪式，旨在获得捕猎的成功。他们用于狩猎的工具具有弓、箭和矛；他们居住在洞穴和岩穴中，但也会住在露天搭建的营帐中。他们在岛上分布稀疏，尽管他们的祖先就地取材制造了将自己运往西西里岛的简单船只，但这些后世子孙并未对海洋做进一步探索。⁴

虽然西西里岛的第一批居民生活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但与其他散布于地中海海滨的数百代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相比，其生活方式并没有显著不同。但这并不是说其生活方式过于简单。把他们与澳大利亚或亚马孙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游牧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处于哪种生产力水平，复杂的神话和仪式在过去几千年间已经使家族和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它的发生也是十分缓慢的，未必包括可被称为“进步”的因素，因为就技术（如洞穴艺术家所掌握的那些）而言，它们可能延续，也可能失传。约公元前 8000 年，气候渐暖，引发了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鼓励小族群迁徙他处寻找传统猎物，有时则促使他们寻找其他替代食物，尤其是来自海洋的食物。由于冰川融化，海平面逐渐上升了一百二十米。现代地中海的轮廓已变得清晰可辨，地峡转变为岛屿，海岸线基本退至现在的位置。但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并不是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到的。⁵

在这些不停迁徙的人群中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化，他们四处游荡以寻找食物，到达易于接近的山顶和海湾，从一个定居地

迁徙到另一个定居地，来来去去地穿行于各聚落。但是当族群对某些特定的区域熟悉之后，他们便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饮食习俗。或许由于埋葬尸骨和装饰洞穴的缘故，他们对土地有了一种真正的依恋。偶尔，石器会不断易手，流传于群落之间，抑或因部落间的冲突而被夺取。总之，他们依赖于海洋和陆地提供的野生动物、鱼类和浆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人口规模很小，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整个西西里岛的人口可能不过数千人，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动物数量的影响日益加深。大量动物开始灭绝，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野马，它们先于人类到达西西里岛——当时西西里岛与意大利还是完全连为一体的。这些野马被记录在了勒瓦佐洞穴的壁画上，它们是盛宴上的食品。

从这一过渡时期至约公元前 5000 年，是我们熟知的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当时石器变得更为精制，但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及谷物耕种技术尚未出现。史前西西里人的食物转向了海产品，他们在海洋中捕捉鲷鱼和石斑鱼，在一些考古遗址中我们已发现大量贝蚌壳，其中有一些还经过雕刻并被饰以赭色。至前 6400 年，在后来被称为突尼斯的地方出现了卡普萨文化（Capsian culture），该文化极其依赖贝蚌类食物，且在海岸线留下了大量贝冢。⁶ 向东，在爱琴海，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有时会经基克拉泽斯群岛到达米洛斯岛采集黑曜石并将其运回希腊本土的洞穴内，如距米洛斯岛一百二十公里的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船可能是用芦苇制成的，而切削芦苇使用的则是经改良的小而锋利的石器或者细石器（microliths）。由于海平面仍在上升，岛屿间的距离比今天更短。⁷ 中石器时代的西西里人已经知晓

黑曜石是从西西里岛东北方的火山群岛利帕里（Lipari）获得的。穿越广阔海洋的迁徙活动已经开始。这种迁徙是局部性的、间歇性的，但也是具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是搜集珍贵材质以制造更优质的工具。这种迁徙并不是“贸易”。这时可能还没有人定居于米洛斯岛或利帕里群岛上；即使有，定居者也无法表达他们对岛上的火山石具有优先使用权。西西里岛或希腊的史前人类制作黑曜石刃的目的并不是将它们送至内陆地区的相邻群落。自给自足就是此时的规则。为寻找证据证明早期人类在为获得渴求的物品进行有目的的旅行，我们有必要快速跳跃到新石器时代（Neolithic）。在这个时代，社会已经开始分层且变得更为复杂，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

2

事实上，存在于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族群的“新石器时代 8 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是开始于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的关于如何掌控食物资源的一系列独立发现。驯化的牛、绵羊、山羊和猪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肉、奶和可用来制作工具的骨头，后来还提供了可用来缝制衣服的纤维。人们认识到作物可以在相应季节轮番播种，因此开始种植各种品种的麦子，最初是半野生的双粒小麦（*emmers*），最后（在地中海）出现了早期的小麦和大麦产品。最早的陶器——以手工而非陶轮塑形——已经开始被用来贮存食物。人们的劳动工具还是用燧石、黑曜石及石英石打制的，但这些工具变得更小巧，且其用途变得更加具体化，这种趋势在中石器时代已经比较明显。这意味着劳动分工不断明确，出现了一个有技能的工具

制造者阶层，他们像寿司厨师那样经历了看似简单实则长期而复杂的训练。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完全有可能创立复杂的、由不同阶层构成的政治机制，如君主制，并依据个人的身份和劳动分工来确定其社会地位。

集中性聚落发展起来，人们筑建围墙，既靠本地物产又靠从外地买入的产品为生。第一个集中性聚落是约在公元前8000年出现的耶利哥（Jericho），它在前8千纪早期有约两千位居民，当地的黑曜石来自安纳托利亚而非地中海。大约自前10000年起，郁南 [Eynan，即马拉哈（Ayn Mallaha），位于今以色列北部] 的居民已开始培育谷物、磨制面粉，此外他们还有闲情逸致在石头上雕刻简单却优美的人物肖像。由于新的食物来源出现，东地中海的人口不断增长，对资源的竞争导致部族间的冲突更为频繁地发生，武器也因此被更多地用来防备同类而非捕猎动物。⁸ 冲突促进了迁徙，人们从安纳托利亚或叙利亚迁至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至前5600年，一个有几千人的部族已定居于塞浦路斯的基罗基蒂亚（Khirokitia），他们用切割开的石头而非黏土制作容器。作为最早的塞浦路斯人，他们虽然也从外部运进一些黑曜石，但还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土地和羊群身上。他们在石头地基上用泥砖建房，卧室在房舍的

9. 第一层，而祖先的坟墓则被安置于房舍的地板之下。不大引人注目的是，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Knossos），最早一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定居点可追溯至约前7000年，它标志着外来者集中迁至该岛的过程的开始，这个海岛在青铜时代（Bronze Age）的东地中海将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居民携带谷物种子和动物沿小亚细亚半岛海滨到达克里特岛，因为在克里特岛上并不存在与其饲养的动物相近的野生属种。他们种植小麦、大麦

和扁豆。他们大约在五百年后才掌握了制陶术，而纺织术在前5千纪的前半期才出现。陶器的缺乏表明他们是一个孤立的族群，并没有效仿其东部近邻的制陶术。他们从西北不远处的米洛斯获取黑曜石。不过，一般而言，克里特人并不关注大海：发现于克诺索斯最底层的数量不多的贝壳受到了水的侵蚀，表明人们是在壳中生物死亡很久后，才将搜集的贝壳制作成了装饰品。⁹但是与外界的联系已经开始改变早期克里特人的生活。约前6500年，人们开始生产黑色的、表面较为光滑的陶器，它们与当时的安纳托利亚风格的陶器有些相似。这里的制陶技术不是渐近发展的，而是从外部整体引入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进一步的迁徙发生在了岛屿的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Phaistos），但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千年，其间克里特人逐渐转向海洋。事实上，对于出现在克里特岛上的这种独特的文明，最好的理解是它是发展缓慢、拥有强大地方特征的土著文化与不断增强的外部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新技术和新模式被克里特人依照自己的需求采用，从而具有了属于克里特岛的特色。

这时，人们已经制作了手推磨和臼，建立于石头地基上的房子成为人们固定的居住地，陶工需要特制的工具来塑造和烧制器皿。劳动分工的发展需要专门的工具，对黑曜石的需求也增加了。黑曜石的诸多优点足以抵消人们在获得它的过程中遇到的麻烦：它极易打磨成薄片，边刃也非常锋利。米洛斯的那些开采时间长达约一万二千年之久的黑曜石石场在青铜时代早期极受欢迎，当时金属器具开始变得更加风行。而黑曜石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是因为它价格较低：在早期青铜时代，金属制

作很难开展。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内，分工不断细化，但对米洛斯石场的开发依旧没有规划，且缺乏商业特征。尽管在岛上的菲拉科皮（Phylakopi）也出现了定居点，但当时黑曜石的采集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在该定居点繁荣发展的时候，其黑曜石石场已经开始衰落；此地的第一批定居者并非黑曜石商人，而是金枪鱼捕捞者。¹⁰米洛斯并无专门的港口，寻找黑曜石的人首先要找到适合的小海湾停泊船只，然后再前往石场，将这种火山石劈砍为片状。

3

为寻找关于新石器时代欧洲大规模建筑工程的重要证据，我们很有必要将目光转向西部，如马耳他岛（Malta）和戈佐岛（Gozo）的神庙和圣所，它们的建筑年代甚至早于金字塔。马耳他的神庙是由一批用自己的双手创立了一种独特文化的渡海者所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已经注意到，“五千多年前，在马耳他，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或者更大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化在约公元前 3500 年全面崛起。¹¹老派的文化传播论假设，即这些神庙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金字塔或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s）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然而，神庙的修建者尽管不是模仿者，但也未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其他文化的模仿对象。约前 5700 年，人类开始在马耳他定居，他们来自非洲，更可能来自西西里岛，他们的文化体现在现存最早的马耳他石墓中。早期马耳他居民在到来时准备充分：他们带来了双粒小麦、大麦和扁豆。他们开垦了岛上的一些土地，开辟了可耕地，岛上本来被大片森林覆盖，但

这些森林现在完全消失了。他们从西西里岛附近的火山岛上获取工具，从潘泰莱里亚岛（Pantelleria）和利帕里群岛获取黑曜石。自前4100年起，岛屿文化开始以独特的方式发展。在约前3600年之后的一千年里，人们挖掘、修建了巨大的地下坟墓或地窖用于集体墓葬，这表明马耳他居民内部有一种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戈佐岛的吉甘提亚（Ggantija）和马耳他岛的塔尔欣（Tarxien）正进行着宏伟的建筑工程。神庙的正面贴岩壁被切凿成巨大的凹面，面对着封闭式庭院；覆以屋顶的建筑内有走廊、通道及隔间；多处半圆形房屋的布局都呈三叶草形。建造者的初衷是建立从很远处就能看到的巨型神庙，当人们从海上前来时，便会看到眼前的神庙越来越高地矗立在岛上，例如马耳他南部的哈扎伊姆（Hagar Qim）神庙便修建在地中海上的陡峭悬崖上。¹²

随着时间的流逝，岛上建筑缓慢出现，就像中世纪的那些大教堂一样，且它们并无统一规划。¹³奇怪的是，这些建筑没有窗户，但以前一定存在着大量用木料或石料制作的配饰。石料配饰得以完全保留下来，它们通常都刻有精美图案，包括螺旋式图案。史前马耳他文化包含的不仅仅是那些不朽建筑，神庙中还有大量塑像，通过一些留存的塑像残片我们可以断定，其表现的是一位与生育和繁殖相关的大母神的形象。在塔尔欣，有一尊近两米高的女性塑像是当时的崇拜中心；显而易见，在同一时期的西地中海并未出现类似的崇拜地。在塔尔欣神庙的居室中我们可以找到举行祭祀仪式的明显痕迹。在一个洞穴内的祭坛上，我们发现了一把燧石刀，祭坛周围还有牛骨与羊骨。我们还挖掘出一些贝壳，表明海洋食品在当地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岩画上还涂有船的草图。¹⁴所有建筑物和

雕刻物均是在没有使用金属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马耳他直到约公元前 2500 年才有了金属。

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孤立的世界。据估计，在新石器时代，岛上人口数量低于一万人。然而岛上的劳动力完成了六个大圣所和很多小圣所的修建，表明岛屿可能已被划分为几个行政区域。可能有人希望发现关于冲突的证据，比如矛尖；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证据留存：这是一个和平的聚落。¹⁵ 马耳他岛和戈佐岛可能是圣岛，获得了地中海中部地区各部族的尊重，类似于希腊古典时期的提洛岛（Delos）。在塔尔欣，我们在神庙的一块板材上发现了一个洞，这或许可证明此地是一处圣所遗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外来者到访的证据。如果它们是圣岛，那么其神圣性应该部分体现在如下惯例中：此地不可靠近，只有那些献身于女神的土著马耳他人才可在此居住。不仅这些女神以大大小小的塑像形式被展示出来，而且神庙的形状——外形丰满突出，内部形似子宫——也表现了对女性的崇拜。

这一文化的消失如同其产生一样令人不解。长期的平静状态在公元前 16 世纪中叶终止。神庙文化并没有衰落的迹象；但由于入侵者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断层时期。外来入侵者缺乏建造此类大型建筑所需的技术，但有一个优势——他们拥有青铜武器。根据出土的泥陶织锭和碳化的布匹我们可断定，他们来自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东南部，且善于纺织。¹⁶ 到前 14 世纪，他们又被另一群西西里人取代。但此时的马耳他已经失去了其独特性：移居者与马耳他人的后裔杂居于这些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先人们留下的不朽居室中。

4

在数百年间马耳他岛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西西里岛的形势则更加多变，因为后者面积更大，且拥有各种资源。利帕里群岛上的可开采的黑曜岩吸引了迁居者的前来。正如我们在位于叙拉古（Syracuse）附近的斯特迪内罗（Stentinello）可以看到的，迁居者们带着自己的文化来到此地，他们的社会在公元前4千纪初开始兴盛，其时马耳他神庙还在建造中。斯特迪内罗遗址上分布着很多小棚屋，有一面约二百五十米长的界墙，墙外有沟渠环绕，在墙中我们发现了陶器和小型的兽首塑像。这是一个繁忙的村庄，有自己的手艺人，掌控着周边的乡间和海滨，并从这些周边区域获取食物。这些居民的定居点让我们想起了意大利东南部的那些定居点，因此斯特迪内罗人的祖先很明显来自那里。

从最早的斯特迪内罗文化时期到后来的紫铜和青铜文化时期差不多有三千年，在这一期间并未发生急剧变化，且移民是间歇性的——在此之前，并没有大的移民浪潮冲击地中海。但这种缓慢的、逐渐渗透的外部影响创造出了一种共同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在新石器时期，斯特迪内罗的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部族有相似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讲同样的语言（由于没有书面文字，我们无法得知他们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也不表示他们供奉的是同一个祖先。但他们都参与了酝酿出农耕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伟大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一种风格相近的粗糙压花陶器出现在了从叙利亚至阿尔及利亚、从西班牙至安纳托利亚的诸遗址中。在同一时期，利帕里不再只是一个人们可任意开采黑曜石的据点，而成了一

些部族的定居之地，这些部族与斯特迪内罗的居民有相似的口味和习惯。公共海域不能阻碍这些史前居民间的交流，移居者向南航行，斯特迪内罗风格的陶器也出现在了一些突尼斯的遗址中，这些遗址中同时还有来自西西里岛和非洲间的潘泰莱里亚岛的黑曜石。¹⁷

由于利帕里掌控了黑曜石的供应，当地的生活水平很高。一系列不同风格的陶器的出现是否能说明居民人口构成的变化，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在艺术风格改变的同时该岛的居民成分却没有发生改变，现代意大利的研究者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元前6千纪，陶器以饰有红色火焰为特征。然后出现了纯棕色或纯黑色陶器，其特点是表面柔滑有光泽且制作工艺精湛。至前5千纪，这些陶器均让位于饰有曲线状或螺旋状的波纹图案的陶器，后者与意大利南部内陆和巴尔干半岛上发现的陶器非常接近。接下来，在前4千纪初，这里又引进了简约风格的红陶，它们最早出现在久已存在的“迪亚那文化”（Diana culture）中，该文化以其遗址的主要发掘地而得名。此处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岛屿的文化发展缓慢，其社会结构十分稳定。¹⁸

水手们穿过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或西西里海峡，向岛上运送、供应物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易坏之物，只有陶器和黑曜石是易于保存的。对这些早期航海者使用了何种船只，我们只能猜测。在公海之上，将船只覆以毛皮可以使其与水隔绝；另外，这类船也不会太小，因为它们不仅用来载人，还要运送动物和陶罐。¹⁹后来的证据，也就是来自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陶器上的线形绘画表明，这些船吃水较浅（因此它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极为不稳），且船的动力源自船桨。有人用一艘名

为帕皮勒拉（Papyrella）的芦苇筏做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这类船的移动速度极为缓慢——最快为每小时四节，如果遇上坏天气则速度更慢。从阿提卡（Attika）出发，一路沿海岛航行，最终到达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米洛斯岛，这通常可能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²⁰

在地中海，还有一些岛屿只有很少的定居点，包括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和撒丁岛。虽然马略卡岛（Majorca）和梅诺卡岛（Minorca）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才出现制陶术，但前5千纪初便有人类在这两座岛上定居，且由于早期移居者放弃了与大自然的斗争，岛上很可能有一个偶然的间断期。撒丁岛上最早的居民似乎已经开始饲养家畜，这些动物一定是被他们带至当地的。²¹在北非海岸一带既没有出现大型建筑，也没有出现马耳他那样的繁荣迹象。对于大多数地中海海滨的居民来说，他们外出冒险的范围不会超出能看到他们自己住所的渔场。尼罗河三角洲及其西部的法尤姆（Fayyum）于前5千纪出现了一些农耕区，但这只是埃及当地的现象，而非地中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农耕区标志着当地居民对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做出了创造性的反应——他们使用了井水浇灌或者浸灌的方法。至少在几个世纪内，下埃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马耳他岛、利帕里群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均是发挥了特殊作用的相当罕见的海岛型人类聚落：利帕里群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为石器制作提供了石材，而马耳他则是一种复杂宗教的神秘崇拜中心。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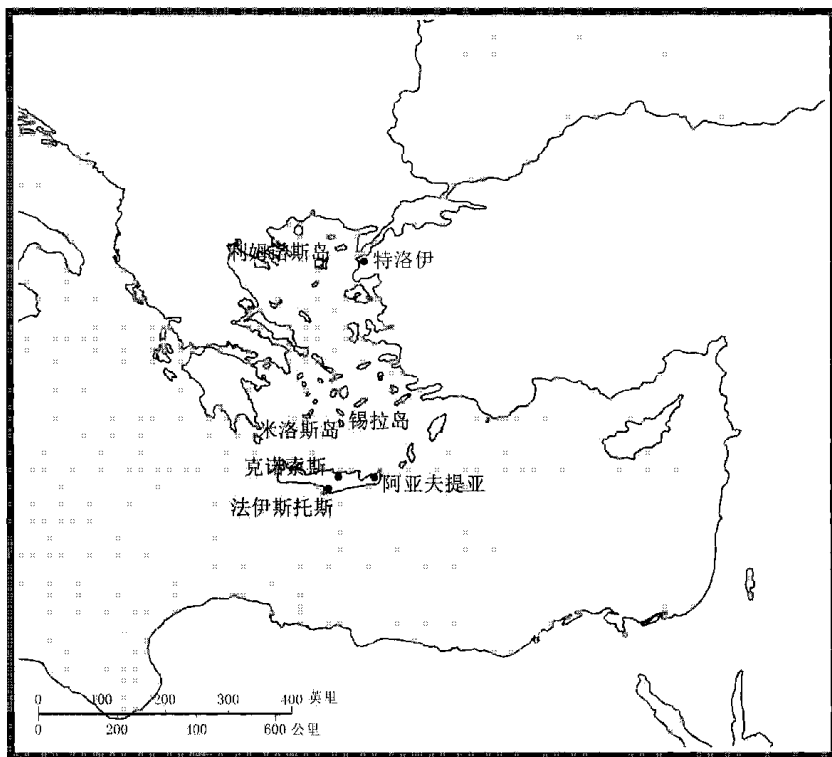
1. D. Trump, *The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Harmondsworth, 1980), pp. 12–13.
2. E. Panagopoulou and T. Strasser in *Hesperia*, vol. 79 (2010).
3. C. Finlayson, *The Humans Who Went Extinct: Why Neanderthals Died out and We Survived* (Oxford, 2009), pp. 143–55.
4. L. Bernabò Brea, *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 1957), pp. 23–36; R. Leighton, *Sicily before Histor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London, 1999).
5. Trump,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 19.
6. *Ibid.*, p. 20.
7. S. Wachsmann, ‘Paddled and oared ships before the Iron Age’, in J. Morrison (ed.), *The Age of the Galley* (London, 1995), p. 10; C. Perlès, *The Early Neolithic in Greece: the First Farming Communi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2001), p. 36; R. Torrenc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Stone Tools: Prehistoric Obsidian in the Aegean* (Cambridge, 1986), p. 96; C. Broodbank, *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 (Cambridge, 2000), pp. 114–15.
8. W. F. Albright, *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Harmondsworth, 1949), pp. 38, 62; Trump,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p. 24–6.
9. C. F. Macdonald, *Knossos* (London, 2005), p. 3.
10. Torrenc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pp. 96, 140–63.
11. C. Renfrew, in *Malta before History: the World’s Oldest Freestanding Stone Architecture*, ed. D. Cilia (Sliema, 2004), p. 10.
12. A. Pace, ‘The building of Megalithic Malta’, in Cilia, *Malta before History*, pp. 19–40.
13. J. Evans, *Malta*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1959), pp. 90–91.
14. A. Pace, ‘The sites’, and A. Bonanno, ‘Rituals of life and rituals of death’, in Cilia, *Malta before History*, pp. 72–4, 82–3, 272–9.
15. Evans, *Malta*, p. 158.
16. D. Trump,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ilia, *Malta before History*, pp. 243–7.
17. Bernabò Brea, *Sicily*, pp. 38–57; Leighton, *Sicily before History*, pp. 51–85.
18. Leighton, *Sicily before History*, p. 65.
19. Trump,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 80.
20. Wachsmann, ‘Paddled and oared ships’, p. 10; C. Broodbank and T. Strasser, ‘Migrant farmers and the Neolithic colonization of Crete’, *Antiquity*, vol. 65 (1991), pp. 233–45; Broodbank, *Island Archaeology*, pp. 96–105.
21. Trump, *Pre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p. 55–6.

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 (前 3000 ~ 前 1500 年)

1

人们在谈及史前社会的发展时，总会从以下两个视角选取其一加以考察：一个是传播论者的方式（现在已不大流行），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新式样和新技术的到来要归因于移民和贸易；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社会内部因素促进了变化与发展。随着人们更为重视社会内部发展对于社会变革的促进，对移居者的种族认同的研究逐渐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已经意识到根据语言和文化进行的简单“种族”识别，与这些族群生活的周边环境是无关的：族群在融合，语言被相互借用，一些重要的文化习俗如丧葬仪式在没有新移民到来的情况下也在发生变化。同样，将所有社会变迁仅归因于受贸易增长影响的内部发展，这也是不正确的：史前时代人烟稀少的地中海海滨和岛屿为人类寻找食物提供了广袤的空间，被放逐的军事首领或去往异教神庙朝圣的人可以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建立新的居住地。如果新居住地有更早的居民，那么移居者或是将他们驱逐或消灭，或是与他们通婚，其中某一方的语言还会出于现在已无法解释的原因成为主体语言。

基克拉泽斯群岛于青铜时代早期（自约公元前 3000 年起）成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的故乡。当时，其主要岛屿均有人居住，米洛斯岛上的菲拉科皮这类村落均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景象，其他岛屿上的小村落也以原初的一些小型田庄为中心发展起来。¹ 黑曜石的采石场仍在使用，与此同时，基克拉泽斯群岛西部的紫铜也被运到了克里特岛。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产品不断输出，且已有了明确的输出方向：出于某种原因，产品向爱琴海的南部而非北部流动，这说明当时海洋的开放程度依旧有限，且依赖于其他地区能为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民提供什么。岛民们似乎很少将外来物品运进他们的村落，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只发现了少量的东方产品。但认为考古记录相当完整是一种典型错误，纺织品、食物、奴隶及用木料这类无法长久保存的材料制作的产品毫无疑问都已经进入海岛，尽管这些物资的到来在前 3

千纪是否可被正式称为“贸易”，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克拉泽斯文化不再只局限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它开始向南传播。在考古学家所称的“EB I”时期，即青铜时代早期的第一个阶段，一批新的移居者在克里特岛东北部的阿亚夫提亚（Ayia Photia）发展起来。从墓葬形式判断，他们的文化更像基克拉泽斯文化，而非克里特文化。但若将此地确定为基克拉泽斯居民的正式“殖民地”，就会太过具体；更确切的说法是，基克拉泽斯居民移居至克里特岛，并以其原有的习俗在此居住。至“EB II”时期，即大约公元前2500年，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物品进入阿亚夫提亚，甚至被克里特工匠模仿；另外，这些物品的流通还辐射至东北方新兴的特洛伊城。此城邻近达达尼尔海峡，不断加强着与安纳托利亚内陆和黑海的联系，可能是锡的主要来源地。²

此时，有一种金属的影响力正在加强，它巩固了掌权者的力量，它就是青铜。由于对这种合金的需求，爱琴海上形成了一个网，将特洛伊和诸岛屿连接起来。青铜或紫铜制成的闪闪发光的容器及基座显示了所有者的财富和威望；而确保应敌时的安全的却是青铜武器。拥有这些物件的人无疑是成功的军事领袖。紫铜于基克拉泽斯群岛最西端的基斯诺斯岛（Kythnos）或希腊本土的阿提卡被发现。早期的冶金者已经知道将相对较软的紫铜与锡铸成合金可以增加铜的硬度。搜集青铜原料并建立交换体系意味着爱琴海上已经形成了至少可被描述为贸易路线的相互交往的网络。为进行交换，乘着船的中间人依据季节的不同，年复一年地建立了有规律的联系，但将这些中间人视为完全以贸易为生的职业商人还为时过早。地中海因此活跃起

来，来自各地的人穿梭于地中海之上，寻找或急于售出那些同样来自各地的货物。

18 这些贸易路线都经过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但群岛并未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然而，在使用“艺术”这个表述时我们应该加一些限定语，因为岛上居民生产的艺术品已具有明确功能，尽管有些功能现在已很难译解。“基克拉泽斯艺术”对当代艺术家影响很大。“朴素的形式却总能摄人心魂”，科林·伦福儒如是说，因为当时之人越来越关注人体比例的“和谐”，这种“和谐”在同时期的马耳他、埃及古王国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像中是找不到的。³在艺术品的规格方面，既有微小雕像（在现代人眼中，这种雕像是定式化的，更像小提琴而不是人），又有接近真人大小的乐师雕像。小提琴雕塑属于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3000 年的早期作品类型。女性雕像占据统治地位，暗示当时是大女神崇拜时期。“萨利亚哥斯的肥胖妇人”（Fat Lady of Saliagos）拥有丰富的臀部，就像马耳他的神像一样，这可能与生殖崇拜有关。来自帕罗斯岛（Paros）的大理石为这些雕塑提供了原材料，但是从留存的大量颜料来看，有人对它们做过着色处理。⁴

这些雕像与葬礼有关，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十四尊陪葬的神像。我们发现，有时这些雕像是破碎的，将它们打碎可能是复杂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它们代表已故者吗？考虑到其生产已经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基克拉泽斯群岛上的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 3000 年，且持续了十二个世纪），它们可能有好几种用处。其他的解释包括，它们是“*psychopompoi*”，即冥界的亡魂引路者，或者是人祭的替代者，又或者是陪伴死者的殉葬者，它们将在另一个世界满足死者的性需求或为其提供

音乐表演。这些雕像证明了一个具有较高技艺的专职匠人阶层的存在。墓葬显示，这是一个有阶级划分且结构复杂的社会，存在着领袖和下属；男性劳力应该已在爱琴海上日益增加的小船上充当桨手，然而他们的航行不大可能超出爱琴海的范围，而且似乎帆船到前 2 千纪才开始投入使用。桨船的图像在所谓的“煎锅”，即一种刻有图案的泥板上有所展现，图案中的物体形似蜈蚣，它的船头是翘起的。⁵

2

特洛伊在地中海史上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青铜时代起，特洛伊就成为联系爱琴海与安纳托利亚及黑海地区的补给站；另一方面，特洛伊的故事已经扎根于历史意识中，不仅对于宣称毁灭了该城的希腊人是如此，对宣称来自该城的避难者是自己祖先的罗马人也是如此。自公元 1868 年以降，真实的特洛伊与神话中的特洛伊已很难区分，当时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痴迷于证实《伊利亚特》的真实性，认定距达达尼尔海与爱琴海交汇处四公里远的希沙里克（Hisarlik）山丘就是荷马笔下的那座城市。⁶ 有些学者认为特洛伊战争并不存在，特洛伊的位置因此也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但赫梯文献（Hittite archives）中的发现平息了这一严重争论，证实希沙里克山丘中存在一处为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所熟知的名为特洛伊或伊利奥斯（Ilios）的城址。后来的定居者，包括古典时期建立伊利奥斯新城的希腊人，以及最开始想在此地而非拜占庭建立新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同样相信特洛伊就位于此地。更引人注目的是，该遗址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典作家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前 1184 年）之

前。在青铜跨越东地中海开始对外输出时，该城的历史揭开了序幕。它被一次又一次重建，1961年，现代考古发掘者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在九个主要地层中辨认出了四十六个遗址层。⁷

特洛伊并没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定居于此的人都已经熟知紫铜，可能还从事锡的贸易。第一个特洛伊城，也就是“特洛伊第一文化层”存在于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前2500年，是一个小的聚落，长约百米，但后来发展了一个很典型的设防处，有石筑的瞭望台和三重防御工事。⁸在此期间它被多次重建，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的最后时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但在要塞之内生活定居的可能性已经被证实，留存下来的纺锤表明当时人们在壁炉（其遗迹已被发现）旁从事纺织活动。这可证实早期特洛伊人也在进行呢绒贸易，放养于堡垒外的平原上的绵羊提供了毛纺织物的原料。“特洛伊第一文化层”中保留最好的民居近二十米长，有向西开门的门廊，该房舍可能是群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居所。早期的特洛伊人塑造了很多小雕像，几乎全部为女性形象，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贝类、金枪鱼、海豚肉和谷物。在这一层，金属武器还未被发掘，但磨刀石的存在证明紫铜和青铜工具被定期磨尖。并没有证据可证明当时有奢侈品：出土的装饰品由骨头、大理石或彩石制作而成。尽管有大量陶罐看起来都颜色暗淡，一般也无修饰，但其形状透出了几分优雅的感觉。⁹

20 早期特洛伊的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已超出安纳托利亚；在西部不远，一个类似的群落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的波利奥克尼（Poliochni）遗址（有时被称为欧洲最古老的城市）繁衍生息；位于莱斯沃斯岛（Lesbos）的特勒米（Thermi）遗址

也有类似情况。¹⁰但去推断诸岛上的最早居民来自何处或讲何种语言是没有助益的。实际上，如果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最早作为贸易中转站出现，以确保通往爱琴海和进入内陆的路线畅通，那么很可能它们一开始就吸引了各色人种前来，就像后来的港口城市一样。虽然现在的希沙里克山丘距海较远，但史前的特洛伊濒临大海湾（荷马似乎已知晓此海湾的存在），该海湾后来渐渐被淤沙填满。¹¹因此，它是一座近海城市，位置具有战略性：逆风可使船只在几周之内都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样一来船只就需要在海湾内逗留数日，于是，居住在要塞内的居民可以有偿地为船上人员提供所需。但所有这些并未立即发生，且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时期，越过要塞的航行可能只是偶尔发生且方向不太容易掌控。在首层的原址之上是“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约公元前 2500 年至约前 2300 年），该层是更雄伟、更完善的防御堡垒，比前一层略大，有一个巨大的门廊和一座宏伟的宫殿，可能还有木质圆柱环绕。这一时期的特洛伊人同样是农耕者和纺织者（在发掘出来的一个纱锭上还粘有一截碳化的线头）。¹²他们获得或制造一些精美的武器；一般认为他们的青铜武器是通过爱琴海从外部引入的，但也有一些紫铜制造的较软武器，它们可能是由通过爱琴海运来的原料在当地生产。

尽管特洛伊人此时已经开始使用轮制陶器（“特洛伊第一文化层”没有），但布雷根并不喜欢他们的陶器，认为“他们是阴沉，缺乏生机的人，不大喜爱光明与快乐”。¹³至于这一时期特洛伊人生产的修长的高脚酒杯是否真的如此乏味无趣，却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与此同时，装有油或酒的大型陶罐从遥远的基克拉泽斯群岛被运至特洛伊城。在爱琴海

沿岸和安纳托利亚，我们也发现了与特洛伊陶罐相类似的陶器。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它们是自特洛伊引进的，但事实上，这种陶罐的样式更有可能反映了一种共有的文化，特洛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与特洛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波利奥克尼的规模相当于两个特洛伊。这些爱琴海沿岸的聚落在财富上远远落后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且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形成了书写体系——这一工具在适当之时会极大地促进贸易和结算。无论如何，特洛伊和波利奥克尼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贸易世界的一部分，好几条蜿蜒曲折的常规贸易路线都从海上或陆上经过了它们。这为“特洛伊第二文化层”的统治精英们带来了巨大财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施里曼发现的著名的“普里阿摩斯宝藏”（Treasure of Priam）。

这份偶尔被怀疑为由施里曼自己捏造的宝藏长期隐匿于苏联，使学者们失去了对其进行解读的机会。¹⁴施里曼将自己从几个储藏室——其中一个被他命名为“大宝库”——中发现的宝藏聚集在一起，并将宝藏之出现归因于千年后发生（如果确实发生的话）的一次围攻。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妇女的首饰与金银器皿非常引人注目，它们包括一个金制船形碟、一个用金线制作的妇女头饰（施里曼认定的），还有上千颗小金珠和一些银项链。此外还有大量用其他材质制成的物品，如玉制礼仪斧与水晶球（可能被镶嵌于权杖之上）。有一些物品很明显出自本土，其他一些，包括金器，肯定来自其他地方。这些宝物表明，这个社会由一个兴旺的精英集团掌控，通过该城的中转贸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特洛伊城不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其产品最有可能是厚重的羊毛制品。另外一种出口物品可能是产自伊达山（Mount Ida）附近的木材，

主要被用于邻近岛屿船只与建筑物的建造。这一地区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从发现的动物遗骨来看，此时该城还未如之后那样成为著名的养马中心。但特洛伊仅是一个外围的定居点；地中海从未成为东方的哈梯^①诸王的兴趣焦点，相反，他们的目光被投向了多山且富含矿藏的西亚内陆。

特洛伊的兴起轨迹并非直线。“特洛伊第三文化层”（建于第二层之后，第二层约于公元前 2250 年毁于火灾）要比第二层贫瘠，其居民聚居于一个不是很舒适的小山顶，甲鱼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在利姆诺斯岛上，波利奥克尼很显然曾遭到袭击，且城镇的规模和财富在前 3 千纪末进一步缩小。前 2100 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灭（可能是由于战争），但是在重建后的第四文化层，条件并未发生明显改善，狭窄且弯曲的街道穿行于房屋之间。西亚的广泛变化正在影响东地中海：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哈梯帝国及其后阿尼塔（Anitta）时期的新帝国（始于约前 1750 年）成为发端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贸易的中心，而之前将金属运至爱琴海北部边缘的贸易路线上的交易量减少了。¹⁵黄金期过后是长达三百多年的衰退期，但到“特洛伊第五文化层”末期（约前 1700 年），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善：房屋更清洁，且与其焖炖甲鱼的祖先相比，这一时期的居民更喜欢牛肉和猪肉。但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最惊人的发展再一次发生在了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上。

22

① 原文如此。《圣经》中把哈梯人（Hatti）和赫梯人（Hittite）都称为“赫族”，但前者似乎是非印欧民族，最初居住于幼发拉底河西岸，后来被赫梯人征服。——译者注

3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是首个重要的地中海文明，也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一个富裕、拥有文字、充满艺术气息的都市型文明。考虑到古王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埃及文明出现时间更早，这个说法似乎不那么准确，但在埃及人眼中，地中海海岸只是他们世界的外缘，且他们的世界是以尼罗河而非遥远的海洋为核心的。相反，米诺斯人则积极在地中海上航行，其文化中的海洋特征尤为明显，这反映在陶器的样式、制陶术、对海神波塞冬的崇拜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米诺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然而其创造的文明在艺术、宗教、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又别具一格。另外，他们留下了关于其伟大国王米诺斯（Minos）的传奇故事，现代考古学家已经把这个名字与克里特岛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修昔底德记载了米诺斯王在地中海创立第一个海洋帝国（*thalassokratia*）的过程，故关于早期克里特的记忆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雅典人还记得每年向克里特国王贡献童男童女之惯例，此记忆可以在前2千纪克里特人的祭仪中得到印证。¹⁶

23 克诺索斯始于新石器时期的最早聚落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之前，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早期青铜时代的克里特陶器与邻近岛屿的同类产品越来越不相同。早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Early Minoan II，约前2600年至前2300年）的陶器带有斑点花纹，这是一种在烧制物品的过程中学会的技术。另外，人们也注意到器皿的外形制作得极为精美且装饰得栩栩如生（巨大的漩涡和流动的河水），这使得早期克里特的陶器风

格与同时期的安纳托利亚大为不同。这些陶器还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到前 2000 年，克里特人已开始制作象牙和石制印章，这标志着精英集团渴望维护其物品所有权的情况已经出现。一些印章的主题（如狮子）很明显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一些抽象的图案则通常会使我们想到埃及和近东地区的印章，这表明该地与叙利亚和尼罗河口的贸易已然十分活跃。¹⁷

至于早期米诺斯人是天资聪慧的当地人，还是将近东文化中的元素带至克里特的移民，我们没有必要做出刻板的结论；克里特位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必然会吸引来自各地的移居者。自荷马起，许多古典作家都列举了该岛上居住的不同民族，包括“勇敢的克里特原住民”，也就是“真正的克里特人”，以及“高贵的佩拉斯吉人”，这一表述被用于指代多种迁移民族。克里特岛上及内陆的一些地名带有前希腊时期的名词词尾，例如 *-nthos* 和 *-ssa*，它们可能是由在希腊人到达之前居于此地的民族传下来的。以 *-nthos* 结尾的最典型的词是“*Labyrinthos*”（迷宫），在古典文献中，该词与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有关；而在以 *-ssa* 结尾的词中比较典型的是“*thalassa*”（大海）。¹⁸然而语言的沿袭和基因的遗传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相较于去分辨出一个天赋异秉的“原生种群”，更好的做法是将米诺斯人理解为一个多民族群体，他们对多种文化都持有十分开放的态度，这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艺术形式。他们不会受制于邻近地区（尤其是埃及）的风格与技术传统，那些地方的文化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克里特的王宫建筑有力地证明，克里特发展出了一种极富活力的地方文明。宏伟的克诺索斯王宫（距海岸六英里）重

建于约公元前 1950 年。约在同一时期（中期米诺斯第一阶段），其他地方——如南部的法伊斯托斯和东部的马利亚（Mallia）——的王宫也修建起来。然而克诺索斯王宫是“众宫殿中的女皇”；这是因为该地在政治或宗教上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其辖区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加丰富的资源，我们不得而知。关于克里特岛被几个王宫划分为几个部落首领辖地的理论，也就仅是理论罢了，甚至“王宫”这一表述的准确性也值得怀疑：这些建筑可能是神庙建筑群，但我们不能认为米诺斯人像现代人一样对建筑类型进行了严格划分。¹⁹很明显，在克诺索斯王宫的原址上，此前已经有一个小的建筑群；因此大型宫殿建筑并非已占据此地的新移民的首创，而是产生于已有岛屿文化的基础之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因为克里特稳固了其东地中海交通枢纽的地位，而且克里特岛也是羊毛和纺织品的原产地。模仿外族宫殿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也有同样大小的大型宫殿和神庙，它们有绘有壁画的墙面和柱廊式的庭院。但克里特宫殿的图案、风格及功能是与埃及建筑迥然有别的。²⁰

克诺索斯王宫多次被毁于火灾和地震，且在其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它的内部形貌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很多历史痕迹依旧可以追寻。挖至古王宫建筑层，在所谓的“容器室”（Vat Room）内，有一些出自约公元前 1900 年的精美的高脚酒杯和人工制品，它们可能被用于宗教仪式。有一些陶器出自克里特岛上的山地，但也有一些外来物品，如象牙、彩陶和鸵鸟蛋，这反映了此地与埃及及叙利亚的联系。当然，还有大量来自米洛斯的黑曜石。因此很明显，在古王宫时期，米诺斯人向北与基克拉泽斯群岛有联系，向南、向东与黎凡特和尼罗河地区的居民有往来。发现于古王宫的重型织机说明克诺索斯是某种向

邻近地区出售的特别纺织物的生产中心，这种重型织机大约于前 1750 年后才出现在其他地方。被称为“*pithoi*”的巨大陶罐被成排摆在地面上，用于储存油、谷物及其他物品，这些储存物或供宫廷专用，或为交易商品。克里特人进一步完善了一种薄如蛋壳的陶器的制作技术，并将这种陶器出口至埃及与叙利亚地区。一些物品产于宫廷匠室，但在宫殿周围也有一些城镇，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克里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周围的城镇及其特有的工艺。克诺索斯在卡赞巴（Katsamba）和阿姆尼索斯（Amnisos）有一些卫星城镇，它们都是海港，而阿姆尼索斯还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在这个港口内有米诺斯的船队，而且（通过对于陶器的考察可知）其海上商船队由此出发开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包括罗得岛在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然后上行至米利都（Miletos），可能还远至特洛伊。²¹直到 21 世纪初，海洋考古学家才在克里特岛东北部发现了第一艘米诺斯人的失事船只。该船长十米至十五米，载有大量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和大罐，主要用于盛放约前 1700 年沿克里特海岸运送的酒或油。这艘船的木质结构已完全腐烂，但一个克里特印章显示了一艘有单桅、喙状船头和高船尾的船，这艘失事的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²²

25

关于该文明与外界的联系以及这种文明对于此的特殊回应的证据，因克里特书面文字的出现而被保留下来。约公元前 1900 年，带有象形文字的印章开始出现，故文字体系的出现与王宫建筑的第一阶段几乎同期。及至古王宫末期，大量档案文献涌现，它们是接收物品或储藏品的清单，包括自耕地上收取并被授予克诺索斯统治者或诸神的贡（供）品目录。书写的主要功能是保管账目，在众多书写人员身后有一个高效且要

求严格的行政组织。某些符号的特征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说明克里特受到了埃及书写体系的影响。可能由于克里特语的发音体系是不同的，其所形成的大多数符号与埃及文字十分不同。所以，虽然其书写理念借鉴自埃及，但书写体系不是。

公元前 18 世纪，在火灾和大规模地震的打击下，古王宫时期结束。法伊斯托斯有必要进行全面重修。在尤卡塔斯山（Mount Jouktas）的一处圣所内，一个男祭司、一个女祭司及一个年轻人一起祈求地震之神息怒；年轻人被献祭，接着屋顶塌落，将企图将年轻人献祭的人埋葬。²³ 考虑到雅典进贡童男童女以喂养米诺牛（Minotaur）的故事，我们并无理由怀疑人祭在克里特的米诺斯的存在。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建后，新王宫建筑 26 26 建筑群出现。新王宫尽管也被火灾和地震破坏，但今天在克诺索斯依旧可见。约在 1900 年，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在想象中对其进行了重构：栩栩如生的壁画、迷宫、在不同楼层的“宫室”、大宫殿、可以隐约想象的典礼 [即在公牛身上腾跃的运动（或宗教仪式）]，还有向女神波提尼亚（Potnia）献上供品的盛大游行。²⁴ 新王宫时期的时代断限被确定在约前 1700 年至前 1470 年，其结束的原因主要是大地震和火山喷发，且这次火山喷发也结束了锡拉岛上的基克拉泽斯文明。一些壁画形象反映了宫殿文化：有一幅壁画展示了宫廷妇女，她们大多裸着上身，围坐在中央庭院周边。这些壁画是对一些小片壁画进行修复的成果。不过我们不应被它们蒙蔽：大多数评论者在看到此幅图景时，认为其描绘了米诺斯文化时期的欢乐、和平以及妇女受到尊敬的场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以现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判断，因为我们在壁画中看到精英们的生活——一座王宫，以及男祭司和女祭司的团体。这些宫殿是否

为（或是否同时为）真正的神庙也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这些建筑是以宗教祭礼为核心的宫廷文化的所在地，其中蛇形女神——可能是冥府之神——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其他早期地中海文化一样，女神崇拜在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是与外界联系日显频繁的时期。一个发现于克诺索斯的埃及条纹大理石盖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1640 年。两百年后，在卢克索神庙外的埃及维齐尔^①莱克米尔（Rekhmire）的墓中，绘有克夫提乌人（*Keftiu*）带来礼物的场景，图中来客穿着短褶裙且身体半裸，服饰与克里特人相似。克夫提乌之名令人想起《圣经》中的迦斐托（*Caphtor*），而迦斐托指的就是克里特。壁画上写有：“这些礼物来自克夫提乌和海上诸岛的大君们。”作为回赠，克里特人获得了象牙、装有香水的石罐、黄金以及用于组装战车的面板——这些物件并非自组装的粗陋配件，而是享有盛誉、精心装饰的战车配件。²⁵但并无大批外来手工品进入克里特，米诺斯人的艺术风格也未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米诺斯人对自己的艺术风格非常自信，它体现在了一些克诺索斯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中：半裸蛇形女神小塑像和装饰有章鱼图案的精美高脚酒杯。实际上，米诺斯文化在对外输出：这一时期产于希腊本土的精美陶器与米诺斯的物件有相同的图案和风格，包括章鱼图案。

这一时期的克里特人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而是以有音节的线形文字 A（*Linear A*）登记其资产。线形文字 A 不如象形文字漂亮，但书写速度更快。他们在档案中使用的似乎是卢维语（*Luvian*），它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与赫梯语有亲缘关系，也被

① 维齐尔是由法老委任的最高官员。——译者注

安纳托利亚西海岸一线的居民，以及公元前 12 世纪的特洛伊居民使用（根据该地出土的一枚刻纹印章推测）。²⁶ 卢维语被广泛用于宫廷中的官方通信，但它在克里特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有一部分或所有克里特人都是安纳托利亚卢维人的后代。此处的关键是，米诺斯人（不像特洛伊人）创造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安纳托利亚文明不同。

4

约公元前 1550 年至前 1400 年，克里特诸王宫的重建与基克拉泽斯群岛——尤其是在锡拉岛上的阿科罗提利（Akrotiri）——新一轮的火山喷发几乎同时发生。锡拉岛上可能已经居住了基克拉泽斯人、克里特人或爱琴海岸所有其他民族，他们来此地是为了获得米洛斯的黑曜石。藏红花生长于锡拉岛，一幅壁画上描绘有采收藏红花的场景。另外，正是通过克里特及其附属地阿科罗提利，爱琴海诸岛才获得了更多舶来品，包括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圣甲虫雕饰、彩陶塑像以及珠串。阿科罗提利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并进口了大量的克里特陶器。阿科罗提利的建筑也效仿了克里特的设计风格。墙上的一些壁画非常引人注目：穿着短褶裙的克里特船员操控船队进入一处港口，港口的房屋都有两层或三层楼高。这些船似乎在渡运一些武士，他们穿着希腊本土风行的服饰。在高度发达的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本土正在兴起的迈锡尼文化之间，锡拉岛起着桥梁的作用，这表明米诺斯人已将其贸易，可能还有其政治影响力发展到了克里特岛以外的地方。²⁷

在公元前 1525 年以后的数年间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该地区的稳定遭到严重威胁。阿科罗提利位于一个巨大火山

口（部分在水中）的边缘。大地不断颤动。约前 1500 年，锡拉岛被一次火山大喷发（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分裂，只留下一个新月形海岛伸出水面，好在之前的一次地震已使居民在此前及时撤出了阿科罗提利。²⁸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更深层次上看，克里特都发生了巨变。前 1525 年前后的几次地震给克诺索斯带来巨大灾难，王宫的很多部分被荒弃。在锡拉岛火山喷发后的很多年间，太阳都被“尘雨”遮蔽，火山灰过后才落到地面，以致克里特岛东部的灰尘竟达十厘米厚。农业惨遭破坏，导致了长期饥荒的发生。在位于尤卡塔斯山阿克哈涅斯（Arkhanes）的一座小型米诺斯王宫，一些明显用于其他目的的房间成了储藏室。整个地区都受到了火山喷发的影响，保证补给的需求因此扩大，通过与近邻贸易的方式解决供应紧缺不再可能。这种危机感还可由克诺索斯北屋（North House）中的可怕发现证实：约在这一时期，有四五个儿童被杀，其肌肉被从骨头上剔除，可以确定这是一种献祭仪式和食人行为。²⁹米诺斯人希望以此平息男神与女神们不断增长的怒火。

卢克索神庙中遗存下来的法老宫廷中的使者画像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们前来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得象牙、猿和孔雀，而是想凭借法老与克里特人间的联盟获得尼罗河谷的粮食。锡拉岛的火山喷发伤害但没有毁灭克里特的经济与社会，且克诺索斯大约在之后五十年内仍然保有财富和影响力（可能规模缩小了）。这次火山喷发造成的破坏只是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之后还有一系列范围更广的变化，它们改变了东地中海（可能还有部分西地中海）的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注 释

1. R. L. N. Barber, *The Cyclades in the Bronze Age* (London, 1987), pp. 26–33.
2. C. Broodbank, *An Island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Cyclades* (Cambridge, 2000), pp. 301–6; Barber, *Cyclades*, pp. 136–7.
3. C. Renfrew, *The Cycladic Spirit* (London, 1991), p. 18; J. L. Fitton, *Cycladic Art* (London, 1989).
4. F. Matz, *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 1962), p. 62.
5. Broodbank, *Island Archaeology*, pp. 99–102; Renfrew, *Cycladic Spirit*, p. 62.
6. C. Moorehead, *The Lost Treasures of Troy* (London, 1994), pp. 84–6; J. Latacz, *Troy and Homer: 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 2004).
7. C. Blegen, ‘Troy’,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 1 and 2, rev. edn, pre-print fascicle (Cambridge, 1961), p. 4.
8. D. Easton, ‘Introduction’, in C. Blegen, *Troy* (2nd edn, London, 2005), p. xxii.
9. Blegen, *Troy*, pp. 25–41; T. Bryce, *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 2006), pp. 39–40.
10. Blegen, *Troy*, p. 40; Bryce, *Trojans*, p. 40; Matz, *Crete and Early Greece*, p. 37; L. Bernabò Brea, *Poliochni, città preistorica nell’isola di Lemnos*, 2 vols. (Rome, 1964–71); S. Tiné, *Poliochni, the Earliest Town in Europe* (Athens, 2001).
11. Latacz, *Troy and Homer*, p. 41.
12. Blegen, *Troy*, pp. 47–8, 55.
13. *Ibid.*
14. Moorehead, *Lost Treasures*, pp. 128–30.
15. Bryce, *Trojans*, pp. 51–6; Blegen, *Troy*, pp. 56–61, 77–84, noting Easton’s comments, *ibid.*, p. xvii.
16. Thucydides 1:4.
17. Matz, *Crete and Early Greece*, pp. 57–8, 69.
18. A. Morpurgo Davies,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is there any?’ in *The End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Aegean*, ed. G. Cadogan (Leiden, 1986), pp. 93–123.
19. R. Castleden, *Minoans: Life in Bronze Age Crete* (London, 1990), pp. 4–7; C. F. Macdonald, *Knossos* (London, 2005), pp. 25–30.
20. Matz, *Crete and Early Greece*, p. 57; Castleden, *Minoans*, p. 29; Macdonald, *Knossos*, pp. 43–7.
21. Macdonald, *Knossos*, pp. 50–52; Castleden, *Minoans*, p. 69, fig. 18 (plan of Gournia), p. 112.
22. Reported in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vol. 63 (2010), pp. 44–7.
23. Macdonald, *Knossos*, pp. 58–9, 87–8; Castleden, *Minoans*, pp. 169–72.
24. C. Gere, *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 IL, 2009), and the discussion in part 5, chap. 2 below.

25. Macdonald, *Knossos*, pp. 134, 173; Castleden, *Minoans*, p. 12.
26. Morpurgo Davies,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L.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Aegean Pre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Linear B Tablets* (2nd edn, London, 1965).
27. L. Casson, 'Bronze Age ships: the evidence of the Thera wall-pain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4 (1975), pp. 3-10; Barber, *Cyclades*, pp. 159-78, 193, 196-9.
28. Barber, *Cyclades*, pp. 209-18.
29. Macdonald, *Knossos*, pp. 171-2,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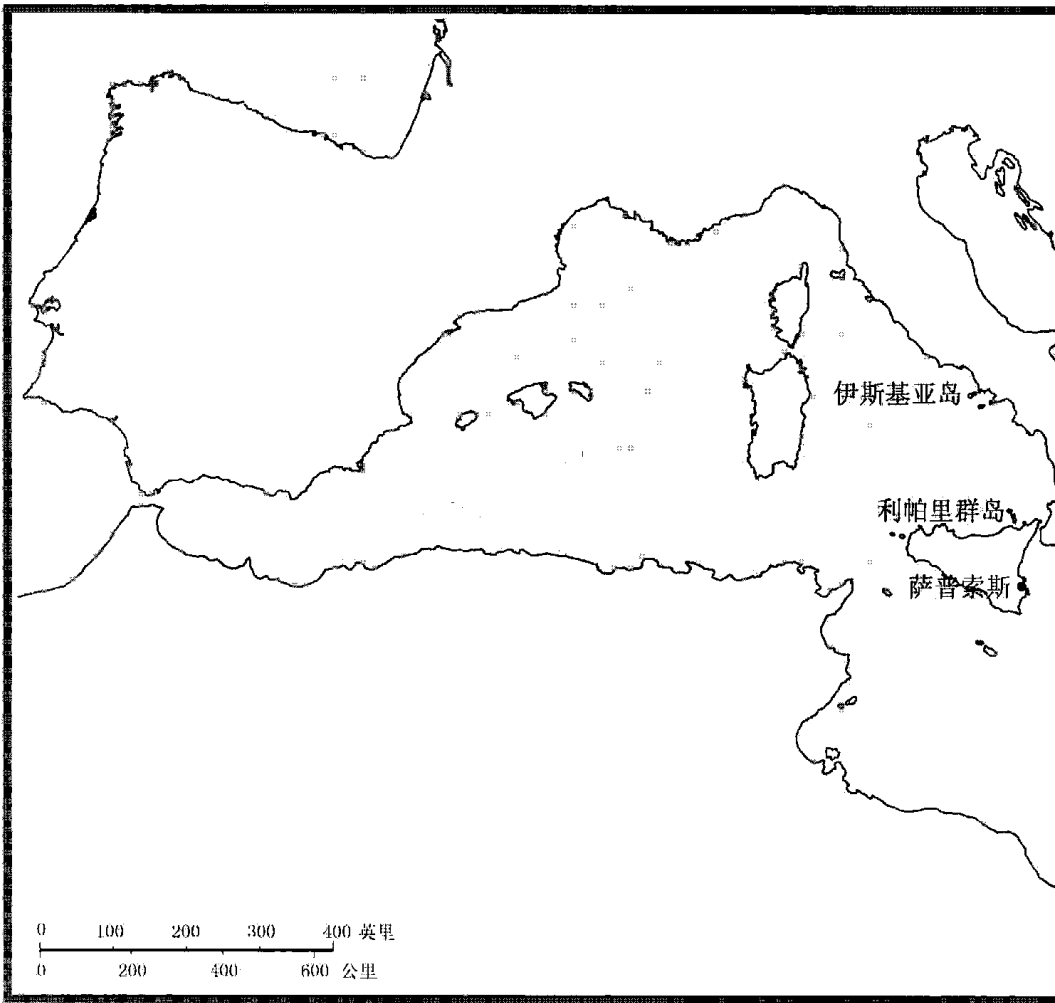
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 (前 1500 ~ 前 1250 年)

1

29 公元前 1500 年前后，克里特岛不仅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也经历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转变。很多定居点，如阿克哈涅斯都被废弃了，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希腊人的王朝到来了；米诺斯时期的遗迹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在诸多大型王宫中只余下了克诺索斯一处。地震和火灾已经被认定为罪魁祸首，来自希腊的入侵者也难辞其咎。由于没有人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较为明智的尝试是将两者相结合予以说明，且认为希腊人趁克里特混乱之际将其占领；或者还可以认为，克里特人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希腊人。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米诺斯人的克里特被引入了希腊人正在崛起的迈锡尼文明中。在早期和中期青铜时期的商贸航线上无足轻重的地区，此时却成为爱琴海海域的政治和（或者）商业势力的中心：迈锡尼文明和权力的大中心是一连串沿希腊东部边沿分布的定居点，以及离海不远的内陆地区的定居点，它们从北部的伊奥科斯 [Iolkos，即沃洛斯 (Volos)] 开始，有奥科美纳斯 (Orchomenos)、底比斯 (Thebes)、迈锡尼 (Mycenae)、梯林斯 (Tiryns)，以及西南部的派娄斯 (Pylos)。希腊人的成功在前 15 世纪早期就有了一些迹象，当时迈锡尼诸王被葬于圆形墓 A 中（如人们逐渐知道的那样），他们戴着金箔面

具，这些面具似乎模仿了他们长有胡须的面部形象，同时也显示他们试图模仿法老佩戴华丽金制面具人葬的习俗。¹当然，迈锡尼“富有黄金”这一说法一直保有特殊声誉。如果荷马所列“参战船只细目”（《伊利亚特》中的一份古老文献）可信，那么至前12世纪，这些独立小邦国都普遍认为迈锡尼王（*wanax*）是他们的宗主。² 30

米诺斯人的记载与迈锡尼人的记载被难以察觉地糅合在了一起。这一方面是由于，克里特艺术对希腊本土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制陶匠人试验性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外形和图案，迈锡尼生产的物品，如陶瓷才逐渐作为地方产品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米诺斯人与迈锡尼人之间模糊的界线，很明显是在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后，来自希腊本土的讲希腊语的精英集团占领了克诺索斯的结果。尽管如此，文化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迈锡尼人用于记录希腊语的线形文字 B 是对米诺斯人创立的文字体系中线形文字 A 的改进。线形文字 B 已被文特里斯（Ventris）和查德维克（Chadwick）于20世纪50年代成功破译。³ 迈锡尼人在克诺索斯重新启用了泥板文献档案，然后在派娄斯对其进行了改进与精心制作，用于记录臣民献给王和神的贡（供）品。甚至在希腊南部，通过传于后世的手工艺品，我们可知他们的宗教仪式也与米诺斯人几乎无异——印章上有女神和祭司的形象，一个杯子和一块镶嵌板上绘有腾跃公牛的运动或仪式。⁴（这些东西尽管发现于希腊，却产于克里特。正如有人据此论证的那样，它们的存在表明公牛崇拜在希腊盛行。）古典时期希腊男神与女神的名字经常会显露出其前希腊时期的根源，且这些神祇有时能在迈锡尼人的书面记录中找到。有迹象显示，在贸易方面希腊与克里特间也存在着延 31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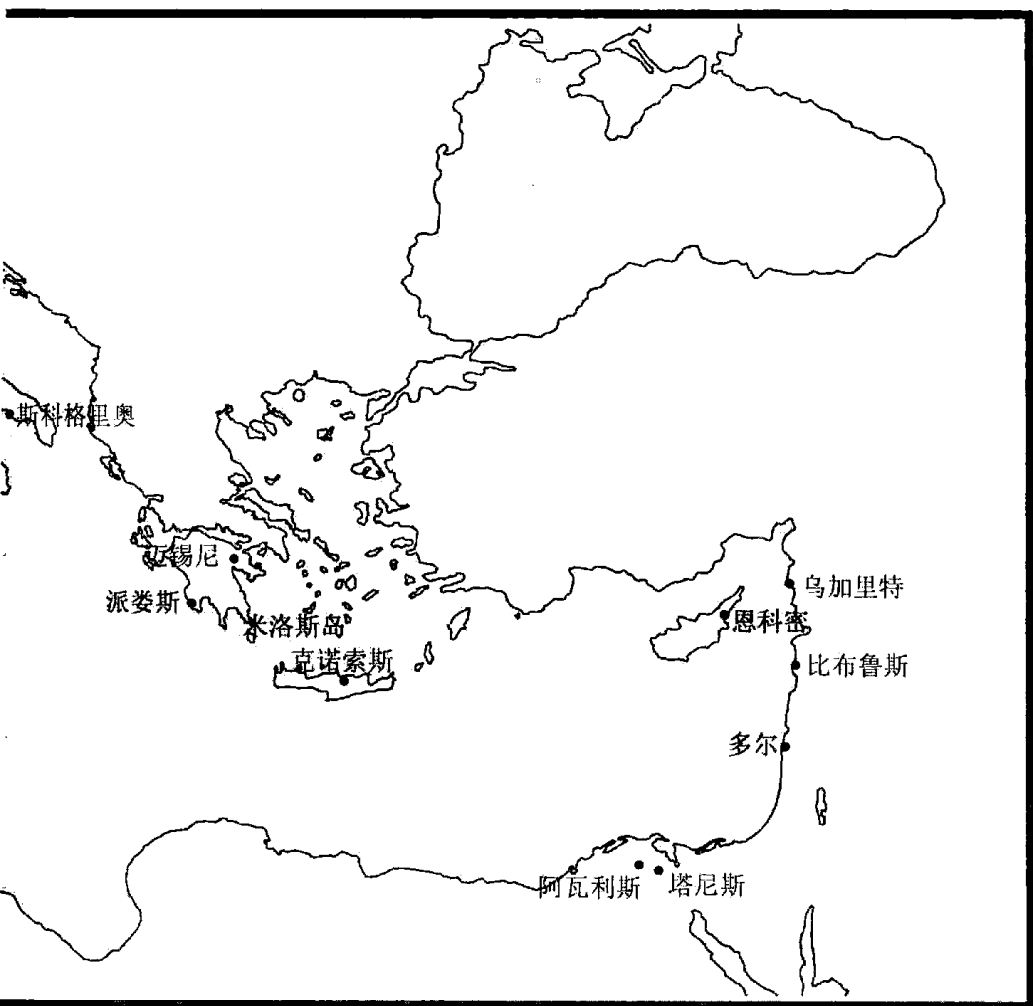
伊斯基亚岛

利帕里群岛

萨普索斯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斯科格里奥

锡尼

派娄斯

米洛斯岛

克诺索斯

乌加里特

恩科密

比布鲁斯

多尔

阿瓦利斯

塔尼斯

续关系，如希腊人与克里特人的产品都被运到了罗得岛、叙利亚及特洛伊，但长距离的航海活动已深入地中海深处，远至西西里岛与意大利。

迈锡尼人以好战而著称。他们善于学习，并很快使自己融入已经存在的文化。尽管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告诉我们，像佩罗普斯（Pelops）一样的文明初创者是如何从其他地方（如佩罗普斯来自安纳托利亚）来到希腊的，但迈锡尼人的祖先很可能生活于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南部。他们是防卫要塞的伟大建造者。像克里特岛米诺斯宫这样防御较为简陋的宫殿较为少见——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派娄斯（Pylo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且几乎可以肯定，它的防卫主要依靠一支大的海上船队构成的“木墙”，和后来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所描述的雅典船队一样。海洋在迈锡尼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陆战和围城战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更引人注目的是迈锡尼人和梯林斯人遗留下来的诸多要塞的断壁残垣。迈锡尼的一些城墙有七米厚；在梯林斯，贯穿于石质建筑之中的狭窄隧道（现在依旧可穿行）在那些甚感困惑的古典作家笔下被描述为由独眼巨人（Cyclopean giants）所建。线形文字 B 的泥板文献还显示了双轮战车对此好武社会的重要性，并对它们进行了计数；荷马在提及这个突然消失的有大量青铜武器和用野猪牙制成的头盔的古老世界时，也对其有所描述。⁵ 在迈锡尼人的伟大战争首领的墓葬中埋有大量青铜武器，不过他们也甚为了解用黑曜石制成的薄如纸片样的箭头，这些箭头出自米洛斯和利帕里（Lipari）。

“迈锡尼人”如何称呼他们自己是一个重要问题。“迈锡尼”是现代人对青铜时代希腊文明的称谓；在公元前 14 世纪，

其表达的只是由堡垒和周围村庄所组成的迈锡尼 (*Mukenai*) 聚落 (勉强可称为城镇)。这一地名的希腊语复数形式, 如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 (典型的有雅典的复数 *Athenai*) 一样, 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这些中心是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成的。⁶ 其统治者属于武士阶层, 至前 14 世纪, 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们的随葬品中不仅有武器, 还有金银制成的高脚酒杯以及 (描绘了狩猎场景的) 精美镶饰的随葬小刀。历史学家在谈及“迈锡尼贸易”时, 指的是这些早期希腊军事首领统辖下的政治区域之间的贸易。对商人和农民是否讲希腊语, 人们也仅能猜测; 事实上, 很多人肯定是会多种语言的克里特人, 他们生活在线形文字 B 时期的克诺索斯和法伊斯托斯。赫梯作为邻国, 在文献中将迈锡尼人称为 *Ahhiyawa*, 而埃及文献将其称为 *Ekwesh*。这说明 *Akhaiwoi* 这一名称, 即古典希腊语中的 *Akhaioi* 与今天人们口中的阿凯亚人 (*Achaeans*), 如果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 至少也是外邦人对他们的称谓, 这些外邦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迈锡尼是一个主要的区域性力量。⁷ 在米诺斯人建立的贸易链的基础上, 迈锡尼商人维系着他们与富藏铜矿的塞浦路斯 (当地直到古典时代一直使用着线形文字) 的交往, 另外还与罗得岛、位于安纳托利亚海岸的米利都及叙利亚海岸有贸易往来。如果伊阿宋 (Jason) 的“阿尔戈号” (*Argonauts*) 的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 那么他们可能与黑海地区也有联系。“格里多亚残骸” (*Gelidonya wreck*), 也就是发现于土耳其南部海岸的前 13 世纪的遇难船只的残骸, 说明了当时迈锡尼人的贸易范围很广。残骸的大部分被水流冲走, 但是其装载的一些货物因太重而被留在原地, 它们是一些半吨重的大铜块, 还有可证明这艘船已经到过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青

铜器与印章。在发现于土耳其海滨城镇乌鲁布伦（Ulubrun）的更古老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更多的铜，且有趣的是，船上还装载了相当于铜重量十分之一的锡，这个比例刚好适用于青铜的制作。⁸

迈锡尼贸易的一个新特征就是与意大利建立了联系，这是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岛所没有的。关于希腊本土与西西里岛的联系的最早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 17 世纪，主要可依据希腊（中希腊时期）与西西里岛东部陶罐的相似性得出此结论（在西西里岛东部还出土了一些中希腊时期的陶罐）。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有经常性的直接联系，它们的来往甚至连间歇性的中介贸易都算不上，因为这些陶罐从希腊经爱奥尼亚海，而后沿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和靴头进入西西里岛。⁹ 能证明两地之间定期联系的铁证稍后才出现，当时大量晚期青铜时代的陶器被带入利帕里群岛，且大量的黑曜石被运回希腊。商人们也留下了一些瓷珠，它们很明显源自埃及，这说明当时已逐渐出现一个贸易网，这个贸易网囊括了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当克诺索斯落入迈锡尼人之手后，黑曜石开始失去吸引力；穿越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运输铜锡的新路线正在开发中。对金属的寻找引导迈锡尼航海者远赴伊斯基亚（Ischia）及其邻近的小岛维瓦拉（Vivara）；在登上托斯卡纳（这里富藏锡矿）和撒丁岛（在此他们遗留下一些铜块）的海岸之前，他们在伊斯基亚等地卸下了陶器。¹⁰ 从锡拉岛壁画上描绘的船只来看，船运技术毫无疑问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以帆助桨，且船身更大，船舷更高，可以承受更强的海浪冲击。他们肯定也对中部和东部地中海的浅滩、暗礁及洋流等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没有这些常识，他们不可能在希腊诸岛屿间自由航

行，也不可能驶向西西里岛。在这一时期，沿海岸线的航行依旧占主导地位；观察迈锡尼陶器在海岸上的分布，我们可发现其航道由多德卡尼斯群岛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且绕过鞋背下行至西西里岛。

与意大利的紧密联系导致了海外贸易站的出现。¹¹ 尽管迈锡尼人向利帕里群岛运送了大量的陶器，包括大陶罐等，但没有证据证明利帕里人处于迈锡尼人的统治之下。然而利帕里人的确与更北的地区 [最远至托斯卡纳北部的卢尼 (Luni)] 建立了联系。¹² 利帕里逐渐备受关注，不只因为它拥有黑曜石，还因为它是西西里周围海域的补给站和通往北部地区的中转站。大陶罐是典型的产品，它并不是装饰品，而是载货用的——装载的最有可能是食油，因为食油是希腊出口物品中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在利帕里群岛的一处墓葬中发现的琥珀项链经鉴定来自亚得里亚海北部而非东地中海。这些都说明，在这一时期，迈锡尼人是最富有的（但并非唯一）冒险穿越地中海中心水域的商人。与此同时，利帕里群岛的居民都居住在火山山坡上修建的小木棚中；对他们而言，奢侈品主要是琥珀和玻璃球，而非金银首饰。

西西里岛以东的一个近海岛屿萨普索斯 (Thapsos) 上的一个聚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输入型文化，该文化在源头上属于迈锡尼人。该地居民建造了一个棋盘格式的城镇，街道宽至四米，宽敞的房子围庭院而建，墓葬中有大量来自希腊本土的晚期青铜时代的器皿，说明“该考古遗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异邦殖民地”。¹³ 事实上，与萨普索斯房屋最为相似的设计，出现在了迈锡尼世界另一端的塞浦路斯，它们的位置靠近法马古斯塔 (Famagusta) 的恩科密 (Enkomi)。这看起来就

像是先构想好了贸易殖民的蓝图，而后在迈锡尼世界的两端将其付诸实践。萨普索斯生产了很多迈锡尼风格的小香水瓶，¹⁴它是一个制造中心，专门为“国际”市场生产香油。但是萨普索斯并非迈锡尼文化的一个简单分支。它生产了大量西西里风格的粗制灰陶，这说明萨普索斯拥有一个混杂的民族群体。在同一时期，位于斯科格里奥（Scoglio del Tonno）^①，即现在的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另外一个迈锡尼聚落促成了亚得里亚海物品，特别是南意大利的铜的流通，且实际上充当了向西西里岛运输货物的中转站。¹⁵于是，对航行于地中海上的人群而言，正是在迈锡尼时代，地中海世界的拓展开始引人注目。

2

对迈锡尼商人更为重要的地域不是欠发达的西方，而是叙利亚与黎巴嫩沿岸。¹⁶至公元前14世纪，贸易者在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和比布鲁斯（Byblos），以及迦南（Canaan）沿岸的基色（Gezer）与拉吉（Lachish）等地留下了大批量的迈锡尼陶罐（青铜时代晚期Ⅱ期风格）。黎凡特地区的贸易网正在形成，足以供给那些由迦南人、塞浦路斯人、赫梯人、埃及人构成的爱琴海商人团体、居民和到访者的富裕城市。¹⁷黎凡特的一些港口早已与尼罗河三角洲有联系；埃及底比斯（Thebes）的科纳蒙（Kenamun）墓葬中曾有一幅现已无存的壁画，上面绘有在迦南商人监督下卸载货物的埃及港口，画中的货物有纺织品、紫色染料（黎凡特海岸的特产，提取自一

① 根据其意也可译为“金枪鱼礁”。——译者注

种骨螺)、油、酒及牲畜。

自公元前3千纪起,乌加里特便是一个重要、活跃的贸易中心;它在某一时期是埃及的藩属国,一个名为尼奇马杜(Niqmadu)的国王曾与法老家族联姻。该城从黎巴嫩山区向埃及供应埃及当地匮乏的雪松木材。乌加里特是美索不达米亚世界——它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复杂的楔形文字——与东地中海世界各地,包括尼罗河三角洲、爱琴海、克里特岛[在乌加里特泥板中被称为卡布图里(Kabturi)],以及距离乌加里特只有一百英里的塞浦路斯(该岛兼有中转站的职能,来自埃及的货物经由此岛运往希腊内陆)之间的桥梁。¹⁸在乌加里特,我们发现了一些塞浦路斯韵体的铭文,说明有来自塞浦路斯的商人居住于此。乌加里特的居民有各种背景:有一些商人被埃及人称作“玛严努”(Maryannu,或称“青年英雄”),他们来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地区;有一些行政人员的名字并非当地人的名字——在乌加里特周围的一些地区居住着一些讲迦南语的人,这种语言含有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元素。专门的官员被指派去料理外来商人的事务,外来商人要遵守当地的居住规定,同时享有在乌加里特置办房屋的权利。从一个约前13世纪的象牙盒看,乌加里特艺术曾受米诺斯文明影响,因为该象牙盒上的女神既有当地的特征,又融合了米诺斯的艺术特色。¹⁹乌加里特有充满生机的文学艺术,有大量刻于泥板上的宗教诗歌被保存下来,且这些诗歌与后来希伯来语的宗教诗歌惊人地相似。这些联系也给爱琴海世界艺术的复苏注入了活力。曾经的克诺索斯已被吞并,迈锡尼世界提供的东西变得更多:克里特人的手工艺作品以及希腊内陆的一些产品此时已经可与曾占优势地位的米诺斯物品相匹敌;另外还有克里特岛的

优质纺织品——线形文字 B 中的“*ri-no*”在早期古典希腊语中的拼写为“*linon*”，意为亚麻布。至此，位于东地中海港口城市的那些由来自爱琴海的移民和商人组成的小型集落已然形成；除商人和货物的到来外，雇佣军也带着他们的武器和盔甲来到此地。当贸易开始改变东地中海的特征时，只有战争才会使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文化遭受巨大损害，将其引向一个漫长冬季（这最终发生了）。

37 此前，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西西里岛贫穷的村民身上，对法老的属民则关注较少，故在此有必要对他们的缺失做一些解释。随着下埃及沼泽地与邻近的尼罗河流域的条形灌溉地合并在一起，埃及人建立了一个复合型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社会；早在公元前 3 千纪，通过金字塔的建立，埃及人就已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组织大批劳动力的能力。为宫廷生产的艺术品，包括华丽的金器、较为珍奇的宝石等，均已优于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中最好的手工艺品。即使在主题上没太大影响，埃及艺术在技术方面对克里特壁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埃及的物件在早期希腊世界被珍重地保存下来；埃及的政治对迦南和叙利亚海岸沿线，特别是比布鲁斯有较大影响。对一些主要必需品，如锡、木材及铜矿等的寻求，使埃及人将其影响力扩展至西奈半岛及以外地区。但当历史学者提到埃及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是它与南部地区的联系：在前 2 千纪，沿红海下行至蓬特（Punt）的贸易远航将象牙和乌木一类的产品运至法老的宫殿。²⁰ 尽管有些法老的确在下埃及大兴土木——《圣经》记述了一个以拉美西斯（Ramesses）命名的大型储藏城市的修建——但在约前 1570 年后，他们的权力中心主要在上埃及。然而，拉美西斯城 [在古王国时期该城被

称作派拉姆西（Piramesse）] 在前 13 世纪的一个时段内确实是埃及的首都，那时法老们正在向迦南与西亚挺进，希望有一个靠近其利益中心的基地作为首都。

公元前 1570 年，统治下埃及和中埃及超过一个世纪的希克索斯（Hyksos）王朝被逐出。这些统治者后来被斥为“野蛮的亚洲人”（其确切的身份依旧是谜），但他们将一些重要的改革引入埃及，包括双轮战车和青铜盔甲。²¹ 他们最终取得埃及政权的手段是武力征服还是阴谋诡计，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技术方面他们确实要比埃及人先进；且他们与邻近的叙利亚和克里特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获得必要的军事装备是非常重要的。希克索斯人统治的晚期是埃及艺术充满活力的时期，最著名的是图坦卡蒙墓中的考古发掘。约前 1340 年，当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en）在阿玛纳城（Tell el-Amarna）为太阳神建立新首都时，其选择的也是上埃及距法老传统权力中心相对较近的地方。对于古埃及人而言，最重要的水域既非地中海，也非红海，而是尼罗河；地中海是他们的地平线，而且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贸易角度看，法老时代的埃及都不能被称为地中海大国（尽管他们也从东地中海获取一些资源）。直到前 4 世纪亚历山大城建立，埃及的地中海海岸上才有了一座眺望希腊世界的主要城市。但在这一时期，到埃及的外来商人通常比旅居海外的埃及人多；萨胡拉（Sahure）金字塔浮雕上刻画的航海者（约前 2400 年）应该是亚洲人，且其航船的设计可能模仿了黎凡特风格——有些船可能已经可以航行至上游区域，它们中既有战船，也有货船。总体来说，埃及人依赖外来的代理人为其建造、管理及驾驶船只，起码在穿越地中海时需要雇用代理人。²²

“伟大的绿色”这一表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文献中，但被用于描述许多水系——法尤姆湖（Lake Fayyum）是其中之一，尼罗河是另一个，偶尔也被用来指代红海。公元前 2 千纪末，“Y-m”这个词偶尔被用来指代大海，包括地中海，这个词本身源自闪米特语（*Yam* 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大海）。对埃及人而言，地中海并没有重要到需要为其指定特别名称的地步。²³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港口有很多来自或前往叙利亚的船只，如位于三角洲东部的特亚茹 [Tjaru，现为特尔赫巴（Tell Hebua）]。该港口已经被希克索斯人使用，而后由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重建。前 15 世纪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在位时，特亚茹是拥有“异邦王族使者”头衔的总督的官邸的所在地，总督的职责之一便是在西奈沙漠开采绿松石矿。在这一时期，绿松石是埃及人比较喜欢佩戴的宝石。然而，特亚茹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它是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基地，这一点可通过在此地发现的来自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陶器证实，这些地区还富藏埃及人渴望获得的木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阿瓦利斯（Avaris），它也位于三角洲东部。早至前 18 世纪，在阿瓦利斯居民（包括士兵、航海者及手艺人）中，便有很多人具有迦南人血统。希克索斯人将阿瓦利斯设为首都，其占地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米。希克索斯人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阿瓦利斯的衰落。²⁴当地修建于希克索斯人被推翻后的宫殿装饰着克里特风格的壁画，这进一步印证了克诺索斯的克夫提乌与法老宫廷之间的联系。²⁵

39 还有一个港口的重要性也在上升，那就是塔尼斯（Tanis）。在公元前 11 世纪早期，有一个来自南方腹地的卡尔纳克（Karnak）的埃及使者由此地被派往比布鲁斯的迦南王国执行一

项艰难的任务：确保木材供应，重建一艘河船，将其献给至高无上的阿蒙（Amun）神。他是神庙的高级管理者（Elder of the Portal），名为维纳蒙（Wenamun）。他留下了一份行程记录，该记录写在莎草纸上，保存在一个埃及人的墓中。据其描述，他从塔尼斯出发的时间为前 1075 年 4 月 20 日。²⁶从一开始，他就面临一些问题：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势力打算独立，不再依附弱勢的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Ramesses XI）；且当地的统治者斯门德斯（Smendes）认为，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专派一艘船将维纳蒙送至比布鲁斯，于是安排他搭乘一艘由当地船长门戈贝特（Mengebet）驾控的船只，当时该船长正打算和一位叙利亚船员出海贸易。这艘船沿海岸线航行，在 多尔 [Dor, 今海法（Haifa）南部] 停靠，此地是所谓的 阐卡尔人（Tjekker）的聚集中心，他们是一个海洋民族，我们之后将简要谈及他们。²⁷多尔的统治者谦逊有礼（他给维纳蒙提供了面包、酒和肉）。然而，门戈贝特的一个船员没能抵挡诱惑，带着维纳蒙携带的用于购买木材的巨额钱财，包括几磅重的银和超过一磅重的金器逃之夭夭。维纳蒙跑到统治者那里告状；统治者说，如果那个贼是多尔人，自己就可以补偿维纳蒙的损失，现在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是进行调查。此次调查足足持续了九天时间，但毫无成果，维纳蒙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北上。到达比布鲁斯后，他设法在门戈贝特的船上找到了与其丢失的钱财差不多数量的银器，并把它们藏匿起来。这些银器是其他人的财产，但是他坚持不交出，除非船主赔偿他丢失的金银，因为窃贼是船主的一个船员。

比布鲁斯的统治者泽克巴尔（Zekerbaal）比多尔统治者更不友好。他拒绝接受维纳蒙，对维纳蒙从港口传来的信息，他

的简短答复是维纳蒙应该离开。其传令者说：“比布鲁斯的主人派我来告知你：‘滚出我的港口！’”²⁸这样的争执反反复复持续了二十九天。当9月来临时，维纳蒙担心他得等到来年春天航行恢复后才能离开了（这证明当时有休航季，休航惯例甚至也适用于沿迦南海岸线的航行）。后来，国王泽克巴尔告诉维纳蒙，曾经有与他类似的使者等待了十七年！维纳蒙打算在另外一艘要离港的船上预定位置，因为门戈贝特已丢下他去了下一个停靠港。后来，当王廷向巴力神（Baal）献祭时，国王的一个臣子突然出现了幻觉，激动不已的国王认为，他必须接见埃及至上神阿蒙的信使，这至少是官方的说法。但是维纳蒙认为，国王的目的是要将他和他的财物分离，使他误了船期，趁他到达皇宫后再将其银两剥夺。但是维纳蒙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莎草纸上写有他进入王宫（泽克巴尔坐在里面）的过程：“当他转过身背对着窗户时，叙利亚大海的波浪击打着他的后脑勺。”²⁹国王不仅未对法老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还对阿蒙神的高级祭司很无礼。他责备维纳蒙没有提交国书（国书被他丢在了塔尼斯），还下令解雇了埃及船员，因为在他看来，和叙利亚人相比，他们显得无能且愚蠢。国王坚定地提出，比布鲁斯的二十艘船及西顿（Sidon）的五十艘船应与埃及进行贸易，然而维纳蒙表达了埃及官方的观点：这些船只不能以异邦船只的身份与埃及贸易，它们必须是处于法老保护下的海船。于是，双方不断地讨价还价，都想获得更多利益，且国王很希望趁埃及的统治者处于弱势之时羞辱埃及。他承认之前的一些国王曾根据埃及人的要求供给木材，但他要求埃及进行偿付；他令手下将王国的账本呈上（表明比布鲁斯有一套复杂的管理体制），从账本中，他证明过去埃及人已经向自己的王国交付

了大量白银。³⁰ 维纳蒙很生气，开始指责国王对埃及这一伟大国度和作为众神之王的法老的失礼。

尽管如此，维纳蒙也知道他的气话不会产生什么作用，故他派人向埃及捎信，要求为泽克巴尔准备一些体面的礼物。埃及人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要求，他们送来了大量奢侈品，包括金银器皿以及一些生活资料，如牛皮、亚麻布、鱼、扁豆、绳子及五百卷莎草纸（泽克巴尔可以在上面记录更多的财务账目）。³¹ 同时，维纳蒙的需求也没有被怠慢。泽克巴尔派遣了三百名壮丁和三百头牛帮助他砍伐和运送木材。泽克巴尔亲自到海岸监督木材的装载，并向维纳蒙送上自己的美意以安抚他：酒、一只绵羊和一个埃及女歌姬。维纳蒙乘着一艘由比布鲁斯船员驾驶的船离港。他逃离了多尔海盗的追捕；后来因遇到风暴船只驶向塞浦路斯，在那里，他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多亏当地的善良的女王他才幸免于难。³² 留存的文献便记录到此，然而整个故事似乎是在为这次失败的任务辩解——我们并不清楚木材最终是否到达埃及。当然，这一描述并不能代表东地中海上的日常贸易情况，但其珍贵之处在于，它首次记录了贸易航行，以及在异国宫廷做生意会可能遇到的政治难题。

埃及人是地中海最富有的势力，但是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敌手。赫梯帝国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出现，拥有大量的金属资源，严重威胁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利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致力于恢复埃及在此地的影响力——自信仰异教的法老埃赫那吞统治以来，埃及对此地的统治便减弱了。赫梯人则调动了其盟友，包括位于西亚的仆从，如吕西亚人（Lycians）和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后来荷马用这个词称呼特洛伊人），以作为回应。公元前 1274 年 7 月，在卡迭石

(Kadesh)，成千上万辆战车被投入战斗；通常来讲，尽管拉美西斯宣称埃及人在战斗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自负的他依然无法掩盖双方均受到重创的事实，因为在战争伊始，赫梯人便砍杀了大量的埃及士兵。³³前 1258 年，双方都承认和谈才是最好的结局。双方订立协议，划定了各自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在大马士革附近确立了一条界线，并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局面。然而，卡迭石之战可以被看作一系列灾难性周期的开端，后续灾难包括特洛伊的陷落（据推测其发生在九十年后）、迈锡尼要塞的毁灭，以及同样重要的神秘的“海洋人”的到来。

注 释

1. W. D. Taylour, *The Mycenaean* (London, 1964), p. 76.
2. Homer, *Iliad*, 2:494-760.
3. J.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 1958).
4. F. Matz, *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 1962), p. 134, plate 32; Taylour, *Mycenaean*, plates 3-4.
5. Taylour, *Mycenaean*, pp. 139-48.
6. *Ibid.*, p. 100.
7. T. Bryce, *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 2006), pp. 100-102; J. Latacz, *Troy and Homer: Towards a Solution of an Old Mystery* (Oxford, 2004), p. 123; cf. O. R. Gurney, *The Hittites* (London, 1952), pp. 46-58; A. Yasur-Landau, *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ambridge, 2010), p. 180.
8. G. F. Bass, 'Cape Gelidonya: a Bronze Age shipwreck',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57, part 8 (1967); G. F. Bass, 'A Bronze Age shipwreck at Ulu Burun (Kas): 1984 campaig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 90 (1986), pp. 269-96.
9. R. Leighton, *Sicily before Histor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London, 1999), pp. 141, 144, 147-8; cf. L. Bernabò Brea, *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 1957), pp.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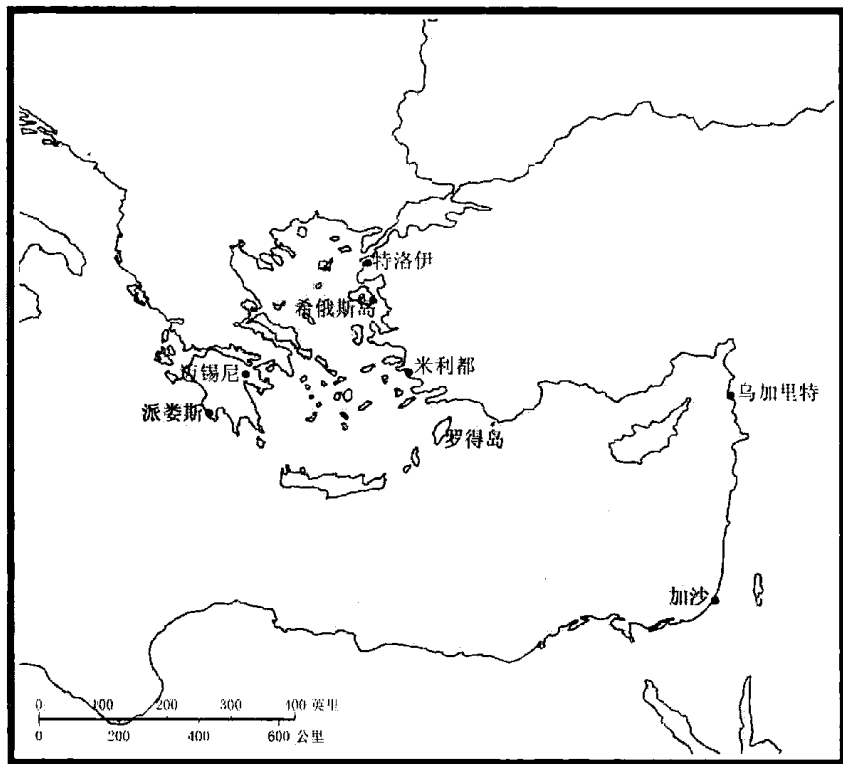
10. Taylour, *Mycenaeans*, pp. 152-3.
11. W. D. Taylour, *Mycenean Pottery in Italy and Adjacent Areas* (Cambridge, 1958); R. Holloway, *Italy and the Aegean 3000-700 BC* (Louvain-la-Neuve, 1981).
12. Bernabò Brea, *Sicily*, pp. 138-9; cf. Holloway, *Italy and the Aegean*, pp. 71-4.
13. Holloway, *Italy and the Aegean*, pp. 87, 95.
14. Taylour, *Mycenean Pottery*; Holloway, *Italy and the Aegean*, pp. 85-6.
15. Holloway, *Italy and the Aegean*, pp. 67, 87-9.
16. F. Stubbings, *Mycenaean Pottery from the Levant* (Cambridge, 1951).
17. W. Culican, *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 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 1966), pp. 46-9.
18. *Ibid.*, pp. 41-2, 49-50; W. F. Albright, *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Harmondsworth, 1949), pp. 101-4.
19. Taylour, *Mycenaeans*, pp. 131, 159.
20. D. Fabre, *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2004-5), pp. 39-42.
21. A. Gardiner, *Egypt of the Pharaoh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61), pp. 151-8.
22. Fabre, *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pp. 158-73.
23. *Ibid.*, pp. 12-13.
24. *Ibid.*, pp. 65-70.
25. Bryce, *Trojans*, p. 89.
26. H. Goedicke, *The Report of Wenamun* (Baltimore, MD, 1975).
27. *Ibid.*, pp. 175-83.
28. *Ibid.*, p. 51.
29. *Ibid.*, p. 58.
30. *Ibid.*, pp. 76, 84, 87.
31. *Ibid.*, p. 94.
32. *Ibid.*, p. 126.
33. Gardiner, *Egypt*, pp. 252-7; Gurney, *Hittites*, p. 110; N.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1150 BC* (London, 1978), pp. 29-32; R. Drews,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 1200 BC* (Princeton, NJ, 1993), pp. 130-34.

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

(前 1250 ~ 前 1100 年)

1

42 特洛伊与海上民族的衰落已经成为庞大的文学主题，它们是影响到整个东地中海——或许也影响到西地中海——的一系列进程的一部分。在公元前 18 世纪，随着希沙里克山丘上的宏伟城市建筑拔地而起，特洛伊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洛伊第六文化层”一直存续至前 13 世纪，其间伴随着一些小规模的重建工程。堡垒的城墙有九米厚（可能更厚），还修了几个大城门及宏伟的瞭望塔，关于该城墙的残存记忆激发了荷马的灵感；城内有带庭院的两层楼房。该堡垒是一个精英阶层的居住之地，他们以某种方式生活，但与同时代的迈锡尼人、派娄斯人或克诺索斯人相比，他们的衣饰并不奢华。¹ 一处近海平原的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存在一片下城区，其规模似乎是堡垒的七倍，占地约十七万平方米，与希克索斯人设在阿瓦利斯的都城差不多大。² 这里比较富有的资源之一是马匹，这一时期的文化层中开始出现马骨。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是著名的“驯马师”（*Hippodamoi*），尽管他选择这个词是为了成全史诗的韵律，但这一描述也与考古发现的证据惊人地相符。在两个大帝国投入成百上千战车的卡迭石之战（或据《圣经》所载，战车被送至红海深处）期间，驯马师显然是战时所需。



观点的分歧早期主要集中在特洛伊人的身份上。古罗马人宣称自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他们也断言自己并不是希腊人的一支。然而，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人说希腊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他们的陶器。特洛伊陶器不只属于特洛伊人，它属于覆盖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特洛伊人也从希腊本土获得了一些希腊风格的陶器，但从特洛伊文化遗址的第六文化层和第七文化层一期（Troy VIIa）的考古发现看，仅有百分之一的陶器是迈锡尼风格（包括当地仿制品）。所有证据表明，特洛伊人属于赫梯世界外围的一个族群，使用与赫梯语接近的卢维语，卢维语属于那些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西侧海岸的人，且正如我们所见，他们还借用了来自克里特的线形文字

A。³毫无疑问，赫梯档案中保留有大量特洛伊人与赫梯国王的通信文件，但特洛伊人自己的书信没能保存；只有一份简短的书面文献被发现，它是来自“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二期”的一个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的印章（“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二期”的时间为公元前12世纪晚期，但印章本身可追溯至更久以前）。从其上文字看，它属于一个抄写员和他的妻子。⁴特洛伊处于赫梯世界而非迈锡尼世界的边缘。整体来看，它并非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但就局部而言，它又位于北部爱琴海贸易路线上的重要位置。出于这个原因，它成了兵家必争之地。⁵

公元前13世纪，赫梯统治者渴望进一步增强其在安纳托利亚近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他们的目标是牵制埃及人，从而在争夺叙利亚北部控制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他们也在小心防范另一个敌手——阿西亚瓦（Ahhiyawa）王，即迈锡尼身份最高的王。特洛伊本身和此事无太大关系，但其军事方面的援助可能颇有用处。如前所见，赫梯的西亚诸属国已被召集到卡迭石战场。阿西亚瓦人与赫梯人之间的冲突的导火索有很多，包括米拉宛达 [Milawanda，即米利都（Miletos）]，此地曾经是米诺斯贸易的中心，此时它至少间歇性地成为迈锡尼在小亚细亚沿岸的一个同盟者。赫梯人被此激怒，于前1320年袭击了这座城市，并将其毁灭。⁶小亚细亚沿岸于是成为一个战乱之地，该地区经常改变效忠对象，迈锡尼武士似乎也常常插手该地纷争。

其中一个混乱之源是一个出身不详的名为皮亚马拉杜（Piyamaradu）的雇佣军长官（*condottiere*）。约公元前1250年，他是赫梯统治者致阿西亚瓦王的一封带有抱怨情绪的信中主要谈及的对象。在早些时候，赫梯王与阿西亚瓦王曾因由谁主宰

一个被称为维露沙 (Wilusa) ——这一名称令我们想起了希腊人对特洛伊的另一个称呼伊利奥斯, 或者其原称维利奥斯 (Wilios) ——的地方而发生分歧, 但之后他们成了朋友。⁷ 很明显, 小亚细亚沿岸被分割成很多令人无法确定其从属的小国, 它们时而效忠于赫梯王, 时而又处于阿西亚瓦王的保护之下。维露沙有一位名为阿拉克山笃 (Alaksandu) 的国王, 其名字的发音似与亚历山德罗斯 (Alexandros) 极为相似, 亚历山德罗斯是海伦的诱拐者帕里斯 (Paris) 的一个别称。另外一个管理着百辆战车、统领众多步兵的雇佣军长官是“阿西亚人” (Ahhiya) 阿塔西亚 (Attarssiya), 他的名字与阿伽门农 (Agamemnon) 和墨涅拉奥斯 (Menelaus) 的父亲阿特柔斯 (Atreus) 的名字极为相似。征服塞浦路斯似乎已成为阿塔西亚的小规模军队的目标, 而塞浦路斯的归属是埃及人和赫梯人都感兴趣的事。⁸ 这些名字都无法证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 但是在史诗中出现了不少安纳托利亚人的名字, 荷马或更早的一些叙述者们提到了它们。一度反抗赫梯人的维露沙国王阿拉克山笃与赫梯人缔结了和约。维露沙是阿苏瓦 (Assuwa) 的四领地 45 之一, 其统治者对赫梯人通常采用不同政策, 对迈锡尼人亦是如此, 但是在卡迭石之战中, 维露沙为赫梯人提供了军队支援。阿苏瓦治下的另一个行政区域名为塔瑞萨 (Taruisa), 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特洛伊。⁹ 所有对阿苏瓦加以描述的文件, 都表明阿苏瓦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较远处; 而且很明显, 维露沙和塔瑞萨位于伊利奥斯 (或特洛伊) 遗址附近。一首出自赫梯人首都的诗 (约前 16 世纪用卢维语写成) 提到了“陡峭的维露沙”, 而且同样的短语也被荷马用来形容伊利奥斯。可能维露沙和塔瑞萨指同一时期的同一个城市或属于同一统治者的两个相邻城

市，就像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他既是阿尔戈斯（Argos）的王，又是迈锡尼的王。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沙里克就是荷马笔下的伊利奥斯，也是维吉尔笔下的特洛伊。

毫无疑问，迈锡尼人与安纳托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土地和城镇的所有权而发生。特洛伊战争是这些冲突的一个后期的记忆，这些冲突最终被浓缩为一次希腊人向众多城市中的一座发动的一场战役。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对特洛伊城十年围攻的记载不可信，事实上，它并非一次性的战争，也非十个阶段的战争，而是具有很多个阶段的战争，战争是间歇性的，而且在赫梯的外交信件中还有关于短暂和平时期的记录。一般而言，这并非迈锡尼王与赫梯王之间的战争，因为大多数战争由一些野心勃勃的雇佣军长官操纵，为了确保最大利益，他们也经常倒戈，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效忠于自己的族群。这是一种低水平、地方性的战斗，但它们偶尔也会导致一些大的冲突，例如当赫梯人觉得有必要宣布对米利都的宗主权时。伊利奥斯或特洛伊并没有因这类冲突而衰落；事实上，“特洛伊第六文化层”引起了一些贪婪的征服者的注意，因为它位于由地中海进入安纳托利亚的贸易路线上，来往运送的货物有金属、织物，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马匹。

导致“特洛伊第六文化层”走向毁灭的，并不是人的贪婪。特洛伊位于强震多发地带。约公元前1250年，南墙被掀翻，东墙的一部分也完全塌陷，一场大地震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坍塌下来的建筑物碎片堆积得很高，有些地方高达一米半。¹⁰ 尽管如此，城墙的主要部分并未遭到破坏。¹¹ 然而，对下城区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们知之甚少。很明显，地震之后，老一辈的精英阶层就不再住在上城区的大房子里。新的房舍被建于“特洛伊第

六文化层”的瓦砾堆上，至少在堡垒内其排列更为紧密，以便更多人口居住。在这些新居内，特洛伊人挖掘储物窖，他们之前从未这样做过，这证明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准备库存，以备灾难时期使用。迈锡尼陶器进口数量的减少说明当时的贸易联系已变得很弱。特洛伊的盛世不复存在，但它并不孤单，同一时期的迈锡尼也面临困难。约前 1250 年，迈锡尼下城区遭受了一次袭击，城堡因而不得不加固；人们修建了一条穿越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希望以此抵挡外来侵袭者，但这些侵袭者究竟是来自迈锡尼其他城邦的王，还是外来世界的人侵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¹²至前 13 世纪末，沿海岸线已经建立起一些瞭望塔，用以向宫殿的居住者告知入侵者的动向。即使如此，很多迈锡尼的重要城市，包括梯林斯和派娄斯，都已在 1200 年前后被摧毁。在派娄斯，因灾难的出现，人们向神献祭。在一份由线形文字 B 书写的献祭牲畜的清单中提到了一男一女，可能是用于人祭 [这一活动不禁使人想起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用女儿伊菲革涅亚 (Iphigeneia) 献祭的故事]。此次灾难使黎凡特沿岸受到波及：乌加里特王派出军队接应赫梯人，但在军队远去时外族的船队集结在了叙利亚海岸；国王在绝望之中在一块泥板上写了一封信，以向盟友塞浦路斯王发出警告，但是这封信从未被送出——三千多年后它被发现时仍然在一个窑炉中等待烘干。在几天内甚至几个小时内，乌加里特的巨大贸易中心被摧毁，从此再未复兴。¹³靠近内陆的阿拉拉赫城 (Alalakh，接近现在土耳其与叙利亚的交界处) 于前 1194 年被毁，之后再未复苏。但是其位于阿尔米纳 (al-Mina) 的港口被重建，生产于其母邦毁灭前后的迈锡尼货物已经在此地出土。¹⁴阿拉拉赫处于亲赫梯派与亲埃及派的不断内讧之中，因此它总是在发生政治危机。位

于安纳托利亚内陆的赫梯首都博阿兹柯伊（Boğazköy）在同一时期也被摧毁，尽管这可能是内部危机的后果。而且，赫梯中心城市47的毁灭意味着赫梯无法保护其在地中海的属地。尽管乌加里特发出了警示，但塞浦路斯仍然受到了严重打击，它的一些城镇被摧毁，然后希腊难民或者入侵者到来，他们带来了古代的线形文字和一种早期的希腊语。在克里特岛，一些人向内陆迁徙，一直到达岛上一些难以接近的高点，如卡尔菲（Karphi）和弗洛卡斯特罗（Vrokastro）。

于是，在古典作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所认定的特洛伊陷落的时刻，即公元前1184年前后，特洛伊被再次毁灭，这次是被烧毁的。一位不幸的拼命逃跑的特洛伊人的遗骸被发现于“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的废墟之下。¹⁵因此，就算在这一时期希腊人的确将特洛伊毁灭了，在他们获得成功之时，他们自己的城邦也由盛转衰。与其说“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的陷落因拥有黄金资源的迈锡尼人与拥有驯马师的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冲突发生，不如说它是几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之间的一次战争的结果。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毁灭特洛伊的人，就是伟大的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统一领导下的希腊人；一种合理的猜测是，他们是一群由具有希腊或其他血统的流放者与商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很可能也是袭击了迈锡尼和派娄斯的那些人，抑或是来自迈锡尼和派娄斯的武装难民。从这个角度看，“特洛伊陷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是赫梯人及其代理者与希腊人及其代理者之间的战争；然后，“特洛伊第六文化层”被毁这一灾难性事件削弱了这座城市的防御力，甚至似乎也削弱了其自给能力（地窖的出现便是证据）；前1184年前后发生的要塞的陷落使特洛伊经历了更大的

毁灭；自此以后，特洛伊进入一个逐渐衰落的时期。于是，这个过程引发了基本的疑问：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究竟发生了什么？发生于青铜时代晚期的这些毁灭性灾难标志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吗？抑或其衰落（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发生了）经历了更为渐进的过程？从来自克里特和特洛伊的证据看，两地居民都在更为卖力地储藏食物，暗示当时多有饥荒发生，这使得一些族群定居在了物产更为丰富的土地上。进一步讲，“衰落”也有多层含义：政治统一体的损毁，如一些大帝国的瓦解；贸易量的下滑，这反映了需求量的减少；人们生活水准的下降，这不仅发生在政治精英阶层中，而且波及了多数社会群体。于是，问题焦点再一次集中在身份不明的入侵者上，我们被再次带到传奇与历史的交接之处。

2

在这一时期，有能力的士兵可以选择在军旅生涯中为获得东地中海沿岸土地的控制权而战；如果没有人雇用他们，他们可以使自己变为“维京海盗”，去夺取自己所求之物。据发现于塔尼斯的铭文所示，拉美西斯二世宣称已经摧毁了被称为沙尔达纳（Shardana）的族群，该族群曾从海上突袭埃及，但不久之后，他们就被编入拉美西斯的军队，且出现在了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中。据前1189年的一份莎草纸的记载，拉美西斯三世夸张地称已将侵袭其王国的人碾为粉末，而后又承认将他们安置在了一些军事要塞中。¹⁶考古发掘表明，有一部分沙尔达纳人被派往阿克湾，为法老守护经过迦南的王室道路，这些偷猎者于是变成了猎场的看护者。沙尔达纳海盗擅长用剑和矛，佩戴独具特色的有角头盔。¹⁷当沙尔达纳武士逐渐

被接受时，其他群体却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阿皮鲁人（*apiru*）或哈比鲁人（*habiru*）被认为是制造混乱的沙漠中的流窜者，他们中间偶尔会有人成为雇佣兵。他们的名字可能与“希伯来”这个词同源，但阿皮鲁或哈比鲁并不仅仅指代一个人数不多的闪米特族群。¹⁸ 各类贫困人群——流浪者、难民及被放逐者——都被吸引至富庶的埃及寻求生计，这不足为奇。随着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经济条件的恶化，这一群人铤而走险的动机进一步增强。令人惊诧的是，克里特人和安纳托利亚人居然没有外出寻找土地、工作及新的机会。

从公元前 13 世纪末至前 12 世纪中期，特洛伊的第六文化层和第七文化层一期被毁灭，下埃及则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围困。第一个威胁来自西部土地上的族群。大批利布人（*Libu*）或利比亚人（*Libyans*）在国王梅尔利（*Meryry*）的率领下，于前 13 世纪末，携带自己的家人、成群的牲畜、黄金、白银及家具向东迁移。正如法老麦伦普塔（*Merneptah*）在一段存留于卡纳克神庙的铭文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整天都在四处游逛，抢掠食物以充饥；他们来到埃及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家糊口。”与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他们的北非同盟者梅什韦士人（*Meshwesh*）和一些外族雇佣军。他们已到达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边界，并打算在此定居；如果埃及人不欢迎他们，他们将强行入驻。这使麦伦普塔感到无法忍受。前 1220 年 4 月，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与利比亚人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最终，梅尔利被彻底打败，退回其故土，“并将弓、箭及鞋丢弃于身后”。麦伦普塔宣称已斩杀六千个利比亚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至少三千人。¹⁹ 然而，这只是周期性入侵的开始，这种入侵的性质更接

近未遂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掠夺行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其他族群乘着牛车而来，这次的入侵者来自东方。备受历史学家关注的这一时期的“海洋人”是这场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人口迁移中的一支。在这轮长期的移民潮中，目的在于迁徙的人要比投机取巧的雇佣兵多，“陆地人”要比“海洋人”多。

利比亚人知道从何处可以获得帮助，且国王梅尔利还获得了来自“海上诸国”（引自一段碑文）的几个外族团伙的支援。其中一个民族是卢卡人（Lukka），安纳托利亚人称之为吕西亚人（尽管这并不能确切地证明他们已定居在吕西亚），至少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海盗和士兵了。他们中既有一些沙尔达纳人，也有其他族群。埃及人宣称，有2201个埃克韦什人（Ekwesh）、722个图尔沙人（Tursha）及200个舍克里什人（Shekelesh）在同梅尔利作战时死于战场。²⁰现在麦伦普塔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亲自解决了该地区的问题，且傲慢地记录了他武力平乱的过程；其王国的疆域不仅向西延伸至利比亚，还囊括了东部的土地。他声称，“以色列被夷平，已经荒无人烟”（这是埃及文献首次提及以色列，且很明显，他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提及）；他将这种态度强硬的和平也扩展到了迦南的土地，在这里他已经“劫掠了每一处土地”。成功控制了阿什克伦（Ashkelon）和基色后，他说：

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任何道路上自由穿行。所有的要塞都开放了，所有水井都可供旅行者们使用。城墙和城垛安详地沉睡在阳光中，直到它们的守卫者把它们唤醒。

治安员们舒展放松地安然熟睡。沙漠前线戍卫者亦可以在他们喜欢的草地上滞留。²¹

50 麦伦普塔肯定雇佣了一个有能力的宣传者，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所吹嘘的全面和平，其关于以色列状况的吹嘘我们也不能相信。无论如何，他所实现的这种和平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仅仅在三十年后，即公元前 1182 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又遭遇了一次来自西部的入侵，但这一次利比亚人并未召集其北部盟军渡海而来。然而，入侵者的军队甚至比麦伦普塔时期的队伍更为强大：如果相信埃及人的话，即他们斩杀的敌人达 12535 人，那么利比亚的军队可能要超过 30000 人，还不包括随军人员。²²在埃及人于浮雕上描绘的一场战役中，一些入侵者被编入埃及军队，成为埃及军队的一部分：有佩戴着角状头盔的沙尔达纳人；还有些士兵戴有羽毛头饰，这使我们想起前 12 世纪的一些塞浦路斯小物件上的图案；还有些士兵穿着褶裥短裙，与雕刻品上的舍克里什人的服装非常相似。²³

如果拉美西斯的话可信，那么这的确是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和平并未到来：约在公元前 1179 年，北方各部族仍然在流动迁徙（前 1176 年，利比亚人再次发动侵袭，折损了 2175 名梅什韦士士兵）。一段存于哈布城（Medinet Habu）神殿内的铭文记录了这些事件的埃及版本。引人注目的是，动乱不只发生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还发生在更广阔的地区：

诸异邦在岛屿上进行密谋。一时间所有地方都在战争中四分五裂，呈一盘散沙状。在他们的武力面前，无一国

家得以幸免，赫梯、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阿扎瓦（Arzawa）及阿拉希亚（Alasiya，即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他们军力所达之处无不成为荒漠，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而后他们自叙利亚和迦南向埃及前进。²⁴埃及人坚持认为，此次灾难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也对其旧敌赫梯人有很大影响，其以陆地为根基的帝国在这一时期瓦解。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侵入埃及的有培勒舍特人（Peleshet）、阐卡尔人、舍克里什人、达奴人（Denyen）及维舍什人（Weshesh），所有这些族群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将手伸向周边可触及的土地”，这使人们不禁想起蝗虫过境的情景。由于入侵者分别从海路和陆路而来，故他们必然会于埃及的地中海岸及东部边界相遇。陆战中，埃及人及其沙尔达纳的同盟者与赫梯式的战车部队（三个人一辆战车）进行对战，入侵者能够调动大量资源，包

51

括大批量的名贵马匹。像利比亚人一样，他们也随军携带妇女和儿童，用大牛车运载物资。

从海上来的入侵者发现自己遇到了围栏和燃烧的火堆：“他们被迫上岸，陷入包围，然后纷纷倒在沙滩上”。²⁵但在埃及人的另一处记录中，入侵者试图由三角洲进入尼罗河河口；有一些效力于埃及人的船舰努力将侵袭者逼上岸，使之落入埃及弓箭手的射程之内。从浮雕可知，埃及的船似乎是适合于在河上航行的船只，而入侵者的船只与叙利亚的贸易船只更为相似。所有船只都配有风帆，不过它们的移动都要依靠帆与桨的合力。“海洋人”在船头船尾装饰有鸟头，这一特点在公元前12世纪的一个出自斯基罗斯岛（Skyros）的迈锡尼陶罐上也可

见到。有一常见情况被归为培勒舍特人的一个特征（有时也被归为达奴人、阐卡尔人和舍克里什人的特征）：除了褶裥短裙外，培勒舍特人还佩戴似乎饰有羽毛的头盔，这种头盔有点像高高的王冠。入侵者的强大之处并非在其海军，而是陆军（尽管还是败于埃及人）：他们投入大量步兵，用标枪和锋利的剑进行战斗，这些武器被证明在战斗中要比赫梯人和埃及人使用的昂贵易损的战车更为有效。沙尔达纳人的圆形盾很适合近距离战斗。入侵者还没有铁制武器，而赫梯人已开始小规模地生产一些铁器。入侵者们受过严格训练，意志坚定，其武器也十分锐利。这些战士的形象在一个迈锡尼晚期的花瓶上有所表现，故该花瓶以“武士瓶”而著称。花瓶上绘有一队士兵，他们手持标枪、圆盾，身着护胫甲和褶裥短裙，头上戴有角状头盔，具有典型的沙尔达纳士兵及其盟军的特征。²⁶ 法老雇用沙尔达纳人的做法十分明智，因为这意味着他今后可以用类似的武器和策略抵抗入侵者。

如果在埃及铭文和莎草纸中提及的这些族群的身份可以确定，那么我们对地中海的动荡局面的认识将会更为清晰。现代怀疑论者不想去辨认这些在埃及文献中被提及的族群，认为仅靠少量辅音字母不足以做出认定（就像在赫梯文献中提到的阿西亚瓦人一样），且无论如何名字要比族群更容易移植。²⁷ 但是在埃及的文献中，有很多名字与荷马史诗、《圣经》及其他文献中的名称相似，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偶然：一次或两次相似可能是偶然，但是六个以上的相似名称就可以构成证据。达奴人这一名字，会让人回想起“达纳威人”（*Danawoi*）或达纳人（*Danaoi*），荷马有时用其描述那些在特洛伊城外扎营的希腊人；这个名字也会使人想起但族人（*Danites*），他们是居于

雅法附近的一个海洋人族群，据《约书亚记》和《士师记》记载，它显然是在另外十一个部族之后加入以色列同盟的。²⁸ 这些族群分布很分散，公元前 9 世纪，在南土耳其的黑山（Karatepe）出现了一个“达奴尼姆（Dannuniyim）王”。²⁹ 如前文所述，在埃及铭文中已出现了 *D-r-d-n-y*，也就是达达尼尔人（Dardanians）。阐卡尔人的发音类似于特洛伊人（Teucrians），他们是达达尼尔人在安纳托利亚的邻居，有一些散居于今以色列北部的海岸，前文中提到的维纳蒙就是在这里遇见了阐卡尔人。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发音相似的原理，认为在梅尔利的联盟中，舍克里什对应西西里；埃克韦什对应阿西亚瓦，并进而认为阿西亚瓦人就是迈锡尼人；而图尔沙人（*T-r-s-w*）则对应托斯卡纳人（Tuscany），五个世纪后，他们又成为忒圣人（*Tyrsenoi*）或伊特鲁里亚人。这些称呼描述了种族、部族或起源地，但当它们被转化为象形文字后元音会消失，因此很难重构。³⁰ 整体而言，至前 1200 年，东地中海处于灾难性的动荡之中，且海盗与雇佣军不稳定的结盟使他们可偶尔组建大规模的海军和陆军对派娄斯和乌加里特这样的城市进行劫掠；可能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军队的征战中，“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陷落了。他们肯定也攻击过自己的故乡，因此有很多英雄被自己的母邦流放，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一些希腊的传奇故事中得到印证。有时故乡被劫掠也会导致一些战士为了重获财富而袭击塞浦路斯、乌加里特，甚至尼罗河三角洲。在他们中可能有塔瑞萨人（*Taruisa*），塔瑞萨与维露沙邻近或接壤。因此塔瑞萨人这个称谓而不是稍后的伊特鲁里亚人可以最好地解释图尔沙人的来源。换言之，特洛伊人既是海洋民族，又是海洋民族的劫掠对象。

3

58 虽然埃及对这一征服进程进行了抵抗，但法老还是失去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控制；从维纳蒙（Wenamun）的故事可知，这导致了埃及公元前11世纪的诸邦分立、四分五裂的局面。诸邦对其上埃及宗主甚至不再履行口头上的臣属义务。在更偏北的地区，尽管发生于前1200年前后的事件并未导致迈锡尼文化突然、彻底的衰退，但如果希腊传说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事件肯定带来了政治方面的巨大伤害。事实上，也有些地方逃过了前述诸多事件的损害，它们中最重要的是雅典：虽然在迈锡尼时期它算不上一流城市，但卫城已经有人居住，卫城下的凯拉米科斯（Kerameikos）公墓已经在使用。该城之所以能避免毁灭，可能主要是因为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不仅有笔直陡峭的要塞，并配有“独眼巨人修建的围墙”，而且它的供水系统可以助其克服被长期围攻的困境。³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迈锡尼一些较大规模的建筑在被毁后还有人居住。希腊北部地区，如塞萨利（Thessaly）及几个爱琴海岛屿依旧和平；罗得岛是海上贸易枢纽，很多青铜时代晚期的多德卡尼斯精美陶器由此岛运至希腊、南意大利及叙利亚，传统风格的图案，如章鱼图案依旧很受欢迎。希俄斯岛（Chios）的恩波利翁（Emborio）是迈锡尼的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特洛伊的经历与之十分相似：“特洛伊第七文化层一期”被毁灭后，一个不那么繁荣的新城市出现了。

希腊北部地区未受破坏的事实使很多人认为攻击那些巨大中心的侵袭者来从南方跨海而来；而并非所有岛屿都受影响这一事实又表明入侵者来自北方。希腊的历史传说提道，雅典在

北部多利亚希腊人（Dorian Greeks）的一次入侵中幸存下来。据推测，多利亚人是雅典的竞争对手斯巴达人的祖先，故雅典人更看重这一传说而非考古证据。一位权威人士在对迈锡尼时代晚期进行评论时说道：“不只应有能证明入侵的证据，还应该有关于入侵者的证据。”³²他仅能找到两个证据：用于交锋的短剑和一种回形别针（该别针前部弯曲，类似于提琴弓的搭扣）。有人认为，新式剑到达东地中海这件事，可以说明入侵势力在与特洛伊、迈锡尼及叙利亚沿海城镇的对抗中为何获得了成功，但并不能证明有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发生，且迈锡尼人也已使用了同样的剑。而整个中地中海和东地中海的别针样式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类似的改变，这些变化反映了包括西西里岛西部在内的地区的艺术品味的变化以及制作工艺的进步。另外，方言方面的证据也足够明晰。多利亚式的希腊方言已遍布伯罗奔尼撒。与此同时，来自希腊的迈锡尼难民迁居至塞浦路斯，标志着希腊人首次大规模迁入该岛，并带来了他们的方言[这种方言只在偏远的阿卡迪亚（Arcadia）留存]。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恰好得到了考古证据的佐证，因为希腊人迁移时带来了长久存在的迈锡尼风格的陶器，以及一种具有希腊风格的墓室。³³

54

尽管古文化正在被改造，但关于这方面的证据不易解读。例如家族合葬墓向独葬或合葬式的石板墓[石棺墓（cist tombs）]的转变，反映了人口的变化、丧葬风格的变化，还是因资源匮乏人们无法组织劳动力修建家族陵墓？在这一问题上，学界目前依然存在争议。我们还可以在陶器上发现旧有技术正在消失的迹象，考古学家轻蔑地将这些陶器归类为“亚迈锡尼式”（Sub-Mycenaean）陶器。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最

终也受到影响，且早在公元前 1000 年之前，位于米利都和恩波利翁的贸易中心就被摧毁；东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货物运送量急剧下降，且货物的运输经常会遭受海盗的劫掠，在后来的希腊故事中海盗被称为“提色尼安人”（Tyrsenians）。尽管在这一刻，人们的关注点仍不可避免地聚焦于东地中海，但有证据证实同一时期，中部地中海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在西西里岛，前 13 世纪中期被称为“战争与恐惧开始”的时期；但是威胁来自意大利本土，而非遥远的海洋族群。³⁴ 根据在西西里岛发现的一些青铜时期晚期的陶器可推测，约前 1200 年这里与希腊的联系就开始减少，至前 1050 年可能已经彻底结束。³⁵

55 进入南部希腊的陆上移民在到来时，并未像前往希腊的劫掠者那样协同一致行动。他们可能没有满怀敌意地进行武装入侵，而是慢慢地、持续不断地渗入希腊的北部，定居于现在的伊庇鲁斯（Epeiros）和阿尔巴尼亚。他们以一种更为简单、基本的存在肯定并巩固了这一趋势。但是这一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希腊本土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地位。交流依然存在：至公元前 11 世纪，雅典作为“原几何”（proto-Geometric）风格陶器的生产中心，已经经爱琴海将其产品出口，而且这种陶器（有些图案极为精美且技术精湛）已经在米利都（此时已被收复）和士麦那老城（Old Smyrna，这是一个新的聚落）出土。这种状况表明，希腊人开始通过海洋重建连接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贸易网，这就为前 8 世纪充满生机的爱奥尼亚希腊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4

发现于公元 19 世纪末的一份被称为阿梅诺皮的奥诺玛斯

提康（Onomastikon of Amenope）的著名莎草纸，很有助益地确定了培勒舍特的位置在巴勒斯坦南部，阐卡尔在巴勒斯坦中部（为维纳蒙的故事证实），沙尔达纳位于巴勒斯坦北部。这与考古证据刚好吻合：海洋人群体居住在阿克，而阿克可能是埃及人建立的基地之一，并派有雇佣军驻守。³⁶海洋人群体与阿克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培勒舍特这个原本属于培勒舍特人的名称最终成为该地区的名字。就像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词法拉沙（Falasha）被用于指代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培勒舍特”意为“异邦人”或“流浪者”；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它又演变为 *Pelishitim*；在希腊语中，培勒舍特人的土地被称为 *Palaistina*，由此演变出了 *Philistine*（腓利士）和 *Palestine*（巴勒斯坦）。培勒舍特这个词可能也与佩拉斯吉（*Pelasgian*）有联系，佩拉斯吉常被后来的一些希腊作家用来描述爱琴海地区的前希腊族群，据说其中有一些居住在克里特岛——正如闪米特词法拉沙所表达的，在此，他们的身份是异邦人或流浪者。在考古学研究的帮助下，我们可对腓利士人的身份做出进一步的确认。在腓利士人的一些遗址上，如今天以色列阿什多德（Ashdod）的遗址，我们发现了前12世纪和前11世纪的陶器，其风格与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陶器相似。塞浦路斯也有类似的陶器出现，但是我们并不能判断其来源，因为该岛经常被海洋人劫掠，且不断有迈锡尼人迁徙至此。³⁷这说明自约前1300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移民进程，它不时被突如其来的毁灭打断：如果移民者不能获准居于此地，他们可能就会拿起武器，就像法老们看到的那样；如果他们受到欢迎，甚至如果他们被埃及人打败，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此居住，而且在靠近沙尔达纳的地方，有很多人于法老的军队中效力。

腓利士人选择的移民区域自加沙向北延海岸线分布，他们的四个主要中心为：加沙、以革伦（Ekron）、阿什克伦及阿什多德。“第一批腓利士人”到达阿什多德时，带来了迈锡尼风格的制陶术（此地的迈锡尼风格的陶罐并非进口品，而是用当地的黏土制成）。腓利士人（和塞浦路斯人）对迈锡尼文明的传统风格保存得最为长久，当时在希腊，这些传统风格已经被更为简明、粗犷的装饰取代。对从以色列的基色、约旦河西岸的特尔艾吞（Tell Aytun）以及其他遗址出土的陶器的研究表明，当时比较常见的一种设计为一只长颈鸟的图案，有时它的头会转向背后。这种设计十分精致，用线条勾勒，有红色的细条纹及其他图案。³⁸在加沙地带发现的陶器及引人注目的人形黏土陶棺也显示了来自埃及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埃及服役的士兵已将埃及的艺术风格带至此地；但是迈锡尼的影响更具优势，此地的陶器展现了很强的迈锡尼特质特征。

迈锡尼自制陶器的出土表明跨越海洋的人不仅仅是士兵和海盗。这些移民人数众多、拖家带口，既有制陶者，也有士兵。腓利士人的移居地特尔卡西尔〔（Tell Qasile），今特拉维夫（Tell Aviv）〕成为酒和油的农业贸易中心。腓利士人的到来并未导致该地与爱琴海商业交流的大潮；相反，由于贸易城市被毁，迦南沿岸的古老生活方式即将消失。食品贸易依旧活跃，某一地区食材的匮乏则可以由另一地区的盈余进行补偿。但是迈锡尼文明辉煌时期的奢侈品贸易已然萎缩，且没有宏伟的王宫可供客商销售其奢侈品。

腓利士人来自希腊世界。³⁹他们是阿伽门农与奥德修斯（Odysseus）的同族。当他们到来时，他们讲希腊语或卢维语。有一些印章上刻有一些符号，这些符号类似于线形文字 A 或

线形文字 B 的字母表中的符号。《圣经》强调腓利士人来自迦斐托 (Caphtor, 即克里特), 这些印章很明显印证了这一传说。³⁷《耶利米书》称腓利士人为“迦斐托岛的遗民”。大卫王杀死了腓利士巨人哥利亚 (Goliath), 哥利亚不禁使我们想起荷马笔下的希腊人。《圣经》中描述的哥利亚的甲冑与同时期迈锡尼武士瓶上所描绘的希腊人甲冑非常相似。⁴⁰ 大卫王作为流亡者与腓利士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雇用了一些克里特卫兵 (Cherethites, 即基利提人)。

定居巴勒斯坦之后, 很多腓利士人失去了航海本领, 转而从从事农耕和手工艺活动。不久后他们便说起了闪米特语, 并接受了迦南人的神, 但起初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男神与女神移居此的。阿什多德出土了一些手臂高举的彩色小雕像, 它们被认为代表了爱琴海的大地女神, 且与迈锡尼世界发现的黏土塑像类似。⁴¹ 在以革伦内陆地区, 他们建立了崇拜中心, 崇拜中心中有爱琴海风格的炉灶, 后来这些中心逐渐就被装饰成了迦南式的庙宇。⁴² 有铁质刀刃的刀具也在这里出土, 这是在神殿中举行宗教仪式时需要的器具。《圣经》提到, 他们控制了铁的供应, 以色列人因此无法受益于铁的使用。以色列人对铁的使用事实上仅限于一些珍贵物品, 如铁质手镯; 铁质手镯在当时非常流行。腓利士人不仅是掠夺者和毁灭者 (在现代人眼中, 这就是腓利士人一词代表的含义), 他们还沿巴勒斯坦海岸创立了一种活跃的以城镇为基础的文明, 迈锡尼文明的痕迹在该文明中获得了长期保留。腓利士人展示了一群雇佣军和迁徙者实现对其他民族土地的控制的过程, 以及土地上的人民慢慢将腓利士人融入闪米特 - 迦南文化, 从而从文化上征服腓利士人的过程。他们离开地中海向内陆发展, 占领了迦南南部山脚下

的一些地区，如以革伦，该地后来因压榨橄榄油而闻名。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与以色列的子孙之间矛盾不断。

5

提及以色列，我们首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动乱中，除腓利士人外，以色列人是否也开始了迁徙？神通过先知阿摩斯问道：“我不是已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地，将腓利士人领出迦斐托了吗？”⁴³那些相信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的人，一般将其时间确定于约公元前 1400 年至前 1150 年间。《圣经》中描述的以色列子民到达埃及的很多细节也与其他证据吻合——为了寻求食物供应，闪米特旅行者到达埃及，且闪米特族的维齐尔时不时地出现在埃及宫廷 [这与约瑟（Joseph）的故事没有太多不同]。在埃及人的战车陷入红海淤泥之后出现的、据说是摩西吟唱的“海之颂歌”——很明显它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曲——描述了与海洋人时代一致的使用战车作战的方式。⁴⁴前文已经提及，游牧的阿皮鲁人或哈比鲁人出现在了埃及东部，他们可能还与乌加里特的衰落有关，乌加里特国王在其绝笔信中提到了他们。我们也会看到臣服于埃及人的人群（他们有时是战俘），这让我们联想到在埃及长期遭受奴役、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更为严谨的寻求证据的方法可参考荷马。荷马可以通过口述历史、传说及周边族群的记载，追溯在他生活的年代数百年以前的社会的特点，这种方式也可使早期以色列人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他们长期旅居埃及，之后成功从法老战车的追捕中戏剧性地逃离的过程。同样，也有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出埃及记》中描述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迁徙引发了很多小规模迁移，一些闪

米特部族离开埃及便是其中一部分，这在近东文献中并没有出现（除了麦伦普塔铭文曾简要提及）；以色列人是阿皮鲁游牧民，在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归了游牧生活，逃离了对法老的臣服，最终跪拜在了他们自己的神的脚下。

进入迦南后，以色列的子民并未摧毁耶利哥或埃伊（Ai），因为早在几百年前，这些地方已经被毁灭。他们带着绵羊和山羊（没有猪）居住在山区的村子里。他们在自己的神的面前达成契约，而且他们也承认其他民族和部落——如但族——的存在。⁴⁵正像腓利士人努力融入迦南社会，既尊奉大衮（Dagon）神，又尊奉当地居民的神一样，但族成了希伯来人中的一个族群，接受了以色列的神。在这一时期，除与但族的交流和与腓利士人日益紧张的关系外，以色列人和地中海地区的来往很少。当腓利士人开始在迦南开垦土地，并与当地融合时，他们试图控制内陆的一些地区，并与以色列人有了正面冲突。如果《圣经》的记载准确，其冲突的高潮发生在约公元前1000年。在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于一场与腓利士人的激烈战争中去世后，曾经生活于腓利士人间的大卫王继位。为了瓦解腓利士人的力量，他以刚征服的牢固据点耶路撒冷为基地，据推测，他借此控制了整个地区。尽管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前11世纪以来的以色列人的遗址并未留下太多奢侈品的痕迹，且以色列人与地中海的贸易交往也很少。即便如此，对以色列人依旧需要关注，因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将对地中海各族群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据《圣经》记载，东地中海区域有很多不安分的部落和族群，但没有任何一个部族能在亚非交界地长久居住。

59

可能并非所有的海洋人都来自海洋，其移民规模也可能没

有埃及记述者想让其读者相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低估海洋人和陆地人各自的影响力，事实上他们甚为活跃。这一时期出现的灾难是一个世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的先兆。伴随政治混乱发生的是经济危机，局部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圣经》简短地提道，在以色列人与腓利士人交战之后，发生了一场瘟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混乱出现的原因之一，是黑死病或类似疾病的暴发，且疫病的源头应该与查士丁尼时期出现的黑死病相同。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东地中海突然陷入动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一个很多事情都只能推测的时期，上述猜测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事实。东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已经被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转折期”，其遭受灾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衰落的时期，它或许是“古代史上最严重的灾难”。⁴⁶第一地中海世界囊括了自西西里岛到迦南、自尼罗河至特洛伊的广阔区域，但迅速地瓦解了。而它再次成为囊括直布罗陀海峡至黎巴嫩间广阔区域的“贸易内湖”，则是好几百年之后的事了。

注 释

1. C. Blegen, *Troy* (2nd edn, London, 2005), pp. 92-4; T. Bryce, *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 2006), pp. 58-61.
2. J. Latacz, *Troy and Homer: Towards a Solution to an Old Mystery* (London, 2004), pp. 20-37; cf. Bryce, *Trojans*, pp. 62-4.
3. Bryce, *Trojans*, p. 117.
4. Latacz, *Troy and Homer*, pp. 49-51, 69.
5. *Ibid.*, pp. 46-7, fig. 10 (map of trade routes).
6. Bryce, *Trojans*, pp. 104, 111.

7. O. R. Gurney, *The Hittites* (London, 1952), pp. 49-50; Bryce, *Trojans*, pp. 110-11.
8. Gurney, *Hittites*, pp. 51-2; Bryce, *Trojans*, p. 100.
9. Latacz, *Troy and Homer*, pp. 92-100.
10. Blegen, *Troy*, pp. 124-8.
11. 认为地面塌陷为毁灭主因的观点。见 M. Wood, *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 (2nd edn, London, 1996), pp. 203-11
12. V. R. d'A. Desborough and N. G. L. Hammond, 'The end of Mycenaean civilisation and the Dark Ag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 1 and 2, revised edn, pre-print fascicle (Cambridge, 1964), p. 4; N.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1150 BC* (London, 1978), p. 180.
13. Sandars, *Sea Peoples*, pp. 142-4; R. Drews,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 1200 BC* (Princeton, NJ, 1993), pp. 13-15.
14. L. Woolley, *A Forgotten Kingdom* (Harmondsworth, 1953), pp. 163-4, 170-73.
15. Blegen, *Troy*, p. 142.
16. Sandars, *Sea Peoples*, p. 133; also A. Gardiner, *Egypt of the Pharaoh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61), pp. 284, 288; A. R. Burn, *Minoans, Philistines, and Greeks BC 1400-900* (2nd edn, London, 1968).
17. Sandars, *Sea Peoples*, pp. 106-7.
18. *Ibid.*, pp. 50-51; Gardiner, *Egypt*, p. 198; B. Isserlin, *The Israelites* (London, 1998), p. 55.
19. Sandars, *Sea Peoples*, p. 105; Gardiner, *Egypt*, pp. 265-6.
20. Drews, *End of the Bronze Age*, p. 20; A. Yasur-Landau, *The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 (Cambridge, 2010), p. 180.
21. Sandars, *Sea Peoples*, p. 114; Gardiner, *Egypt*, p. 266; Isserlin, *Israelites*, p. 56, and plate 34 opposite p. 81.
22. Drews, *End of the Bronze Age*, p. 21.
23. T. and M.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the Search for the Philistines* (New York, 1992), p. 95; cf. Sandars, *Sea Peoples*, pp. 134-5.
24. Sandars, *Sea Peoples*, p. 119; Gardiner, *Egypt*, pp. 276-7.
25. Sandars, *Sea Peoples*.
26. *Ibid.*, pp. 124, 134-5, 165, 178, plate 119; p. 189, plate 124; F. Matz, *Crete and Early Greece* (London, 1962), supplementary plate 22; W. D. Tylour, *The Mycenaeans* (London, 1964), plate 7.
27. Gurney, *Hittites*, p. 54.
28. Joshua 18:1 and 19:40-48; Judges 5;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pp. 215-18; Sandars, *Sea Peoples*, pp. 163-4.
29.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p. 215.
30. Sandars, *Sea Peoples*, pp. 111-12, 200; Yasur-Landau,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pp. 180, 182; cf. Gardiner, *Egypt*, p. 264.
31. C.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Cambridge, MA, 1958), pp. 51-2.

32. Desborough and Hammond, 'End of Mycenaean Civilisation', p. 5; also V. R. d'A. Desborough, *The Last Mycenaeans and Their Successors* (Oxford, 1964).
33. Desborough and Hammond, 'End of Mycenaean Civilisation', p. 12.
34. L. Bernabò Brea, *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 1967), p. 136.
35. R. Leighton, *Sicily before Histor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London, 1999), p. 149; also R. Holloway, *Italy and the Aegean 3000-700 BC* (Louvain-la-Neuve, 1981), p. 95.
36.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pp. 211-13.
37. W. Culican, *The First Merchant Venturers: the Ancient Levant in History and Commerce* (London, 1966), pp. 66-70.
38.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plates 5 and 6, and pp. 37-9, 53.
39. Yasur-Landau,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pp. 334-45.
40. I Samuel 17:5-7.
41. Yasur-Landau, *Philistines and Aegean Migration*, pp. 305-6.
42.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pp. 8, 239-54.
43. Amos 9:7.
44. Exodus 15:1-18; Isserlin, *Israelites*, p. 206.
45. Isserlin, *Israelites*, p. 57.
46. Drews, *End of the Bronze Age*, p.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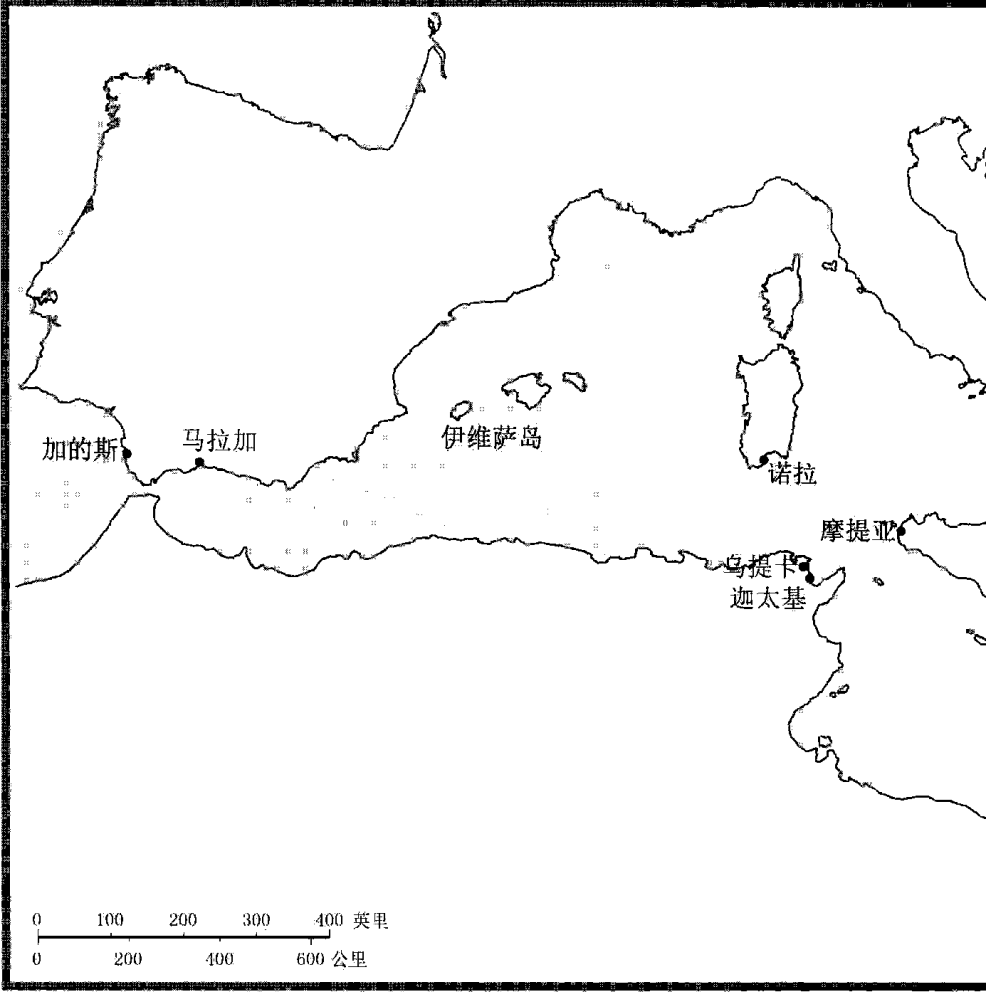
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
(前 1000 ~ 6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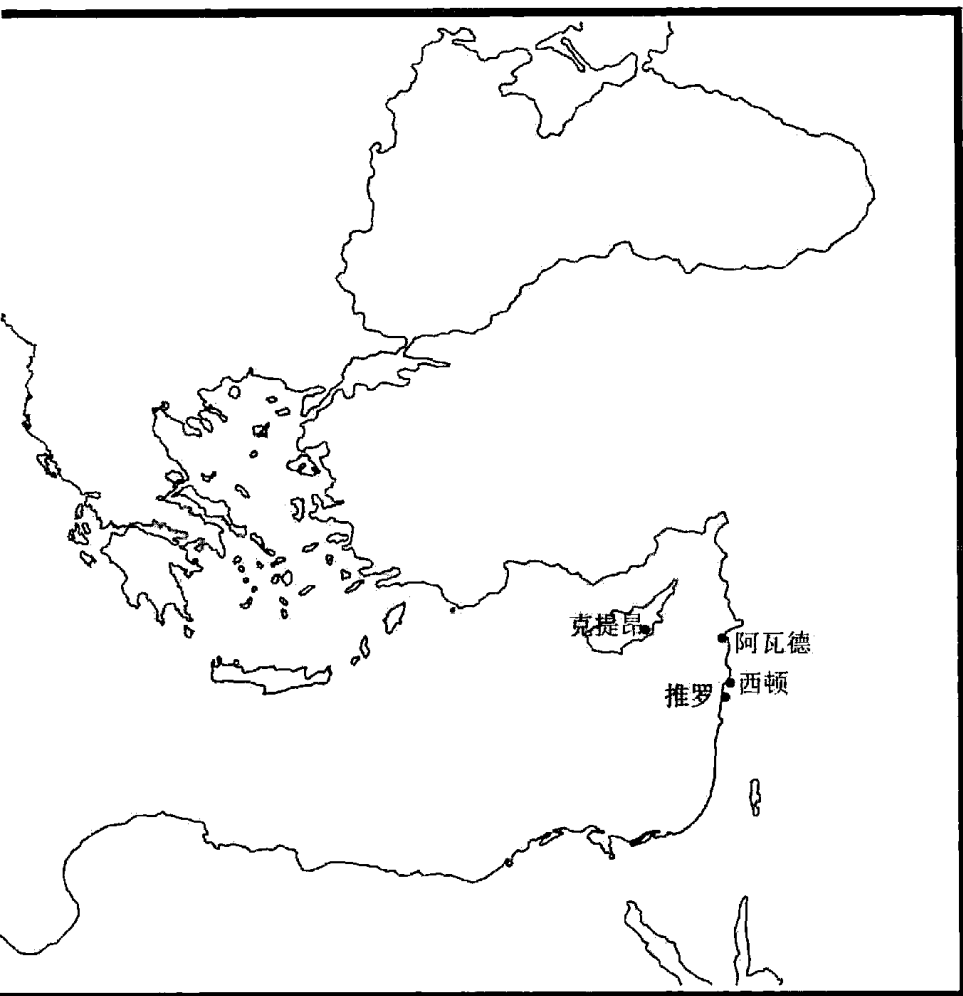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 (前 1000 ~ 前 700 年)

1

从公元前 12 世纪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63
爱琴海上的那些国家衰退到了哪种地步，我们不得而知，但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书写文字消亡了，但在塞浦路斯避难的希腊人中它还存在；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独特的涡纹风格的陶器也消失了，但同样，它在塞浦路斯还有所保留；贸易萎缩了；王宫衰落了。黑暗时代并非爱琴文明的独有现象。向西远至利帕里群岛也有动乱的迹象——在西西里岛，旧有秩序已在前 13 世纪的破坏中终结，利帕里的居民只能靠建立坚固的防御工事来维持一定程度的繁荣。¹ 法老的力量也被削弱；尼罗河的土地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破坏，是因为外来侵略者的消失（他们定居在了新开拓的土地之上），而与埃及的内部实力无关。

至公元前 8 世纪，新的贸易网络出现，东方文化被传至西方，最远到了伊特鲁里亚和南西班牙。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贸易网的建立，并没有借助大规模的帝国扩张实现（西亚的贸易网络是在亚述王的强势统率下建立的），而是由商人团体建立：希腊人有意或无意地在追寻其迈锡尼先人的足迹，将方向转向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伊特鲁里亚海盗和贸易者出现在刚刚兴起的城市的土地之上；更为超前的是，黎巴嫩的迦南商





人，也就是希腊人熟知的腓尼基人（*Phoinikes*），也出现了，这一族群因热爱贸易和追逐利润而为荷马所憎恨。²至此，对这些从事“贸易”的人长期轻视的历史也开始了。他们的名字源于“紫色染料”这一名词，它提取自一种骨螺，是迦南沿岸最为昂贵的产品。希腊人也承认腓尼基文字是字母文字的源头，是他们的新书写体系的基础。而且腓尼基也是艺术范本的源头，在一个积极的艺术创造酝酿期，腓尼基艺术改变了希腊和意大利古风时期的艺术。

尽管黎巴嫩沿岸各城共享一种文化，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但任何统一体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其范围由海上贸易而非陆上贸易确定。”³然而，考古学家习惯性地将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黎凡特地区的居民称为迦南人，将在此之后的居民称为腓尼基人。⁴这一惯例掩盖了重要的难题：腓尼基人的城市是何时、如何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伟大中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些早期贸易中心，如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的基础上建立贸易中心？⁵如前所见，乌加里特大约于前1190年被摧毁，沿岸已被多尔的阐卡尔人这样的族群占据。毫无疑问，破坏已经发生了；西方的旧有市场同克里特与爱琴海一起从商业地图上消失了。海盗攻击商人。但是古老的迦南世界的一些重要方面留存下来，有时影响力惊人。⁶迦南语成为生活在黎凡特土地上的各族——爱琴海的腓利士人、希伯来农民，以及推罗（Tyre）与西顿（Sidon）的城市居民——的通用语言。迦南人的宗教在稍作改变后被该区域除希伯来人之外的所有人接受。但希伯来人其实也没有那么例外，因为他们的先知曾因其追随迦南人的传统习俗而谴责他们。以色列人也熟知腓尼基人的习俗——有时他们会在祭祀仪式上献

祭他们的头生子，而这也引起《圣经》中的先知和后来古罗马的作家的愤怒和惊骇：“你不要将你的任一子孙让可憎恶的摩洛神（Molech）带走。”⁷

于是，地中海的这一角落的历史延续性远胜于希腊或意大利。在公元前 11 世纪，繁荣景象开始走向衰落，但并未消失。前 10 世纪腓尼基人在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洋贸易。他们还有其他的路径可供开发：将其紫色染料出售给富有且军事实力势不可当的伊拉克北部的亚述人，远比跨越海洋将该产品兜售给贫穷的民族更具有商业的意义。⁸ 但是希腊人并不这样看待早期腓尼基人。古典作家认为，推罗是在特洛伊毁灭（前 1191 年）的若干年前建立起来的；但是推罗本身就是一个更为古老的遗址，通过推罗国王阿比米尔基（Abi-milki）与埃及法老间的信件可知，这位国王是前 14 世纪的一位重要人物。罗马人认为，腓尼基人在所谓的推罗建城后的一个世纪之内已经开始在西方寻找和建立定居地：加的斯（Cádiz）建立于前 1104 年，约在同一时期北非建立了乌提卡（Utica）和利克斯斯（Lixus）。这似乎证明早期的腓尼基人已经冲出“黑暗时代”，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贸易网络。《圣经》曾提及地中海西部的一块名为他施（Tarshish）的土地，其读音更像古典作家熟知的塔特索斯（Tartessos）。尽管有几个古罗马作家提道很久之前便有加的斯存在，但事实上，他们只是重复了历史学家维雷乌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观点。维雷乌斯与奥古斯都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他生活于上述事件发生一千一百年以后。这些久远的时间并没有被考古研究证实。即使在腓尼基，属于前 11 世纪和前 10 世纪的考古发现也惊人匮乏。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黎巴嫩城市人口

密集，向底层挖掘的工作很难进行；另一方面，海上族群对黎凡特地区的城市进行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圣经》强调，推罗王的财富和权势可追溯至公元前 10 世纪。根据《列王纪》的描述，推罗王希兰（Hiram）与以色列王所罗门（Solomon）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一纸条约的签订（所罗门约在前 960 年接受了该条约）被推至顶峰，该条约规定以色列应确保推罗人的粮食与食油供应，而推罗要向以色列提供木材及工匠，以修建以色列新都的耶路撒冷神殿。⁹《圣经》对神殿的描述也为我们了解腓尼基人早期崇拜中心的情况提供了珍贵记述，它可与哈措尔（Hazor）及其他地方发掘的神殿相媲美：一个外坛，两侧有两根柱子护持的神龛入口，向前穿过一个较大的外殿便可进入圣所。在推罗发现的以色列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容量高达二十四升，这表明，在前 9 世纪到前 8 世纪，在早期希伯来人居住的土地上，食品贸易从未中断。¹⁰作为对推罗人帮助修建神庙的回报，据说所罗门王还将以色列北部的一些居住地送给推罗王；《圣经》称其为城市，但也提道，当看到这些定居点时，希兰王并不高兴，所以很明显，所罗门的财务代办夸大了赠物的分量。¹¹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在腓利士人定居点东部的丘陵地带牧羊和种植大麦，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深知推罗缺乏农业资源；只要有正常的粮食供应，这座城市——在一个或两个世纪后人口可能已达到三万——就可以生存和发展。在城市后面有丰富且优质的森林资源，树木长得很高。如果这座城市想要自给自足，就必须开采森林资源用以交换和贸易。¹²希伯来人也为骨螺所吸引；尽管被禁止食用螺肉，但他们被命令用从骨螺中提取的染料为袍服染边。实际上，这种紫色染料可以染

出的颜色种类有很多，从碧蓝到铁红应有尽有，取决于如何对其进行处理。因此，推罗与它的邻居有两大优势：在西亚纺织品贸易中极受重视的奢侈品，以及大量的木材产品。没有后者，建筑业、造船业的和数不尽的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推罗及其邻居并非只是作为亚洲与欧洲的中间人而繁荣，它们也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腓尼基诸城在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9 世纪早期所拥有的巨大优势是，它们不受强权控制，彼此之间通常也相互独立。埃及人对迦南地区影响力的急剧衰落为腓尼基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不受外界干扰，我行我素。前 9 世纪，亚述军队从东而来，这种局面因此被打破：亚述军队像“狼入羊圈”一样洗劫了沿岸城市，恰如它在内陆最终吞并了以色列王国一样。但是亚述人也极为明智地认识到腓尼基人将是财富的源泉，他们从推罗及其邻居的贸易中继续获得贡赋。直至今时，推罗仅是腓尼基沿岸诸多独立城邦中的一个，但是它已经为异邦人（如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知晓；它还是大约建立于前 814 年的地中海西部城市迦太基的母邦。有时推罗的统治者也对西顿实行治理，且荷马史诗与《圣经》都称他们是“西顿人的王”（荷马从来没有用过“腓尼基人”这一词语，而一直使用“西顿人”的说法）。¹³这可能使推罗显得比较特殊，但从诸多显著方面看，推罗确实是腓尼基人贸易的中心。同腓尼基人之后的多个属地以及位于北部的阿瓦德（Avard）一样，推罗在一个岛上，因其良好的防御位置而得到了 *Tzur* 这一名称，意思是“岩石”或“要塞”。直到前 4 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建了一个长堤将推罗与内陆相连，这座城市才与海岸永久连为一体。这些小岛拥有天然的防御屏障，但水源的供应是应长久

担心的问题。据古典晚期的相关记载，有阿瓦德人用水渠将水从内陆引入城中，另外也可以用小船运水及在蓄水池中存储雨水。¹⁴至亚历山大时期，推罗已经有两个自己的港口，一个向北面对西顿，另一个面向埃及，有条运河将两个港口连接起来。¹⁵前6世纪，希伯来先知以西结（Ezekiel）认为，推罗就像是用黑门山（Mount Hermon）上的柏木和黎巴嫩的雪松木制作而成的精美船只，银、铁、锡、铅都来自希腊和西方，而犹大王国则送来谷物、蜡、蜂蜜、油及乳香。¹⁶他沮丧地预言道，推罗这艘大船正要遭遇船难。他还提供了一份地中海至西亚的航线图，其中推罗被定位为世界上所有货物的集中点——有西方他施的财富，有北部爱奥尼亚的财富，还有图巴尔（Tubal）及其他一些神秘土地和岛屿上的资源。

推罗是逐渐成为一座光辉之城的。推罗至塞浦路斯、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短程贸易即使在乌加里特衰落后的暗淡时期仍在继续，尽管公元前11世纪埃及的经济困难也削弱了推罗的实力，因为它与尼罗河三角洲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而西顿因将目光转向了亚洲腹地而获得较大成功。¹⁷腓尼基艺术深受历史悠久的西亚文化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的文化影响，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腓尼基文化是亚述与埃及风格的结合体。¹⁸从以色列国王暗利（Omri）在首都撒玛利亚（Samaria）的宫殿出土了一些前8世纪的象牙制品，它们显然深受埃及风格影响：两个天使彼此相对，翅膀正面张开，脸部没有遮挡，他们的条纹头饰具有典型的埃及特征。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象牙出自红海或经由埃及运送至西方，且腓尼基的银器和象牙制品出现在了罗马以南的普莱奈斯特 [Praeneste，即今天的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 的一个贵族墓中，时间可追溯至前7世

纪。而后，腓尼基人开辟了新的航线进入地中海中部和西部。

一些最好的腓尼基产品须作为贡品上交给有权有势的统治者。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巴拉瓦特 (Balawat) 铜门是公元前 9 世纪为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 (Shalmanasar III) 所造，门上铸有推罗王伊索巴尔 (Ithobaal) 在推罗的一个港口为船上装载贡物的场景，且还有一段铭文庄重地宣布：“我收到了推罗和西顿人民用船只运来的贡赋。”然而，贡物还不能通过海船运送至伊拉克北部。青铜铭文中还描述了一个事实，即滨海地区的迦南人是通过远航地中海致富的。¹⁹这进一步被亚述王阿叙尔纳西尔帕 (Assurnasirpal) 的年表证实。阿叙尔纳西尔帕死于前 859 年，曾声称自己从推罗、西顿、阿瓦德及其他沿海城市获得了“银、金、铅、铜、青铜器、用彩色羊毛织的毛衣、亚麻袍服、一只大猴、一只小猴、红枫木、黄杨木、象牙及一种被称为‘纳比鲁’ (nabiru) 的海洋生物”。在这份清单中既有带着异域风情的商品，又有日用品；既有经地中海运来的商品，又有产自腓尼基本地的产品；还有猴子之类的珍稀动物，它们可能是经红海运达此地的。²⁰红海贸易被纳入地中海贸易的说法见于《圣经》的记载，《圣经》提到的俄斐 (Ophir) 的船，就是被所罗门和希兰王从埃拉特 (Eilat) 派出的。²¹

尽管腓尼基人的贸易并非简单的物物交换，但他们没有铸造钱币。²²在进行大笔交易时他们使用银块或铜块支付；有时也用贵金属铸造的酒杯支付，这种酒杯的重量应该有一定标准 (关于酒杯的记忆被保留在《圣经》中，据说约瑟将一个酒杯藏在弟弟便雅悯的粮袋中；另外在前述维纳蒙的故事中对此也有记载)。²³标准重量，如舍克尔 (shekel) 的采用，就很好地

证明了，即使没有钱币，腓尼基人也可以使所谓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换句话说，他们熟知货币经济，但他们使用的钱体现为钱币以外的多种形态。很久之后，腓尼基人才开始铸造钱币，主要为了更方便地同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进行贸易，因为希腊人热衷于使用钱币。²⁴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贸易中的基本产品是金属：腓尼基人建立的第一个可明确定位的贸易基地距其家乡不远，位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塞浦路斯岛上，靠近拉尔纳卡（Larnaka）。该基地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9世纪，此地即希腊人熟知的克提昂（Kition），也就是希伯来人口中的基提姆（Kittim）。在腓尼基人中，该城被简单地称为“新城”（*Qart Hadasht*），同样的名字后来也被用于指代北非的迦太基和西班牙的卡塔赫纳（Cartagena）。²⁵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尝试在克提昂建立属地，并获得对该地周围土地的统治权。前8世纪中期的一则铭文记载，尽管在克提昂有一个供奉女神阿施塔特（Astarte）的巨大神庙，但“新城”的长官是推罗王的代理人，他崇拜的是黎巴嫩的巴力神（*Baal Libnan*）。²⁶塞浦路斯的巨大粮仓与其铜矿一样具有很大吸引力。推罗的粮食供应不仅来自以色列的谷物产地，也来自塞浦路斯。若没有正常的粮食供应，腓尼基人就无法确保城市的繁荣，而城市财富的增多也反映为人口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增大。不幸的是，对推罗人来说，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成功引起了亚述王的注意。萨尔贡二世（Sargon II，逝于前705年）取得了塞浦路斯的统治权，亚述人从此进入地中海，这是一个短暂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有一则铭文记录了萨尔贡在克提昂确立统治权的史实，多年以来，他依旧从岛上收取贡物，并未干涉岛内事务，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夺取岛上的财富。²⁷当然，对于亚述王而言，铜矿资源

的吸引力并未消失。后来，西顿和推罗的国王陆立（Luli）曾逃离推罗前往塞浦路斯避难，由此可知亚述人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被削弱。这一事件被刻成一组浮雕，它描绘了受辱国王匆匆离开腓尼基船只的情景。²⁸但是，塞浦路斯的重要性只体现在这个使腓尼基商人与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定期联系的贸易网中。

71

至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已经拉开序幕。尽管在腓尼基商人是否先于希腊商人或其他神秘族群——如提色尼安人，该族群在爱琴海和第勒尼安海地区常被提及——开始从事地中海贸易这个问题上，争论仍然存在，但无论首先抵达意大利的是谁，腓尼基人使自己开拓的贸易路线伸向更远地域——沿北非海岸延伸——的努力应获得承认。

2

欲探寻腓尼基早期贸易帝国的踪迹，最好的途径就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进行一次环地中海航行。²⁹这次航行还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加的斯及更远处，因为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来自地中海最东部的商人也在最西部探索进出大西洋的通道。考虑到地中海的季风和洋流情况，以及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即他们大约在春末至秋初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出海，他们应该沿着向北的路线，经过塞浦路斯岛、罗得岛及克里特岛，而后穿过广阔无垠的爱奥尼亚海，最终到达南意大利、南撒丁岛、伊维萨岛（Ibiza）及南西班牙。在他们穿越爱奥尼亚海时，陆地已远离了他们的视线，从撒丁岛至巴利阿里群岛的路线亦是如此。迈锡尼人则乐于慢慢沿爱奥尼亚海边缘西行，通过伊萨卡岛（Ithaka）前往直意大利

靴跟处，他们在身后留下的陶罐提供了线索；南意大利缺乏黎凡特陶罐的事实，则无声地证实了腓尼基航海者的自信。向西航行的腓尼基船只通常会在马拉加（Malaga）附近水域停泊。直布罗陀海峡的天气是变化无常的，有一股强劲洋流从大西洋涌进，且雾气与顶头风交替出现。这可能意味着，在试图穿过海峡到达加的斯和其他贸易前哨之前，他们要等待很长时间。幸运的是，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比离开地中海要更容易，因为阻止船只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风和洋流此时刚好成了优势。72 在返回推罗的旅程中，腓尼基人会沿着漫长的北非海岸前行，但此时依然须格外谨慎，因为沿途有很多激流险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将无法买到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及撒丁岛这些金属资源丰富的岛上的产品。³⁰另外，迦太基的巨大港口为那些距离家乡十分遥远的、在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海盗猖獗的水域内航行的船只提供了避风港。

根据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王宫或其他地方的一些浮雕作品，我们可以将这些船只复原。海洋考古学家也开始打捞腓尼基船只的残骸：有一些来自西西里岛西部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迦太基船只残骸；还有两艘更加残破不全的腓尼基遇难船只，它们被发现于古代腓利士人的阿什克伦港以西三十三海里处，船上载着前8世纪晚期的陶罐。³¹这些考古发现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要比希腊人更喜欢重型船只。这些船只与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在东地中海使用的船只间的一致性也令人印象深刻，但腓尼基人肯定也对它们进行了重要改进。例如船上有锋利撞角，这种在古典时期海战中用于却敌的可怕武器，已为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及罗马人所效仿。通过对龙骨的改造，腓尼基人富有技巧地加重了船体，使其可

承载大批货物相对平稳地穿行公海。以沥青填封船隙的技术也被认为是腓尼基人的创新，这对于长距离航行船只的防水性十分重要。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这一时期的地中海贸易中，货物的运送能力有了真正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就船只本身来讲，腓尼基船并不比古代比布鲁斯的船大：约公元前 1200 年，乌加里特的一些船只可以承载四十五吨货物，腓尼基船只的最大承载量比它大不了多少，³²但是其稳定性明显提高。正因如此，腓尼基人的航行才可以远及大西洋港口加的斯和莫加多尔（Mogador）等地，甚至如前 6 世纪的希罗德德所说，这使环非洲航行成为可能。这种用于中长距离贸易的圆形船只长度是宽度的三倍或四倍，其长度可以达到三十米，而阿什克伦的船只残骸仅有约其一半长。³³依照巴拉瓦特铜门上的图像，这些船有高翘的船首，并饰有马头的形象（可能是出于对类似于波塞冬这样的海神的尊敬，波塞冬也是一个爱马者），³⁴船头上还画有眼睛。在船尾的后甲板延伸处，船板被组装成鱼尾的样式。桅杆上挂着方形的风帆，据《圣经》中先知所说，桅杆是用黎巴嫩产的香柏木制作而成的。一些船也使用船桨助力。船舵则是固定在船舷上的一个宽大的桨。这种看起来甚为牢固的船只有很好的承载力，比较适合谷物、酒和油的运输，不同于只运送少量异邦奢侈品的快船。两次船难留下的残骸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考古学家在两艘船之间发现了八百个载酒的双耳陶罐，它们的装载量（如果陶罐都装满酒的话）高达二十二吨。这时也有一些小型船只（与大船并没有太大差异），主要进行短途贸易，航行于腓尼基人贸易网中各个分散的港口之间。这些小型船只的大小约是阿什克伦船只大小的一半，其遗

骸已在西班牙南部水域被发现，船上装载着铅锭、编筐及产自南西班牙当地的陶罐。³⁵它们是早期地中海的流动货船。贸易网中流动的商品既有一些原料产品，如食材，也有价格昂贵的制品，如发现于南西班牙和伊特鲁里亚的奢华墓室中的象牙制品及银碗等。³⁶还有一种不同样式的船只被用于战斗，其特征是有锋利的青铜撞角，战争中，腓尼基船长用其撞击敌人的船只。这种船的长度约是宽度的七倍，它还有一个前桅。这种战船与圆形货船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通过桨为船只提供动力，在战斗中尤其如此。³⁷

在地中海西部发现的最古老的腓尼基物品是出自撒丁岛南部的“诺拉石碑”（Nora stele），它属于约公元前9世纪晚期；该石碑提到一处奉献给普美（Pumay）神的神殿建筑，该神在腓尼基百姓间被称为普美亚童 [Pumayyaton，希腊语为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根据石碑上的文字，它是在撒丁岛上镌刻的，因此，撒丁岛此时已经开始被称为撒丁岛了。由于撒丁岛的南部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金属，包括铁和银，因此腓尼基人在这里的出现不足为奇。石碑的镌刻者可能是最早的开拓者，从其修建神殿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已经打算长居此地，因为建立神殿通常是腓尼基移民早期的一步行动。而且，就是在地中海正南部的诺拉，腓尼基人开始建立大批长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居住地。

3

在众多居住地中，迦太基最为著名。维吉尔很开心将迦太基的建立时间追溯至特洛伊战争时期，当时埃涅阿斯（Aeneas）拜访了女王狄多 [Dido，亦称埃利萨（Elissa）]。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是对罗马的过去和将来的沉思, 故他在书中对罗马共和国曾面临的最强大敌人进行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他的古典作家, 包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 (Josephus), 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迦太基初建的说法, 其中也提到了狄多, 据说她逃离了凶残的兄长皮格马利翁的毒手, 皮格马利翁杀害了她的丈夫, 也就是赫拉克勒斯 (Herakles) 的一位高级祭司——希腊人视赫拉克勒斯与迦太基神麦勒卡特 (Melk-Qart, 意为“王之城”) 为同一位神。她第一个到访的港口是塞浦路斯的克提昂, 即另一座“新城”, 然后她决定带领八十位或可称为神娼的年轻女子西行, 以确保腓尼基的宗教仪式在其避难定居之地的延续。³⁸ 她们直接逃至北非, 在迦太基定居下来, 但她们并非第一批到达此地的腓尼基人, 附近的乌提卡人接纳了她们。居于此地的利比亚人也热烈欢迎她们的到来。最早称埃利萨为狄多的便是这些人, 狄多之意为“流亡者”。腓尼基人并未被阻止来此地定居, 但是当她们开始购买土地时, 利比亚国王就不那么慷慨了。他说, 狄多 - 埃利萨可以买一块牛皮大的土地。女王则做出了非常聪明的回应, 她命人将一块牛皮切成细条, 用它们圈出了比尔萨山 (Byrsa, 迦太基卫城) 的外围。尽管该地初建的传奇故事很有趣, 但它不过是希腊作家解释迦太基腹地山丘之名起源的一次尝试, 因为在希腊语中, “比尔萨” 的含义就是动物皮。事实上, 他们听到的应是迦南词“布尔特” (Brt), 意为要塞。即使被狄多欺骗, 利比亚王依旧对其十分着迷, 他坚持要求与她成婚, 但是她仍忠于自己死去的丈夫。为了逃避这次婚姻, 她自行火祭殉情, 从此以后, 人们便将其奉为女神。³⁹ 尽管这一故事具有一定程度的倾

向性，但有两点仍然值得注意。一是女王自我献祭这一故事具有持久性，维吉尔将其带入了主流古典文学，后来它又进入了欧洲文学。二是故事中包含的一些细节十分精确：其行火祭的日期——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ad）前约三十八年（ $776 + 38 = 814$ ）^①——与考古发现一致，因为考古证据显示这刚好发生在腓尼基人在此地定居的时期。迦太基的精英们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之子”（*bene Tzur*）或“推罗人”，据后来的古典作家的描述，迦太基移民会定期向位于推罗的麦勒卡特神殿献礼。狄多的自我献祭也可能是后世对腓尼基真实世界的描绘，且自我献祭在迦太基可能是特别常见的事情：人祭的目的是在城市建立之时取悦神明麦勒卡特，从而确保神明的恩宠。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发现任何一件来自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的迦太基文物。这里最早的考古发现是一些前730年前后的墓葬，和约前750年之后的陶罐残片。值得注意的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物品都属于希腊人，而非腓尼基人，这里有来自爱琴海埃维厄岛（Euboea）的绘制有几何图案的器皿。但我们之后会看到，埃维厄人当时已经在那不勒斯湾建立了殖民地，因此某些器皿可能来自那里。⁴⁰早期的迦太基并没有将自己与希腊不断发展的贸易与殖民活动隔绝开来。荷马对西顿商人的蔑视，其实就起源于当时腓尼基人与希腊人间的贸易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腊陶罐都被置于著名的托菲特（*Tophet*）神殿之下作奠基物，有时这一神殿会用孩子充当祭品。

① 公元前776年为第一次希腊奥运会召集之时，公元前814年被推断为狄多女王自焚之时。——译者注

迦太基很快就成了所有腓尼基殖民地中的“女王”。对这座城市的崛起，常见的解释是它地理位置优越，是来自或前往南西班牙的商人的必经之地。但是西班牙生产的东西很难与最粗陋的古迦太基产品相媲美。其他方面的解释强调迦太基本是推罗流放者的避难地，是塞浦路斯岛上克提昂人的移居地，也是繁荣的黎凡特海滨城市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之迁居地；另外，它还吸引了一些当地的柏柏尔人（Berbers）。实际上，迦太基成功的关键并不是西班牙或腓尼基，而是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开放性：这里的农业资源令古典作家记忆深刻，据他们描述，这座城市被豪华的住宅和庄园环绕。另外，迦太基作家马贡（Magon）在公元前5世纪或前4世纪写的一部关于农业的论著，被罗马元老院下令翻译成拉丁文和希腊文。⁴¹ 迦太基的贵族阶层靠谷物、橄榄油和葡萄园获得财富，而不是像推罗人那样靠紫色染料、香柏木及象牙获得财富。这些记录恰好与来自圆形船只的考古证据一致，如前所述，这些船只更适合载运装满油和酒的陶土罐以及装满谷物的麻袋，而不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在前600年之前，迦太基已经是一座十分繁荣的大城市，如果当地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这将不太可能发生。迦太基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它自己建立的贸易网络的中心。这个贸易网络也包括腓尼基人在该地区的其他移居地。乌提卡距北非海岸不远，它是更为古老的城市，但从来不是迦太基的竞争对手。另外，西西里岛的摩提亚（Motya）在某些方面更像推罗或阿瓦德，而不像迦太基，它被描述为“腓尼基殖民地的典范”。⁴² 摩提亚于前8世纪建于西西里岛以西不远处的一座小岛，靠近今日的马尔萨拉（Marsala）。该岛位置隐蔽，位于格兰德岛（Isola Grande）与西西里海岸之

间。⁴³摩提亚会让人联想起推罗的另一点是此地有一些紫色染料工场，因此它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还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其产品还包括铁器。它的繁荣期为前7世纪，当时以儿童为祭品的做法越来越常见，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与推罗人一样，摩提亚人缺乏一块处于他们自己控制下的大面积内陆土地。但是这促使他们与西西里岛西部的土著伊利米人（Elymians）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支族群最靠近摩提亚的主要中心是伟大的厄里斯（Erice）神殿，该神殿位于西西里岛西海岸的一座高耸的山峰之上。摩提亚人从伊利米人那里获得粮食、食油及他们需要的酒，因为西西里岛西部盛产这些东西。摩提亚人也可以利用位于厄里斯海岸下方的广阔的特拉帕尼（Trapani）盐池。在有盐的地方人们就可对鱼类进行长期贮存，例如会季节性大量出现在西西里海岸的金枪鱼。鱼是迦太基人的特产食物，他们发明了制作臭鱼酱（*garum*）的方法，⁷⁷罗马人特别喜欢这种鱼酱。腓尼基人并没有打算征服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居住点是贸易和手工业中心，他们并没有试图在西西里岛西部建立政治上的统治权。

然而，腓尼基人的领土扩张到了西西里岛以外。从公元前750年起，撒丁岛南部出现了一连串的定居地，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提供安全的港口，也是为了控制周边乡村并以此确保基本补给。其中大部分聚落是古典时期腓尼基人的基地，位于高于海面的地峡之上，如塔罗斯（Tharros）和诺拉便是如此；苏尔基斯（Sulcis）考古层的最底层像迦太基的考古层一样，有来自埃维厄的希腊陶罐。⁴⁴在内陆，腓尼基人占领了一些古代的要塞，虽然在表面上，他们与撒丁岛原住民维持和平的关系，撒丁岛原住民很乐意获得拿金属和谷物与驻留苏尔基斯的

腓尼基富商进行贸易的机会。约前 1540 年，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对撒丁岛的控制权得到了确认，当时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的阿拉里亚（Alalia）海战中将弗凯亚（Phokaia）的希腊人赶走了，这保证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一直处于希腊世界的外围。考虑到撒丁岛本身的价值——这里是各种金属资源和农产品的产地，腓尼基人在海战中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影响力。尽管弗凯亚的希腊人在马赛建立了一个基地，但是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只要迦太基人保持优势，希腊人就无法对其进行深度渗透，于是只有腓尼基人才有可能探索南西班牙和摩洛哥的潜在资源。这些定居点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腓尼基人生活在何处，而不是他们走了多远。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墓葬中有其受推罗人影响的证据，一些随葬品是装饰着动物图案的雕花银器，这类银器在前 6 世纪的意大利中部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腓尼基和迦太基商人是自由代理商还是国家代理商。有时他们会作为使团成员被统治者派出，并会因此获得一些佣金，例如他们曾为亚述王效力。在地中海西部，他们则可以自己做主。起初，他们可以向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王室提供各种商品。至前 500 年，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贸易网，该贸易网的维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投入，且它可以为他们带来直接效益，为他人效力的方式因此失去了吸引力。

远西世界越来越引人注目。如斯特拉波（Strabo，他在公元 1 世纪早期写作）这样的希腊作家强调了西班牙南部作为银产地的重要性。在地中海，从很多腓尼基的基地都可通往直布罗陀海峡：蒙蒂勒（Montilla）、马拉加、阿尔穆尼卡（Almuñécar）及其他的一些现已埋葬于阳光海岸（Costa del

Sol) 坚硬岩石之下的聚落。有些聚落之间的距离仅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步程；大多数聚落被纳入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但从马拉加附近的一个遗址中发掘出的光洁的前6世纪早期伊特鲁里亚陶罐，说明此地与外界也有广泛的联系。⁴⁵ 在伊维萨岛上有一个腓尼基人的早期定居点，由此地可远眺伊比利亚内陆；在通常情况下，当地人用金属换油和酒，尽管贯穿了伊维萨历史的资源还有闪闪发光的盐池。在伊比利亚内陆，约前730年建立的小镇托斯卡诺斯（Toscanos）的发展对我们具有启发性意义。在前7世纪中期至晚期，该镇是一个拥有一千五百人的社群，那里的工匠能够制作铁器和铜器。但是约前550年，不知因何缘由，它被荒弃了。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它可以满足当地伊比利亚人口的需求，但在腓尼基人更大范围的贸易网中它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如果有人希望了解与东方人的接触是如何改变伊比利亚人的，那么对他来说托斯卡诺斯还是十分关键的。

事实上，在这个地区腓尼基人的主要基地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加迪尔（Gadir）或加的斯；但是由于其收益都流入了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网，故早期的加迪尔也是地中海史的一部分。就像其他很多腓尼基移民聚落一样，加迪尔建立在靠近海岸的岛上，一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1104年，但这一时间可能比其实际建立的时间早约三百年。这里有一座为麦勒卡特建立的神庙，且后来西塞罗（Cicero）写道，此地有人祭习俗——可能是一种春天的祭祀活动，以庆祝迦南神话中记载的麦勒卡特的复活。该神庙非常富有，是存放奇珍异宝的宝库，同时也是祭祀中心，这种情况在地中海贸易世界中已经比较常见。在麦勒卡特神庙中有许多东西都值得珍藏，因为加迪尔是

通往希罗多德时期就享有盛名的富庶之地塔特索斯的主要通道。关于塔特索斯的名字，自古便有争论。一些人认为，塔特索斯是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一条河；此时则指西班牙南部住着土著伊比利亚人的一个王国或某个区域。该地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邻近瓜达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的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银矿：“银与塔特索斯是同义词。”⁴⁶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那么希腊贸易者萨摩斯（Samos）的克莱奥斯（Kolaios）被风吹离航线，于前7世纪中期到达西班牙南部，并从塔特索斯带回六十塔兰特（约合两千公斤）白银便是史实。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奥斯见到的当地国王名叫阿甘索尼奥斯（Arganshonios），头几个字母的意思便是“银”。

79

根据后来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Diodoros，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说法，将银运往东方（包括希腊和亚洲）的是腓尼基人，而非伊比利亚人。作为交换，腓尼基人带来了橄榄油和他们的手工艺品：首饰、象牙品、小香水瓶及编织品。自约前8世纪起，他们便教授塔特索斯人提取、精炼、加工金属的方式。这些方法是比较复杂的。一位西班牙学者将这种联系时髦地描述为一种“不等价的”“殖民”剥削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⁴⁷塔特索斯人在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的冶炼中心积极地工作，不仅提取、冶炼白银，还有金和铜。即使那些热衷于用“殖民主义”视角解读的人也承认，掌控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是土著的伊比利亚人，从采矿到冶炼，他们“牢牢地掌握着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伊比利亚的精英阶层则从对腓尼基人的贸易中获利。当地的工匠开始采用腓尼基风格，且伊比利亚贵族们获取的财富使他们过上了奢华的生活。正是在与东方交往的过程中，西部的传统社会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

也发生在伊特鲁里亚，但其改变速度更快。腓尼基人并非简单地走向远方，他们的活动也有能力将遥远土地上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正在开始改变整个地中海。

人们经常会把塔特索斯视同于希伯来《圣经》中被不断提及的富含金属的他施。约拿逃离上帝，从雅法前往他施，很明显，该故事的作者认为他施是一个极为偏远之地，到达那里要穿越海洋向最西处行进。以赛亚讲了一个关于推罗的令人恐惧的预言——来自他施的推罗船只在经过基提姆（Kittim，即塞浦路斯的克提昂）时得知了其家乡被毁的消息：“哀哉，他施的船只啊，因为他施已经被损毁，无房屋，无停泊处。”⁴⁸

4

如前所述，在运作这一贸易体系的过程中，腓尼基人并未使用太多钱币。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记录自己做过的事情。商人们是受过教育的，他们使用一种简单的线形文字，该文字很容易学，并能快速书写，是现在大多数现代字母文字（此处的字母文字指狭义的字母文字，即一个字符基本对应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发音）的祖先。⁴⁹阅读和书写原来是祭司的专有能力和由三种埃及文字书写的复杂发音只能为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识读。线形文字 B 中的音节字母本身也是笨拙的，更何况是将其加于希腊语这样本身就无法简单地分出辅音和元音音节的语言上。在腓尼基手写体中，表示一栋房子的符号为“b”，因为房子这个词“bet”的首字母是“b”。二十二个腓尼基字母中有很多（但不是所有）都以“ox”为首。腓尼基文字成功的秘密在于完全排除了元音，直到后来希腊人才引进了元音字母。*Mlk* 代表的含义是“他统治”或“他

曾统治”，如何理解取决于元音字母，细心的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判断其含义。这种书写体的首例存在于公元前 10 世纪比布鲁斯国王阿西拉姆（Ahiram）的棺木上。这里的关键问题并非腓尼基人是否仅根据一些随意的涂写（西奈地区较早使用的一种书写体可能已经有一些字母）就发明了字母，而是他们通过地中海将字母文字传播了出去，不仅传播到了其位于地中海西部的居留地（如诺拉的碑文证实的那样），也将其传播给了他们的邻居，也就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希腊人将一些在他们看来多余的字母——例如喉音不再出现在希腊语中——转化为元音的音素，而且对大多数符号重新进行了精细设计。⁵⁰

腓尼基人在文化方面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依旧是个谜。乌加里特的迦南人创造了如《圣经》中的诗篇那样脍炙人口的宗教诗歌，而迦太基人则编著农学的小册子。也有一种观点轻视地认为腓尼基人的文化是一种衍生物，在艺术方面，他们很明显依赖于埃及和亚述的风格，例如他们的牙雕艺术就是如此。当然，这也是穿梭于近东和地中海的消费者所希望见到的：各种物件上有的是伟大的尼罗河帝国文明和伟大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帝国文明的印记，而非贪求利益的迦南城镇的印记。腓尼基人懂得如何满足其顾客的需求，包括远在西部的塔特索斯和托斯卡纳的顾客。腓尼基文化穿越了地中海，最远传播到了西班牙南部。这种传播通过移民和同土著居民的贸易实现，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将东方的风格带到了遥远的西方，也在于这是东方的水手第一次由海上到达如此遥远的西方，其远航里程远远超过了从希腊西部向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缓缓航行的迈锡尼水手。

尽管腓尼基人与土著居民进行了通婚，但他们并未丢掉自己独有的东地中海文化，也没丢掉自己作为推罗人或迦南人的身份认同，关于此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他们从迦南本土带来的人祭习俗。这种祭祀活动引起了很多《圣经》学者和古典作家的强烈反感：以撒未能献祭成功是《圣经》诸多反对人祭的故事中的一例。这种祭祀活动在腓尼基人的新移居地有逐渐强化趋势，特别是在迦太基、苏尔基斯和摩提亚。在今日可供参观的迦太基城南部的托菲特，将幼儿献祭给巴力神的历史持续了六百年；在这一城市存在的最后两百年，城中有两万个装满了孩子遗骨（偶尔或有小动物的骸骨）的陶瓮，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会有一百个陶瓮，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每个瓮中可能又装着好几个孩子的遗骨。托菲特是神灵崇拜的专用地。很多瓮中也装有死胎、早产的胎儿及自然流产的胎儿。在那个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其他的遗骸应该属于自然死亡的孩子们。因此，托菲特是早夭儿童的墓地；孩子们一旦长大成人，应该举行的就是土葬而不是火葬了。⁵¹因此，正如《圣经》和古典文献强调的，尽管的确有人祭发生，但不会像我们在第一眼看到大量盛装着烧焦儿童骸骨的陶瓮时通常会感觉到的那么普遍。但在碰到一些严重、紧急的威胁时，人们就会扩大祭祀规模，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平息神明的怒气。据两位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公元前310年，迦太基被叙拉古僭主围攻时，城市长老们认为神的愤怒主要因贵族家庭在祭祀中用小奴隶代替他们自己的头生子而起，于是他们将五百个贵族出身的孩子献祭给愤怒的神明。托菲特前4世纪的一块石碑上描绘了一个祭司站在平台上，头上戴着帽子一样的头饰，身穿极薄的长袍，将一个孩子带向祭祀之地。根据《圣经》

和其他古典文献中的记载，祭祀过程是将活着的孩子放在巴力神神像宽阔的臂弯中；作为祭品的孩子将掉下来，活生生地落入下面熊熊燃烧的火炉中。⁵² 通过把幼儿献祭给神灵，腓尼基人确认了他们对巴力神、麦勒卡特神和其他腓尼基神的臣服，也确认了他们是几百年前自黎巴嫩迁徙至北非、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推罗人的后裔。因此，尽管腓尼基（特别是迦太基）输出的艺术缺乏原创性，但腓尼基人是拥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族群。

注 释

1. L. Bernabò Brea, *Sicily before the Greeks* (London, 1957), pp. 136–43.
2. M. E. Aubet, *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n, Cambridge, 2001), p. 128; S. Moscati, 'Who were the Phoenicians?', in S. Moscati (ed.), *The Phoenicians* (New York, 1999), pp. 17–19.
3. G. Markoe, *The Phoenicians* (2nd edn, London, 2005), p. xviii.
4. D. B. Harden, *The Phoenicians*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71), p. 20.
5. S. Filippo Bondi, 'The origins in the East',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p. 23–9.
6. Aubet, *Phoenicians in the West*, pp. 23–5.
7. Leviticus 18:22.
8. Markoe, *Phoenicians*, pp. 38–45, 121.
9. B. Isserlin, *The Israelites* (London, 1998), pp. 149–59, for Israelite agriculture.
10.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48–9, and fig. 19.
11. I Kings 9:11–14; S. Moscati,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London, 1968), p. 33.
12. Markoe, *Phoenicians*, p. xx
13. *Ibid.*, p. 37 (King Ithobaal, early ninth century); Moscati,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 35.
14. Harden, *Phoenicians*, p. 25; cf. Tyre: Markoe, *Phoenicians*, p. 73.
15.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34–5; Markoe, *Phoenicians*, p. 73.
16. Ezekiel 27.
17. Markoe, *Phoenicians*, pp. 15–28.
18. M. L. Uberti, 'Ivory and bone carving',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p. 456–71.
19. Harden, *Phoenicians*, p. 49 and plate 48.

20. Moscati,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 36;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 91, fig. 27, a later bas-relief from Nimrud showing two monkeys.
21. I Kings 9:26–8; I Kings 10:22, 10:49; Markoe, *Phoenicians*, pp. 31–4; Isserlin, *Israelites*, p. 188–9.
22. Markoe, *Phoenicians*, p. 122.
23. Genesis 44:2.
24.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80–84.
25. Moscati,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 137–45.
26. V. Karageorghis, ‘Cyprus’,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p. 185–9.
27. *Ibid.*, p. 191; Markoe, *Phoenicians*, p. 41–2.
28. Harden, *Phoenicians*, p. 49 and plate 51; Moscati,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 40–41.
29. Cf. Ezekiel’s account of Tyre: Ezekiel 27; Isserlin, *Israelites*, p. 163.
30.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166–72, 182–91; P. Bartoloni, ‘Ships and navigation’,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p. 84–5.
31. Markoe, *Phoenicians*, pp. 116–17; R. D. Ballard and M. McConnell, *Adventures in Ocean Exploration* (Washington, DC, 2001).
32. Markoe, *Phoenicians*, p. 117; cf.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 174.
33. Bartoloni, ‘Ships and navigation’, pp. 86–7; Markoe, *Phoenicians*, p. 116.
34.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173–4.
35. Markoe, *Phoenicians*, pp. 118–19.
36. *Ibid.*, p. xxi.
37. Bartoloni, ‘Ships and navigation’, pp. 87–9;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174–8.
38. S. Ribichini, ‘Beliefs and religious life’,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 137.
39.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215–16; R.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London, 2010), pp. 58–9.
40.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221–6, and figs. 49 and 51.
41.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81.
42.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 232.
43. Harden, *Phoenicians*, pp. 35–6, figs. 6–7; Markoe, *Phoenicians*, pp. 81–3; popular account: G. Servadio, *Motya: Unearthing a Lost Civilization* (London, 2000).
44.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 238.
45. *Ibid.*, pp. 311, 325; also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49–54.
46.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 279.
47. *Ibid.*, pp. 279–81, 288–9.
48. Jonah 1; Isaiah 23:1; cf. 23:6, 23:14.
49. G. Garbini, ‘The question of the alphabet’,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p. 101–119; Markoe, *Phoenicians*, pp. 141–3; Moscati,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 120–26.
50. Harden, *Phoenicians*, p. 108 and fig. 34; also plates 15 and 38; Markoe, *Phoenicians*, pp. 143–7.

51. Markoe, *Phoenicians*, pp. 173–9;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p. 245–56 (though the biblical references there are confused);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69–73.
52. Aubet,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 249; Harden, *Phoenicians*, plate 35; Ribichini, 'Beliefs and religious life', in Moscati, *Phoenicians*, pp. 139–41;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70.

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 (前 800 ~ 前 550 年)

1

83

早期希腊人是否同腓尼基人一样拥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我们不甚清楚。直到公元前 6 世纪他们面临来自东方的波斯的巨大威胁时，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及爱琴海区域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不同群体才开始强调他们的共性；这种希腊认同感在与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海军在西地中海打响的战争中被进一步强化。¹ 在希腊人心中，爱奥尼亚人、多利里亚人，埃奥里亚人（Aeolians）和阿卡迪亚人是相互独立的群体，而不是总体意义上的赫拉斯人。斯巴达人骄傲地以多利里亚人的后裔自居，认为自己来自北方。雅典人认为自己是无人能征服的古希腊人的后代。爱奥尼亚人渡过爱琴海，在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及亚洲沿岸的新定居点繁衍生息。我们不能将所谓的“希腊人”简单地认定为那些对希腊诸神和英雄的传说津津乐道的人，因为这些故事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人中间也有流传。也不能将我们现在称为希腊的土地上的居民都认定为希腊人，因为他们中有那些住在岛屿与沿岸的更早的异邦人——一般被称为佩拉斯吉人或提色尼安人——的后人。除此之外，讲希腊语的人还从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向外移民，有一些来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将在此生活二千五百年；还有一些迁居到了西西里岛、意大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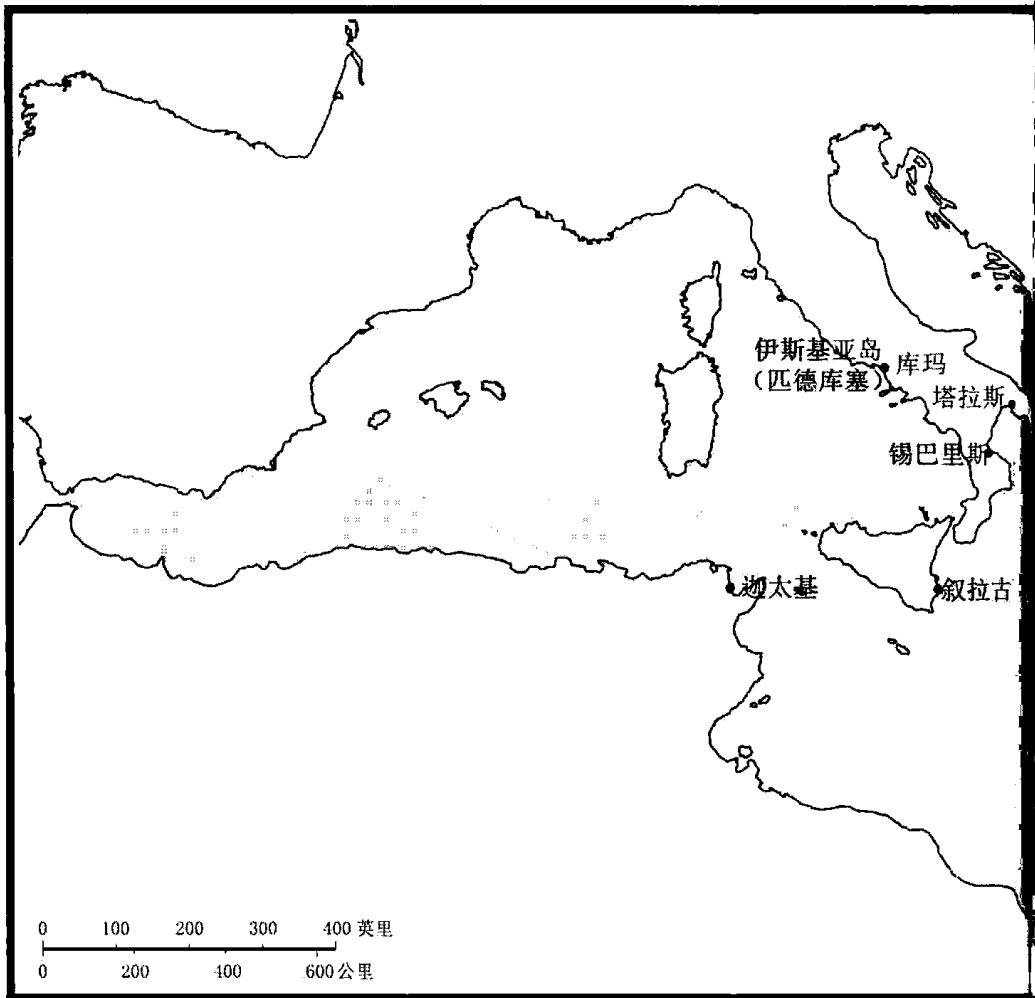
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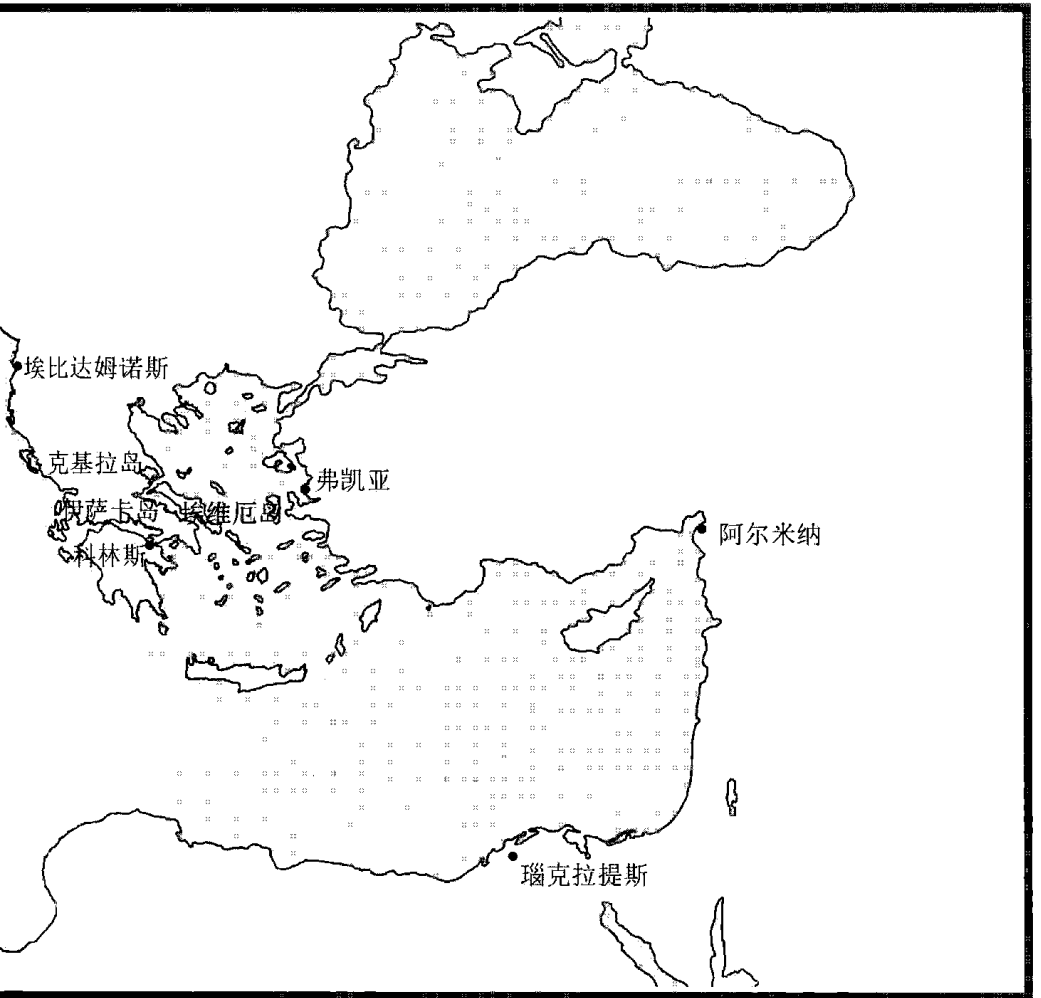
地中海铁器时代早期的这场大移民是如何、何时、为何出现的，至今仍是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改变了这个地区，将古希腊的物产、众神、风尚、思想与希腊人向西带至西班牙，向东带至叙利亚。希腊人对这些迁徙的记忆体现在了关于他们的祖先的传说中，这些传说往往十分复杂且相互矛盾，讲述了他们的先祖跨越地中海以播撒自己的“种子”的过程。在有的传说中，一个族群中的所有人都登上船只，被带往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这些传说所讲述的更多是他们分散的时间，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久远之前的英雄们的居处。² 因此，许多人痴迷于辨认自己古老的祖先，把他们同某些地名和族群之名联系起来，根据一些语源学上的推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推论都是错误的）和离奇的事件，在地图上勾勒出他们迁徙的路线。

84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特洛伊的陷落不仅导致迈锡尼和派娄斯英雄世界的瓦解，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标志着希腊人开始游弋于地中海及地中海以外的区域。在这个新的时代，航海者们不得不与公海之上的危险——例如会唱歌的塞壬（Sirens）、女巫喀耳刻（Circe），以及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做斗争。风暴肆虐的海域被记录在了荷马的《奥德赛》和其他一些从特洛伊返乡的英雄（这些英雄被称为“*Nostoi*”，意为返乡者）的故事之中。该海域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相关故事对其具体区域的描述也极为模糊。海洋之神波塞冬被构想为很不喜奥德修斯的神，他经常将奥德修斯脆弱的船只撞为碎片：“所有的神都可怜他，除了波塞冬——他冷酷无情，狂怒无常”，尤其在奥德修斯杀死了波塞冬的怪物儿子，也就是独眼巨人之一波

85





埃比达姆诺斯

克基拉岛

伊萨卡岛

科林斯

埃维厄岛

弗凯亚

阿尔米纳

瑙克拉提斯

吕斐摩斯 (Polyphemos) 之后。³ 所有流浪者都以最终能返回故乡为目标，无论是西方的奥德修斯，还是游荡于利比亚和埃及的斯巴达的墨涅拉奥斯 (Menelaos)。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有忘忧岛，还有海中女神卡吕普索 (Calypso) 的洞穴；但这些都

86 都不能取代家中的炉灶，王后佩涅洛佩 (Penelope) 坐在炉旁纺织，避开酒宴上的求婚者，等待着失踪的丈夫。毫无疑问，古典希腊著作《荷马史诗》的评注者已经确定了《奥德赛》中提及的很多地方的位置，特别是那些位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周边水域的地点：斯库拉 (Scylla) 的水域和卡力布狄斯 (Charybdis) 旋涡最终被认定为水流湍急的墨西拿海峡；忘忧岛则似乎与杰尔巴岛 (Jerba) 相对，在今天的突尼斯海岸附近。克基拉 [Kerkyra, 今科孚岛 (Corfu)] 被认为是阿尔金诺斯 (Alkinoos) 国王的领地，奥德修斯在此岛沿岸遭遇海难后，向这位国王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且有幸得到了国王美丽的女儿诺西卡 (Nausikaa) 的帮助——从奥德修斯裸露的身体中，她看出了他的尊贵身份。⁴ 无论荷马是谁，也无论他生活于什么年代 (可能是公元前 700 年前后)，他在地理位置方面都叙述得不够详尽。对于早期希腊航海者而言，他们很容易把《奥德赛》当作一本关于地中海航行的指南。一些严谨的学者和航海者认定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揭示了真实的历史，他们致力于复原奥德修斯的航行路线。⁵ 但是荷马笔下的海被认为是地中海和黑海的混合物，可能还涉及大西洋的一些水域。例如喀耳刻居住的埃阿亚岛 (Aiaia) 从其名字看，似乎位于东方太阳升起的某个地方。与荷马生活时代较为接近的诗人赫西俄德 (Hesiod) 却认为喀耳刻必然生活在距意大利较近的地方。地中海的地图在诗人手里具有极大

的可变性。⁶

希腊人及其邻居也意识到了那些在特洛伊陷落几个世纪后导致人们不断迁移的动乱，他们试图确定迁移者是谁的后裔，以此使关于这场移民的故事变得个体化。这个被人不断重复讲述的故事最终使罗马人相信，他们是从特洛伊城逃出的埃涅阿斯的后裔。在他的冒险经历中移植有很多奥德修斯经历，比较著名的便是探访地府。伊特鲁里亚人也坚信他们是奥德修斯 [他们称其为乌利斯 (*Uli se*)，拉丁语写作乌利塞斯 (*Ulysses*)] 或埃涅阿斯的后裔。希腊和特洛伊的英雄们成为地中海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希腊人失去了对其的专有权。毕竟荷马告诉我们的仅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伊利亚特》讲述了特洛伊被围攻的几十天中发生的故事；《奥德赛》则是关于一位英雄的返乡之旅及儿子寻找父亲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中还有大量可以填充的空白，且有大量口头传说可被古希腊作家们采用。从公元前 7 世纪的赫西俄德到雅典伟大的戏剧作家，他们都非常深刻地描述了阿伽门农返乡后的权力之争及其被谋杀于浴室的故事。特洛伊故事的快速传播可由瓶画、刻纹镜子及其他物品印证，它们不仅描绘了荷马记载的故事，还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其他方面及战后之事。这些物品似乎属于前 7 世纪，特别是《奥德赛》中记载的很多场景可由前 600 年以前的希腊陶器印证，其中包括塞壬的故事和较之稍晚的女巫喀耳刻的传说。⁷

87

《奥德赛》令人不解的方面在于，不仅英雄在何处抵达陆地模糊不清，其偏离故事中心的家乡的具体位置也不准确。伊萨卡岛位于迈锡尼世界的最边缘处，毫无疑问，对那些早期迈锡尼贸易者来说，此地是他们进入南意大利的跳板。越过伊萨

卡岛和其他几个爱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就可以到达克基拉岛；从克基拉岛航行一小段距离便可进入南意大利，经此地可进入斯巴达人在塔拉斯的殖民地，该殖民地建于公元前706年，非常靠近斯科格里奥遗址，斯科格里奥的南意大利土著居民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获得了大量迈锡尼陶器。在前800年之后，来自西爱琴海的科林斯和埃维厄岛的陶器被运至伊萨卡岛和小镇艾托斯（Aetos）。在艾托斯人们发现了许多科林斯陶器，显然这里是科林斯人的一个补给站。此地还有一间神殿，航海者向神殿供奉琥珀珠、青铜护身符及金饰品等来自克里特岛的物件。⁸尽管施里曼想尽办法要找到奥德修斯的宫殿，但几乎没有遗迹可以证明伊萨卡岛曾存在过迈锡尼人繁荣昌盛的生活中心。该岛并没有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变动中被摧毁，旧有的崇拜中心依然活跃，而且旧有人口和习俗的存续也可以解释，为何留存至今的奥德修斯返乡故事的细节要比其他返乡者的故事更为丰富。在城中有一个为奥德修斯修建的神殿，建立时间为前8世纪中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希腊人相信该神殿纪念的是奥德修斯献出的青铜三足器，此处也是他最终返回岛上的位置。奥德修斯的信徒在神殿留下了他们自己的三足器，现在这些三足器已经出土。⁹

88 荷马已经意识到商人们正在探索爱琴海以外的海域。他赞扬海盗的勇气，鄙视商人们的经商方式；他将一个腓尼基商人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人，因为腓尼基人是“非常狡猾”且“行为不端”的民族。¹⁰荷马回想起那个交换不是通过商人间的交易，而是贵族武士间的互相赠礼完成的时期：“他已经送给墨涅拉奥斯两个银浴盆、一对三足器和十塔兰特黄金。”在荷马心中的英雄时代，人们依照

传统的行为准则行事。根据荷马描绘的图景，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构想出了一个“奥德修斯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早于希腊商人的商业化世界的。¹¹但是荷马自己也感到很矛盾。一些王公贵胄也有可能经商，甚至诸神也会扮作商人。在《奥德赛》的开篇，雅典娜就以高贵的商人形象出现在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os）面前：“我乃门忒斯（Mentes），聪慧的安基阿洛斯（Anchialos）之子。我统治着喜好航海的塔福斯人（Taphians）。现在，我已偕同伙伴驾船而来，穿过泛着酒色的海面，前往异邦之地忒墨塞（Temese）。我带来了闪亮的灰铁，希望换取此地的青铜。”¹²一般认为，忒墨塞是南意大利的一个地名，但坦率而言它可能是任何地方。事实上，荷马的关注范围几乎不涉及意大利。荷马偶尔会提到西西里人，不过他们大多出现在《奥德赛》第二十四卷，此卷是后来杜撰的结尾，或对此前事件进行了大肆篡改。

在《奥德赛》最负盛名的一节中，荷马描述了奥德修斯的船员与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邂逅。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读出希腊人在同陌生原始的外界族群接触时的重重忧虑，尽管他们看似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荷马很轻率地对文明与野蛮做了区分。独眼巨人“妄自尊大且无法无天”，他们并不费心耕种土地，而是直接采集他们所需的物资。“他们从不开会商讨相应事宜，也不制定相关法典”，在洞中过着孤僻的生活，并不关注自己的邻居。¹³他们是不敬神明的食人一族。¹⁴总之，他们不懂得贸易的好处：“巨人库克罗普斯没有造出涂红了船首的船只，他们中间也没有造船的工匠，因此无法建造坚实的船只，无法到达每个有人居住的城市，也无法完成海上航

行之人可以完成的诸多任务。”¹⁵而忒勒玛科斯生活的岛屿则很容易就能找到修造海船的船匠，因为雅典娜建议忒勒玛科斯打
89 听他父亲的音讯，“准备一条你能找到的配有二十位桨手的最好船只”。¹⁶在这个时代，海上航行是自然而便捷的。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人们开始在地中海上与其他地方建立联系。希腊人与腓尼基人或是联合或是竞争，不但他们的发源之地开始焕发新生，其在故土之外建立的城市文明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另外，他们对定居地之外的地中海上的其他族群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

爱琴海（特别是埃维厄岛）的希腊人开始与面向第勒尼安海而居的族群往来的时刻被描述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西方文明而言，“该时刻几乎要比古代取得的任何单项进步都更为影响深远”。¹⁷它不仅对于希腊的商人和移居者最早踏上意大利土地是一个重要时刻，对于希腊本土繁荣的贸易中心亦是如此：埃维厄岛上的城市衰落后，科林斯控制了航线，将成千上万的精致陶瓶运往西方，并将诸如金属和食材等原材料运回来；继科林斯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开始获得同样的贸易统治地位。希腊能够在青铜文明衰落后重现繁荣，希腊手艺人偏爱的独具风格的物件能够广布各地（希腊艺术因此成了远西的伊比利亚和伊特鲁里亚手艺人的参照对象），离不开这些外部的资源和联系。要书写希腊文明史，如果不关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水域，而只描述雅典和斯巴达崛起的故事，就如同在书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时认为文艺复兴只发生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希腊人与那不勒斯湾的首次接触可追溯至迈锡尼时期，维瓦拉岛（Vivara）上发现的陶器可以证明此点。埃维厄人大约于公元前750年在邻近的伊斯基亚岛建立了一个落脚点。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有意紧随其青铜时期先人的足迹的；但铁器时代的第一批希腊移民定居在了深入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某处一事仍令人费解。紧接着，他们在该海湾的库玛〔Kyma，即库迈（Cumae）〕建立了一个陆上定居地。¹⁸半个世纪后，斯巴达人在意大利靴跟处的塔拉斯〔即塔兰托（Taranto）〕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从该地可以轻松航行至爱奥尼亚诸岛和科林斯海峡，且对于在意大利土地上的首次试探性探索而言，定居这里似乎是更合乎逻辑的选择。尽管如此，一般观点认为，腓尼基人已经多次航行至北非，甚至在此之前已经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塔特索斯。这些漫长而雄心勃勃的路线的形成以获取金属为动机，无论是托斯卡纳和撒丁岛的铜和铁，还是撒丁岛与南西班牙的银。晚于这个时代的一份希腊文献在记载腓尼基航海者前往塔特索斯的航行时，对腓尼基人能在遥远的西方找到这些财富表示惊讶。据其记载，这些商人载着油向西航行，然后踏上归途，带着“如此之多的白银，以致船只上没有空间再装载或者再接收白银，于是他们在起航之时将所有设备与器具都打制成了银具，甚至还打制了银制船锚”。¹⁹而且我们还可看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些水域，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尽管这些水域上的主要定居地，如迦太基和库玛，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例如希腊城邦中的居民并不认为他们是希腊人，而是自称埃维厄人、多利亚人或爱奥尼亚人），但这些跨越广阔海域的航线是一项合作性事业。

连接埃维厄和伊斯基亚两岛的贸易路线的两个端点在哪里是一个谜。为何在经历了“黑暗时代”的长期衰退后，埃维厄岛会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中心，至今仍不得而知。²⁰埃维厄是一个被森林覆盖的狭长岛屿，它的一侧与希腊本土相连；从希腊本土至此最多几英里的路程，赫西俄德却过分夸大了穿过该狭窄海峡的恐怖。岛上的两大主要城市哈尔基斯（Chalkis）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控制着优质的自然资源，且在与雅典和科林斯的地方贸易中较好地开发了这些资源，这一点或许是关于埃维厄崛起的最有力解释。埃维厄盛产木材，这对于船只建造至关重要。实际上，一首献给阿波罗的荷马式赞歌（Homeric Hymns，即写于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的赞美诸神的一类诗歌，它们被认为带有荷马的风格）就曾描述该地“以船只闻名”。酒是另外一种资源——早期希腊语单词“*woinos*”被传到意大利，在这里伊特鲁里亚人将这个词改为了罗马人所知的“*vinum*”。²¹哈尔基斯的名字说明该地区富藏铜矿，而且在埃维厄岛的勒夫坎迪（Lefkandi），人们发现了用于铸造三足器的模具，它们属于约前10世纪晚期的物件。当时勒夫坎迪是一个繁荣的中心，在该地，一处一端呈半圆形的建筑已被挖掘出来。据测量，该建筑长四十五米、宽十米，修建时间为前950年以前。它是在石头地基上用泥砖修成的，其屋顶上有茅草覆盖。这是一位伟大武士的壮观陵墓，该武士身披亚麻布斗篷（其残片还在），在他身旁有铁剑、矛以及随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三匹马。墓中还有一具女性骸骨，她的陪葬品有金首饰以及铜铁制成的别针。²²

埃维厄人并未将其所有精力都投向伊斯基亚岛。实际上，

他们的目标是将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打造成东西地中海贸易网中的中间点。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晚期，制陶术已经从叙利亚海岸传至勒夫坎迪。约前 825 年，阿尔米纳建立了贸易点，这加强了勒夫坎迪与叙利亚的联系。勒夫坎迪遗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莱昂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爵士发掘，他很明确地阐述了埃维厄岛作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对其周围地区的重要性——向东是欣欣向荣的亚述帝国，沿海岸下行可到达推罗和西顿，穿过公海可到达爱奥尼亚人（即希腊人）的土地。²³它与塞浦路斯的联系更为紧密，经塞浦路斯可到达叙利亚诸城镇、南安纳托利亚及尼罗河三角洲。埃维厄是所有沿海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腓尼基人在克提昂的殖民地也住着希腊居民和商人。在埃维厄的遗址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来自塞浦路斯的青铜权杖头，以及源自埃及或黎凡特地区的金器、彩陶、琥珀及水晶。²⁴依据勒夫坎迪武士墓中出土的精美衣物残片推测，高质量的针织物对于勒夫坎迪的居民也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商品。叙利亚沿岸以生产布匹而闻名，其染料更是吸引了很多希腊人前往黎凡特。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埃维厄岛成了前 9 世纪希腊世界中最为繁华的地区（除部分希腊化的塞浦路斯岛外）。这些商品是由什么人带至埃维厄岛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前 8 世纪，在哈尔基斯人和埃雷特里亚人于伊斯基亚岛建立定居点之前，此地就已经开始繁荣。可能从塞浦路斯到来的商人并非希腊人，而是腓尼基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早期希腊诗人会了解腓尼基商人及其先进技术。

92

另外一个未解之谜是，埃维厄人从与塞浦路斯和黎凡特的商品交换中能获得什么。由于他们开辟了向西的航线，他们可

以获得金属供应，如铜和铁，并以此换取东方的产品，因为很明显，在这个时期当地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埃维厄人的迫切需求。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义务供应一些货物，而这些在考古层中是没有留下确切痕迹的：成袋的谷物、装有酒和油的陶罐以及带瓶塞的香水瓶。装运这些产品的陶罐被运至远及以色列王国或位于南部安纳托利亚的奇里乞亚（Cilicia），陶罐的设计与图案固然已备受赞誉，但最重要的还是它们盛装的货物。之后，由于这种贸易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贸易，为了能够购买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埃维厄人被激发出了进一步寻找金属和其他一些商品以进行抵付的动力，因此进入了第勒尼安海。一些来自埃维厄岛或至少是埃维厄风格的陶器可以证明，埃维厄岛与撒丁岛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托斯卡纳海岸及内陆的铁矿依旧是较好的资源，在此地一些繁荣的村庄逐渐合并成为伊特鲁里亚繁荣城邦文化的基础。所以，埃维厄人渐渐开始与环第勒尼安海的居民建立联系，最初是以腓尼基人为媒介，而后通过他们自己的船只。

伊斯基亚是埃维厄人选择的一个基地，奇怪的是，他们称此地为匹德库塞（*Pithekoussai*），意为猴子的领地。该岛一大吸引人之处为其葡萄园，另外还有其安全的近海地理位置，以此为据点，埃维厄贸易可向外辐射，寻找意大利中南部及诸意大利岛屿上的产品。²⁵在约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拉科阿梅诺（*Lacco Ameno*）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基地，此地出土的两件特殊文物可说明这一遥远的定居点与希腊世界的联系。其中之一是产自罗得岛的酒杯，该酒杯被随葬于一个约十岁的男孩的坟墓之中。酒杯上镌刻了一段基调轻快的铭文：

涅斯托耳 (Nestor) 有一个精美的酒杯, 任何人用此酒杯饮酒都将很快对戴着金黄色花冠的阿芙洛狄忒 (Aphrodite) 充满渴望。²⁶

98 据《奥德赛》中的陈述, 涅斯托耳的酒杯由黄金制成, 但是在倒入酒水之后, 它就有了仅凭黄金无法赋予的魔力。²⁷ 该则铭文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地方。它由哈尔基斯居民喜爱的希腊字母书写而成, 它的刻写很有可能并不是与罗得岛上的铸造同时完成的, 而是后来被埃维厄岛的希腊人添加上去的, 当时他们已经到埃维厄岛的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文字。埃维厄人将这种字母文字向西带至意大利, 之后这种字母 (而非在希腊世界获得成功的阿提卡字母) 促成了伊特鲁里亚字母文字的诞生, 并由此衍生出了罗马的字母文字。除荷马的标准颂诗外, 该诗是从前 8 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的韵体诗。它对于涅斯托耳的提及, 进一步说明特洛伊战争在古风时期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据的中心位置。与罗得岛的联系, 不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通过哈尔基斯人或埃雷特里亚人建立的间接联系, 也为出现于伊斯基亚的一些产自罗得岛的小香水瓶 (*aryballoi*) 所证实, 人们在葬礼中用光瓶中之物, 然后便丢弃了这些瓶子。

来自拉科阿梅诺的另外一件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一个浅颈花瓶 (*krater*), 其边缘部分的图案描绘了一场海难。这也是第一个此种类型的陶器, 是从意大利遗址出土的第一个有叙事画的花瓶, 而且是在当地制造的。它展示了一艘船——与后来科林斯陶器刻画的那种船甚为相似——被打翻, 其船员为了活命在海中游动, 但是一人已经淹死, 另外一人即将被一条大鱼吞食。接下来的场景是肚满肥圆的鱼将尾巴翘起, 说明后一位船员似

乎并未逃脱被吞食的厄运。这里并不存在《奥德赛》或其他英雄返乡故事中的场景，其展现的可能是当地常见的一种情况，即真实世界中的人一旦到了海上便再无回归之时。其他来自古墓的证据也可以证明，海上交通对伊斯基亚的匹德库塞居民十分重要。有一些来自南伊特鲁里亚的花瓶，它们呈纯黑色，被称为巴契罗（*bucchero*）；使之尽显典雅之风的是它们的造型，而不是装饰图案。南伊特鲁里亚与东方的联系特别紧密，在该地公元前8世纪70年代的古墓中，有约三分之一出土了产自黎凡特或在黎凡特影响下生产的产品。²⁸在一座小孩的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圣甲虫护身符，上面有法老博克霍里斯（*Bocchoris*）的名字，据此可断定这是约前720年的墓。此外，塔尔奎尼亚（*Tarquinia*）的一处伊特鲁里亚遗址出土了一个彩陶花瓶，花瓶上的文字也提到了该法老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航线以埃及为起点，可能经过腓尼基或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到达希腊，而后进入第勒尼安海。无论如何，匹德库塞并非这条贸易线的终点，商人们继续向前推进，一直到达富藏金属资源的托斯卡纳海岸。就像海外的腓尼基人最终成为比黎凡特的腓尼基人更为忙碌的商人一样，在遥远的西方，埃维厄人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活跃的贸易世界，并最终将叙利亚、罗得岛及科林斯与匹德库塞连接在了一起。

匹德库塞的居民是贸易者，同时也是男女手艺人。一片可能源自厄尔巴岛（*Elba*）的铁渣揭示了与伊特鲁里亚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因为伊斯基亚并不生产金属。考古学家在这里也发现了冶炼设备，且从一些残存的金属短线和锭块来看，这里已经生产了铁器和青铜器。这是一个由勤劳的外来人员组成的社会劳动群体，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其人

口为 4800 ~ 9800 人。因此，昔日的中转站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在此安家立业的不仅有希腊人，还有一些腓尼基人及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人。一个装有幼儿遗骸的陶罐上刻有腓尼基人的标志性图案。²⁹ 我们不能只因为匹德库塞是希腊人建立的基地，就断言这里只有希腊人，特别是只有埃维厄人居住。如果外来的手艺人能带来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技术，他们也会受到欢迎，不论他们是科林斯的制陶者（从约前 725 年开始住在库玛），还是腓尼基的雕刻者（可以满足意大利人对东方雕刻品的需求）。因此，匹德库塞成为一座桥梁，“东方化风格”的物品汇集此地，并经此地传向西方。匹德库塞人注意到，伊特鲁里亚南部的一些正在兴起的村落，如维爱（Veii）、卡埃里（Caere）和塔尔奎尼亚，对东方的物品充满渴望，所以它们向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出售其想要的物品，作为交换，它们将获得产自伊特鲁里亚北部的金属。一些村庄围绕着“七丘”聚集，它们就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台伯河对岸，但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此点，我们就不太确定了。

3

修昔底德讲述了埃维厄岛的城市被卷入利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的经过。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最惨烈的一次内战。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且几乎没有关于它的细节性描述；它可能是为争夺对利兰丁平原的地下铜矿和铁矿资源，或者平原上的葡萄园和牧场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³⁰ 无论如何，至公元前 700 年，埃维厄岛已经盛极而衰。它无法继续维持领先地位，因为其他中心（如科林斯）已经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者。与西方的贸

易为科林斯带来发财的机会。荷马早已描述过该城的富有。³¹前5世纪的传统主义诗人品达（Pindar）在《奥林匹亚颂》中唱道：“我将会了解幸运的科林斯，那地峡上的波塞冬门户。”³²前5世纪的科林斯在领土和人口规模上，仅是雅典的约三分之一；但它凭借地利可以从跨地中海贸易，以及范围更大的自希腊西至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第勒尼安海的贸易网络获取巨额利润。坐落在连接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交通线上，科林斯也可以从穿越地峡的陆路贸易中获利。³³科林斯卫城的陡峭要塞中（可能是几个村落的聚合体）的居民在约前900年就与更远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当时科林斯原几何风格的陶器已经到达维奥提亚（Boiotia）；至前800年，数量可观的科林斯陶器作为祭品被虔诚地送至德尔斐（Delphi）。³⁴至前8世纪中期，很多科林斯陶器被运往匹德库塞，并从那里沿贸易路线下行至伊特鲁里亚的一些早期村庄。³⁵在前7世纪，科林斯人在地峡的两端建立了港口，一个港口在科林斯湾的勒凯翁（Lechaion），另一个在肯克里埃（Kenchreai）。从肯克里埃出发经萨龙湾（Saronic Gulf）可进入地中海；萨龙湾的水域更为平静，但从科林斯到这里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与港口同样重要的，还有科林斯人建立的船只专用滑道（*diolkos*）。通过滑道，科林斯的奴隶们可以经陆路将船舶从一个港口转移至另一个港口。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极富想象力地把滑道比作性行为：“这种滑道对于地峡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上下抽动阴茎的次数远比科林斯人将船推过滑道的次数还多！”³⁶与东西方——包括希俄斯、萨摩斯、伊特鲁里亚——进行频繁贸易的证据在科林斯出土的陶器中就可以轻松找到。³⁷修昔底德断言，科林斯是一个造船中心，因为“据说，赫拉斯的第一艘三列

桨战船就是在科林斯制造的”。³⁸

在公元前 625 年至前 600 年间的某个时间，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ros）与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统治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要建立一个范围远至爱奥尼亚和埃及的联盟。僭主的外甥基普塞洛斯（Kypselos）以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os）作为自己的昵称，这也是与佩里安德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法老之名。爱奥尼亚人的一个贸易据点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逐渐建立，很快科林斯的陶器便出现在了此地。³⁹至前 6 世纪中期，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在购买陶器时最偏爱的就是科林斯陶器。在前 8 世纪晚期，迦太基人模仿了科林斯人的设计图案，随后就屈从于科林斯正宗陶器的小规模进口。伊特鲁里亚人在购买陶器时有能力鉴别其中的优质产品，例如约前 650 年的基吉陶瓶（Chigi vasa）是流传至今的最精美的科林斯陶器。直到前 6 世纪，雅典陶器才在出口至意大利的陶器中占据优势地位。⁴⁰

尽管科林斯陶器精美典雅，但没有人会相信科林斯仅凭人们对这些陶器的需求就能维持与东方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城市中致力于陶器生产的区域并不大。多数陶器作为压舱物放在装满易腐商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染成深红色、紫色、火红色和海绿色的地毯、毛毯、亚麻衣料）的船舱内。⁴¹这些商品的生产依赖于染料的供应，因此与腓尼基的紫色染料的贸易者的联系显得颇为重要。其中的一个联络点位于黎凡特地区的商业中心阿尔米纳，在这里希腊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Aramaecans）及其他人群混杂而居且互通有无。⁴²而科林斯的优势在于产品的多样性。科林斯商人们拥有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品、木材、精美器皿及陶砖（他们将大量的陶砖送往德尔斐的神庙，除了

个别覆盖着大理石屋顶的建筑之外，那里的其他建筑都用陶砖覆盖屋顶)。小型的青铜制品是备受青睐的出口品，青铜和铁制成的武器、铠甲也广受欢迎，早在公元前 700 年，科林斯人就开始在这一领域享有盛誉。⁴³

成功的代价是嫉妒，且在科林斯与其邻邦发生的战争中，勒凯翁曾几度落入敌人之手。但科林斯的政策总的来说是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邻居保持和平关系，该政策一直沿用到了公元前 5 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毕竟海上和陆上的冲突对一个贸易城邦来说是有害无益的。然而我们不太确定的是这种贸易是否由科林斯船只完成。在科林斯，我们发现了大量制造于前 460 年之前的迦太基双耳细颈陶罐，这说明科林斯与西地中海之间活跃的食材贸易是由科林斯人和迦太基人共同完成的。有人提出，运往科林斯的陶罐中装载的主要产品是一种用鱼的内脏制成的臭鱼酱，这种鱼酱从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的遥远的腓尼基人贸易中心库阿斯（Kouass）运来。⁴⁴前 8 世纪末至前 3 世纪中，科林斯生产的双耳细颈陶罐已遍布西地中海，向西它们最远被运至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和伊维萨岛，南意大利及希腊人在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定居点也能看到这种陶器。制造这些陶罐是为了装载货物，且它们的出现揭示了当时活跃的谷物、酒和油的贸易；随着希腊本土的滨海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像西西里岛这样的地区对谷物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且将西方的希腊人与其故土联系起来的生命线就是通过科林斯地峡建立起来的。作为回应，科林斯将其土地上产出的富余产品油和酒卖给西西里岛及更远处城市的购买者。⁴⁵

科林斯的崛起引起了关于古代地中海经济的更广泛的争

论。例如摩西·芬利认为，财富的根基在于本地的农业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他坚称，在科林斯，奢侈品的贸易量是很小的，以至于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明显作用，且后来的雅典亦是如此。芬利对人类学家关于礼物交换的观点深信不疑，认为在这一时期，相互联系远比寻求利益重要。很多证据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⁴⁶ 例如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来，科林斯人开始使用一种银币，而且南意大利发现的一些窖藏银币表明，这些钱币早在前6世纪末就被带至西方。爱琴海世界中可以辨别的最古老硬币源自吕底亚（Lydia），但我们不知道科林斯人铸币的想法源自何处。很可能科林斯人铸币的最初动机是使那些使用他们的两个港口和滑道的商人定期缴纳税款。⁴⁷ 无论如何，至前600年，从事贸易的人要远远多于从事礼品交换的代理人。

在科林斯早期历史中有两个人物证实了这一观点。一个是佩里安德，他的父亲领导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之前统治该城市的巴克基阿德（Bacchiad）王朝。⁴⁸ 佩里安德统治科林斯的时间为公元前627年至前585年；就经济层面而言，这是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希罗多德认为佩里安德具有许多独裁者特有的坏品质：他被认为谋杀并尸奸了自己的妻子梅丽莎（Melissa）；他因为儿子死于克基拉岛而被激怒，从克基拉岛掠夺了三百个男孩并将他们籍没为奴，然后将他们送往吕底亚阉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他是严酷独裁者的典型。但亚里士多德也在其他方面提道，佩里安德依赖于市场和港口的税收，且秉公执法；甚至还有一些人将其推崇为古希腊七贤之一。⁴⁹ 后来的很多文献公开断言，他是奢侈行为的反对者，据说他烧毁了深受科林斯贵妇喜爱的精美衣料，制定法律反对蓄养奴隶，主张臣民应自己从事劳动。⁵⁰ 他憎恶懒散。此处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关

于他的遥远记忆中，他的政策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人物是巴克基阿德王朝的独裁者德玛拉图斯（Demaratos）。直到很久之后的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德玛拉图斯的生平细节才得以披露，且披露人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是一位不太可信的作家。据说当德玛拉图斯的王朝被推翻后，他于约公元前 655 年逃至塔尔奎尼亚，并与当地一位贵族女子结婚。该女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塔克文（Tarquin），也就是罗马的第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据说德玛拉图斯也带来了一些手艺人。⁵¹科林斯人肯定发生过流散，而且巴克基阿德王朝曾积极建立科林斯人的海外殖民地。在约前 733 年，该王朝的臣民在西西里岛建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希腊城邦叙拉古；约在同一时期，他们还在克基拉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但是与其的关系有时并不是很好。⁵²克基拉岛是科林斯人沿伊庇鲁斯（Epeiros）和伊利里亚（Illyria）海岸建立的定居点之一，但克基拉本身也在埃比达姆诺斯——现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建立了一处殖民地。克基拉和叙拉古保护着穿过爱奥尼亚海前往亚得里亚海的贸易者。从亚得里亚海里的殖民地人们可以获得产自巴尔干内陆的银，科林斯人铸造的精美钱币正是用这种银做成的。前 4 世纪初，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在努力控制地中海水域时，决定在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沿岸“建立一些城市”，目的是

99 “确保通往伊庇鲁斯的航线的安全，且这些城市可以为船只提供停泊处”。⁵³关于叙拉古和克基拉之建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其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已经存在的贸易路线，还是安置科林斯无法养活的多余人口？⁵⁴当殖民者在新占领的土地上稳固扎根后，他们就可以进行初级产品（如谷物）的贸易，进而

缓解母邦在基础生活资料方面的压力，并使母邦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继续发展。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这一时期，一个希腊城邦将居民送至海外的动机有很多：在社会的顶层，有政治放逐者；在底层，有盯上新市场的商人和船主；此外有一些手艺人，他们意识到在遥远的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地区，对其产品的需求正在增加；还有一些人要到西方寻找可耕种的土地。拓殖活动并不意味着母邦发生了饥荒，它象征的是财富的不断增长，以及以科林斯和其他在地中海上创立诸多子邦殖民地的城市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更进一步的希望。然而，正如科林斯的德玛拉图斯所经历的那样，也有一些希腊人只能作为当地最有影响力之族群的客人居住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伊特鲁里亚人。

注 释

1. I. Malkin, *The Returns of Odysseus: Colonisation and Ethnic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1998), p. 17.
2. *Ibid.*, p. 22; also D. Briquel, *Les Pélasges en Italie: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 la légende* (Rome, 1984); R.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 (London, 2008).
3. *Odyssey* 1:20, 5:291, 5:366, in the translation of Roger Dawe.
4. Malkin, *Returns of Odysseus*, pp. 4, 8.
5. Notably in the works of the French Homer scholars Victor Bérard and his son Jean Bérard: J. Bérard, *La colonisation grecque de l'Italie méridionale et de la Sicile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57), pp. viii, 304-9.
6. Malkin, *Returns of Odysseus*, p. 186.
7. *Ibid.*, p. 41; M. Scherer, *The Legends of Troy i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1963).
8. Malkin, *Returns of Odysseus*, pp. 68-72.

9. *Ibid.*, pp. 68–9, 94–8;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p. 181–2.
10. *Odyssey* 14:289; 15:416, trans. Dawe.
11. M.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2nd edn, London, 1964).
12. *Odyssey* 1:180–85, trans. Dawe.
13. *Ibid.*, 9:105–115.
14. *Ibid.*, 9:275.
15. *Ibid.* 9:125–9.
16. *Ibid.* 1:280.
17. D. Ridgway, *The First Western Greeks* (Cambridge, 1992) (revised edn of *L'alba della Magna Grecia*, Milan, 1984). Subsequent literature on the western Greeks: G. Pugliese Carratelli (ed.), *The Western Greeks* (London, 1996); V. M. Manfredi and L. Braccisi, *I Greci d'Occidente* (Milan, 1996); D. Puliga and S. Panichi, *Un'altra Grecia: le colonie d'Occidente tra mito, arte e memoria* (Turin, 2005); also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18.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 160.
19. Cited by Ridgway, *First Western Greeks*, p. 99.
20.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p. 52–69.
21. *Ibid.*, p. 159.
22. Ridgway, *First Western Greeks*, p. 17;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p. 55–9.
23. L. Woolley, *A Forgotten Kingdom* (Harmondsworth, 1953), pp. 172–88.
24. Ridgway, *First Western Greeks*, pp. 22–4.
25.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p. 138–49.
26. Ridgway, *First Western Greeks*, pp. 55–6, figs. 8–9;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p. 157–8.
27. *Odyssey* 3:54, trans. Dawe.
28. Ridgway, *First Western Greeks*, pp. 57–9, 115.
29. *Ibid.*, pp. 111–13, and fig. 29, p. 112.
30.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p. 169–70.
31. *Iliad* 2:570 – cf. Thucydides 1:13.5; J. B. Salmon, *Wealthy Corinth: 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 (Oxford, 1984), p. 1; M. L. Z. Munn, 'Corinthian trade with the Wes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Ph.D. thesis, Bryn Mawr Colle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Ann Arbor, MI, 1983–4), p. 1.
32. Pindar, Olympian Ode 13; C. M. Bowra (trans.), *The Odes of Pindar* (Harmondsworth, 1969), p. 170.
33. Thucydides 1:13.
34.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p. 84–5, 89.
35. Ridgway, *First Western Greeks*, p. 89.
36. Aristophanes, *Thesmophoriazousai*, ll. 647–8.
37. L. J. Siegel, 'Corinthian trade in the ninth through sixth centuries BC', 2 vols. (Ph.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University Microfilms, Ann Arbor, MI, 1978), vol. 1, pp. 64–84, 242–57.
38. Thucydides 1:13; Siegel, *Corinthian Trade*, p. 173.

39. Herodotos 1:18.20 and 5:92; A. Andrewes, *The Greek Tyrants* (London, 1956), pp. 50–51; Siegel, *Corinthian Trade*, pp. 176–8; also M. M. Austin, *Greece and Egypt in the Archaic Age* (supplements to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o. 2, Cambridge, 1970), especially p. 37.
40.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p. 105–6, 109–10.
41. Munn, *Corinthian Trade*, pp. 6–7;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p. 101–5, 119.
42. Woolley, *Forgotten Kingdom* pp. 183–7.
43.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p. 99, 120.
44. Munn, *Corinthian Trade*, pp. 263–7, 323–5.
45.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 136.
46. K. Green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 M. I. Finley reconsider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3 (2000), pp. 29–59, especially 29–34.
47. Munn, *Corinthian Trade*, pp. 78, 84, 95–6, 111; cf. M.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1973).
48. Andrewes, *Greek Tyrants*, pp. 45–9.
49. Herodotos 5:92; Aristotle, *Politics*, 1313a35–37;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 197; also Andrewes, *Greek Tyrants*, pp. 50–53.
50. Salmon, *Wealthy Corinth*, pp. 199–204.
51. C. Riva, *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 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 700–600 BC* (Cambridge, 2010), pp. 70–71; A. Carandini, *Re Tarquinio e il divino bastardo* (Milan, 2010).
52. A. J. Graham, *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 1964), p. 220.
53. Diodoros the Sicilian 15:13.1; Munn, *Corinthian Trade*, p. 35.
54. Graham, *Colony and Mother City*, pp. 218–23.

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 (前 800 ~ 前 400 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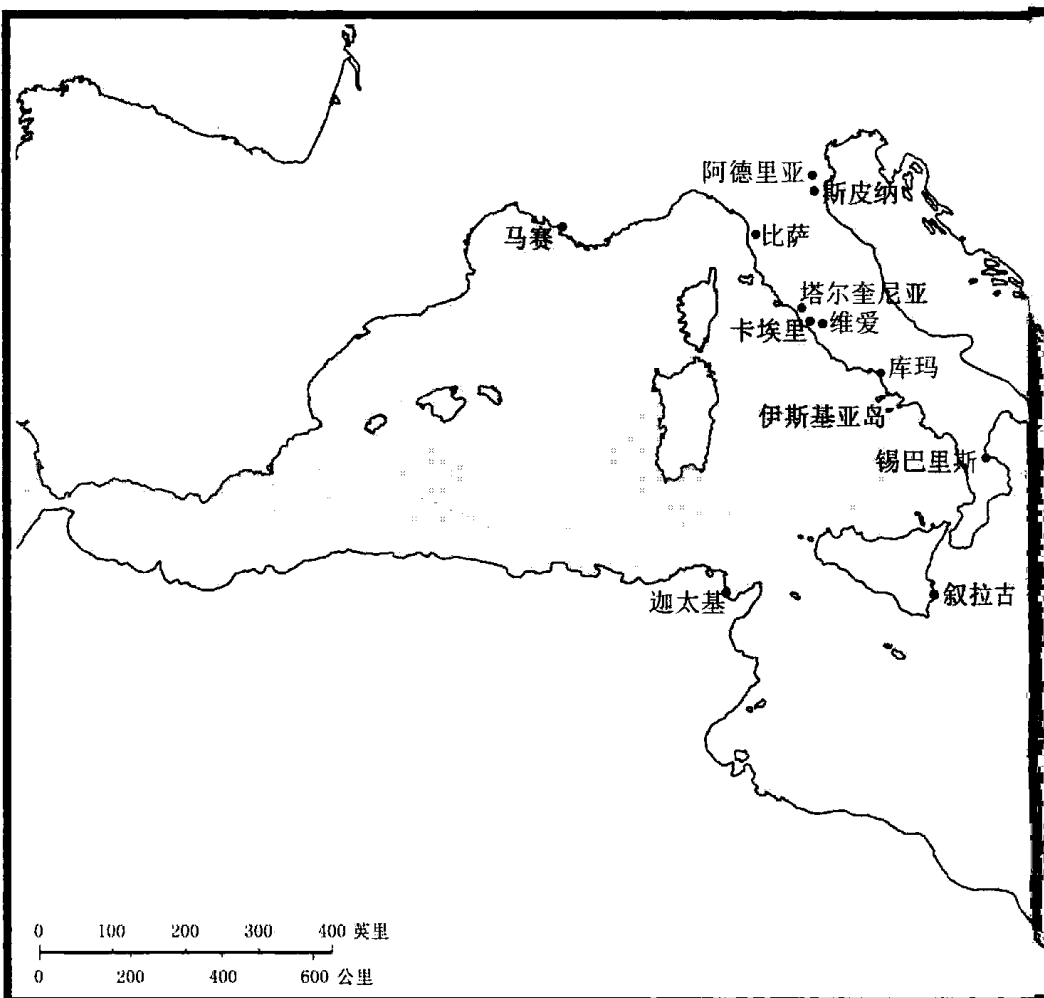
100

伊特鲁里亚人的重要性不只在在于其令 D. H. 劳伦斯 (D. H. Lawrence) 着迷的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的墓葬壁画, 也不在于其特殊语言令人困惑的起源, 也不只在在于其在早期罗马史中留下的深刻痕迹。他们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们是西地中海在东地中海文化影响下出现的第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有时, 伊特鲁里亚文化被贬低为一种衍生文化, 伊特鲁里亚人被一位最为著名的希腊艺术家贴上了“无艺术修养的野蛮人”的标签;¹ 他们生产的任何符合希腊人标准的物件都被归为希腊艺术家的作品, 其他被扔掉的作品则是可证明他们艺术水平低下的证据。然而, 即使伊特鲁里亚艺术不具有古典意义上的品位或完美性, 大多数人还是会像劳伦斯一样赞美其生动性及表现力。但是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伊特鲁里亚受到希腊和东方影响的程度、丰富多彩的东地中海文化向西方的传播, 以及意大利中部 (罕有迈锡尼人拜访此地) 与爱琴海及黎凡特建立密切商业关系的过程。这些进程是一场范围更广的运动的一部分, 辐射了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

伊特鲁里亚崛起的标志有: 除希腊早期殖民者的城市外第一批意大利城市的修建, 伊特鲁里亚人海上势力的建立, 以及意大利中部与黎凡特之间的贸易联系的形成。随着这一进程的

发生，地中海的文化版图经历了长期变化。高度复杂的城市社会在西地中海沿岸形成，在这类社会中，对腓尼基和爱琴海海域物产的需求日益增长，融合了东西方特征的新艺术风格开始出现。沿连接伊特鲁里亚与东方的贸易新路线前来的不仅有希腊商人和腓尼基商人，还有希腊和腓尼基的男女众神，且希腊众神（包括一整套关于奥林匹斯山的神话、特洛伊的故事及诸英雄的传说）最终征服了意大利中部族群的思想。对于科林斯精美器皿（后来是雅典器皿）的需求使诸多市场建立起来；实际上，多数最为精致的希腊器皿出现在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墓中而不是希腊人的墓中。迦太基初期的成功也与这些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市场有关。迦太基的位置就在这些市场的附近，迦太基人获得了进入伊特鲁里亚诸城邦的特权，而这种联系又通过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公元前 509 年与罗马人的一项协议）得到了巩固。在迦太基人眼中，与他们在北非与西西里岛进行贸易的土著民族文化相对落后；但在伊特鲁里亚，他们找到了理想的贸易伙伴，且在迦太基人与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斗争中，伊特鲁里亚人也被证明是强有力的盟友。

伊特鲁里亚人因其两大“未解之谜”引起了各方关注。它们是关于族群起源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立于古代世界其他语言的伊特鲁里亚语的起源问题。古代历史学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认为伊特鲁里亚人自东地中海迁徙而来。希罗多德的说法很有价值且接受度很高，他的陈述展现了一个公元前 5 世纪的爱奥尼亚希腊人是如何看待地中海世界中诸民族与各地区间的关系的。² 他向我们说明了，在吕底亚王阿提斯（Atys）的统治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在很遥远的过去，移民是如何发生的。希罗多德说，吕底亚人发明了除跳棋以外的其



阿德里亚

斯皮纳

马赛

比萨

塔尔奎尼亚

卡埃里

维爱

库玛

伊斯基亚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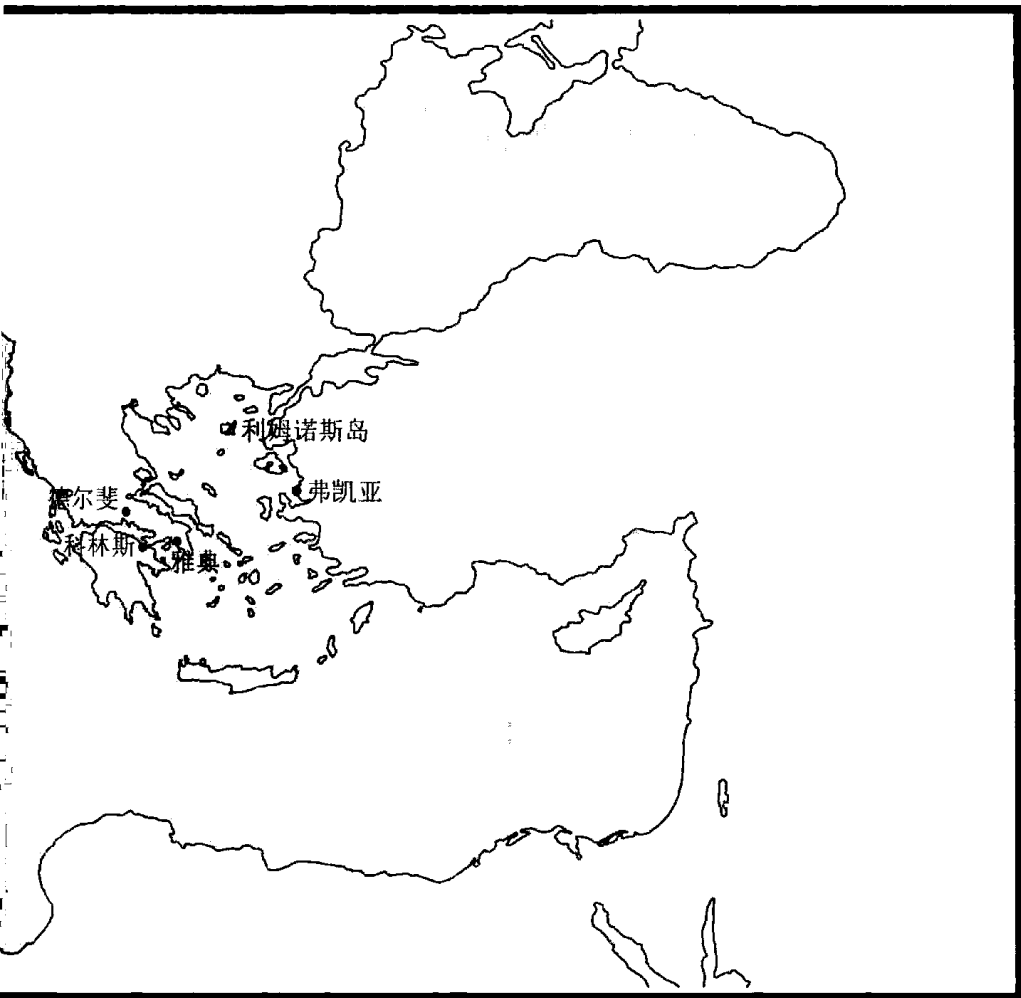
锡巴里斯

迦太基

叙拉古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他棋类游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他们最初的解决方法是吃一天饭，下一天棋，希望以此忘记饥饿：“以此方式，他们坚持了十八年。”但是形势越来越糟。所以国王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将饥饿的人口分为两部分，一半人口将继续留在吕底亚，另一半人口则要在阿提斯之子逖圣（*Tyrsenos*）的带领下寻找新的家园。³ 移民者下行至士麦那，他们制造船只，航行经过了许多地方，最后到达了翁布里亚人（*Umbrian*）的土地。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城市，依照首领逖圣的名字称自己为逖圣人。逖圣（在雅典阿提卡方言中写作 *Tyrrhenos*）对于伊特鲁里亚人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希腊语名称。于是，我们有了另一种希腊作家们非常喜欢的说法。相信伊特鲁里亚人自东方迁徙而来的人不仅包括一些最伟大的罗马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及卡图鲁斯（*Catullus*），还包括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家，如西塞罗、塔西佗（*Tacitus*）和塞涅卡（*Seneca*）。显然，伊特鲁里亚人和吕底亚人对此也坚信不疑。公元 26 年，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决定在小亚细亚的一座城中建立一间雄伟的神庙；为说服罗马人萨迪斯（*Sardis*）是这座神庙的最理想位置，该城提醒元老院说，伊特鲁里亚人是罗马人在几个世纪前派往海外的拓殖者，这说明萨迪斯一直与意大利有密切的联系。⁴

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作的古文物收藏家迪奥尼索斯与希罗多德一样是哈利卡那索斯人，他决心证明伊特鲁里亚人并不是东方的移民，而是意大利的土著居民。他最终希望证明希腊人与罗马人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证实伊特鲁里亚人生于本地是其复杂论证过程中的一环。⁵ 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的修正主义历史

学家间颇受欢迎，他们意识到，仍然被广泛认同的希罗多德的记载只是表面上看似合理而已。一方面，希罗多德阐释了东方文明对于早期伊特鲁里亚艺术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公元前 8 世纪和前 7 世纪，当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开始深入第勒尼安海时，这种影响显得最为深远，但这个时间比希罗多德设想的东部移民来到伊特鲁里亚的时间要晚很多。且正如迪奥尼索斯所言，吕底亚的语言（起源于卢维语）和伊特鲁里亚语之间没有任何关联。⁶ 当代意大利考古学家马西莫·帕罗提诺（Massimo Pallottino）受到迪奥尼索斯说法的影响，认为真正的问题并非“种族”问题，而是伊特鲁里亚文明作为融合多种文化要素——既有拥有不同起源与语言的当地居民，也有来自腓尼基和希腊的外来商人——的复合体如何形成的问题。⁷ 一些来自小亚细亚的流浪雇佣兵（*condottieri*）可能已经在意大利中部诸族群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可以解释前 650 年前后，塔尔奎尼亚和卡埃里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突然开始热衷于东方风格的大型墓葬；而“塔尔奎”（*Tarquin*，或 *Tarchna*）这个名字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安纳托利亚的暴风之神塔浑（*Tarhun*），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塔浑就已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特洛伊附近的阿扎瓦族（*Arzawa*）及其土地。至于伊特鲁里亚语，它肯定是一种产生于意大利的古老地中海语言，但后来来自北部和东部的人侵者用他们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取代了伊特鲁里亚语。学界也曾尝试在血型和 DNA 的帮助下解决这一难题。⁸ 据说在托斯卡纳的穆尔洛（*Murlo*，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地人口的基因类型与黎凡特人的基因类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托斯卡纳中部的牛也比我们想象中的牛具有更多“东方”特点，

科学家们因此推测，当时到来的不仅有移民，还有他们的牲畜。⁹但在伊特鲁里亚时代之后，东方人有很多机会——或者作为罗马军团的士兵，或者作为中世纪的奴隶——定居于托斯卡纳的城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伊特鲁里亚人从何而来，而是他们如何在意大利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

伊特鲁里亚文明并非因为大规模的移民而出现，但这并不是说伊特鲁里亚与东地中海的联系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关于伊特鲁里亚崛起的解释强调的不是整个民族的迁徙，而是物品、审美标准和宗教崇拜自东向西的引入。民族可能并未迁移；但是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看，个体可以完成迁移，例如科林斯的德玛拉图斯——他是罗马王塔克文一世（亡于约公元前 579 年）的父亲，以及前 7 世纪希腊制陶工阿里斯托诺索斯（Aristonothos）——他工作于伊特鲁里亚的卡埃里。¹⁰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带来的不仅是陶器和奢侈品，还有社会行为的新模式。宴会（包括宴会中斜躺于卧榻上的习俗）及葬礼可能都模仿了叙利亚的习俗。性行为则融合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本土的习俗：单词 *katmite* 是典型的希腊词语 *Ganymede*（侍童）在伊特鲁里亚文中的缩写形式，该词后又被转化为拉丁语的 *catamitus*（娈童），这个词还带有对伊特鲁里亚人喜欢鸡奸行为的指责；但是一些研究者同时也感到困惑，因为女性在宴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其他地方，宴会则是男人的特权。¹¹

2

从很早起，伊特鲁里亚人也被指控为海盗。一首荷马式诗歌使伊特鲁里亚人与海盗的关系变得明朗化。这首诗讲述了一

个故事，即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以一位英俊青年的形象出现，披着一件漂亮的紫色披风，长发随风舞动，站在海边岬角上。但是：

很快，一艘精心装饰的船只
 飞也似的向酒红色的大海驶来，
 船上的人是海盗，他们是提色尼安人。邪恶的命运引
 导着他们，
 他们看到了他，对他点了一下头，迅速跳下来，
 将他俘获，带到他们的船上，心中甚为喜悦。¹²

但是绑索从他身上自然脱落。舵手意识到他是神而不是人，因此说：“不要碰他，万一他生气了，会招来狂风暴雨。”但是船长回答道：“我认为他要去埃及或塞浦路斯或北方净土（Hyperborean）或更远的地区。最终，他会告诉我们谁是他的朋友及他们有什么财富。”作为回应，狄奥尼索斯用葡萄藤将该船缠绕起来，把酒倾倒在船舱内，然后召出一只熊。受惊的水手们纷纷跳入大海，变成了海豚。酒神饶恕了那名舵手，最后现形为“呐喊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与海盗的故事是很多花瓶绘画者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技艺最为高超的雅典画师埃克斯基阿斯（Exekias）便是其中之一。出自他之手的一个浅杯上描绘了狄奥尼索斯斜躺在一艘船上，船的桅杆已经为一条巨大的葡萄藤所攀附，该葡萄藤一直向上攀爬，超出了宽大的帆，七只海豚绕着该船跳跃。该绘画以黑色构图，底色为红色，制作时间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530 年。¹³这个杯子上有画师的印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出土于伊特鲁里亚最大城市

之一乌尔奇（Vulci）的墓地之中。乌尔奇的居民极其喜欢精美的希腊陶罐。尽管伊特鲁里亚人事实上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反派角色，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埃克斯基阿斯杯子的喜爱。

在致狄奥尼索斯的颂诗中，他似乎站在了东地中海的某处海岬上，因为海盗们认为他可能要去黎凡特或黑海以北的“北方净土”。提色尼安人出现在希腊水域的说法也被利姆诺斯岛上的考古发现证实。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强调在爱琴海诸岛及沿岸有由这些民族组成的居住区。¹⁴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提道，提色尼安人和佩拉斯吉人生活在爱琴海北部沿岸，在阿索斯山（Mount Athos）周围及利姆诺斯岛上（该岛在阿索斯山的视域范围内），但在公元前511年雅典人的一次入侵中，他们被驱逐了。¹⁵此故事还有一个关于早期地中海贸易和航海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修订版本，其中讲到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已经有了他们的早期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多少与伊特鲁里亚人有关。（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极为别出心裁的观点，狄奥尼索斯与海豚的故事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伊特鲁里亚人尽力控制地中海上的酒业贸易的方式。）¹⁶所有的伊特鲁里亚人在希腊语中都被称为提色尼安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提色尼安人都是伊特鲁里亚人。很明显，提色尼安人主要用于指代野蛮的海盗。¹⁷

上述评论很容易被认为是古代历史学家对神秘的希腊民族之幻想的又一个例子。但是神话与现实是有关联的。一块发现于利姆诺斯岛卡米尼亚（Kaminia）的墓碑上刻有一位武士小像，据说于公元前515年前后立起，该武士手持盾牌与长矛，旁边用希腊字母刻着一段铭文。但它并不是希腊语，因为还发

现了一些写有同样语言的铭文残片，上面显然是利姆诺斯岛上的居民使用的一种语言，而当时岛上居住的仍然是修昔底德笔下的“提色尼安人”。这种语言与远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铭文所用的语言相似，但并非相同。¹⁸ 卡米尼亚石碑纪念的是弗凯亚的赫莱斯（Helaies the Phokaian），他位高权重，死时年仅四十岁（有人认为是六十岁）。赫莱斯似乎在爱奥尼亚海沿岸的弗凯亚和爱琴海周边地区当雇佣军。¹⁹ 但是爱琴海的提色尼安人除了语言和喜欢做海盗外，在其他方面都不像伊特鲁里亚人。在艺术和工艺方面，利姆诺斯并未模仿伊特鲁里亚。除了古典时期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及铭文外，并无其他迹象表明该地居民和伊特鲁里亚人有任何联系。这里没有发现伊特鲁里亚的陶罐碎片，也没有发现可说明此处与伊特鲁里亚讲相似语言的居民建立了直接联系的迹象。²⁰ 米里纳（Myrina）城外的一个前7世纪的神殿（多少有些奇怪的是现在它被并入一家酒店）由像迷宫一样的许多走廊和房间组成，但它和希腊或意大利没有明显关联。因此，爱琴海地区的提色尼安人是由一些与伊特鲁里亚人讲类似语言的族群组成，可能他们也喜欢做海盗，但是他们可能保留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文化；而意大利的提色尼安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则将伊特鲁里亚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文明之地。

107

希腊人可能致力于区分其所遇到的每一个民族，在他们之间严格划界区别；但现实是，像利姆诺斯岛和阿索斯山这样的地方是新旧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有时，古代习俗甚至语言还会在这些地方遗存。地中海的海岸和岛屿并没有形成统一体。不同族群于地中海诸岛和海岸分散居住已有几千年之久。希腊作家对地中海诸民族的刻板划分扭曲了事实真相。

3

从保守的利姆诺斯进入伊特鲁里亚南部的塔尔奎尼亚，就会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经历巨大改变，且这些变化来自穿越地中海到达这里的强大推动力。这种大改变早在公元前 10 世纪就已经开始；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从意大利西部沿岸——这些最接近地中海的地区是最先与东地中海文化建立密切联系的——传入内陆。首先，一些村社共同体在山顶上圈地建房，这里后来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即罗马人熟知的塔尔奎尼亚（在古罗马语中写作 *Tarquinius*）。²¹ 该名称是复数形式，伊特鲁里亚其他一些城市名也是复数形式（*Veii*——维爱；*Volsinii*——沃尔西尼；*Vulci*——乌尔齐；*Volaterrae*——弗拉特拉），这可能告诉大家它们都是由若干村落聚合而成的。最早在 108 这些村落中的前城市文化（pre-urban culture）被命名为“维兰诺瓦”（Villanovan），从发音来看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名称：维兰诺瓦是波伦亚（Bologna）的一个郊区，它是第一个被考古学家认定的具有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火葬墓地。维拉诺瓦文化也在同一时期于伊特鲁里亚南部沿海地区出现，而后逐渐向北扩散至现在的托斯卡纳，且穿过了波伦亚的亚平宁山脉。然而，最先发生向城市文明的跨越的，却是伊特鲁里亚的海滨城市：这些城市富裕且组织完善，有文化精英，有漂亮的神殿，也有技艺精湛的匠师。伊特鲁里亚文明从沿海城市逐渐向内陆传播；而且一些晚期的中心，如佩鲁贾（Perugia），最初是作为内陆的居民区出现的，后来它们也被伊特鲁里亚化。²² 从这个意义上讲，伊特鲁里亚“民族”的确因为迁徙而出现，

但它是意大利内部的迁徙，是从地中海岸向亚平宁山脉或者跨越亚平宁山脉的迁徙，而且它更多是风尚的转移而非人口的流动。

维兰诺瓦工艺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当属其具有顶饰的青铜头盔，该头盔的制作方式让我们回想起了同时期的中欧青铜器；这些头盔很清楚地证实了武士阶层在已经形成等级制度的维兰诺瓦村社中的地位。²³一些出身高贵的人不再行火葬而改为葬于狭长的墓坑中，造成这种改变的不是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而是海外联系的建立。最终，这些坑墓就变成了规模更大的塔尔奎尼亚和切尔韦泰利（Cerveteri）的丘冢和绘画墓葬。有一处可以被认定为早期贵族武士之墓的墓葬，但由于没有给他歌功颂德的铭文，我们不能确定墓主的名字，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维兰诺瓦文化中出现了书面文字。1869年，有消息称在塔尔奎尼亚城外的墓地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棺，此处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墓葬被称为“武士之墓”。²⁴从其随葬品可以看出，东地中海的商品已经到达此地，后来这些商品成了一位塔尔奎尼亚贵族价值不菲的所有物。墓中发现了十四个希腊风格的花瓶，其中有几个是迁居至意大利的希腊陶工制成的，但保留了产自克里特岛、罗得岛及塞浦路斯岛的物件的样式。²⁵而此地与东地中海有更广泛联系的说法进一步被发现于墓中的圣甲虫指环证实。该指环由银和铜铸成，在其下方雕刻着一只腓尼基风格的狮子。²⁶

这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借助大海实现的。有大量维兰诺瓦时期的陶制船模留存下来，船头采用鸟头的造型；据推测，这些陶器是维兰诺瓦海盗和商人的陪葬品，因为要将一整只大船同死者的尸体或骨灰一起埋葬是不太可能的。²⁷在公元前7

世纪早期，陶工阿里斯托诺索斯在卡埃里居住并工作，他在一个陶制醒酒器上描绘的海战场面栩栩如生，这场海战可能发生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间，一方站在一艘较低的桨船上，另一方则站在较沉重的商船上。²⁸可以推测，维兰诺瓦人的物品中既有自制的，也有进口的，因为该文化在青铜武器的设计方面与爱琴海世界遥相呼应，在陶器风格上更是如此：传统的维兰诺瓦陶瓶其实是一些融合了希腊元素的装饰性储物罐，这种陶罐会使我们想起前9世纪的希腊几何风格陶罐。维兰诺瓦人开始用一些精细的颗粒状花纹装饰首饰，后来这成为伊特鲁里亚金匠们的特有手法，这种方法学自（且后来超越了）黎凡特。²⁹一些青铜器甚至已经可以与乌拉尔图（Urartu，位于现在的亚美尼亚）的精美浇铸物相媲美。³⁰基底金属贸易是伊特鲁里亚繁荣的根本。多亏当地盛产铜、铁及其他金属，伊特鲁里亚人才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从希腊和黎凡特进口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产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成品可供出口 [但他们已经为表层光滑的黑陶（*bucchero*）找到了销售市场，也就是希腊、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厄尔巴岛及其对面的波普罗尼亚（Populonia，伊特鲁里亚唯一真正位于海上的主要城市）周围的海岸富藏铁矿；再深入内陆一些的维图罗尼亚（Vetulon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周边是铜矿富藏地。³¹至前7世纪，一个繁荣的新定居点出现在了位于阿尔诺河河口附近的比萨，此地是多条通商道路的交汇处。³²经由比萨，伊特鲁里亚人与撒丁岛的居民交换金属；撒丁岛的陶工甚至定居在了维图罗尼亚。³³他们可能是作为奴隶到达此地的，因为当第勒尼安海发展出商业之时，猎奴和贩奴成为进一步在海上获取利润的手段。盐是另外一种资产，维爱城的居民与其近邻罗马城的居民

在台伯河口竞相争夺对盐供给的控制权。酒也是伊特鲁里亚商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物品，他们将其运出第勒尼安海，再运往法兰西南部。³⁴

当希腊人在伊斯基亚附近站稳脚跟后，他们对这些自然财富的开发变得更有热情。然而能够证明意大利中部与希腊世界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最早证据，出现在希腊人到达该地几十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8 世纪。维兰诺瓦的胸针和别针出现在了希腊人的遗址中，另外还有许多由维兰诺瓦青铜工匠制作的盾牌和头盔的残片。³⁵将它们运载至此地的很可能是希腊作家提到的提色尼安人的船只。在此地与爱奥尼亚和科林斯建立联系后，早期的伊特鲁里亚人就开始制作具有他们自己的风格的原始科林斯式陶罐。塔尔奎尼亚最具实力的居民及其邻居希望获得来自东地中海的精美物品，以彰显他们的权势与地位，这些物品包括：由腓尼基商人带来的鸵鸟蛋，刻有狮身人面像、黑豹、荷花及其他“东方”特色图案的象牙和金板，带有埃及主题图饰的彩陶和玻璃制品（尽管大多都是在腓尼基生产的仿制品）。³⁶

从东方引入的一种文字将改变意大利的面貌。字母文字从希腊来到伊特鲁里亚，但还不确定其是源于希腊本土还是来自第一批定居于伊斯基亚和库玛的居民。在形式上，伊特鲁里亚字母是来自埃维厄的希腊字母。该字母沿贸易路线来到这里，且很早以前就来到了。在伊特鲁里亚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是一块公元前 7 世纪的书写板，它于 1915 年出土于阿尔贝尼亚的马尔西利亚那城（Marsiliana d'Albegna）。它的边框刻有字母表，按照传统的字母顺序排列，其形式似乎非常古老。³⁷该书写板出土时旁边还有一支铁笔，且在书写板上还有

蜡的痕迹，因此该书写板的用途很明显是学习文字。³⁸在模仿希腊字母的基础上，伊特鲁里亚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标准字母，一般情况下，这种文字的书写是由右向左的（与腓尼基及早期希腊字母文字一样）。伊特鲁里亚的字母文字之后又被很多邻近族群借鉴，他们中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

早期的铭文揭示了许多与通过海洋建立的联系有关的事实。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商人们记录了他们的交易，一个例子便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佩克玛赫（Pech Maho）发现的属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一块铅板。这块铅板的一面用伊特鲁里亚语书写，提到了玛塔利艾（*Mataliai*，即马赛）；后来该铅板被重复使用，
111 上面用希腊语记录了向恩波利翁（Emporion，希腊人建于加泰罗尼亚海岸的一个基地）的居民购买船只的细节。³⁹人们在位于罗马北部海岸的卡埃里的港口皮尔吉（Pyrgoi）发现了三块金箔板。这些金箔板反映腓尼基人（可能性最大的是迦太基人）出现在了伊特鲁里亚的海滨城市。其中两块金箔板上的文字是伊特鲁里亚文，另一块写有腓尼基文。它们记录了约前500年吉斯拉（Cisra，或卡埃里）的国王塞法利·维历阿纳斯（*Thefarie Velianas*）的献词，该国王向伊特鲁里亚的女神乌尼（*Uni*）献出了一座神庙。通常而言，该女神等同于希腊的赫拉（*Hera*）、罗马的朱诺（*Juno*）；但是在这里，她等同于腓尼基的阿施塔特女神。⁴⁰这里也有来自希腊的到访者：塔尔奎尼亚附近发现了一段约前570年的铭文，它被刻在一块新月形的石头上，这块石头象征着一只锚。这段铭文读作：“我属于艾伊娜的阿波罗（*Aiginetan Apollo*），索斯特拉托斯（*Sostratos*）生育了我”。这段文字属于靠近雅典的艾伊娜岛（*Aigina*）上的希腊语方言，可以确定，这里所说的索斯特拉托斯就是希罗

多德记载的那个带领希腊商人前往塔特索斯经商的人。⁴¹伊特鲁里亚人并没有为外来的商人和迁居者设置什么障碍，也没有排斥他们的神祇；事实上，伊特鲁里亚人欢迎他们，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⁴²

4

在“东方的”艺术风格对古代维兰诺瓦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公元前7世纪中期，伊特鲁里亚的文化、政治甚至环境都发生了改变。由于希腊与黎凡特的联系通过爱奥尼亚和腓尼基商人得到了强化，希腊文化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过程。实际上，这些爱奥尼亚人是穿越海洋从东方到达伊特鲁里亚的一种影响力之源，所以明确分辨影响源自希腊还是东方的其他地区是很难的：一些有翼生物的石雕被用来保护死者的坟墓，这种坟墓非常奢华，不再是简单的墓冢，而通常是仿照死者生前的房子建立的墓室。在塔尔奎尼亚，最早一批纪念性陵墓建于地面之上，它们是宽大的圆形构造，上面还覆有尖顶；其入口上方的石灰板上刻画着诸神及另外一个世界的精灵。同时，这些陵墓建筑也展现了那些新兴贵族精英之财大气粗，他们竟然为死者修建了如此引人注目的宫殿。这种设计似乎与东地中海地区，如吕底亚、吕西亚及塞浦路斯等地的墓葬非常相似。自前6世纪中期起，为精英家族修建绘有壁画的坟墓已成为塔尔奎尼亚的一个特色。但更早的一些例子则来自其邻近城邦；而且，2010年8月，考古学者挖掘出了一处前7世纪中期的部分用绘画装饰的前厅，它可能是王室陵墓的一部分。该发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处陵墓与位于塞浦路斯东部的萨拉米斯（Salamis）同时期的希腊坟墓最为相似。⁴³最早的坟墓深受希腊

爱奥尼亚艺术的影响，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建造这些坟墓的艺术家是否本身就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很明显，外来匠人和本地匠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卡埃里墓葬中的前6世纪绘画（现藏于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有强势的构图、规范的布局、细致的空间组织，它们不仅在风格上属于爱奥尼亚，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其中的人物场景也来自希腊神话：帕里斯的裁判和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塔尔奎尼亚的绘画墓葬中经常会饰有一些家庭宴会的场景，同时也有一些希腊神话中的故事：阿喀琉斯（Achilles）出现在公牛墓（Tomb of the Bulls）中，且神秘的巴龙墓（Tomb of the Baron）中绘有的游行场景完全属于希腊风格。一个檐壁上绘有年轻人牵着马的情形，以及一个留有胡须的男子领着一个年轻同伴与一位情妇或女神会面的情形。这些壁画在灰色底漆涂层上用红、绿、黑三种颜色简单着色，每一个人物形象看上去都深受爱奥尼亚文化的影响——这些人都戴有爱奥尼亚的一种尖顶帽（*tutulus*），且他们皆体态丰满健壮。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参观了该墓，像大多数参观者一样，他也被其独特且栩栩如生的壁画吸引：狩猎和捕鱼的场景、鸟儿飞翔的场景、一个裸体男人跳入海中的场景、一个捕鱼者拖动网绳的场景。至少，这些画面所反映的更多是伊特鲁里亚的艺术风格，而不是希腊的艺术风格。但是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即现在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发现的一处绘画墓葬中，也有一个跳水的场景，这表明这些图像是希腊绘画者经常使用的题材。

在其他艺术类别与它们所揭示的思想世界中，也有相似的情形。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开始模仿科林斯和雅典具有黑色图像

的陶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后来，在陶罐的红底上绘涂黑色图画的方法被一种更为复杂的红纹技术取代：陶罐表面的大部分区域被涂成黑色，而未被涂黑的红底则构成了陶器上的图画。伊特鲁里亚人在从雅典购买大量新陶器的同时，也制作一些仿制品。⁴⁴但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器物外观极其保守，他们更喜欢“古老”或“仿古”的风格；而在当时的雅典，雕塑和绘画都采用了一种具有生命力与“和谐”感的古典风格。⁴⁵伊特鲁里亚人从希腊人那里购买的陶器并非都是最优质的。在位于波河河口的伊特鲁里亚人聚落斯皮纳发掘的陶器几乎都产自希腊，尤其是希腊的雅典；但是它们有时质量非常差，一个雅典艺术家甚至被称为“最糟糕的绘画者”。⁴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绘在陶器上的图案讲述的完全是希腊神话故事。意大利诸民族开始借用希腊世界的神话和宗教理念；古老的森林和水源崇拜依旧保有活力，但是意大利诸民族之无形的抽象神明现在与奥林匹亚诸神一般具有了形状、形体与自己的情绪。维爱城内有一间很大的神庙，约公元前 500 年，其屋顶梁开始被装饰上真人大小的阿波罗、赫尔墨斯和其他诸神的陶制雕像。这些雕像由伊特鲁里亚的著名雕塑家乌尔卡（Vulca）创作完成。它们的流畅风格并不是对希腊风格的完全照搬，且以如此具有戏具性的方式装饰屋顶梁很明显是一种伊特鲁里亚人而不是希腊人的实践。但是乌尔卡描绘的是希腊神话而非伊特鲁里亚神话。这些作品是意大利、希腊、东方风格的结合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伊特鲁里亚艺术。这种融合也体现在占卜术中：在这里，近东的做法与意大利本土民族的做法再一次融合在一起。没有人能比一位伊特鲁里亚的占卜师（*haruspex*）更熟练地释读被献祭的动物肝脏上的斑点；

在 410 年哥特人袭击罗马城时，人们仍然会咨询伊特鲁里亚脏卜师的意见。

5

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体现为政治关系，且这种关系并不像文化、宗教和贸易关系那样容易维持。至少自公元前 8 世纪起，意大利中部诸民族与希腊人就多次发生海战。我们已经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发现了一些证据，即希腊人战胜后从维兰诺瓦人手中缴获的头盔，这些战利品被希腊人献给了诸神。⁴⁷在法国南部，来自希腊爱奥尼亚海海域的弗凯亚人曾经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就是后来的马赛）。
114 在靠近该殖民地的海域，伊特鲁里亚海军与弗凯亚海军时而竞争，时而合作。⁴⁸希罗多德向我们讲述了前 540 年弗凯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科西嘉阿拉里亚城的附近海域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海战。六十艘弗凯亚船对阵六十艘迦太基船和另外六十艘来自卡埃里的船。尽管双方在船只数量上相差悬殊，但是弗凯亚人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其船只也受到重创，他们不得不撤出了科西嘉。希罗多德讲述了卡埃里人用石刑屠杀弗凯亚战俘的经过。后来，卡埃里人发现那些经过屠杀地的人会突然变癩，而且这种怪事不仅发生在人的身上，也发生在他们的牲畜身上。他们感到又惊又疑，于是派使者前往德尔斐神庙向阿波罗的女祭司求乞神谕，最后他们被要求举办定期赛事以纪念死去的弗凯亚人。这种赛事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还在举办，而且类似的丧葬活动被画在了伊特鲁里亚陵墓的墙壁上。⁴⁹卡埃里人与德尔斐神庙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德尔斐所立财库的地基已被发现，实际上他们是第一批被允许进

人希腊主要崇拜地的“外邦人”。⁵⁰同时，伊特鲁里亚人可以随意开发科西嘉岛上的铁、蜡和蜜。然而，比这些资源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人的船只在第勒尼安海北部没有劲敌。⁵¹

第勒尼安海南部则是另一种情形。库玛的希腊人对于近在眼前的伊特鲁里亚势力（既存在于陆上，又存在于海上）十分在意：伊特鲁里亚人在内陆深处还建立了两座城市 [卡普亚 (Capua) 与诺拉]，且他们至少控制了一座沿海城镇 (庞贝)。⁵²为战胜伊特鲁里亚人，库玛不得不依赖于西西里岛的希腊殖民者的帮助。公元前 474 年，叙拉古僭主希伦 (Hieron) 取得的一场胜利改变了西地中海的政治和商贸局势。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当薛西斯 (Xerxes) 的大军被希腊人的力量击退时，他就在击败外族蛮人的战争中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希伦的此次胜利之前，叙拉古人在西西里岛的西莫拉 (Himera) 之役中也获得了胜利：六年之前，叙拉古海军在前任僭主盖伦 (Gelon) 的率领下，战胜了西地中海的另一劲敌迦太基人。据说，盖伦获胜的时间与希腊人取得对波斯人的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是在同一天。⁵³不久之后，希腊诗人品达以伊特鲁里亚人在库玛的失败为主题，赞扬了“战车竞赛的胜利者、埃特纳的希伦”：

115

噢，伟大的克洛诺斯 (Kronos) 之子，
我向您祈求，
让腓尼基人和第勒尼安人的战争咆哮在家中平息；
人们已经看到，在库玛面前，
他们光荣的船队遭受了何种灾难，

而当叙拉古之主驱舰将他们驱逐，
使他们从其快艇落入大海之时，
赫拉斯人的小船则从受奴役的压力中解放出来。⁵⁴

希伦向奥林匹亚捐献了一顶伊特鲁里亚式壶盔，上面刻有：“希伦，宙斯之子，叙拉古人之子，狄诺美涅斯（Deinomenes）之子，库玛的提色尼安人。”该头盔现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然而，品达将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腓尼基人……的战争咆哮”）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导致了年代错乱。由于某种原因，迦太基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联系在库玛之战爆发前二十年就已经减弱。考古证据证明，在前550年到前500年的这段时间，伊特鲁里亚向迦太基的物品输出一度中断。⁵⁵作为迦太基的希腊盟友，雷焦的阿纳克西拉斯（Anaxilas of Rhegion）为防止伊特鲁里亚人对雷焦发动袭击，专门在墨西拿海峡建立了一个堡垒。因攻击行动失败，伊特鲁里亚人的船只向南航行，准备进军利帕里群岛，当时这些岛屿依旧保持着其自史前时期就具有的功能，即充当东西地中海贸易交换活动的中间点。⁵⁶而后，在前5世纪早期，伊特鲁里亚人在西地中海被逐渐孤立。

尽管公元前5世纪末，伊特鲁里亚的船只似乎再一次采取了行动，但叙拉古人已经在整个第勒尼安海占据优势。前453年至前452年，伊特鲁里亚人袭击了卡埃里沿岸，暂时把自己安置于富含铁矿的厄尔巴岛，并在那里捕获了很多奴隶；最后，这些提色尼安海盗拥有了他们自己的钱币。⁵⁷伊特鲁里亚人对叙拉古人的憎恨一直持续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之后的章节我们将会讨论这一战争。当雅典人对叙拉古发动袭击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伊特鲁里亚人与叙拉古人间的敌意。⁵⁸

前 413 年，伊特鲁里亚人派出三艘大船前往叙拉古支援雅典船队。修昔底德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一些第勒尼安人出于对叙拉古人的憎恨，才参与了对叙拉古的战斗。”⁵⁹伊特鲁里亚人人不多，但他们至少在一场战斗中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几个世纪以后，斯普里纳家族（Spurinna，塔尔奎尼亚的一个贵族家族）为歌颂祖先（其中一位是前 413 年参加这场战争的西西里海军将领）的功勋，非常自豪地立起了一块刻有拉丁文的石碑。⁶⁰

116

6

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城市锡巴里斯（Sybaris）维持，该城市的居民以喜爱奢侈品闻名。公元前 510 年，锡巴里斯因其他地区的嫉妒而被摧毁，直到当时它仍是规模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之一，来自科林斯、爱奥尼亚及雅典的商品经由此地被运往波塞冬尼亚，并在此地被装上伊特鲁里亚的船只。⁶¹锡巴里斯因与伊特鲁里亚交好而特别出名（或可说臭名昭著）；据 2 世纪生活于瑙克拉提斯的阿特纳奥斯（Athenaios）的记载，锡巴里斯与伊特鲁里亚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向两个方向延伸——北部向伊特鲁里亚，东部向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

锡巴里斯人穿着米利都的羊毛披风，这一点足可说明这两个城邦间的友好关系。锡巴里斯人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喜爱超过了其对意大利所有其他民族的喜爱；而且，在来自东方的这些人中，他们更喜欢爱奥尼亚人，因为爱奥尼亚人和他们一样，也喜爱奢侈品。⁶²

迁居西方的希腊人主要起媒介作用，伊特鲁里亚人喜爱的物品并非由他们生产，而是由其爱琴海地区的同胞生产。

当旧有的沟通渠道因战争和商业纠纷而无法使用时，雅典人为了维持其竞争优势，开通了新的交流渠道。库玛之战标志着伊特鲁里亚人丢掉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权。第勒尼安海不再是他们的内海，而是迦太基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以及新的竞争者，如罗马人、沃尔西人（Volscians，意大利中部的山地民族，拥有超群的技艺，且可独立发动海上袭击）等共有的海域。对于海上优势地位的丧失，伊特鲁里亚人做出的回应是牢牢控制内陆城镇，包括佩鲁贾（它先前是翁布里亚人的一个中心，与拉丁民族有联系）、波伦亚（之前由维兰诺瓦人居住，其文化与较早的伊特鲁里亚文化相似），以及曼图亚（Mantua）等位于波河河谷的城市。⁶³这意味着新的路线将被开辟，它会把来自东地中海的货物经亚得里亚海沿岸各港口运抵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在今天意大利马尔凯（the Marches）的所在地，一个非凡文化的全盛时期已经来临，该地被称为皮塞尼斯人（Picenes）的族群通过海洋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在陆上则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⁶⁴但前500年以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居民成为维系该地与希腊的交往的主要媒介。即使相关路线包含一段花费较高的穿越亚平宁山脉的陆上行程，但对于航海者来说这仍然十分便捷：船可以从科林斯湾出发，经爱奥尼亚诸岛前往希腊殖民地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埃比达姆诺斯，然后再经皮塞尼斯到达阿德里亚（Adria）和斯皮纳。阿德里亚与斯皮纳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泥沼地和浅滩上建立的新港口，它们十分靠近后来的费拉拉（Ferrara）和拉文纳（Ravenna）。正如

在文艺复兴时期费拉拉的埃斯泰公爵们投入了很大精力驯养良驹一样，在古风和古典时期，费拉拉的马匹驯养也吸引了大批希腊人前来。⁶⁵

我们可以说斯皮纳是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一个定居点，但大量希腊人移民到了此地；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希腊人建立的定居点，但经历了大量伊特鲁里亚人的移民。其人口由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来自希腊东北部的威尼提人（Veneti）和其他很多民族构成。它可能已经成为内陆城市菲尔希纳（Felsina，即伊特鲁里亚人的波伦亚）的出海口：一个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石柱上刻了一艘战船，该战船属于菲尔希纳的凯科纳（Kaikna）家族中的一员，很难想象除了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如斯皮纳）外这些船还能被停放在哪里。斯皮纳和阿德里亚向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供应了大量意大利和凯尔特（Celtic）奴隶；只有当波河河谷的伊特鲁里亚殖民者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凯尔特入侵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奴隶的数量才能增加。斯皮纳城被设计成棋盘状，这是伊特鲁里亚人十分喜欢的格局，但是其通向海洋的水道则混合了伊特鲁里亚、希腊、威尼斯的特征。在斯皮纳的墓地中已发现四千多座墓冢。大量的希腊陶瓶也被发掘，其中有很多属于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早期；之后，这里与雅典的联系中断，斯皮纳的居民不得不使用伊特鲁里亚窑炉中出产的质地较差的陶罐。⁶⁶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耕地非常肥沃，但冲积平原有一个缺点——它不太固定。前4世纪，耕地范围不断扩展，与此同时这座城市距离大海也越来越远。同一时期，凯尔特人入侵意大利，其行动在前390年的一次对罗马的侵袭中达到高潮，很多入侵者定居于此，对该地区造成了很大影响。⁶⁷因此，斯皮纳的全盛期相对较短，却十分

辉煌。它的崛起是一个更广泛的发展进程，即整个亚得里亚海成为一个大市场之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市场中希腊的货物随处可见。

因此，伊特鲁里亚城邦的出现并非第勒尼安海的独有现象，亚得里亚海也在向迁徙者和外来商品开放。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及腓尼基人一起重塑了地中海，这有助于建立跨越整片海域的相互联系。

注 释

1. J. Boardman, *Pre-classical: from Crete to Archaic Greece* (Harmondsworth, 1967), p. 169.
2. D. Briquel, *Origine lydienne des Étrusques: histoire de la doctrine dans l'antiquité* (Rome, 1991).
3. Herodotos 1:94.
4. Tacitus, *Annals* 4:55; R. Drews, 'Herodotos I. 94, the drought ca. 1200 BC, and the origin of the Etruscans', *Historia*, vol. 41 (1992), p. 17.
5. D. Briquel, *Tyrrhènes, peuple des tours: Denys d'Halicarnasse et l'autochtonie des Étrusques* (Rome, 1993).
6.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1:30.
7. M. Pallottino, *The Etruscans* (2nd edn, London, 1975), pp. 78–81; but the point about Tarhun is mine.
8. Beginning with *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on Medical Biology and Etruscan Origins*, ed. G. E. W. Wolstenholme and C. M. O'Connor (London, 1958).
9. G. Barbujani et al., 'The Etruscans: a population-genetic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 74 (2004), pp. 694–704; A. Piazza, A. Torroni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variation of modern Tuscans supports the Near Eastern origin of Etrusca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 80 (2007), pp. 759–68.
10. C. Dougherty, 'The Aristonothos krater: competing stories of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in C. Dougherty and L. Kurke (eds.), *The Cultures within Ancient Greek Culture: Contact, Conflict, Collaboration* (Cambridge, 2003), pp. 35–56.
11. C. Riva, *The Urbanisation of Etruria: Funerary Practices and Social Change, 700–600 BC* (Cambridge, 2010), pp. 142–6; R.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Greeks and Their Myths in the Epic Age of Homer* (London, 2008), pp. 1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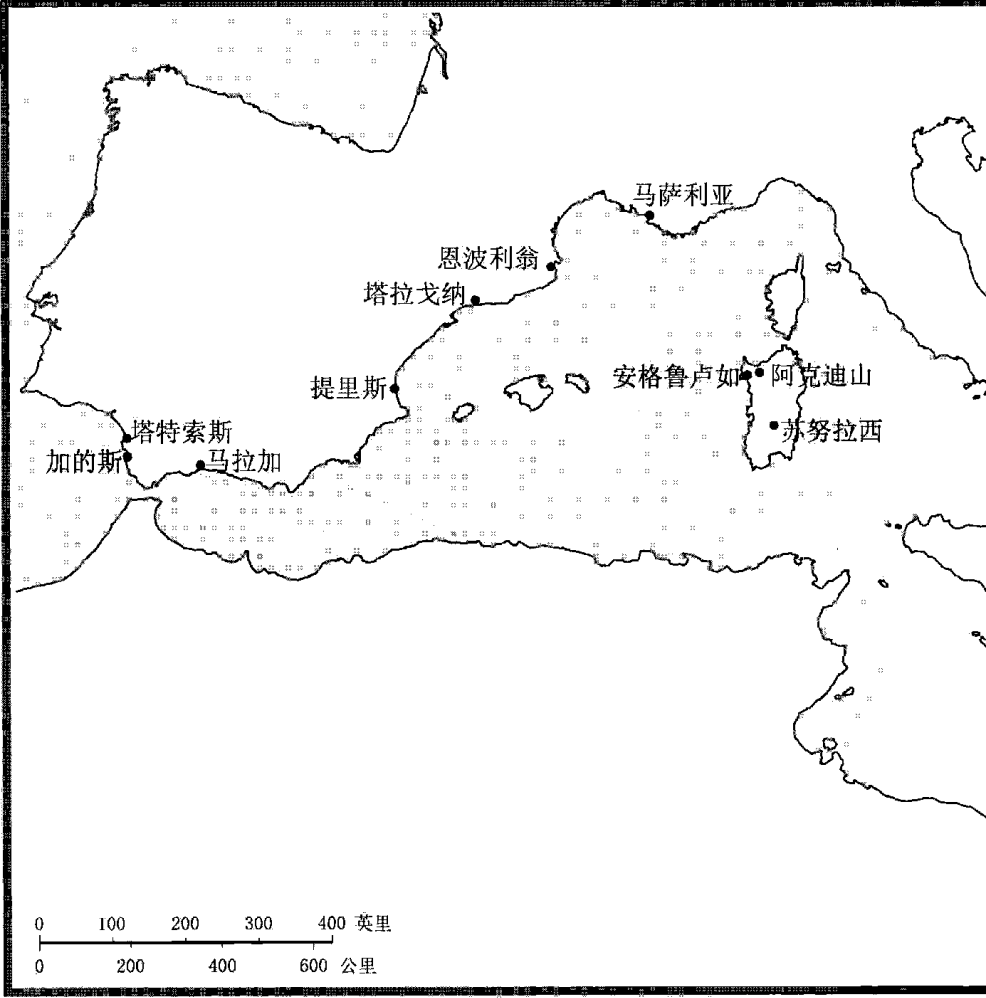
12. Homeric Hymn no. 8, to Dionysos; see also M. Iuffrida Gentile, *La pirateria tirrenica: momenti e fortuna*, Supplementi a *Kókalos*, no. 6 (Rome and Palermo, 1983), pp. 33–47.
13. M. Cristofani, *Gli Etruschi del mare* (Milan, 1983), pp. 57–8 and plate 37 – cf. plate 68 (late 4th c.); G. Pettena, *Gli Etruschi e il mare* (Turin, 2002); Iuffrida Gentile, *Pirateria tirrenica*, p. 37.
14. M. Torelli, 'The battle for the sea-routes, 1000–300 BC', in D. Abulafia (ed.), *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 101–3.
15. Herodotos 1:57; also 4:145, 5:26; Thucydides 4:14.
16. M.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archaïques* (Rome, 1985), pp. 648–9; cf. Iuffrida Gentile, *Pirateria tirrenica*, p. 47.
17.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1:30; 他们自称拉斯纳人。
18.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 629; 利姆诺斯语中的 *aviz* 相当于伊特鲁里亚语中的“年”。
19. *Ibid.*, generally, and pp. 628, 637, 650; *Il commercio etrusco arcaico* (Quaderni del Centro di Studio per l'Archeologia etrusco-italica, vol. 9, Rome, 1985); G. M. della Fina (ed.), *Gli Etruschi e il Mediterraneo: commercio e politica*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per il Museo Claudio Faina, vol. 13, Orvieto and Rome, 2006); cf.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p. 56–60.
20.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 615.
21. Riva, *Urbanisation of Etruria*, p. 67; H.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London, 1968), pp. 78–84.
22. Pallottino, *Etruscans*, pp. 91–4.
23.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 99 and plates 54, 90–93.
24. R. Leighton, *Tarquinia: an Etruscan City* (London, 2004), pp. 56–7;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 66–73.
25.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lates 139–41.
26. *Ibid.*, p. 72, fig. 31c, and p. 119.
27. Dougherty, 'Aristonothos krater', pp. 36–7;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 116, 230, and plates 76–7.
28.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p. 28–9 and plate 15.
29.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 122, and plate 138.
30. *Ibid.*, p. 123.
31. G. Camporeale et al., *The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Los Angeles, CA, 2004), p. 29.
32. S. Bruni, *Pisa Etrusca: anatomia di una città scomparsa* (Milan, 1998), pp. 86–113.
33. Camporeale et al.,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 37; also Riva, *Urbanisation of Etruria*, p. 51 (Bronze Age contact).
34.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254–390.
35.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30.
36. Hencken, *Tarquinia and Etruscan Origins*, pp. 137–41.
37. E.g. Pallottino, *Etruscans*, plate 11.
38. D. Diringier, 'La tavoletta di Marsiliana d'Albegna', *Studi in onore di Luisa Banti* (Rome, 1965), pp. 139–42; Lane Fox, *Travelling Heroes*, p. 159.

39. A. Mullen, 'Gallia Trilinguis: the multiple voices of south-eastern Gaul'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8), p. 90; H. Rodríguez Somolinos, 'The commercial transaction of the Pech Maho lead: a new interpretation',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vol. 111 (1996), pp. 74–6; Camporeale et al.,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 89.
40. E. Acquaro, 'Phoenicians and Etruscans', in S. Moscati (ed.), *The Phoenicians* (New York, 1999), p. 613; Pallottino, *Etruscans*, p. 221.
41. Pallottino, *Etruscans*, p. 112 and plate 11 (original in Museo Nazionale Etrusco, Tarquinia); Herodotos 4:152.
42.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523–5.
43. Announced in *Corriere della Sera*, 5 August 2010; *La Stampa*, 6 August 2010.
44. J. D. Beazley, *Etruscan Vase-Painting* (Oxford, 1947), p. 1.
45. *Ibid.*, p. 3.
46. So named by J. D. Beazley, *Attic Red-figure Vase-Painters* (2nd edn, Oxford, 1964).
47.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30 and plate 13.
48.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393–475; Torelli, 'Battle for the sea-routes', p. 117.
49. Herodotos 1:165–7.
50.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83 and plates 54, 58; cf. O. W. von Vacano, *The Etruscans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60), p. 121.
51. L. Donati, 'The Etruscans and Corsica', in Camporeale et al., *Etruscans outside Etruria*, pp. 274–9.
52.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p. 70, 84.
53. A. G. Woodhead, *The Greeks in the West* (London, 1962), p. 78.
54. Pindar, *Pythian Odes*, 1:72–4, trans. M. Bowra.
55. C. and G. Picard,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thage* (London, 1968), p. 81.
56.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514–22.
57. Diodoros the Sicilian 11:88.4–5;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p. 114–15.
58. Thucydides 6:88.6.
59. Thucydides 7:57.11.
60. Leighton, *Tarquinia*, p. 133 and fig. 56, p. 140;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521, 686;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115.
61. Cf. T. J. Dunbabin, *The Western Greeks: the History of Sicily and South Ital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eek Colonies to 480 BC* (Oxford, 1968), p. 207.
62. Cited by J. Heurgon, *Daily Life of the Etruscans* (London, 1964), p. 33.
63.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95.
64. C. Riva, 'The archaeology of Picenum', in G. Bradley, E. Isayev and C. Riva (eds.), *Ancient Italy: Regions without Boundaries* (Exeter, 2007), pp. 96–100 (for Matelica).
65.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93.
66. *Ibid.*, p. 101 and plate 66, p. 103, pp. 128–9; Heurgon, *Daily Life*, p. 140; cf. J.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n, London, 1980), pp. 228–9;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p. 103, 129.
67. Cristofani, *Etruschi del Mare*, p.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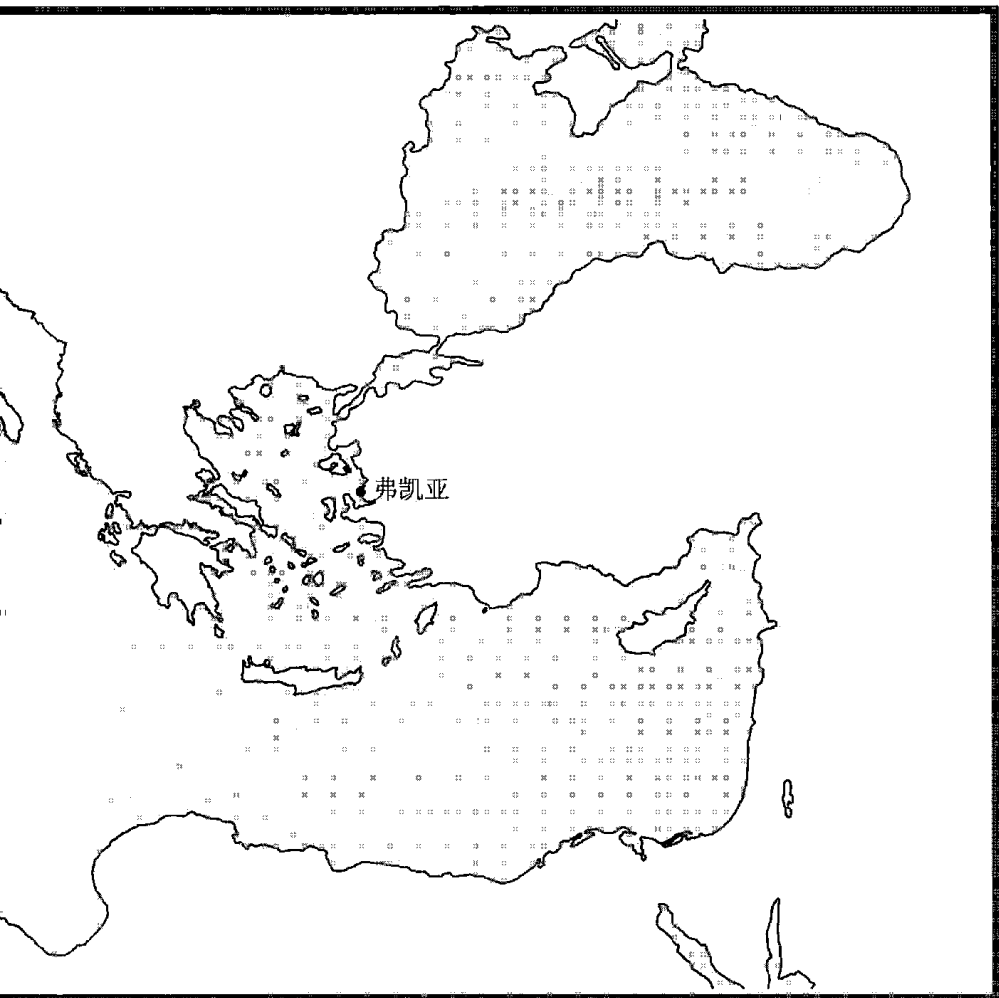
四 通往金苹果园 (前 1000 ~ 前 400 年)

1

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意大利内部，人们对与东地中海之联系产生的影响感受完全不同。希腊文化对西西里岛土著民族——西坎人（Sikans）、西科尔人（Sikels）和伊利米人——日常生活的渗透要比对托斯卡纳和拉丁姆（Latium）土著民族生活的渗透更为缓慢。在西西里岛，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当地土著居民保持距离。在几个世纪里，富有各种矿藏的撒丁岛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心，这种文明的一大标志是一种被称为 *nuraghi* 的石塔，现在仍有成千上万的石塔点缀着该岛屿；它们周围似乎曾经有一些繁荣的村庄，这些村庄深深地扎根于岛上富饶的农业土地上。这些石塔约于公元前 1400 年开始出现，但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一些新的石塔还在修建。¹ 在迈锡尼时期，撒丁岛与外界已经有联系，因为东地中海的贸易者为寻找铜矿到达了此地。根据安格鲁卢如（Anghelu Ruju）的墓葬群 [位于撒丁岛西北部的阿尔盖罗（Alghero）附近]，我们可以对前 2 千纪的本地精英的财富进行估算；这些墓冢是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欧青铜时代早期陵墓中最为富有的，显示出此地与西班牙、法国南部及东地中海的联系。² 西班牙的影响体现在发掘于该地的钟状宽口罐上。与西班牙的另外一种联系是语言上的联系。撒丁岛人并未留下书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面记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书写体系，还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易损坏的书写材料未能保存下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多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同样提供线索的还有撒丁语，它是后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通用拉丁语，其方言中融合了120 许多前拉丁时代的词语。石塔时期的民族似乎讲的是一种或几种与非印欧语系的巴斯克语（Basque）相关的语言。因此，撒丁语中表示“小羊羔”的 *bitti*，与巴斯克语中表示“小山羊”的 *bittn* 极为相似。³ 这一证据并不能说明有一次大规模的从伊比利亚向撒丁岛移民的浪潮。它证实的是如下事实：在西地中海存在着一个语族，在西班牙、法国南部、一些西地中海岛屿以及北非的一些地区都能找到说这类语言的人。

早在公元前 2 千纪，撒丁岛人就开始将死者葬于令人印象深刻的石窟陵墓中。他们会把墓地凿砌成与活人住房相似的样子，墓中有几间由走廊连接在一起的墓室，墓室中还装饰有门框、门楣，以及其他一些模仿活人住所中木制配件的石雕。撒丁岛上的这些墓葬建筑现在被称为 *domus de janas*，意为“仙居”。121 古代的撒丁岛人也建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圣地，例如在北部靠近萨萨里（Sassari）的阿克迪山（Monte d' Accodi）上，有一个靠着大斜坡而建的平顶金字塔，可能是建于前 15 世纪的一个祭祀场所。

大多数石塔都临海岸而立；有一些被建在小山顶上，且各种因素证实，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防御：抵御窃羊贼、海盗，更重要的是抵御其棘手的撒丁岛邻居的侵扰。它们也是存放黄铜与青铜的“保险箱”，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已经制成的雕塑和武器都可以在这里储藏。位于撒丁岛南部的巴鲁米尼（Barumini）的苏努拉西（Su Nuraxi）的大型建筑群是极好的

例证，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6 世纪是此地的繁荣期。除了城堡，苏努拉西还有约六十座小屋，这些小屋都修在石制地基上，它们围绕一个中心广场分布。一个大的建筑被认为是议事厅，里面配有一条石制长凳和一些可放置油灯的壁龛。后来该地受到迦太基人攻击，遭到毁灭，迦太基人的驻地卡利亚里（Cagliari）距撒丁岛南部不远，苏努拉西于前 5 世纪被重建，且由发掘出来的一些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可推测，该地后来又成为一个繁荣的中心。⁴ 它是一个极为分裂的社会，每一个小领主都拥有自己的城堡。但是来自腓尼基、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在此地的渗透非常缓慢：与在与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接触中发生改变的早期的伊特鲁里亚文明不同，它并未因与外界的联系而发生急剧且明显的改变。⁵ 它与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以甚为微妙的方式相互影响，且撒丁岛上的社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一直到前 3 世纪末这里还在建造石塔，其时，不仅迦太基人，罗马人也成了他们的宿敌。例如在阿尔盖罗附近的帕尔马维拉（Palmavera）这样的遗址，就有许多修建于约前 750 年的塔、楼梯、秘道和城墙，同时还有一些环绕塔基分布的修筑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它们见证了一个腓尼基入侵者在撒丁岛安营扎寨的时代，于是，撒丁岛人需要修建更为复杂的建筑来对付更为精明的敌人。古代撒丁岛的宗教崇拜也显示出其社会的保守主义；在这里，希腊或腓尼基的神并未获得统治地位，岛民们都是圣井崇拜和公牛崇拜的虔诚信徒。⁶

122

撒丁岛人并非城市居民。其聚落的典型特征是村落围绕着堡垒建立。撒丁岛的城市是由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建造的。尽管有时迦太基和撒丁岛人之间关系并不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

石塔文明是与世隔绝的文明。琥珀是这里的一种舶来品，该物品经一条未知的航线从波罗的海（Baltic）一路而下，在苏努拉西结束了其旅程。黄金并未引起撒丁岛人的兴趣，而且直到公元 14 世纪撒丁岛南部才开始对银矿进行充分的开采利用。在撒丁岛发现的最古老的希腊陶器（且先不说一些迈锡尼时期的残片）来自前 8 世纪。前 7 世纪时，有一个爱奥尼亚陶瓶被送到苏努拉西。科林斯的陶器只出现在了撒丁岛南部的考古遗址中，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包括希腊陶罐的仿制品）却出现在了岛上的多处遗址中，这多少可帮助说明撒丁岛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⁷ 对于撒丁岛岛民来说，这些物品具有很明显的吸引力，以铜块作为交换物，他们就可轻松获得这些外来物品。

对于撒丁岛人来说，寻找铜矿并非难事；但是将铜转化为更为坚硬的青铜合金所必需的锡矿，则要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进口。撒丁岛人用青铜制造的小雕像具有十分深远、广泛的影响：这种长腿人物小雕像深深地吸引了 20 世纪的雕塑家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注意力；它们也深受维图罗尼亚的伊特鲁里亚金属工匠喜爱，此地通常雇有来自撒丁岛的工匠专门制作这类四肢修长的小雕像。有几百个产自撒丁岛的这种小雕像留存至今，通常是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作品。他们似乎在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有武士、弓箭手、匠师及牧羊人，但女性雕像要远远少于男性雕像。有时，他们也会制造一些动物铜像，在某些场合，这些动物铜像可被当作受当地居民崇拜的神明的化身。⁸ 小雕像为当时的航海活动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因为伊特鲁里亚港口出土了不少铜制船舶模型，它们被认定是前 8 世纪后制作的。有一个模型的

船首是鹿头的模样，其船舷上还点缀着几只野兽和鸟。另外一艘圆底船模型上绘有一只蜷缩的猴子，这种动物可能已经由迦太基人从非洲带至此地。⁹

2

南意大利的希腊人起着桥梁性的作用，将爱奥尼亚、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与伊特鲁里亚诸新兴城邦连接在一起。同样，遥远的爱奥尼亚殖民地马萨利亚（Massalia，位于今天的马赛）也像桥梁一样将希腊世界的主体与地中海最靠西的海岸连接起来。¹⁰来自小亚细亚沿岸的弗凯亚人再一次成为先驱者，率先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在马萨利亚建立了移居点，当时大约有六百个成年人来到此地，并很快与当地进行了通婚。该地的早期发展很快，到前6世纪，其占地约达五十公顷。¹¹它真正的辉煌时代是弗凯亚人来到此处后的前半世纪。前6世纪中叶，波斯人对爱奥尼亚的入侵导致弗凯亚人开始向外移民，以尽可能远地离开波斯敌人。希罗多德提道，波斯人要求弗凯亚人拆除一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并将一座建筑象征性地献给波斯总督。弗凯亚人表示他们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且希望可以停战一天，以便对此事做出周全的考虑；但是他们借停战的有利时机，将所有财产装载上船，驶向希俄斯岛，并驶向更远的西方——先是科西嘉岛，而后是马萨利亚。因此，他们交给波斯王的是一座没有人的“鬼城”。¹²

124

但这些并没有使马萨利亚成为一个爱奥尼亚复国人士的集合地。马萨利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当其他地方的爱奥尼亚同胞正在与伊特鲁里亚人斗争时，当地居民却尽力保持沉默；对此有一种解释是马萨利亚人与西地中海上的族群建立

了密切联系——不只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有居于非洲和西班牙的迦太基人，以及居于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文化较为落后的利古里亚人（Ligurians）。¹³ 马萨利亚成为与西欧凯尔特民族建立联系的一个据点，希腊和伊特鲁里亚的陶器及其他物品可以经此地向北进入高卢腹地。与此同时，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与迦太基人在这一地区同时展开贸易；前文提及的佩克玛赫被迦太基商人用作贸易站，然而很明显这里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商人到访，正如在此地发现的铅板上的伊特鲁里亚铭文已经揭示的那样。吸引这些商人来到法国南部的不是铅，而是锡矿，他们希望获得法国西北部甚至不列颠（不列颠已经有了来自加的斯的腓尼基水手的足迹）的锡矿供应，而来自加的斯的腓尼基人已经到达了这些地区。沿塞纳河发现的一些希腊和伊特鲁里亚青铜器和陶器，特别是在威克斯（Vix）发现的一个约公元前 530 年制作的大型青铜薄壁兑酒器（*krater*），就各类商品所循之进入高卢腹地的漫长贸易路线（但不一定是个体商人的路线），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¹⁴ 这个大型兑酒器提醒我们，酒在马萨利亚是一种大宗贸易商品。该酒罐可容纳 1100 升液体，希腊人习惯于将 2 份水兑入 1 份酒中。实际上，前 6 世纪是希腊人前往遥远的西方进行贸易的一个黄金时代。尽管爱奥尼亚在科西嘉岛上的一个殖民地刚一建立就被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扼杀，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小规模的聚落还是在马拉加、西班牙南部的其他地区，以及更为有名的恩波利翁形成，恩波利翁现已改名为恩布里斯（Empúries）。在附近区域，来自罗得岛的商人可能已经建立了罗得城（Rhode），即今天加泰罗尼亚的罗赛斯（Roses）。

马萨利亚维持着与东地中海的联系，其青铜的冶炼炉急需 125 锡。在马赛的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大量产自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陶器，它们中一部分来自埃维厄、科林斯、雅典、斯巴达、爱奥尼亚，以及更近一些的伊特鲁里亚。富有的马萨利亚商人在德尔斐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¹⁵ 法国南部的文化被希腊同化了。晚期罗马作家查士丁（Justin）对较早时期的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的论述 [其《腓力史》（*Philippic Histories*）已佚失] 做出了如下概述：

因此，高卢人从马萨利亚人那里学到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之前的粗野习俗或被放弃或已改进。通过马萨利亚人，他们学会耕种土地，为自己的城邦修建围墙。他们也逐渐适应了依法行事，而不再依靠暴力。另外，他们还学会了修剪葡萄藤与种植橄榄。这种文明之光辐射到所有人和事，人们甚至会以为，不是希腊被移植到了高卢，而是高卢已经被移植到了希腊。¹⁶

当然，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人写的赞美之词，将橄榄树和葡萄藤引入此地的是否真的是希腊人也值得商榷。¹⁷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对该地的葡萄园进行了集约型开发，并将更为先进的橄榄油压榨技术和酒的酿制技术引入此地。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爵士坚持认为“在勃艮第（Burgundy），人们喝的第一杯酒是来自马萨利亚的希腊葡萄酒”。而且在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罗旺斯的很多遗址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来自雅典、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的酒罐，它们进一步支撑了博德曼的观点。¹⁸ 查士丁是对的：像罗

马军团一样努力将此地区划入希腊文化圈的范围是没有必要的。

像西地中海其他地方一样，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马萨利亚也开始经历重要转变。促成这些转变的部分原因是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间逐渐紧张的政治关系，它导致跨第勒尼安海的贸易走向衰退。同时，法国北部和东部的文化——一般被称为哈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逐渐衰落，而更趋东部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成为充满生机的新大陆文化中心。所谓的拉特尼文化（La Tène culture）经由东阿尔卑斯山的一些隘口，受到伊特鲁里亚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意味着连接地中海与北欧的贸易路线向东转移，罗纳河（Rhône）河谷的居民对于地中海精致货物的需求逐渐减少。¹⁹ 被运往马萨利亚的陶器数量减少了，但在这个世纪的末尾，陶器贸易得到了恢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希腊人无法再通过马萨利亚向高卢内陆运送酒和精美货物了；而与此同时，在西方遥远的西班牙海岸，迦太基人在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希腊世界对此种局面做出的回应之一是，他们对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一条贸易路线更为依赖，这条路线把他们与新兴城市斯皮纳连在了一起。马萨利亚的衰落使斯皮纳地位上升。希腊世界的另一个回应是，将马萨利亚定位为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沿岸新殖民地 [包括阿格德 (Agde)] 的母邦城市，但是马萨利亚最著名的子邦尼凯亚 (Nikaia, 即今天的尼斯) 到前 3 世纪才得以建立。²⁰

3

一个最典型的希腊化案例可以在西班牙找到。早期希腊文学，如赫西俄德的著作提道，地中海最西端是三头巨人革律翁

(Geryon) 等神话怪物的故乡；这里也是神秘的金苹果园 (Garden of the Hesperides) 的所在地；另外，在赫拉克勒斯石柱处，阿特拉斯 (Atlas) 撑起了苍穹。²¹ 如前所述，腓尼基人最先来到了此地，并在地中海之外的加的斯建立了一个重要基地。而希腊人中，弗凯亚人及其邻居则再次成为先驱者，于公元前 7 世纪中期与萨摩斯的水手克莱奥斯一同进入此地；据说塔特索斯的国王甚至还曾邀请弗凯亚人住在他的土地上。²²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错误地到达了科西嘉岛。前 6 世纪至前 4 世纪，西班牙的希腊定居者和贸易者的数量与迦太基人相比是相当有限的，且他们是否已经把迦太基人视为竞争者，我们也不得而知。恩波利翁的希腊人用金属与当地入做生意，公元前 4 世纪的恩波利翁钱币既有迦太基的图案，又有希腊的西西里图案。恩波利翁的公民可能会被迦太基军队招募为雇佣兵，在西西里岛与希腊人作战；但恩波利翁并未试图开辟一个受其直接控制的大区域。它的财富所基于的不是当地的资源，而是与富藏金属资源的西班牙南部地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维持则靠迦太基商人从中周旋。²³ 但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容易超过迦太基文化的影响。尽管希腊人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中心依旧繁荣，但位于安达卢西亚 (Andalucía) 的那些中心，例如马拉加附近的麦纳克 (Mainake)，很快就衰落了，且这些地区被纳入了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富藏银矿的塔特索斯可能于约前 500 年开始走下坡路，但是也有其他一些机遇，如迦太基人利用其在西地中海取得的胜利，与新兴的罗马于前 509 年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委婉但严格地禁止罗马人及其同盟者进入西地中海水域。

试图封闭海洋的尝试通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这种做

法很容易将海盗引来，且这种计划的落实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或许在迦太基人获得对西班牙的垄断地位之前，一位希腊航海者编写了一份航海手册，该手册描绘了自西班牙的加利西亚（Galicia）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并沿着海岸前往马赛的路径；马赛可能就是该作者的居住地。毫无疑问，编写这份手册是为了记录这条航线，以便更好地获取加利西亚供应的锡。这位作者是来自马赛的著名希腊航海者皮西亚斯（Pytheas）的前辈，皮西亚斯在公元前4世纪发现了通往不列颠的海上航线。²⁴这份前6世纪（或者可能要稍晚些）的小册子被保留在了4世纪的异教拉丁作家阿维努斯（Avienus）用拉丁语创作的文辞粗陋的诗中。²⁵阿维努斯反复强调他的古文本描述了西班牙沿岸的一个地方，该地后来成为废墟。因此，阿维努斯读到的文本是古代文献和后来一些旅行者的观察记录的混合体。而手册对一些地名的忽略，如希腊人的殖民地罗得岛，则表明在该希腊航海者编写航海手册时，这些殖民地还未建立，这进一步证明该手册是十分古老的资料。阿维努斯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塔特索斯（自前5世纪起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并很自信地将其与加的斯相提并论，尽管他也强调称“现在它的规模不大，现在它被遗弃，现在它是一片废墟”。²⁶他描述了塔特索斯人是如何与其邻居进行交易的，以及迦太基人是如何来到这些水域的；他还指出有一座富有锡矿藏的闪烁光芒的山峰已经引起了早期贸易者的兴趣。²⁷该文本还提到了西班牙南部衰落的腓尼基城市，表明在前6世纪晚期，阿维努斯的这位先辈就游历过这些地方。另外，阿维努斯还提到了一些腓尼基的聚落现被迦太基移民者占领的过程。²⁸通过将希腊文本译为拉丁文本，并增添一些后世的资料文献，阿维努斯创立了一个重写本，但

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分清其中的层次。²⁹阿维努斯的确描述了塔拉戈纳（Tarragona）和巴伦西亚（Valencia）的一些重要土著聚落群，他称它们为提里斯 [此名称与图里亚河（Turia）的名字关系密切，这条河直到现在仍然流经巴伦西亚的中心地带]。当他提到巴塞罗那（该名字有迦太基起源）时，他认为此城市建立较晚。在谈到西班牙沿岸的那些以奶和奶酪为生存资源的凶悍民族时，阿维努斯称他们像“野兽”一样，然后他向我们展现了，那些被统称为伊比利亚人的民族实际上有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西班牙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伊比利亚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很多部落和小邦。³⁰

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与伊比利亚诸族群之间有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促成了一种文明的形成，该文明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规模合理的城市，并使用了某种书写体系。伊比利亚文明几乎没有引起除西班牙以外的其他族群的注意，但是伊比利亚人的文明程度很高，在西地中海它已经超过了除伊特鲁里亚外的其他族群。³¹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希腊和腓尼基文化通过远程贸易和移民向西渗透的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现了希腊与腓尼基的文化影响与当地的石雕与及金属加工技术的结合。但是伊比利亚人比伊特鲁里亚人更难认定族群身份。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形成一个团结的单一族群，他们称自己拉斯纳人（*Rasna*）；而安达卢西亚、巴伦西亚海滨及加泰罗尼亚的伊比利亚人却有不同的文化。这里有很多部落，没有形成政治统一体。甚至他们讲的是不是同一种语言或相互关联的语言，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现存语言中与古代伊比利亚语最接近的可能是巴斯克语和柏柏尔语。在内陆，他们与其他族群融合，通常被现代学

者，甚至也被阿维努斯划归为凯尔特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表述，主要强调大陆文化传统，而非地中海文化传统）。³²于是，“伊比利亚”是一个很广义的词，指公元前7世纪至前2世纪一个政治上依旧不稳定的世界中的诸多族群，迦太基人、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都曾以贸易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对这个世界进行渗透。

如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情况所展现的，希腊人的聚落（如恩波利翁）有时远离土著居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和其他联系会使城市成为不同族群的杂居之地。在距恩波利翁不远的乌利亚斯特雷特（Ullastret）有一个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伊比利亚城镇，该城镇规划较好，有四个入口和一片空地，占地面积为四万平方米。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伊比利亚
129 人与殖民者之间始终是充满敌意的。有一些例子表明伊比利亚人将他们从希腊人和其他民族那里学到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独特的表达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在西班牙西南部存在多种民族，但是伊比利亚人书写所用的字母是大致相同的，而且，毫无疑问，很多字符源自希腊语，而非腓尼基语。奇怪的是，虽然他们已经开始使用字母文字，但增添了一些音节符号，如 *ba*、*be*、*bi*、*bo*、*bu*（字母 *c* 和 *d* 亦是如此）。更为奇怪的是，在这种变化后，这一书写体系的创造者就不再进行创新了。现代西班牙有两个基本特征来自希腊人对伊比利亚人的影响：葡萄和橄榄逐渐在伊比利亚受到欢迎，尽管加泰罗尼亚的酒因品质差而受到罗马诗人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责难。无论如何，伊比利亚人传统上更喜欢啤酒，通常也从伊特鲁里亚进口较优质的葡萄酒。³³

另一个文化借鉴的例子体现在伊比利亚人的墓葬风俗。伊

比利亚人一贯偏好火葬。考古学家在安达卢西亚的图土基 (Tutugi) 发现了许多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5 世纪的墓冢, 它们形制各异, 有一些只埋葬了简单的骨灰盒, 也有一些修建了若干奢华的墓室, 这些墓室间有走廊, 墙上还有绘画痕迹。这些大型坟墓中的一大常见建筑元素是以爱奥尼亚风格装饰的石柱。它们很明显是为收纳上层人士的骸骨而修建的, 令我们不禁想起了伊特鲁里亚人, 反映了来自意大利的影响。像意大利和东地中海某些地区一样, 伊比利亚人也效仿了在一些富有或知名人士的墓中放入相当数量的随葬品的习俗, 例如在图亚 (Toya) 的一座三厅室墓葬中有若干青铜桶、宝石和一辆二轮战车。³⁴ 原生文化与外来影响相融合的第三个例子体现在雕塑艺术上。伊比利亚艺术家们利用石灰岩创造出了几乎接近实物大小的公牛、马和鹿的雕塑, 它们十分明显地展示了动物的主要特征。他们更喜欢深浮雕, 且留存下来的一些雕塑据推断都是用于神庙和其他祭祀中心的外部装饰。³⁵ 希腊风格的影响是循序渐进的, 且这种影响的产物并不是一种完全希腊化的风格。这一点在伊比利亚最著名的前 4 世纪的雕像“埃尔切夫人” (Dama de Elche) ——一尊戴着精美首饰的女祭司或女神的半身像——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尽管其脸部造型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时期的希腊样式, 但雕像的其余部分与出现在西班牙的其他真人大小的妇女雕像风格十分相似。³⁶ 她的首饰可能多少模仿了迦太基的样式,³⁷ 但是该半身像和其他类似雕塑处理衣服褶皱的方式都反映出了伊比利亚的标准风格。伊比利亚人并不像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那样喜欢塑造裸体形象, 只有一幅伊比利亚陶瓶画描绘了裸体男子, 但是该陶瓶是在恩波利翁出土的, 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³⁸

陶器可以揭示不同族群间的贸易联系；如果这些陶器是绘有图画的花瓶，则它们还可以反映文化影响产生的方式，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瓶画中，也可能体现为土著民族对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和英雄们的兴趣。不同于意大利诸民族，伊比利亚人的宗教信仰并未被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思想征服，尽管考古证据显示，沿海地区居民和一些外来民族一样，信仰的是德墨忒尔（Demeter）、阿施塔特及其他外域神祇，例如从图土基的一个墓葬坑中出土的一尊雪花石膏雕像很明显是一位腓尼基女神。³⁹在瓶画领域，伊比利亚人显示出了独创性，而不是像伊特鲁里亚人那样简单地模仿希腊风格。来自巴伦西亚附近的利里亚（Liria）的黑绘花瓶上描绘了舞蹈与战争的场景；其人物形象由一种生动的半抽象风格勾勒，表现出了一种动感，画面剩余部分则被填充以花饰、圆形图案、各种花卉图案及其他图形，以防出现空白。⁴⁰在安达卢西亚，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几何形图案到前4世纪还在使用，主要为了满足伊比利亚购买者的要求，他们偏爱鸟、兽及树叶的图形。因此，所谓的单一“伊比利亚风格”并不存在，准确的表述是伊比利亚人学习了希腊的一些基本艺术理念，然后他们对来自东地中海的一切事物（由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船只载来）做出了自己的改进。

最后，伊比利亚人并非作为贸易者，而是作为优秀士兵，为西班牙域外的人所知晓。公元前480年他们被西西里岛的西莫拉僭主招募为雇佣兵，但是前5世纪末他们又服役于迦太基军队，与迦太基士兵一起袭击了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市。前395年，迦太基被叙拉古的希腊僭主击败后，很多伊比利亚人又转投希腊僭主麾下。大约在这一时期，他们甚至在阿里斯托芬的一部喜剧中被提及，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因为据说他们

全身都覆盖着体毛。其著名的军刀借鉴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军刀的设计，在作为雇佣兵服役的期间，他们学会了使用这种军刀的方法。⁴¹从战争中获得的薪俸和战利品应该为伊比利亚带来了大量财富，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某些伊比利亚墓葬显得十分富有。另外，西班牙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金属资源，才是伊比利亚繁荣的真正源头。伊比利亚人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西班牙内陆到沿海地区的交通线路可以为他们带来收益，他们同样也可以从加迪尔（加的斯）和其他大西洋港口出发，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阿维努斯记载的路线），从这条航线中获益。现在，整个地中海的海面上都有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或迦太基人在航行；遥远西方的族群是雅典的阿里斯托芬戏剧中的嘲笑对象，而西方族群则将希腊（先是科林斯，而后是雅典）看作时尚与风格的中心。

注 释

1. M. Guido, *Sardinia*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1963), pp. 59-60; cf. M.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archaïques* (Rome, 1985), pp. 87-91.
2. M. Pallottino, *La Sardegna nuragica* (2nd ed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 Lilliu, Nuoro, 2000), pp. 109-14.
3. *Ibid.*, pp. 91-102.
4. *Ibid.*, p. 162; Guido, *Sardinia*, pp. 106-7, 142.
5. Guido, *Sardinia*, p. 156.
6. *Ibid.*, pp. 112-18; Pallottino, *Sardegna nuragica*, pp. 141-7.
7.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113-15, and fig. 19, p. 114, also pp. 164-7, figs. 29-30, and pp. 185-6.
8. Guido, *Sardinia*, pp. 172-7;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 145 (Vulci).
9. Guido, *Sardinia*, plates 56-7;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p. 115-19, 123-40; Bible Lands Museum, Jerusalem, *Guide to the Collection* (3rd edn, Jerusalem, 2002), p. 84.

10. V. M. Manfredi and L. Braccisi, *I Greci d'Occidente* (Milan, 1966), pp. 184-9; D. Puliga and S. Panichi, *Un'altra Grecia: le colonie d'Occidente tra mito, arte a memoria* (Turin, 2005), pp. 203-14.
11. Gras, *Trafics tyrrhéniens*, p. 402.
12. Herodotos 1.163-7; A. J. Graham, *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 1964), pp. 111-12; M. Sakellariou, 'The metropolises of the western Greeks', in G. Pugliese Carratelli (ed.), *The Western Greeks* (London, 1996), pp. 187-8; Manfredi and Braccisi, *Greci d'Occidente*, pp. 179-81, 184-5; Puliga and Panichi, *Un'altra Grecia*, pp. 203-4.
13. G. Pugliese Carratelli, 'An outlin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Greeks in the West', in Pugliese Carratelli, *Western Greeks*, pp. 154-5.
14. M. Bats, 'The Greeks in Gaul and Corsica', in Pugliese Carratelli, *Western Greeks*, pp. 578-80, and plate, p. 579; V. Kruta, 'The Greek and Celtic worlds: a meeting of two cultures', in Pugliese Carratelli, *Western Greeks*, pp. 585-90; Puliga and Panichi, *Un'altra Grecia*, pp. 206-7.
15. J.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n, London, 1980), pp. 216-17; Manfredi and Braccisi, *Greci d'Occidente*, p. 187.
16. Justin, *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43:4; Boardman, *Greeks Overseas*, p. 218; Manfredi and Braccisi, *Greci d'Occidente*, p. 186.
17. L. Foxhall, *Olive Cultivation in Ancient Greece: Seeking the Ancient Economy* (Oxford, 2007), and other studies by the same author.
18. Boardman, *Greeks Overseas*, p. 219.
19. *Ibid.*, p. 224.
20. Kruta and Bats in Pugliese Carratelli, *Western Greeks*, pp. 580-83; Boardman, *Greeks Overseas*, p. 224.
21. P. Dixon, *The Iberians of Spain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Aegean World* (Oxford, 1940), p. 38.
22. *Ibid.*, pp. 35-6.
23. A. Arribas, *The Iberians* (London, 1963), pp. 56-7.
24. B. Cunliffe, *The Extraordinary Voyage of Pytheas the Greek* (London, 2001).
25. Avienus, *Ora Maritima*, ed. J. P. Murphy (Chicago, IL, 1977); L. Antonelli, *Il Periplo nascosto: lettura stratigrafica e commento storico-archeologico dell'Ora Maritima di Avieno* (Padua, 1998) (with edition); F. J. González Ponce, *Avieno y el Periplo* (Ecija, 1995).
26. Avienus ll. 267-74.
27. *Ibid.* ll. 80-332, especially ll. 85, 113-16, 254, 308, 290-98.
28. *Ibid.* ll. 309-12, 375-80, 438-48, 459-60.
29. Cunliffe, *Extraordinary Voyage*, pp. 42-8; Dixon, *Iberians of Spain*, pp. 39-40.
30. Avienus ll. 481-2, 485-9, 496-7, 519-22.
31. Dixon, *Iberians of Spain*; Arribas, *Iberians*; A. Ruiz and M. Molino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Iberians* (Cambridge, 1998).
32. Avienus l. 133.

33. Arribas, *Iberians*, pp. 89, 93, 95, figs. 24, 27, 28, and pp. 102-4, 120, bearing in mind Foxhall, *Olive Cultivation*.
34. Arribas, *Iberians*, pp. 146-9.
35. *Ibid.*, plates 35-8, 52-4.
36. *Ibid.*, p. 160; also plates 22-3; Dixon, *Iberians of Spain*, pp. 106-7, 113-15 and frontispiece.
37. Dixon, *Iberians of Spain*, p. 107.
38. *Ibid.*, p. 82 and plate 12b.
39. Arribas, *Iberians*, p. 131 and plate 21; also Dixon, *Iberians of Spain*, p. 11.
40. Dixon, *Iberians of Spain*, pp. 85-8, plates 10, 11a and b.
41. *Ibid.*, pp. 54-60; Arribas, *Iberians*, pp. 7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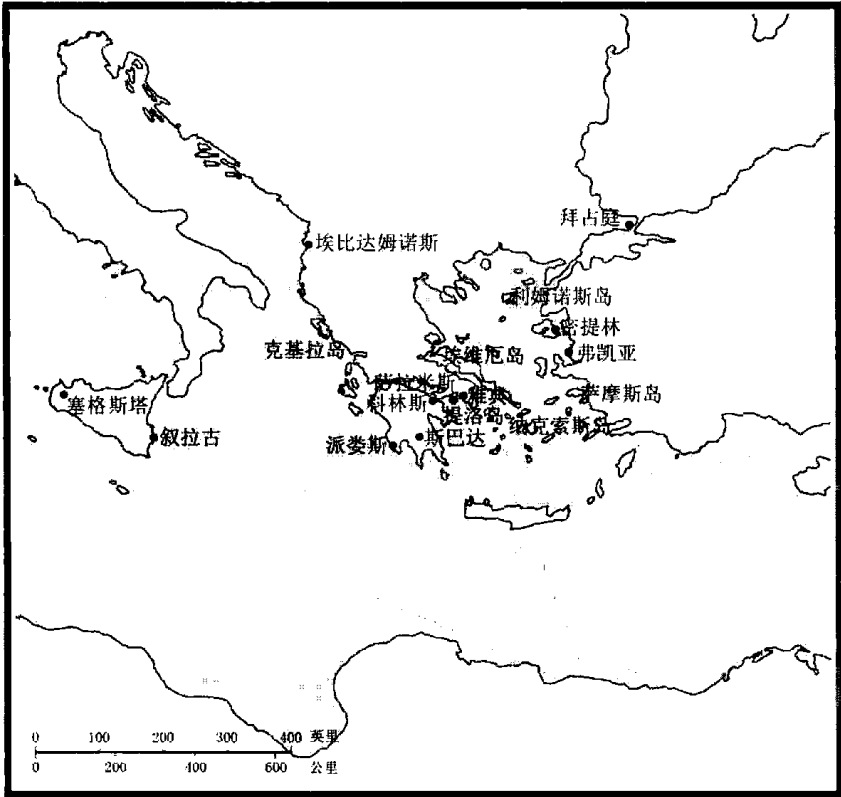
五 制海权

(前 550 ~ 前 400 年)

1

132

人们可能希望地中海海岸能成为限制中东的大国（赫梯、亚述）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扩张的天然屏障。亚述人偶尔使用恐吓手段逼迫塞浦路斯归顺自己，埃及人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因为这座岛屿拥有令人难以忽视的木材和金属资源。然而，没有哪一次控制东地中海的尝试，能与公元前 6 世纪波斯对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征服，以及其入侵希腊的企图相提并论；波斯人的失败则被视为特洛伊陷落后希腊人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这次成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希腊本土的诸多城邦与爱琴海诸岛在抵御波斯人的战斗中实现了团结，甚至叙拉古也被要求进行援助（尽管可能受波斯挑拨，它曾击退了迦太基人的一次行动）。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希腊人修建了很多纪念性建筑物，如来自德尔斐的青铜蛇柱，它现在屹立于伊斯坦布尔的竞技场（Hippodrome）。该纪念柱上刻有在前 479 年的普拉提亚（Plataia）战役中协助抵抗波斯人的三十一个城邦的名字，但该名单是不完全的。¹一个“赫伦人共同体”开始出现，且“赫伦人”（Hellene）这一荷马对阿喀琉斯的追随者的称呼逐渐开始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身份认同。²于是出现了为保卫希腊自由而对抗专制的波斯的故事，希罗多德对这一故事做了最为



成功而生动的讲述。前 472 年，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戏剧《波斯人》中强调，赫拉斯（即希腊）的未来直接取决于其母邦雅典的命运：

133

阿托莎（Atossa）女王：请问，在这个所有人类居住的世界中，被人们称为雅典的城市位于何处？

将领：很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太阳神在那里沉落，其光辉在那里消散。

阿托莎：那片遥远的土地就是我的儿子渴望占领的地方吗？

将领：是的，因为如果雅典归属于他，所有的赫拉斯人都会对其唯命是从。³

希腊人是否真的为了自由而反抗波斯人还有待商榷。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伯罗奔尼撒战争最激烈的阶段，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不时向波斯人寻求支持。归顺于波斯王并没有被一直视为一种令人鄙视的行为。这个争取自由的故事被不断讲述，先是希罗多德的记叙，之后是罗马时期的普鲁塔克（Plutarch）为雅典和斯巴达伟人撰写的传记。波斯王率领的入侵希腊大军中有一些希腊人，不论是否自愿，他们都在与其他希腊人战斗。波斯人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干扰，如招募军队和征收赋税，但波斯人的一般政策是只要希腊城市毫无怨言地奉上土壤或水等象征性的贡品，那么它们就将获得较大的自主权。

从希腊的角度看，其与波斯人的关系问题始于公元前546年吕底亚王国的毁灭。该王国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isos，或写作 Croesus）因财富而声名显赫。波斯王居鲁士（Cyrus）要求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它们名义上效忠于吕底亚）与其联合以打败吕底亚人，但是爱奥尼亚人在吕底亚陷落后才向其表明意愿，一切都为时已晚，居鲁士此时已打算不再给予爱奥尼亚人他们作为吕底亚名义上的子民时曾享有的优待。一些人臣服于波斯，然后发现他们不得不供养波斯人的军队；这种负担在居鲁士统治时期相对较轻，但在后来的波斯统治者即位后变重了，因为这些统治者需要筹措资金以发动大规模战争。也有一些城邦，特别是弗凯亚，听取来自赫伦人的建议，实行了全体性移民。后来成为雅典军队中著名统帅的米太亚德（Miltiades），带领五艘船从弗凯亚出发，船上装载着一群逃难

者和城市中的所有财富；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被腓尼基海盗劫获。在这一时期，对波斯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中东大帝国的土地。前 539 年，巴比伦为居鲁士攻陷，后来该事件成为《但以理书》中的一个生动故事。紧接着，前 525 年，埃及被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Cambyses）征服。与此同时，波斯人还使一些腓尼基城市臣服在了自己脚下。对于腓尼基人来说，这并不全是坏事。波斯人绕开爱奥尼亚，将新的活力注入贯穿推罗和西顿的贸易路线。在地中海，腓尼基人为波斯海军生产龙骨，尽管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也被期待为波斯王室的海军建造船只。约前 525 年，作为爱奥尼亚统治者之一的萨摩斯的波吕克拉特斯（Polykrates），为其盟友冈比西斯征集了 100 艘大桨帆船（每艘由 50 个桨手操控）和 40 艘有三排桨的三列桨战船。[这些船腓尼基人也能建造，前 499 年，腓尼基人曾派出 200 艘三列桨战船攻击纳克索斯岛（Naxos）。⁴] 换句话说，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需要招募成千上万的水手，因此波吕克拉特斯召集的人力很有可能已远远超过萨摩斯本身拥有的人口。令希罗多德也感到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其是否可与海上霸主米诺斯相提并论。⁵

埃及陷落后，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希腊城邦承认了波斯人作为最高宗主的地位，所以至此波斯帝国的疆域已经延伸至今日之利比亚。像其他腓尼基城邦一样，迦太基似乎对波斯人的一系列进展表示认同。但波斯人并没有试图在地中海建立霸权。希腊人告诫其西西里岛上的同胞，他们的岛屿也处境危险。但是在欧洲范围内，波斯人最为在乎的地区并非希腊，而是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境内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斯基泰人（Scythians）。希腊人和波斯人都视这一游牧民族为野

蛮人。波斯王大流士（Darius）曾于公元前 513 年出兵征讨斯基泰人。在爱琴海北部地区，一些希腊人和其他族群向波斯人发难，而波斯人则以暴行实施了报复：波斯人于前 509 年占领了利姆诺斯，并对当地居民实施了大屠杀。贪婪的波斯人还希望控制以自然资源闻名的埃维厄。⁶ 自前 499 年起，爱奥尼亚陷入了叛乱，并不时得到希腊半岛各城邦的支持，这种动乱导致了残酷的报复：腓尼基船员以血腥劫掠的方式报复了希腊竞争者。不过当爱奥尼亚叛乱逐渐平息之时，波斯人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体贴周到，他们不仅接受了希腊的民主政治，还要求这些城邦订立贸易协议，希望以此从根源上消除城邦间的紧张关系。在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面前，波斯王意识到他有责任以怜悯之心对待臣民，帮助他们获得安定。即便如此，爱奥尼亚还是未能恢复到原来的繁荣状态。⁷

2

公元前 486 年薛西斯即位后将波斯原来极力调和与异己势力关系的政策转变为对波斯敌人的暴力镇压。他打算对支持爱奥尼亚反叛的希腊人进行惩治。腓尼基人和埃及人收到命令，他们被要求提供大量绳索用以建造两座跨越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① 的船桥。这些缆绳一定要非常结实，足以经受得住湍急的水流。因为较早的一支船队已经在阿索斯山的海岬附近遭遇了海难并损失惨重，故薛西斯王要求在此地开凿一条运河，且这一任务也已经完成。部队的行军路线将经过色雷斯（Thrace），波斯人沿着这一路线设立了一些食品补给站。希腊

① 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译者注

人很清楚这场战争将是海陆两地作战，且斯巴达人被指派担任海军的高级统帅，这进一步表明斯巴达人在海上的实力不容忽视。毫无悬念的是，在薛西斯摧毁希腊城市、奴役希腊百姓之前，很多希腊人就已经臣服于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受诱惑成为“米底党”（Medize），站到波斯人一边。德尔斐的祭司皮提亚的预言（Pythian Oracle）指示雅典人放弃家乡，向西迁移。她进一步做了一些含糊的预言，提到了“木墙”，告诫雅典人这些“木墙”可以在波斯人的攻击中幸存。另外，她还暗示，在距雅典西部不远的萨拉米斯将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陆地上的战役于公元前480年在狭窄的温泉关（Thermopylai）关口上演了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当时300名斯巴达勇士誓死抵抗规模庞大的波斯军队；而后，波斯大军横扫了希腊北部和东部，而已经成为空城的雅典则遭受洗劫，包括卫城（Acropolis）中的古代神庙。⁸ 海上战役则为希腊提供了良机，因为波斯的船队主要由腓尼基自重轻、航速快的三列桨战船组成，希腊人可以寄希望于用自己较重的三列桨战船来抗击它们。腓尼基人可能在数量上占上风，但是希腊人更了解这片水域。⁹ 前480年，希腊盟军通过将波斯船队拦截在萨拉米斯，得以拖延波斯对伯罗奔尼撒看似很难避免的大规模入侵。萨拉米斯是一个小岛，它的东部与阿提卡内陆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在这里双方船队面对面排列；其西部则与面朝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海湾隔着较宽的海峡相对。希腊人以200多艘海船（一些人估算有380艘，主要是雅典船只）对阵600艘到1200艘敌船，因此希腊人就需要将腓尼基船只吸引到萨拉米斯与希腊陆地之间狭窄的海峡地段，并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埋伏。¹⁰ 希腊人使用了

一个奥德修斯式的计谋：一个雅典间谍向波斯人报告称，天黑之后希腊人打算向西逃走。于是，波斯派腓尼基人去海峡西部的出口处巡逻。但希腊人仍按兵不动，天亮后，被派去封锁希腊人逃离通道的巡逻队对当时的安静深感迷惑。与此同时，希腊人则与驻守在东部海峡的腓尼基船队开战。科林斯船只扬起帆，从表面上看他们要沿海峡逃往西部的埃莱夫西斯，实际上这是他们诱敌深入的计谋，最终波斯人发现自己的船在狭窄的入口187 无法挪动。此间，薛西斯王一直坐在位于萨拉米斯湾高处的金制御座上，期待着看到波斯海军追逐敌军并大获全胜。但是相反，200艘腓尼基船与其他波斯船或沉没或被俘获，而希腊人只损失了约40艘船。¹¹为波斯军队效力的爱奥尼亚希腊人为了避免与希腊本土的同胞发生战争，匆匆驾船离开了。这是一场古怪的胜利：波斯海军并未被彻底击溃，大约还有1000艘各类战船浮在海上，且在其附近还驻守着一支波斯军队；但是萨拉米斯海战证明薛西斯无法推进对希腊南部的征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入驻了爱琴海，他们已经成功阻止它变成波斯人的海。后一年希腊人在陆上战场普拉提亚（Plataia）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的联盟。通过历史日期的核准，有人认为，就在萨拉米斯海战胜利的同一天，叙拉古人在盖伦的带领下取得了对入侵西西里岛的迦太基人的决定性胜利。对波斯和腓尼基联军而言，入侵西西里岛可能是为了开辟第二战场。波斯人在东西两个方向被同时击败的观点有很强的吸引力。

波斯战争巩固了斯巴达（它在温泉关战役损失了许多英雄）和雅典（雅典人在牺牲了自己的城市之后，在阿提卡水域的海战中取得胜利）在道义上的优势。斯巴达和雅典都开

始乘胜追击，并在海上取得进一步的胜利，特别是在萨摩斯岛（他们成功将萨摩斯从波斯人的统治中解救出来）和米卡勒（Mykale）岬附近（在这里他们于公元前 479 年成功引燃波斯舰队，并出力促成了爱奥尼亚的叛乱）。因此，薛西斯撤退时带走的船只大大少于其来时率领的船只，埃斯库罗斯在其剧作中将薛西斯塑造为一个悲剧角色，他不自量力地挑战希腊诸神，并给波斯人和希腊人带来苦难。埃斯库罗斯坚持认为，希腊人是在为一个基本原则——自由而战：

右翼为先锋，准备就绪，
后面跟进整个舰队，首尾相连，
于是，一个人大声呐喊：“现在，赫拉斯的子民们，
就是现在！
解放赫拉斯，解放你们的妻子，解放你们的家乡，
拯救你们诸神高高的祭坛和你们先人的墓葬。
现在，成败在此一战！”¹²

3

大规模重建后的雅典成了民主政治的积极拥护者（这里的民主仅仅是男性自由公民的民主，很多客籍民或外邦人被排除在外）。通过利用海军控制爱琴海诸岛屿，雅典也成为区域性帝国的中心。¹³斯巴达则集中精力维持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权威，在这里，一小撮受过良好训练的斯巴达士兵（重装步兵）统治着为数众多的奴隶人口 [希洛人 (*helots*)] 和从属于斯巴达的同盟者 [柏里伊赛人 (*perioikoi*)]。正如修

昔底德所言，斯巴达是“一个简单的村落联合体”，此处并没有宏伟遗迹。同时他认为，从雅典拥有的遗迹来看，其在人印象中的实力是其真实实力的两倍。¹⁴

雅典帝国是通过宗教信仰实现整合的。在爱琴海水域上影响力最强的信仰是神圣的提洛岛（Delos）上的阿波罗崇拜。提洛岛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中部，差不多在爱琴海的正中间，进入该岛对于爱奥尼亚的希腊居民来说很方便——萨摩斯岛位于其东北偏东，希俄斯岛位于东北部偏北。萨摩斯的大海盗波吕克拉特斯对提洛岛很感兴趣，他将离提洛岛不远的雷尼亚岛（Rheneia）奉献给了提洛岛的阿波罗；在去世（公元前522年）之前不久，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链桥将雷尼亚岛和提洛岛连在一起。¹⁵提洛岛还引起几个邻近岛屿上的居民的关注，如纳克索斯人，他们在这里放置了狮子石雕（the Terrace of Lions），它们是用纳克索斯著名的优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通过参与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崇拜，爱奥尼亚人与爱琴海周围的希腊同胞团结在了一起。这里的阿波罗崇拜不仅表现为祭祀活动，也体现在一些节日活动中，如竞技比赛、合唱表演及舞蹈表演。修昔底德引用了过去一首献给福玻斯·阿波罗^①的诗：

啊！首先是，福玻斯，你的心偏爱提洛岛。

在那里，爱奥尼亚人穿着拖曳的长袍，聚在一起，
在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环绕中，走在你的神圣之路，
在那里，他们以拳击和歌舞取悦于你，

① 福玻斯·阿波罗（Phoibos Appollo）为古希腊太阳神的全名。——译者注

当赛事开始进行时，他们会大声呼喊你的名字。¹⁶

爱琴海中部的一个祭祀中心显然是希腊诸城邦于公元前 477 年建立用誓言维系的提洛同盟 (the Delian League) 之处，该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在薛西斯撤退之后继续对波斯人施压。很明显，将提洛岛作为同盟总部应该是雅典人的提议，因为这里不仅是公认的圣洁之地，而且可以使人们不会注意到雅典在控制同盟这一事实。起初，同盟财库被置于提洛岛上的雅典圣所内；但是前 454 年，这个财库被搬到雅典。至此，提洛同盟显然成为雅典的一个政策工具——雅典人任命整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人应该来自爱奥尼亚和爱琴海诸岛。¹⁷雅典人既信任这个同盟，也在利用它的神圣性。

很少有人认为在城邦内实行民主而在城邦外实行帝国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历史学家约翰·希利 (John Seeley) 爵士的箴言是“帝国与自由” (*imperium et libertas*)。¹⁸雅典人知道为何他们需要一个帝国：这并不只是为了抵抗波斯人；为了确保生存，雅典必须有足够的基本资源，必须有可以向其提供物资之地，且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占有可以确保引人物资的远程航线安全性的关键区域。雅典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谷物的供应。关于公元前 5 世纪雅典的规模有多大还存在争议。一种较为合理的估算是雅典及其阿提卡附属区域的人口为 33.7 万人。¹⁹仅靠当地资源是无法供养这么多人的。尽管阿提卡最开始并不被看好，但是此地还是有一些精耕细作的农耕区的。阿里斯托芬也描述道，雅典人可以从周边乡村买到多种类型的产品：黄瓜、葡萄、蜂蜜、无花果、萝卜。当地人甚至还设法种植了反季节作物，所以很难从农产品的种类分辨到底处于哪个季节。²⁰但

是古典时期的证据表明阿提卡拥有的资源可以养活约 8.4 万人，且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 10.6 万。²¹因此，雅典需要进口谷物以养活自己，这些谷物大多来自遥远的埃维厄、黑海 [或本都王国 (Pontos)] 和西西里。大约有一半的谷物是进口的，确保该城市的供给的是船主和谷物商人（他们是受到指责的对象）。

140 雄辩家伊索克拉底 (Isokrates) 大约于公元前 380 年对 “*klerouchoi*” 进行了描述，“*klerouchoi*” 指的是被派往雅典掌控下可提供物资的外邦领土的雅典殖民者。这些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拥有的土地相较于我们的人口规模很少，但我们的帝国很大；我们拥有的战船不仅是其他所有城邦战船总和的两倍，而且我们战船的战斗力足以对抗规模两倍于我们的海上势力”。²²他强调了埃维厄岛的重要性——“我们对它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控制程度”，因为早在前 506 年，雅典人就已经获取了伟大的哈尔基斯 (Chalkis) 家族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四千位公民，且六十年后伯里克利 (Perikles) 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分配。²³然而前 411 年，在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趋近结束时，埃维厄岛摆脱了雅典人的控制。修昔底德评论称：“对他们而言，埃维厄比阿提卡更有用。”且失去埃维厄岛造成的恐慌甚至比在西西里岛（雅典的另一个谷仓）的战败还严重。²⁴

基于公元前 4 世纪及后来很少被提及的证据，人们一般认为，黑海一直都是主要的谷物产地。²⁵但在前 4 世纪之前，黑海谷物偶尔才被提及，且它的提及意味着爱琴海区域出现了供给紧缺。雅典依赖整个爱琴海区域——色雷斯、利姆诺斯、埃维厄及莱斯沃斯——来满足其资源需求。在莱斯沃斯岛，两万

名莱斯沃斯耕种者的劳动成果被分配给三千位雅典人，这些雅典人允许一部分原住民作为农奴留在此地。²⁶所有这些表明，雅典采取措施促成了这一系统性的、有组织的谷物贸易，而不是随意地依赖商人们在爱琴海及其他地区能找到的谷物产地。²⁷该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是在雅典帝国的海外领地 (*chôra*) 获得大量土地的富人。²⁸

4

雅典无法容忍持异议者。公元前 470 年，当纳克索斯岛试图脱离提洛同盟时，雅典向纳克索斯人征收了现金税，以此替代原来从他们手中获得的船只。后来，雅典将这种做法向更多盟友推广，从留存下来的大量贡赋清单看，雅典是想以这种方式树立自己在爱琴海的权威。提洛同盟有一个实力较强的竞争者，即伯罗奔尼撒同盟。该同盟包含希腊南部的一些城邦，由斯巴达控制。修昔底德评论了这两个同盟的不同之处：

141

斯巴达人没有要求其盟邦缴纳贡款，但是要求它们接受那些为斯巴达利益工作的贵族寡头的统治。雅典则逐渐接管了盟邦海军的控制权，对于属于例外的希俄斯和莱斯沃斯则要求它们缴纳贡款作为替代。²⁹

因此，斯巴达与盟邦相互协作，雅典则凌驾于盟邦之上。但另一方面，雅典的盟邦对雅典的领导能力——特别是对远离其希腊本土之地的领导——印象深刻。雅典人很清楚，对外胜利可以提升其在爱琴海的霸主地位。前 466 年，盟军在雅典将军西蒙 (Kimon) 的率领下在距小亚细亚沿岸不远的欧里梅敦

(Eurymedon) 河口将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共有两百艘波斯船被击毁。盟军勇敢地抗击波斯人，于前 459 年派遣一支由两百艘船组成的船队前往埃及，支援一场反对波斯人统治的叛乱，但最终蒙受惨败之辱。十年之后，提洛同盟派西蒙率领一支船队前往波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进行骚扰。在同一时间，雅典人正在打击敌人和镇压叛乱，加紧对埃维厄岛的控制，并在前 466 年与他们最主要的竞争者斯巴达人建立了和平关系。因为斯巴达和雅典的关注点不同——雅典试图控制爱琴海地区，斯巴达则希望维持其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在它们之间划分利益范围并非难事。但一旦雅典和斯巴达被拖入小城邦间的纷争后，真正的麻烦就会出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其实可以追溯至亚得里亚海发生的一些事件，在伊利里亚边缘有一个很小但位置很有战略价值的城镇埃比达姆诺斯。该城位于一条日益重要的贸易路线上，这条路线始于科林斯湾，终于伊特鲁里亚殖民地斯皮纳及希腊殖民地阿德里亚，雅典是这条贸易线的一个较大受益者。埃比达姆诺斯的修建者是来自克基拉（科孚）的科林斯殖民者，因此该城镇是科林斯的孙邦，而且和大多数希腊城邦一样，它被贵族派与民主派的党争（公元前 436 ~ 前 435 年）撕裂了。民主派由于受到贵族派及其蛮族盟友伊利里亚人围攻，向克基拉求助；但是很明显克基拉对此并不关心。³⁰ 克基拉人自视有一支受人敬重的海军力量（拥有一百二十艘战船，仅次于雅典），与母邦科林斯——毫无疑问，双方的关系是冷淡的——在海上发生了争执：科林斯宣称克基拉并没有向作为母邦的自己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而克基拉则认为“这一时期，自己的财力足以使其与赫拉斯最富有的城邦平起平坐，而且其军力也

超过了科林斯”。³¹在科林斯回应其孙邦埃比达姆诺斯的请求，派殖民者前往帮助这座被围攻的城市后，其与克基拉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³²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斗因此在科林斯与克基拉之间的水域——克基拉认为这片水域属于自己——爆发了。克基拉人向雅典求助，因为他们认为雅典强大的海军力量可以牵制傲慢的科林斯。他们对雅典人说：“科林斯为了日后袭击你们，先对我们发起了攻击”。³³他们要求加入雅典的联盟，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一请求并不恰当，因为此前雅典与斯巴达达成了协议，双方希望维系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平衡。克基拉请求的具体内容如下：

赫拉斯有三大海军力量：雅典、克基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人首先控制了我们的海军与他们的联合在一起，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对付克基拉与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船队；但是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加入你们的联盟，你们的船只将和我们的船只并肩作战。³⁴

从这一席话可知，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将是不可避免的。前433年，雅典人派船前往位于克基拉和希腊陆地之间的西博达（Sybota）以援助克基拉人，在这里，科林斯及其同盟的150艘船对阵克基拉的110艘船。雅典船队的主要影响力是精神上的：雅典的船队一到达就加入了战斗，而科林斯人一看到雅典人就急忙逃走了，因为他们坚信还有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正在路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巴达很明智地对此事件袖手旁观。³⁵

修昔底德对战争和政治，特别对在雅典和斯巴达斗争期

148 间，希腊诸城邦做出相关政治决议的理由感兴趣。有一些他没有解开的谜团：为什么已经在爱琴海建立了一个帝国的雅典人，希望进入希腊西部海域、爱奥尼亚海及亚得里亚海？雅典人、科林斯人与克基拉人的商业利益在促使他们开战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科林斯人和雅典人并非没有看见公元前5世纪时亚得里亚海已经出现的新贸易机遇。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是雅典公民大会做出另一个决定的根本原因，此决定即围攻位于哈尔基斯半岛的科林斯殖民地（也是雅典的盟邦）波提狄亚（Potideia），该地距今天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不远。塞萨利（Thessaly）靠近一些谷物产地，雅典由此获得谷物供给，控制了塞萨利将有利于控制爱琴海北部诸岛，包括雅典统治下的利姆诺斯岛。与此同时，伯罗奔尼撒同盟内则出现了对于雅典日益增长的抱怨之声，有的甚至来自雅典自己的盟邦：位于阿提卡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艾伊娜对雅典驻军深表不满，因为这损害了其自治权。³⁶换言之，其他希腊城邦目睹了雅典人将原本的同盟体系转变为帝国的整个过程，它们想知道这一过程何时何地才会结束。斯巴达人决定领导这次对雅典的斗争。很多斯巴达人非常不愿意卷入战争，且当该事件被提交至公民大会进行投票时，究竟是主战派呼声高还是主和派呼声高，在一开始并不明显。³⁷

雅典与斯巴达战斗的第一回合是所谓的阿基达米安之战（Archidamian War，公元前431～前421年），在这一阶段，雅典可以在海上展示其航海水平之高。前428年，雅典强有力地回击了莱斯沃斯的一次反叛，当时莱斯沃斯的主要城镇密提林（Mytilene）的公民密谋推翻雅典的统治，并扩大自己的海军势力。³⁸他们告诉斯巴达人，雅典人“对我们的海军已经有了警觉，

以防我们形成一支力量且与你们或其他力量联合在一起”，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能给予我们全力支持，那么你们将赢得一个具有更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城邦（这是你们最需要的）”。³⁹伯罗奔尼撒人允许密提林人即刻加入他们的同盟，但这并没有挽救密提林被雅典再次夺回的命运。在随后发生的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藉的争吵中可以看出雅典民主的利己主义和排他性：雅典人同意了像克里昂（Kleon）这样的将军的残忍提议，将密提林男性全部处死，妇女儿童籍没为奴。一艘三列桨战船被火

144

速派往莱斯沃斯执行该法令。尽管如此，雅典人也进行了重新考虑，并派了另一艘三列桨战船前去撤销决定。它紧追第一艘船，虽然没有超过它，但还是按时到达并拯救了当地百姓。这就是帝国。之后由于反叛依旧不断发生，雅典人逐渐剥夺了其盟邦的独立权，不再以平等态度待之。

伯罗奔尼撒战争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造成这种结果的既有疾病又有人类的残酷行为。瘟疫（可能是鼠疫）于公元前 430 年到达希腊，并摧毁了雅典。地中海上的交通线总是为流行病的传播提供路径，文献中记载的一些更为典型的案例，如 6 世纪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以及 14 世纪的黑死病，都将戏剧性地揭示这一点。但人们并没有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这种疫病给予较多关注，而将其看作诸神对人类恶行的惩罚。

公元前 425 年，雅典人试图在派娄斯建立一个基地，从而将战争引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派娄斯是古内斯托尔（Nestor）的前首府，可以从这里对斯巴达的谷物供应路线进行干扰。⁴⁰结果四百二十名斯巴达重装步兵发现自己被困于派娄斯对面的斯帕克特里亚岛（Sphakteria）上，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命运似乎与未来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可能是斯巴达精锐

部队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回归对斯巴达至关重要。斯巴达人与雅典的一位将军达成一个局部停战协议，他们将把停留在此水域的约六十艘船交给雅典作为抵押，直到双方完成协商。所有迹象似乎都显示战争即将结束，但是当斯巴达使团真正面对雅典公民大会时，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对其敌人事实上的胜利给予让步。⁴¹所以战争仍然继续，且雅典将军克里昂带领一支特遣队对派娄斯进行了突然袭击，并俘获了被困于斯帕克特里亚的重装步兵——这并不是温泉关之战的重演。⁴²

这场战争很快延伸至爱琴海和克基拉周边水域以外。但为何雅典人会于公元前 427 年在西西里岛开辟一个新战场，还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希望切断从西西里岛向伯罗奔尼撒诸城邦运送谷物的路线。且他们也开始怀疑“他们能否获得对西西里岛的控制权”。⁴³习惯于控制岛屿的雅典人并未认识到西西里岛有多大，也不了解想要控制这个岛屿将面临多少竞争压力：迦太基人是一个潜在的对手；叙拉古人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威胁，因为他们是多利亚殖民者，装备精良，并拥有一大支船队，而该力量可能会倒向伯罗奔尼撒一方。⁴⁴自古以来的忠诚开始展露出来，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西西里岛的殖民者分为两个阵营：支持雅典联盟的爱奥尼亚人和本能地支持斯巴达的多利亚人。西西里岛东部正与叙拉古交战的爱奥尼亚殖民地莱翁蒂尼（Leontini）向雅典求助，雅典的回应是派出二十艘船作为支援。雅典的自信因其快速的成功而增强，这些胜利包括解救莱翁蒂尼和在墨西拿海峡确立统治权。叙拉古似乎比雅典预期的更软弱，对西西里岛的征服似乎是可行的。但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假设。

在雅典与斯巴达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西西里岛问题重新出

现了。雅典盟友的范围已经扩展至整个西西里岛，甚至已经包含了西西里西部希腊化的伊利米人。塞格斯塔（Segesta）或埃格斯塔（Egesta）的居民已经开始修建宏伟的神庙，该神庙至今依旧矗立在那里。他们视雅典为可帮助他们抵抗叙拉古及其同盟的保护者；当塞利诺乌斯（Selinous 或 Selinunte）的多利亚人向南袭击塞格斯塔时，塞格斯塔便派出使节前往雅典寻求援助（公元前 416 年或前 415 年）。塞利诺乌斯是另外一座西西里城市，其宏伟的神庙现在依旧留存。塞格斯塔的使节强调，这只是叙拉古和多利亚希腊人试图赢得整个岛屿控制权的开始，这一说法足够可信，因为几位叙拉古的僭主已经有了统治大西西里的野心。所有这些论证都助长了雅典人重开西西里战线的热情。⁴⁵塞格斯塔为雅典人的援助准备了回报，他们向雅典人送去了六十塔兰特的未被铸造成钱币的银锭作为礼物；雅典回访塞格斯塔的使节也受到饮宴款待，所用的餐具均用金银制成，他们离去时的印象是，该岛的富有令人难以置信，其财富可很好地服务于雅典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塞格斯塔人反复使用了自己为数不多的精美餐具，当雅典使节在一个又一个塞格斯塔家族接受款待时，这些餐具也在挨家挨户地传递。⁴⁶所有这些都足够诱惑贪婪的雅典人，于是经过公民大会投票决定，雅典派出六十艘船前往西西里岛。被派往西西里岛的将军中有明确支持西西里远征的亚西比德（Alkibiades），他后来毫无廉耻地先后效力于雅典、斯巴达和波斯，直到战争末期才作为雅典潜在的拯救者获得雅典人的尊敬。⁴⁷亚西比德并未被给

敌人。

公元前 415 年，雅典人最终向叙拉古发起了进攻，这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城市，因为它位于山崖上，扼守着前往大海港的入口。而在叙拉古北部交战的双方试图在沼泽地、采石场及开阔地上筑起围墙——叙拉古人筑起守卫城墙用以隔离雅典人，雅典人则筑墙围困叙拉古以断其供给。但这场战斗并非孤立地进行：斯巴达人派出了援助部队；雅典人则向不是希腊人的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海军求助。伊特鲁里亚人派出一些船以展示自己的价值；迦太基人则更乐于坐山观虎斗，因为像叙拉古一样，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势力已经给其带来诸多不利。⁴⁸ 斯巴达将领吉里普斯（Gylippos）率领一支小型船队和陆军到达此地，削弱了雅典人的士气。当战争打响时，叙拉古船队固守大海港的入口，最终击败了雅典海军（包括一些刚到的援助部队）。⁴⁹ 海上胜利发生不久后叙拉古人又取得了戏剧性的陆上胜利。七千名雅典士兵被俘，并被带至叙拉古附近的采石场，他们在那里忍受高温折磨，最终有数千人死于中暑和营养不良。很多人沦为奴隶，不过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如果有人能背诵欧里庇底斯（Euripides）的作品，那么他就可获得自由，这是因为欧里庇底斯的戏剧深受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喜爱。⁵⁰ 因此，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以一次后果与瘟疫一样惨烈的灾难结束。从政治上看它也是灾难，雅典的威望大大折损，人们因此感到雅典的政策缺乏方向性，而且这一时期雅典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亚西比德此时已成了斯巴达的座上宾。

雅典决定对西西里岛作战的本意是干扰这里对伯罗奔尼撒的谷物供给，可现在雅典正面临谷物供给中断的威胁。至公元前 411 年，斯巴达人积极与波斯人建立联盟，他们希望将腓尼

基人的船只引入爱琴海。波斯人的态度不明朗，因为他们也在与雅典进行洽谈。对于他们来说，希腊人内斗到筋疲力尽之时，他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前 411 年波斯人向斯巴达人许诺的腓尼基船只从未到达，但是伯罗奔尼撒人利用自己的海军力量赢得了对赫勒斯滂的控制权，并在地处战略性位置的拜占庭煽动了叛乱。在赫勒斯滂的一系列海战中，斯巴达人由于缺乏海上作战经验而被雅典海军钻了空子，雅典因此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对于雅典而言，这些胜利并非易事，一次战役的失利就可能整个战事的失败。⁵¹前 406 年，在位于希俄斯岛与小亚细亚之间的阿吉纽西（Arginoussai），雅典以仅损失一百五十五艘船中的二十五艘的结果，取得了一场巨大的海上胜利，但是后来海军将领被送上法庭，这场胜利因此付诸东流。他们因没有将落水淹死的雅典船员的尸体捞回而被判处渎神罪。

对此斯巴达人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正忙于建立一支他们自己的船队。⁵²简单掠夺阿提卡已经无法为他们带来胜利；这是一场必须在海上取得胜利的战争。公元前 6 世纪，斯巴达已经在海上向萨摩斯岛的波吕克拉特斯发起了挑战，且斯巴达在海军上下的功夫不容小觑。斯巴达人成功调动了盟邦和附属城邦，他们雇用了希洛人作为桨手。在与雅典人作战的晚期，最成功的一位斯巴达海军将领名为莱山德（Lysander），他在人们眼中十分善战，即使在其任期已满、不再有资格担任海军将领后，他仍被任命为名誉海军将领，以此身份留在军中并完成了击败雅典的任务。他就是在前 405 年的羊河战役（Aigospotamoi）中带领斯巴达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取得战争胜利的将领，在他的指挥下斯巴达人几乎俘获或击沉了整支雅典海

军。⁵³雅典人不得不向其求和，他们的帝国分崩离析，至此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霸主，虽然在前4世纪初为了维持霸权，它不得不在陆上和海上进行艰难的斗争。⁵⁴

伯罗奔尼撒战争将原来由雅典人控制的爱琴海转变成了斯巴达人的湖。同时这场战争在亚得里亚海和西西里岛也引起巨大反响。在这场战争中，帝国野心与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是应由谁来控制将谷物从西西里岛、爱琴海和黑海运往雅典和其他城邦的供给线。至公元前148 4世纪末，城邦时代已开始走向尽头。痴迷于增强自己神圣权威的马其顿王多次进行征战，东地中海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包括谷物的运送）因此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而在地中海西部，迦太基遇到了试图挑战其区域性霸权的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争夺该海域的新一轮大战即将发生。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地中海非洲一侧海岸的两座城市——迦太基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将在地中海的政治文化史中占据主导地位。

注 释

1.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Oxford, 1959), p. 226.
2. Thucydides 1:5.
3. Aeschylus, *The Persians (Persae)*, trans. Gilbert Murray (London, 1939), ll. 230-34, p. 30.
4. A. R. Bur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Greece* (Harmondsworth, 1966), pp. 146, 159; Hammond, *History of Greece*, pp. 176, 202; J. Morrison and J. Oates, *The Athenian Trireme: the Histo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 Ancient Greek Warship* (Cambridge, 1986).
5. Thucydides 1:21; Herodotos 3:122; C. Constantakopoulou, *The Dance of the Islands: Insularity, Networks, the Athenian Empire and the Aegean World* (Oxford, 2007), p.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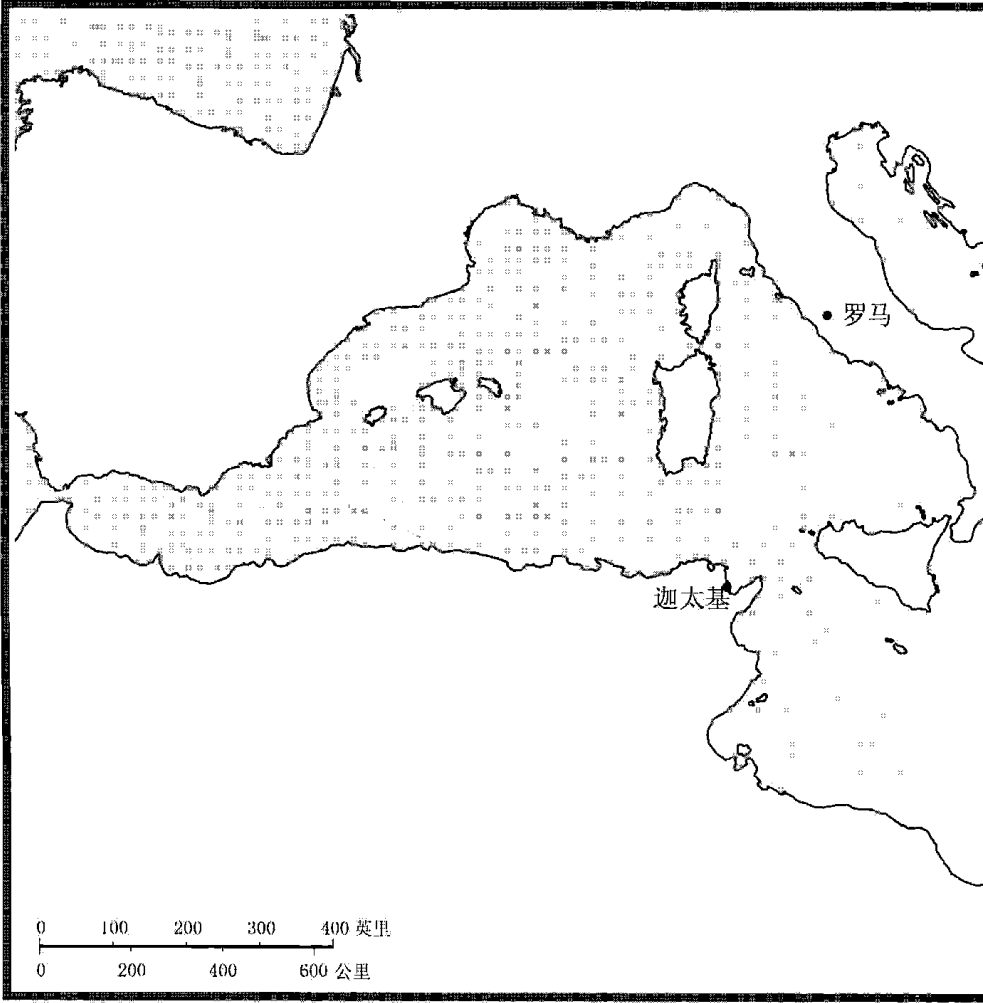
6. Herodotos 5:31.
7. Burn, *Pelican History*, p. 158.
8. P. Cartledge, *The Spartans: an Epic History* (London, 2002), pp. 101-17.
9. Burn, *Pelican History*, p. 174 – cf. Hammond, *History of Greece*, p. 202.
10. On numbers: W. Rodgers, *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Annapolis, MD, 1937), pp. 80-95.
11. *Ibid.*, p. 86.
12. Aeschylus, *Persians*, ll. 399-405, p. 39.
13. J. Hale, *Lords of the Sea: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Ancient Athens* (London, 2010).
14. Thucydides 1:14.
15. *Ibid.* 1:13 and 3:104; Constantakopoulou, *Dance of the Islands*, pp. 47-8.
16. Thucydides. 3.104 (trans. Rex Warner); cf. Homeric Hymn to Delian Apollo, ll. 144-55.
17. Constantakopoulou, *Dance of the Islands*, p. 70.
18. 这句话写在了剑桥大学历史系以约翰·希利爵士命名的图书馆的大门上。
19. A.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the Athenian Grain Supply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Oxford, 2007), pp. 28-31.
20. Aristophanes, *Horai*, fragment 581, cited in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p. 75.
21. Cf. P.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Cambridge, 1988), and M.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1973).
22. Isokrates 4:107-9, cited in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p. 77.
23.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p. 100.
24. Thucydides 8:96; cf.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p. 126.
25. Herodotos 7:147.
26. R.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1972), pp. 121-3, 530;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p. 318.
27. Moreno, *Feeding the Democracy*, p. 319; cf. P. Horden and N.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2000), p. 121.
28. P. J. Rhodes, *The Athenian Empire (Greece and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no. 17 (Oxford, 1985).
29. Thucydides 1 (trans. Rex Warner).
30. *Ibid.* 1:2; J. Wilson, *Athens and Corcyra: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Bristol, 1987); D. Kagan, *The Peloponnesian War: Athens and Sparta in Savage Conflict 431-404 BC* (London, 2003), p. 25.
31. Thucydides 1:2 (adapted from version by Rex Warner).
32.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 27.
33. Thucydides 1:3.
34. *Ibid.*
35. Thucydides 1:4;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p. 34-6, and map 8, p. 35.
36. Thucydides 1:67.2;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 41, n.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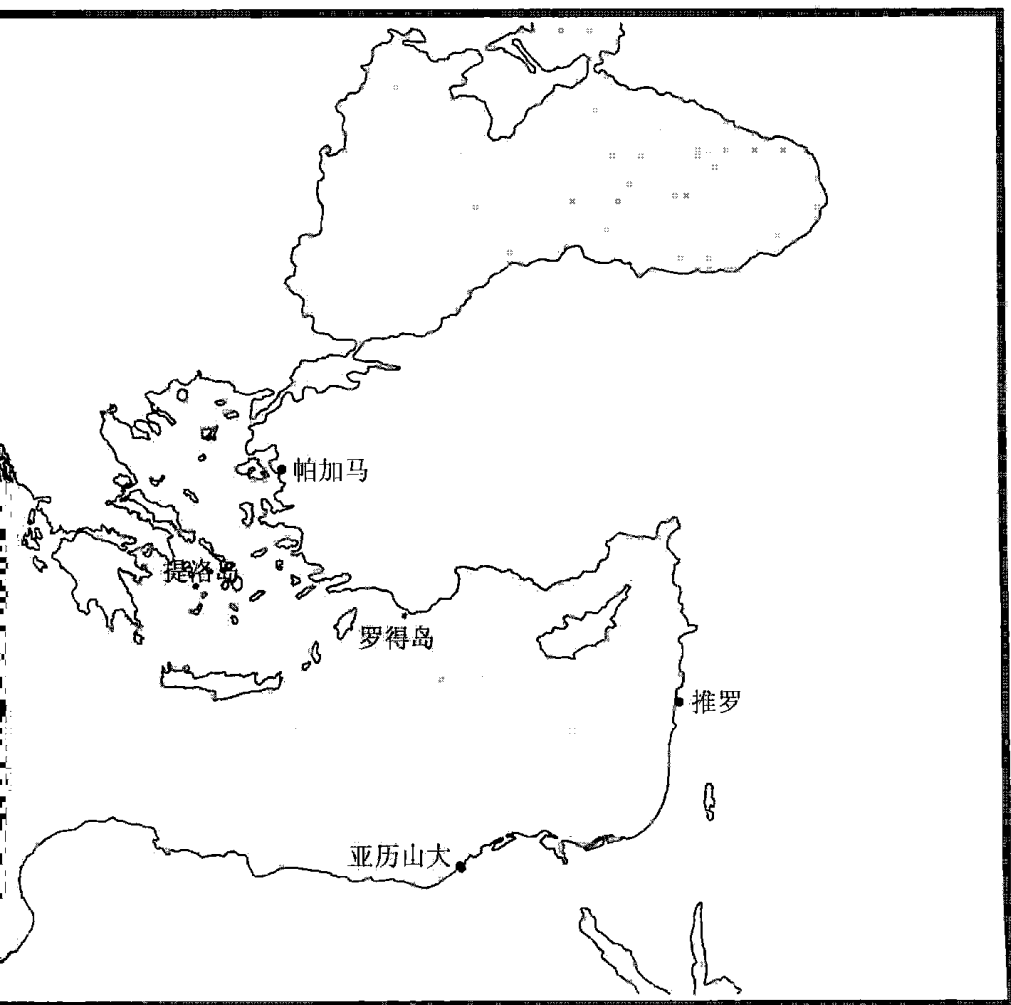
37. Thucydides 1:6.
38.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p. 100–101; Constantakopoulou, *Dance of the Islands*, pp. 239–42.
39. Thucydides 3:13.
40. *Ibid.* 4:1.
41.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p. 142–7.
42. Thucydides 4:2.
43. *Ibid.* 3:86.4.
44. *Ibid.* 6:6.1;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p. 118–20.
45. Cf. Thucydides 6:6.1.
46. *Ibid.* 6:46.3.
47. W. M. Ellis, *Alcibiades* (London, 1989), p. 54.
48.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 280.
49. Rodgers, *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pp. 159–67.
50. Kagan, *Peloponnesian War*, p. 321.
51. *Ibid.*, pp. 402–14.
52. *Ibid.*, pp. 331–2.
53. Xenophon, *Hellenika*, 2:1; Cartledge, *Spartans*, pp. 192–202.
54. Xenophon, *Hellenika*, 3:2, 3:5, 4:2, 4:3, 4:4, 4:5, 4:7, 4:8, 4:9, etc.

六 地中海的灯塔 (前 350 ~ 前 100 年)

1

公元前 333 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49 他宣称自己是希腊人，但受到了雅典人的质疑）在奇里乞亚门（Cilician Gates）外的伊索斯（Issos）战役中大败波斯军队，报复了在以往几个世纪中把希腊置于威胁下的波斯王。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波斯腹地追捕波斯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他很清楚沿地中海海岸压制波斯力量的必要性，并向南进军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无情地攻占了之前向波斯提供船队的腓尼基城市。他建立了一个大堤将推罗与大陆永久相连，但即使如此，推罗的抵抗还是持续了七个月之久，这激怒了他。推罗被攻陷后，其大部分居民或被屠杀，或被籍没为奴，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¹ 他绕开耶路撒冷，择路穿过加沙，因为这一阶段他的真正目标是埃及。自冈比西斯统治时期起，埃及已被波斯总督统治了近两百年，亚历山大三世对这片土地的征服不仅改变了埃及，也改变了整个东地中海。他的胜利使埃及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定位，开始将目光朝外投向地中海，而非局限于其内部的尼罗河河谷。² 前 311 年，他决定在埃及北部边缘的一处石灰岩岬角上建立一座城市，这个岬角与内陆的冲积平原间隔着一个湖泊。与其说这是一座埃及城市，不如说它是毗邻埃及的城市，这也可由之后的拉丁文文献对其的称呼证实：它被





称为“*Alexandria ad Aegyptum*”，意为“通往埃及（或邻近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亚历山大城都将被更多视作一个地中海城市而不是埃及城市，直到 20 世纪外国势力被逐出此地后人们才改变了看法。在这两千多年间的多数时期，它都是地中海最伟大的城市。

亚历山大建立此城的动机必然包括为自己歌功颂德。³ 不久前他在下埃及古都孟菲斯被加冕为法老。而且在考察了亚历山大城城址后，他拜祭了宙斯/阿蒙神，此后他便自认是该神明的儿子，而非著名的马其顿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其对希腊的多次征战已经为亚历山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的儿子。他对荷马的著作十分痴迷，且（据普鲁塔克记载）荷马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梦里，让他想起《奥德赛》中的一个章节，据其描述，在距埃及海岸不远的—个被称为法罗斯（Pharos）的岛屿上有一个良港。他对于亚历山大城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潜力十分清楚，且为其作传的阿里安（Arrian）坚持认为，亚历山大积极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规划。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画线工具可用来在地上勾画城墙的轮廓，亚历山大的建筑师建议用大麦粉代替，而这要从马其顿士兵的给养中抽取。最终确定城市边界的是被面粉引来的一大群鸟。⁴ 同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新兴城市相同，亚历山大城的街道呈棋盘格状，其大部分格局被保留到了今天，但早期亚历山大城宽阔的街道已经变窄很多，且在水位线以上几乎找不到古代城市的痕迹——建于公元前 4 世纪后期的所有建筑都不复存在了。亚历山大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它东西长三英里（五公里），南北宽度大约为东西长度的一半，是一个狭长的城市，据说像一件希腊式披风（*chlamys*）。⁵ 港口在城市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港口

间由一道长长的防波堤隔开，这道防波堤又将新城与荷马口中的法罗斯岛连在一起。

很快，亚历山大就将埃及抛在后面，成功地经波斯挺进印度，然后在亚历山大城建成八年后，他于巴比伦去世，年仅三十二岁。⁶ 他建立一个希腊 - 波斯大帝国，将两个伟大民族的高等文化结合到一起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他的帝国被三名争夺权势的将军瓜分，分成马其顿与希腊、叙利亚与东方，以及埃及。正是在控制埃及的那位将军建立的王朝下，亚历山大在埃及边缘建立一座伟大城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外号“救星”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凭借个人能力手握大权，他自称法老，将希腊和埃及的统治和治理理念结合起来。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雕像在表现法老时呈现出极强的传统风格，希腊人的发式偶尔才得以保留，而且托勒密人还按照古代埃及的风格为埃及诸神建造神庙。对于托勒密人来说，娶自己的姐妹也成为惯例，就像过去法老们长期坚持的那样，这种做法在希腊人中并不存在。⁷ 亚历山大城成了重焕光彩的希腊文化最活跃的中心，这种希腊文化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希腊化”文化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属于希腊人。希腊化风格的艺术传入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希腊化的概念征服了犹太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希腊化文化常常被视为古代雅典的通俗化的古典文化，以艺术和建筑的绚丽风格——古希腊的样式——为主要特征。然而，希腊科学与文化界最闪亮的几颗明星正是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特别是亚历山大城（而非希腊本土）中诞生的。他们中有数学家欧几里得、发明家阿基米德、喜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到后来罗马人统治的早期，则有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和名医伽林（Galen）。在这种开放的新型希腊文化向

地中海传播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城发挥了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它成了地中海文化的灯塔。

托勒密王朝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宗教政策令人印象尤为深刻。早期的托勒密人野心勃勃、活力四射且极富求知欲，他们愿意接受不同的文化，在管理埃及经济时也颇有远见。把亚历山大城建造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的是他们，而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托勒密一世（亡于公元前 283 或前 282 年）和“恋姐者”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os，亡于前 246 年）把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引入了亚历山大城。许多犹太人因为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爱戴，作为忠诚的士兵来到此地；此后，“亚历山大”一直是犹太人最喜欢的名字之一。当然，他们的信仰与众不同，但托勒密王朝并不想进行干涉。亚历山大城东部有一块叫作三角洲（Delta）的重要区域，那里逐渐成为犹太人的活动中心，地中海沿岸的第一个大型犹太人聚居区也由此形成。古代的以色列人主要过着相对封闭的田园生活，被生活在沿岸地区的腓利士人和其他民族围在内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在地中海此前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亚历山大城的建立，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开始慢慢向地中海传播。斐洛强调摩西作为律法制定者的地位，以及由摩西传承下来的神圣律法的价值。这种强烈道德启示与有组织律法体系的结合，以及一神论智识层面的吸引力，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为犹太教吸引了众多皈依者和同情者。后来的犹太人在描绘这个时期时通常强调希腊与犹太文化间的敌对，以及时常因此发生的暴力冲突，这种矛盾最终酝酿出了前 2 世纪反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塞琉古（Seleucid）统治者的马加比起义（Maccabean revolt）。虽然这一点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贯彻得很

好，但这些统治者未能坚持尊重犹太教的传统：塞琉古人试图废止包括割礼在内的犹太人习俗，并在他们的神庙中举行异教的献祭。纪念犹太人起义的光明节（Hanukkah）逐渐成为为纪念对希腊化的完全摒弃而举行的庆典。尽管这次起义反映了对希腊化的反感情绪，但这些情绪本身也揭示了绝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已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他们因参与竞技比赛和学习希腊哲学而受到批判。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而非阿拉姆语（Aramaic，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方言），不久后希腊语版的《圣经》就会出现。此外，在亚历山大城诞生之初的两个世纪中，希腊人和犹太人和谐地睦邻而居。犹太人在他们的许多会堂中都镌刻了纪念托勒密人并盛赞这个王朝的铭文，但同时他们拒绝接受异教神庙把托勒密人奉为“神圣”的做法。⁸

托勒密一世为城中的其他居民，特别是希腊人，带来了一位新的崇拜对象——萨拉皮斯神（Sarapis）。萨拉皮斯身上的部分元素源自埃及，他是公牛之神阿匹斯（Apis）与复活之神奥西里斯（Osiris）的结合体 [因此，这位神事实上应被叫作“（奥）西里 - 阿匹斯”（[O] sir - apis）]。但萨拉皮斯也吸收了希腊神祇——狄奥尼索斯、宙斯（与奥西里斯的性质相当），甚至冥界之神哈迪斯（Hades）——身上的一些元素。他还与希腊神话中的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有关。在他的画像中，他通常把一个量谷器皿放在自己的头顶，这一形象展现了他与埃及的富饶及其规模逐渐扩大的谷物贸易的关系。因此，这样一个折中形象既可用希腊风格又可用埃及风格表现。⁹托勒密人在萨拉皮斯神可能的出生地——孟菲斯为其建造了一座被称为萨拉皮翁（Sarapeion 或 Serapaeum）的

大型神庙，装饰这座神庙的是“纯希腊式的”雕像；亚历山大城的萨拉皮翁神庙的周围却都是埃及风格的斯芬克斯像，其中有些斯芬克斯今天仍然存在。萨拉皮斯在亚历山大城极受欢迎：“尽管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这种创造新神的做法并不稀奇。”¹⁰这是因为希腊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神只能是希腊化的神，同时对于神在不同民族前有着不同形象一事，他们也能接受。因此，萨拉皮斯神的创立构成了埃及神祇适应希腊文化的过程中的一环。希腊人的问题不是“你们的神与我们的神有何不同”，而是“你们的神与我们的神哪里相同”。萨拉皮斯神的折中特质还向人传递了一种感觉，即奥林匹亚的十二位主神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他们的拟人化是一种把大量混杂的神圣特征合理化的过程。折中态度有时还表现为把萨拉皮斯神奉为“三位一体”的希腊或埃及神祇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这种倾向继续发展，最终萨拉皮斯被描绘成宇宙间的唯一真神，他的信徒彻底成为亚历山大城中基督徒的竞争对手。¹¹

2

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治下的第二个重要创举是在法罗斯岛上建造了大灯塔；“法罗斯”一词在希腊语、拉丁语以及
155 罗曼语系中被保留下来，它直接就意为灯塔。大灯塔很快就被列为一大世界奇迹，与它同为世界奇迹的还有罗得岛巨像：这两处纪念性建筑都彰显了它们所在城市的荣耀，且同时强调了一个事实：这种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灯塔是亚历山大城早期构想中的一部分，其修建工程始于公元前 297 年，前 283 年才结束。修建这样一座灯塔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必

要：海岸附近有夜间无法看见且日间也难以发现的浅滩。如果这座城市想要成为地中海贸易中心，那么通往亚历山大城的道路就应该变得更为安全。托勒密人的这座屹立于海波之上的巨型建筑高一百三十五米（四百四十英尺），它分为三部分，最底层是面积逐渐向上收缩的方形平台，在那之上是一座顶部为圆形石柱的八角塔，柱顶上矗立着宙斯的巨型雕像。巨大的镜面将光线投向数英里以外的海面，根据比较合理的推测，这一距离约为四十英里。灯塔究竟如何照明至今仍然是个谜。尽管15世纪晚期修建于此地的马木留克堡（Mamluk fortress）——它规模更小，但仍然十分壮观——重新使用了原灯塔的部分设施，尽管现代的水下考古活动发掘出了灯塔规模可观的残迹，但法罗斯灯塔的确切外形和运作方式仍然难以确定。

灯塔以及亚历山大城的修建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托勒密家族控制了大量资源。他们不只利用了这些资源，还在亚历山大城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事实上，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亚历山大城从埃及内陆获取的财富至少不亚于来自地中海的收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认为“该城从河道获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来自海洋的收益，因此湖畔边的港口比海港更为富庶”，不过他在托勒密一世与托勒密二世的黄金时代之后的数个世纪，也就是公元1世纪初期，才写下了这段文字。¹²亚历山大城两方兼顾，将埃及与地中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而与地中海世界外部的联系——经红海与印度的联系——则确保了亚历山大城作为印度洋与地中海间第一港口的地位，且在之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它始终保持了这一地位。托勒密家族眼光独到，知晓如何维系亚历山大城乃至整个埃及的经济活力。他们明白仅依靠亚历山大本身并不能控制

海上商路。他们致力于将腓尼基诸城纳入自己的掌控下，这使他们与对手塞琉古人陷入冲突。如果他们想要维持强大的舰队，那么就需要将其政治影响力延伸到埃及以外的地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盛产木材的地区：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安纳托利亚南部。同样，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也无法掌控这些地区。¹³于是海军的军备竞赛开始了，扩大的不只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舰队规模，舰船本身的体积也变得更大。前4世纪，双方有时拥有的舰船有300多艘。腓尼基人的造船厂用黎巴嫩的雪松为塞琉古诸王打造出一支强大的舰队。托勒密二世的舰队则拥有336艘舰船，其中包括224艘四列桨座式战船、三列桨座式战船和小型舰船；但其中还有许多巨型船，它们是17艘五列桨座式战船，以及可能两边装备着更多桨手的更大的船——5艘“六列桨座式战船”、37艘“七列桨座式战船”、30艘“九列桨座式战船”、14艘“十一列桨座式战船”以及2艘超大的“三十列桨座式战船”。后来，外号“笃爱父亲的人”的托勒密四世（Ptolemy IV Philopator，于前204年去世）要建一艘“四十列桨座式战船”，这可能是一种大型的双体船。¹⁴这些船的名称是桨手具体数目的直接反映，还是仅表示“要比之前的大船更大”，对此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托勒密四世的“四十列桨座式战船”从未投入战斗，可能它并不适合作战；但它充分地展现了埃及希腊化的法老们的富庶和强大。其长度超过130米，宽度超过16米，据说可容纳4000名桨手和3000多名辅助海员。单为这样一艘船补给食物和饮水就需要一支小型舰队。¹⁵然而，一艘如此大尺寸的船的用途并不只有展示实力。在以色列阿特利特（Atlit）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只2.25米长、465千克重的撞角，它属于前2世纪的

一艘战船。¹⁶

除用于建造舰船的木材，托勒密王朝还需要寻找金、银、锡、铜等矿产资源。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当赫梯人、腓利士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积极用铁来制造武器和各种工具时，埃及人却奇怪地无视了这种金属。这或许是因为埃及的土壤在尼罗河河水泛滥后便十分易于耕作，因此埃及人完全不需要铁制重型。但另一方面，埃及的金属制造业确实十分繁荣，金、银、铜等金属制作的盘子的出口成了亚历山大城的一大优势产业，其他出口货物还有织物、陶器以及作为该城特产的玻璃。¹⁷莎草纸是埃及的另一种特产，从维纳蒙所处的公元前 11 世纪起，周边地区就对它有着极大的需求，如今埃及的莎草纸已遍布地中海各地。迦太基是销售这些货物的主要市场之一，迦太基人还使用托勒密王朝的重量标准来制作货币。迦太基对托勒密王朝而言很有价值，因为西班牙和撒丁岛的白银正是通过迦太基流入埃及的。¹⁸埃及与罗得岛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前 3 世纪，罗得岛是与亚历山大城齐名的商贸重镇。亚历山大城因此被建设成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之一，它如此具有活力，不仅因为托勒密王朝在其统治早期取得了辉煌成就，还因为它迅速地融入了希腊化的贸易网。

从埃及的沙漠中出土了一些莎草纸文献，其中提到了托勒密二世政府中的一名行政人员，他的名字叫阿波罗尼奥斯 (Apollonios)。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份公元前 3 世纪的商船货单，记录了从叙利亚发往亚历山大城的阿波罗尼奥斯家中的货物，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主要有哪些贸易品——有来自黑海的坚果（一直是地中海商路上很受欢迎的商品），有来自希俄斯岛的奶酪，有橄榄油、无花果、蜂蜜、海绵和羊毛，还有

从外国进口的野猪肉、鹿肉和山羊肉。但占据船舱大部分空间的是葡萄酒——船上有盛放普通葡萄酒的138只双耳罐和6只半双耳罐，以及盛放甜葡萄酒的5只双耳罐和15只半双耳罐。这种贸易在征税方面十分谨慎、精确。¹⁹同过去的法老一样，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对贸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而且他们并不打算放松这种控制。在船只抵达事先指定的港口后，船上的货物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后来的罗马人、拜占庭人以及阿拉伯人也使用了这套古老的商业征税制度，它被称为“按价征税”（*ad valorem taxes*），表示在货物估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征税，有时税率会高达50%（葡萄酒和橄榄油），有时则只征收估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仅港口会征收这种税，当货物沿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时，沿岸的征税站也会征税。²⁰这种征税体系的一个后果是，当货物抵达亚历山大城的码头时，商人们不得不抬高货物的价格。然而人们对产自埃及的谷物和其他产品需求十分强烈，因此它们仍然能够在东地中海找到买主。此外，亚历山大城是把印度洋与地中海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商”，这一职能也使城中的居民获益匪浅。虽然在此之前，希腊商人已经在瑞克拉提斯和其他地方开始从事印度洋和地中海间的贸易，但亚历山大城的加入使这种贸易的规模急速扩大。158 黄金、乳香和没药是从红海运来的三种最受欢迎的物品。在前270年或前269年，“恋姐者”托勒密二世重新开凿了一条运河，将尼罗河三角洲与西奈半岛西部的数个湖泊连接起来（如今这条运河被苏伊士运河横穿而过），开辟了一条通往红海的商路。来自印度的货物在亚历山大城中随处可见，托勒密王朝还凭借来自非洲和印度的大象建立了一支大象军队。²¹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列举了一艘名为“赫尔马波罗”（*Hermapollo*）

的船上搭载的货物，该船从印度运回了 60 箱甘松、5 吨重的普通香料以及 235 吨重的象牙和乌檀木。²²地中海的大宗香料贸易早已成形，就算是葡萄牙人在 15 世纪末开辟的经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也没能动摇亚历山大城作为最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的地位。

谷物是在亚历山大城的商贸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部分原因是这座城市需要获得补给。先前建造的运河将亚历山大城背后的马雷奥蒂斯湖（Mareotis）与尼罗河三角洲连接起来，谷物的获取得到了保障。但托勒密人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对谷物的需求始终存在；雅典可能转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寻找粮食供应，但罗得岛则渴望购买埃及的谷物以满足自己和贸易伙伴的需求。²³由此一来，托勒密人发现自己占尽优势：他们继承自埃及人的政治制度规定，埃及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法老的所有物，他们因此就能够对农民征收较高的租金，且要求农民上缴其土地的一半产出。鉴于在尼罗河河水泛滥之后土壤会变得十分肥沃，这样的要求似乎算不上毫无道理。与此同时，出口市场又浮现出了新的机遇：黑海地区面临凯尔特人和斯基泰人的不断入侵，这里的粮食生产和通往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运粮路线因此受到严重破坏。托勒密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谷物贸易获利，于是开始努力提高谷物生产的品质与数量。他们扩大土地耕种面积，鼓励人们使用铁制农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铁制农具给埃及农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这几乎可被称作农业革命。”²⁴灌溉系统也得到改进，托勒密人发明了一些灌溉土地的新装置，其中就包括阿基米德螺旋泵，它至今仍是埃及农夫钟爱的工具，在当时它被称为“蜗牛”或“克齐里阿斯”（*kochlias*）。²⁵波斯人曾引入一种新型小麦，它要优

于埃及人种植的各种传统麦子，这种小麦的优势在亚历山大在世时就已经得到重视。葡萄的种植活动迅速扩展到了亚历山大城对岸，且当地生产出了一些优质的葡萄酒。对托勒密人而言橄榄油业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因为在托勒密王朝之前，埃及的橄榄树种植并没有如此广泛。由此，托勒密人为埃及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并且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了拜占庭时期。

3

托勒密人在花钱方面毫不吝啬。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在途经叙利亚时被托勒密人抢走，并被葬于亚历山大城中心的豪华墓葬中（寻找墓葬的具体位置一直是深受亚历山大城市民喜爱的消遣），托勒密王朝由此获得了荣耀。但亚历山大城本身就充满活力，其最伟大的建筑毫无悬念就是那些附属於城北大规模宫殿群的建筑物。托勒密人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机构，它们证实了托勒密人的强烈的学术热情，也证实了他们当时的一种决心，即无论他们要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大、最好。这两个机构便是亚历山大学宫（Mouseion）与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凭借埃及的莎草纸，托勒密人建立了有史以来收藏最为丰富的文献中心。设立学宫（献给缪斯女神的神龛）的想法并非首创 [它的修建可以参考雅典的著名先例，且托勒密一世也采纳了学识过人的雅典人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os of Phaleron，约公元前 350 ~ 前 280 年）的建议]，但其规模、存在时间以及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不单是一个教授音乐、哲学和艺术的祭祀中心。它是一所高级研究机构，是一间万灵学院，这里的学者们大多不用

承担教学任务，可以全身心投入文学、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当中。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学宫还设有一间公共休息室，学宫成员们可在此共同进餐。该机构拥有一笔捐款，国王任命一位祭司主持这里的工作。²⁶

另一处伟大的学术机构大图书馆也极为神秘。它并非公共图书馆，不过专业学者均可进入，且馆中设有侧厅，学者们可在其中讨论问题并一起工作。该图书馆的修建源于托勒密一世的一个决定，他想要“将所有民族的著作收集起来，只要它们是值得关注的”。²⁷尽管学宫据称主要研习希腊文化，但图书馆的关注范围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希腊世界，不过绝大多数非希腊语的文献在存放之前都已被译成希腊语版，如埃及法老们的编年史、希伯来语的《圣经》、印度的传说。在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及其能力卓绝的继任者们的指导下，图书馆被安置在托勒密家族宏伟的宫殿群落中的某一处。虽然不久后塞拉皮翁（Serapeion）又建了一座“子图书馆”，而且那里的交通更为便捷，不过该馆的藏书规模似乎只有主馆的十分之一——这里只有4.28万卷莎草纸文献，而主馆则藏有40万卷各种各样的“混合”图书以及9万卷“未被混合的”图书。²⁸有些卷册包含数种著作，但较长的作品[对此，亚历山大城的诗人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有个著名的说法，即“大书即大恶”（*mega biblion, mega kakon*）]被分成独立的卷册。然而，证据表明在图书的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矛盾。托勒密人决定要拥有伟大作家们的最好作品：他们骗雅典人要对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底斯等人的作品进行抄录，请他们将这些大师的剧本原稿送来，但最后却扣下不还，即便为此他们支付了数量庞大的白银作为赔偿。²⁹与此同时，博物馆的学者们集中精

力，对古代及古典时期的希腊诗人们——如萨福（Sappho）与品达（Pindar）——的作品加以分类和编辑整理，却忽略了不太知名但文采卓越的古典作家以及与他们自己同时代的诗人们，例如卡利马科斯，我们经常不得不通过在埃及沙漠中发现的莎草纸碎片才能还原卡利马科斯的作品。³⁰因此，学宫与图书馆对编辑、整理古典作家们的作品文集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被神化为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当然托勒密人也付出了代价——亚历山大城也被彻底希腊化了。

对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创作表示轻蔑将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昔兰尼（Cyrene）的卡利马科斯以及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os of Rhodes）就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工作，而且卡利马科斯还为图书馆设计出一套分类体系。但他们自己也创作了历久不衰的作品：卡利马科斯以其警句著称；而阿波罗尼俄斯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史诗，他按照荷马史诗的体例创作了《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ka*），该史诗重新描绘伊阿宋寻找金羊毛并与美狄亚（Medea）相爱的旅程。但他的文风并非对荷马史诗的拙劣模仿：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描绘事情时仿佛是在直接同读者讲述他的亲眼所见，而且其绚丽的文风也很有魅力。虽然他永远无法摆脱荷马式地理知识的影响，导致罗马时期的评论家们嘲笑他的错漏，不过他描述了伊阿宋可能经过的地中海水域，描述了远方的欧洲河道水系，这透露出他受到了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以及民族志学者的影响。³¹

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在藏书规模与全面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它还有竞争对手。小亚细亚海岸的帕加马（Pergamon）的历任国王们也在为其图书馆收集图书；据说，

托勒密二世为了阻挠他们藏书量的增长，特意下令禁止将莎草纸出口到帕加马。但帕加马的图书馆馆员们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在动物皮毛制成的羊皮纸（即帕加马纸，*pergamemon*）上书写。³²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城的藏书量在经历了迅速增长后开始慢慢减少。文献的自然磨损、不当的搬动（图书馆不对外出借图书）以及经年累月的相对忽视，特别是尤利乌斯·恺撒将亚历山大城码头周围一些可能存放图书的仓库——可能是某种类型的远距离图书馆——付之一炬，都意味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巅峰期已过。³³尽管传统上的说法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毁灭与公元 642 年阿拉伯人入侵有关，但大家一般也认同，在那个时候，图书馆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被破坏的物件了，而且让人难过的是该图书馆中的原始文献一份都没有留存下来。³⁴

关于托勒密王朝对其他民族的智慧成果并不排斥的说法，最明确的证据是古代作家们的报告经常提及的一件事，即托勒密二世曾委托相关人员翻译希伯来语的《圣经》。³⁵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称：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派遣七十二名犹太贤人前往亚历山大城，他们被安置于七十二个隔间中，被要求独立翻译《摩西五经》。他们提交了七十二份完全相同的希腊译文，这被称为“七十士译本”。³⁶事实上，“七十士译本”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成形，它满足的不仅是求知欲旺盛的托勒密家族和他们支持的学者的需要，还有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的需要，在这些犹太人中间讲希腊语的人口日渐增长，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是否精通希伯来语。有趣的是，“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希伯来文本与犹太人保存的标准版本“马所拉抄本”（Masoretic）有数处差异，它还保留了一些被

犹太圣经放弃的伪造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些文献——如“所罗门智慧书”——显示出希腊化哲学思想的突出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没有完全摒弃希腊化文化，反而热情地对其表示欢迎。“七十士译本”是亚历山大城对地中海文化史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后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将之作为《旧约》的标准版本。事实上，拜占庭的基督徒保留下来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文化要比犹太人自己保留下来的更多，其中就包括斐洛的大量作品。

我们很容易就能列一份那些曾在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学习、研究的著名希腊学者的名单。有些学者影响极大但留下的信息却含糊不清：欧几里得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数学家学会？公元前3世纪时，精确算出地球直径的伟大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就曾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名馆员。另一位极富创见的科学家是阿利斯塔克（Aristarchos），他推演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不过他的观点未能引起重视。在罗马时期，另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其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仍然主张地球是宇宙中心，该书的出版进一步削弱了阿利斯塔克的影响力。亚历山大城拥有极具活力的医学传统。为进一步了解人体，城中的学者不仅解剖尸体，还对被定罪的囚犯进行活体解剖。阿基米德（前287～前212年）在其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只在埃及有过短暂的停留，但他始终与亚历山大城的数学家，如埃拉托色尼保持联系。³⁷阿基米德的职业生涯可以反映托勒密宫廷对精妙机械的着迷程度。在安提基西拉岛（Antikythera）附近的地中海海床已出土了他的一件作品，它看起来像是关于宇宙的机械模型。³⁸亚历山大城的科学研究服务的不仅是当地利益，这些科

学家们的发明与发现的重要意义历久弥新，进一步证明了希腊化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而亚历山大城正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首都。

4

亚历山大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仰仗于其与地中海东部和西部（至少远至迦太基）的联系。在曾经强大的海上贸易力量雅典衰落后，东地中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填补了雅典留下的真空地带：罗得岛。虽然罗得岛以外的世界已经被马其顿的将军们瓜分殆尽，但罗得岛上的希腊裔贵族成功地维持了该岛的独立性，使该岛没有被竞争对手控制。公元前 305 年，罗得岛人成功挫败塞琉古国王季米特里奥斯（Demetrios）夺取该岛的企图，他从叙利亚率四万大军封锁了罗得岛整整一年。但最后，罗得岛人的决心迫使季米特里奥斯撤退。这也是针对罗得岛的第一次著名围攻，后来类似的情况多次发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岛上树立起一座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巨型雕像，该雕像正好立在罗得岛的港口之上。这座著名的巨石雕像大约于前 280 年正式完工。罗得岛人甚至还成功地在东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海岸建立自己的统治区域，使之成为重要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基地。³⁹他们对人力有着巨大需求，因为他们需要派遣大型舰队并耗费巨大精力来肃清海域中的海盗，这些海盗的出现也是雅典海上霸权衰落难以避免的后果之一。在前 206 ~ 前 203 年，罗得岛人投入了巨大力量以打击以克里特岛为据点的海盗。⁴⁰他们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是，任何势力都不得主宰他们航行的区域；他们要保持不同阵营间的平衡。如此一来，尽管他们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

及保持着紧密的商业和政治联系，但如果埃及海军想要称雄于整个东地中海，他们就会选择支持塞琉古人。罗得岛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试图去建造托勒密人以及塞琉古人钟爱的那种大得不合理的重型舰船。在他们倾向于建造的船只中，有一种三列桨快船（*triemiolia*），是在原有的三列桨战船基础上改造而建成的，它可以较好地同时利用船帆与划桨的力量，这种船因此是追击海盗的理想船只；罗得岛人还使用了希腊火（Greek fire）的一种雏形，它把火焰从管子里喷出并投向敌人船舰的甲板。⁴¹

164 尽管托勒密王朝已经建造出十分壮观的战舰，但亚历山大城的商业通道仍然受罗得岛的船只支配，在风向适宜之际，这些船只需三四日即可抵达埃及，而返回罗得岛的航线甚至在冬季也不会中断，不过船行速度会更慢一些。⁴²狄奥多罗斯写道，“罗得岛人的岁入绝大多数来自前往埃及的商人”；他还声称，“罗得岛人甚至可以说，供养他们自己城市的是埃及王国”。⁴³埃及的绝大多数谷物是经由罗得岛人运往北方的，大量销往埃及的葡萄酒也来自罗得岛，因为罗得岛人在整座岛屿上都种植了成片的葡萄。亚历山大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出土了十万只提耳处刻有罗得岛标记的双耳陶罐，⁴⁴它们是可证明这类贸易的存在的有形证据。在爱琴海的其他遗址，以及爱琴海以北的黑海、以西的迦太基与西西里岛均出现了这种盛放葡萄酒的陶罐。古代文献对公元前200年前后罗得岛的年均贸易值做了估算——五千万德拉克麦（*drachmai*，即古希腊的银币）。按照每单进出口贸易征收百分之二的税收计算，这笔数额每年会产生一百万德拉克麦的收益。⁴⁵罗得岛的银行家们构建起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地中海中部与东部；他们提供贷款，维持地中海商

业网络的运作。爱琴海地区的城镇与岛屿都接受罗得岛货币的重量标准。这种贸易在周边区域激起的是感激而非敌意：当罗得岛在前 227 年或前 226 年毁于地震时，西西里、埃及、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统治者纷纷伸出了援手。

希腊化世界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是提洛岛 (Delos)，最初这里被罗得岛人用作地区贸易的清算中心。⁴⁶从公元前 168 年开始，因贸然与马其顿王开战而陷入困境的罗马人开始介入爱琴海的商业网络。他们不再视罗得岛人为盟友 (及重要贸易伙伴)，而是视其为附庸，希望罗得岛的舰队能听从罗马人调遣，加入他们与马其顿诸王的战争。罗得岛人对此不感兴趣。作为报复，罗马元老院怂恿另一个更为顺从的盟友雅典去管理提洛岛，但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当地人必须被驱逐，且该岛必须是自由港。于是商人们进入了提洛岛，其中包括许多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维系并加强了该岛与地中海西部的联系。在前 100 年前后，岛上居民数量已经增长到 3 万人。罗得岛因贸易被夺走而迅速衰落，据说罗得岛的商业收益迅速萎缩到了 1.5 万德拉克麦。提洛人在商业上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圣地的声望。对提洛岛的考古发掘揭示，这里有大规模商业区，这些区域没有设防，因为该岛的神圣性会为其提供庇护。这里有数个 *agorai*，也就是为意大利商人设立的交易场所，里面不仅有柱廊、门廊、商店和营业处，还设有用于祭祀受商人们推崇的各种神——如海神波塞冬、信使神——的神龛。意大利人鼓励香水和药膏贸易，且与纳巴泰 (Nabataen) 商路的间接联系已经通过叙利亚建立起来，这条贸易路线将深入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和没药产地。另外，奴隶贸易也十分繁忙，这些奴隶是海盗活动的受害者。前 2 世纪末，

奇里乞亚海盗在地中海东部重新出现（这毫无疑问是罗得岛衰落的后果，因为罗得岛人在过去一直守卫着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周边海域），海盗活动变得更加猖獗。在罗马时代，提洛岛被描述成“地球上最大的贸易中心”。⁴⁷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提洛岛的幸运是建立在罗得岛的不幸上的，但前者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一种趋势：在公元前3~前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商业网络不断整合为一个协调一致、管理有效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支配权最初属于罗得岛支配，后来被转交至提洛岛。提洛岛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商业网络，那不勒斯湾的普特奥利（Puteoli）商人也被吸收进来成了新的贸易伙伴。希腊化世界在政治上分裂成三个主要的单元——希腊、叙利亚和埃及，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络已经开始显现。有一个要素却不见了：在前2世纪中期，伟大的迦太基城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有必要往前回溯一下，考察这一结果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住在遥远边区的罗马人是如何在前100年之前逐渐主宰整个希腊水域的。

注 释

1. R. Lane Fox, *Alexander the Great* (3rd edn, Harmondsworth, 1986), pp. 181-91.
2. Serious account: P. M.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3 vols. (Oxford, 1972), vol. 1, p. 3; popular account: J. Pollard and H. Reid, *The 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Birthplace of the Modern Mind* (New York, 2006), pp. 6-7.
3. Lane Fox, *Alexander the Great*, p. 198.
4. Pollard and Reid, *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pp. 2-3.
5. Strabo, *Geography*, 17:8; J.-Y. Empereur, *Alexandr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2002),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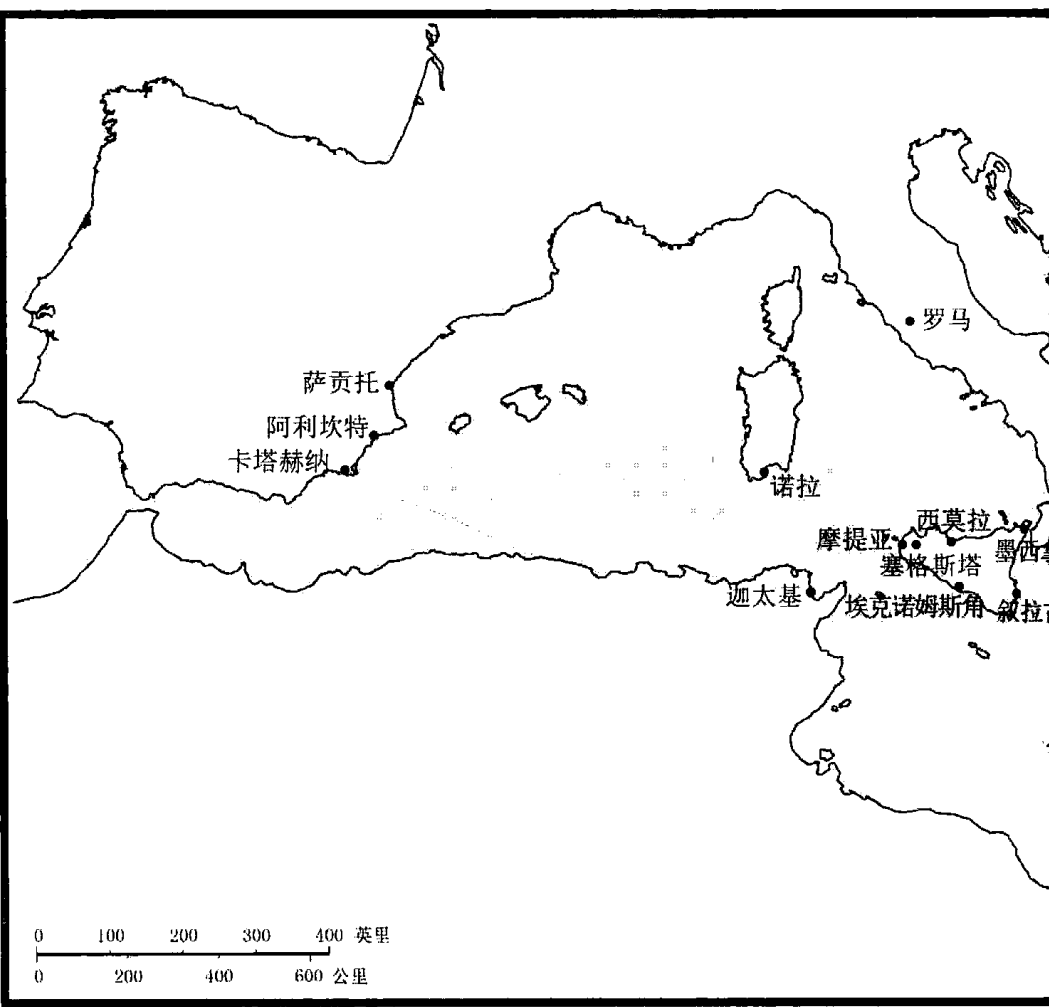
6. Lane Fox, *Alexander the Great*, pp. 461–72.
7. S.-A. Ashton, 'Ptolemaic Alexandria and the Egyptian tradition', in A. Hirst and M. Silk (eds.),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2nd edn, Cairo, 2006), pp. 15–40.
8. J. Carleton Paget, 'Jews and Christians in ancient Alexandria from the Ptolemies to Caracalla', in Hirst and Silk,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 146–9.
9.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 255; Empereur, *Alexandria*, pp. 24–5.
10.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 252; also pp. 116–17.
11. *Ibid.*, p. 259.
12. Strabo, *Geography*, 17:7; cf.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p. 132, 143.
13. 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 vols. (Oxford, 1941), vol. 1, p. 29.
14. L. Casson, *The Ancient Mariners: 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 Princeton, NJ, 1991), pp. 131–3.
15. *Ibid.*, p. 130.
16. *Ibid.*, p. 135, and pl. 32.
17.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p. 367, 387;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p. 137–9.
18.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p. 395–6.
19. Casson, *Ancient Mariners*, p. 160; cf.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p. 226–9.
20.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 150.
21. *Ibid.*, pp. 176, 178–81.
22. Empereur, *Alexandria*, p. 35.
23. Bosphoran grain: G. J. Oliver, *War, Food, and Politics in Early Hellenistic Athens* (Oxford, 2007), pp. 22–30.
24.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p. 359–60, 363.
25. Diodoros the Sicilian 1:34.
26.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 315; H. Maehler, 'Alexandria, the Mouse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Hirst and Silk,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 1–14.
27. Irenaeus, cited in M. El-Abbadi, '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 in Hirst and Silk,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 167.
28. El-Abbadi, '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 p. 172;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 329.
29. Empereur, *Alexandria*, pp. 38–9.
30. Maehler, 'Alexandria, the Mouse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 9–10.
31. Comments by E. V. Rieu in his translation of Apollonius of Rhodes, *The Voyage of Argo* (Harmondsworth, 1959), pp. 25–7; cf.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 627.
32. Pollard and Reid, *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p. 79.
33. Empereur, *Alexandria*, p.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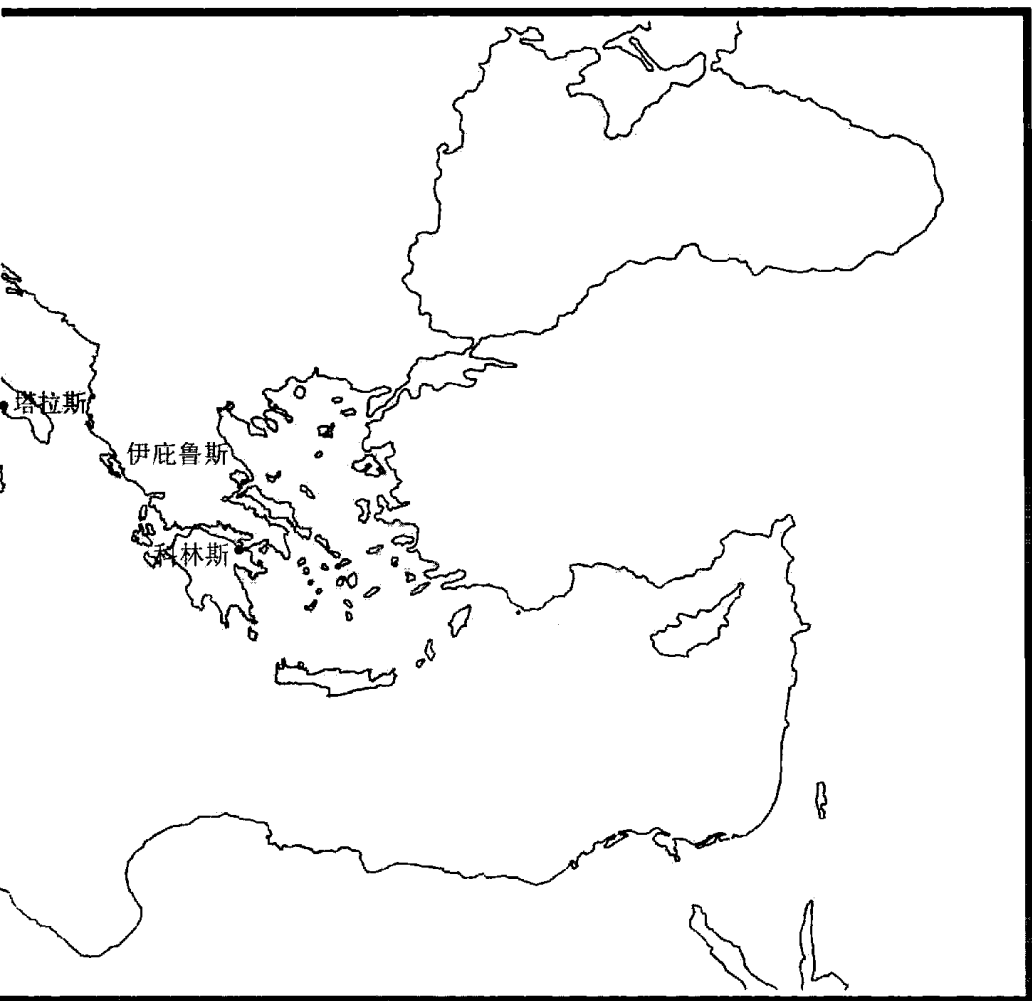
34. El-Abbadi, 'The Alexandria Library in history', p. 174.
35. N. Collins, *The Library in Alexandria and the Bible in Greek* (Leiden, 2000), p. 45: Philo, Josephus (Jewish authors); Justin, Tertullian (Christian authors – also Irenaeus and Clement of Alexandria, attributing the work to the reign of Ptolemy I).
36. Carleton Paget, 'Jews and Christians', pp. 149–51.
37.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vol. 1, pp. 331, 338–76, 387–9.
38. Pollard and Reid, *Rise and Fall of Alexandria*, pp. 133–7.
39. N. K. Rauh, *Merchants, 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 2003), pp. 65–7.
40. 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1999), pp. 80–84.
41. Casson, *Ancient Mariners*, pp. 138–40.
42. Rauh, *Merchants*, p. 66.
43. Diodoros the Sicilian 22:81.4, cited by Rauh, *Merchants*, p. 66.
44. Rauh, *Merchants*, p. 68.
45. Casson, *Ancient Mariners*, p. 163.
46.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p. 230–32; for its early development, see G. Reger, *Regionalism and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Independent Delos, 314–167 BC* (Berkeley, CA, 1994); later developments in: N. Rauh, *The Sacred Bonds of Commerce: Religion, Economy, and Trade Society at Hellenistic-Roman Delos, 166–87 BC* (Amsterdam, 1993).
47. Rauh, *Merchants*, pp. 53–65, 73–4; Casson, *Ancient Mariners*, p. 165.

七 迦太基必须灭亡 (前 400 ~ 前 146 年)

1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控制爱琴海而爆发的战争发展到高潮之际，在更遥远的西部，希腊城邦为了自己的生活也卷入其他冲突当中。迦太基在其所处的地中海水域中是一支重要的海军力量，相当于雅典之于东地中海。公元前 415 年，当雅典人进攻叙拉古时，迦太基人尚且能够作壁上观。他们看到希腊人自己分崩离析，彼此争吵，以至于都无法顾及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设立的商业据点。在迦太基人看来，任何能够削弱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势力的事情都值得欢迎。另一方面，雅典海军的崩溃带来一个新问题，迦太基人发现在自己必须尽快对其做出处理。叙拉古人并非首次威胁要控制整个西西里岛。然而，事实再次证明，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塞格斯塔的伊利米人，他们招来的雅典人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对此他们还不满足，于是又请求迦太基人前来帮助他们抗击老对手——塞利诺乌斯的希腊人。迦太基人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塞格斯塔。在塞格斯塔所辖区域内散布着布匿人（即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巴诺尔莫斯（Panormos，即巴勒莫）和摩提亚是其中较为出名的两个。当塞格斯塔人在前 410 年为寻求帮助而成为迦太基属民时，迦太基的公民大会意识到，巩固他们对西西里西部的控制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了。¹





塞格斯塔人的求助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迦太基过去的盟邦与商站只是松散的联合体，如今成了迦太基帝国，其治下的臣民不仅包括其腓尼基同胞，还有其他属民——被希腊作家称为柏柏尔人的“利比亚人”，西西里的伊利米人、西科尔人和西坎人，当然还有撒丁岛人和伊比利亚人。

迦太基的精英们还需要处理一些其他内部问题，因为此时这座城市由一群控制元老院的强大家族主宰。据说迦太基名人汉尼拔（Hannibal）憎恨所有希腊人，因为他的祖父哈米尔卡（Hamilcar）于公元前480年在西莫拉同叙拉古军队作战时阵亡了。在这位令人敬畏的汉尼拔的指挥下，迦太基人在前410年轻松获胜，迫使塞利诺乌斯人撤出塞格斯塔。随后，在前409年，汉尼拔率领从意大利南部、北非、希腊与伊比利亚征召的军队发动了第二波大规模入侵。色诺芬（Xenophon）在其多少有些蹩脚的修昔底德历史续编中指出，汉尼拔率领的军队有十万人，这个数据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两倍。² 汉尼拔使用的复杂攻城器械以近东腓尼基人非常熟悉的模式为原型，它们给汉尼拔带来很大助力，使他仅仅用了九天就攻破了塞利诺乌斯的城墙。城中的居民为自己的抵抗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6000万名塞利诺乌斯人被处死，5000人沦为奴隶。随后，迦太基人又洗劫了西莫拉，也就是汉尼拔的祖父哈米尔卡前480年战死的地方。迦太基人在这里处决了3000名男性俘虏，以献祭哈米尔卡。³ 迦太基人并没有沉浸于暴怒之中。他们还决定消灭叙拉古，从而确保对西西里岛大多数地区的统治。然而，这不是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民族”之战：迦太基人派遣一位使者前往雅典，雅典人如今正处于与斯巴达交战的最后阶段，他们向迦太基人示以友善，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能够

找到的所有盟友。⁴ 雅典与迦太基还希望在希腊世界恢复和平后，双方能从相互间的贸易中获益。

如果色诺芬所记录的惊人数据值得信任，那么公元前 407 年迦太基人就集结了十二万人的大军，由 120 艘三列桨战船搭载着，他们入侵了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即使拥有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迦太基人还是在花费七个月的时间围困阿克拉加斯（Akragas）后才最终迫使其投降。这座城市的精美艺术品被洗劫一空，其中包括一只黄铜制成的公牛，据说前 6 世纪的一位阿克拉加斯僭主曾在铜牛腹内对其对手行炮烙之刑。⁵ 这些战利品使迦太基人逐渐喜爱上了希腊风格的器物；到前 3 世纪时，希腊的艺术与建筑显然已经全面影响了迦太基。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如今处于迦太基人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他们也开始继续向东扩张，来到南部海岸的杰拉（Gela），这座城市是前往叙拉古的通道。杰拉城的居民选择了逃亡。叙拉古人在看到希腊人接二连三遭遇失败后，急于同迦太基人和谈，而为其军队与舰队耗费巨资的迦太基人此时也愿意接受足够优惠的条款。已经被迦太基人征服的西西里岛西部与东南部区域继续由其控制，但希腊居民可以返回自己原来所在的城市，且生活在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和西科尔人可以保持独立。这样一来，迦太基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

168

民主制度是这场冲突的牺牲品。叙拉古再次落入一位长寿的僭主，也就是狄奥尼修斯一世（公元前 367 年去世）的统治之下，他也是一个极为恐怖的王朝的第一位君主。有一则故事，称西西里有一位僭主知道自己遭人厌憎，因此在发现有一位老妇人在城中的神庙中定期为自己祈求平安后，他感到十分惊奇，询问她为何如此。老妇人毫无畏惧地回答道：她知道他

169

是恐怖的暴君，但她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位僭主十分残暴，但随后继位的人更糟，且这位新僭主之后的僭主比两位前任还要可怕；所以她要为现在的这位僭主祈求长寿，她知道如果他去世了，其继位者很可能是一位凶恶程度更加令人难以想象之人。这位僭主被老妇人诚恳的回答打动了，于是赠给她一袋金子。这些僭主们所倚仗的是野蛮的武力，他们没有丝毫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打算。但他们同时具有较高的品位和文化水平；某位早期的西西里僭主曾获诗人品达的赞誉，新僭主们则培养了一批哲学家，例如曾在前 388 年或前 387 年访问叙拉古的柏拉图。据说他后来还数次到访，希望引导狄奥尼修斯一世的继任者们严格按照柏拉图原则制定政策。⁶ 尽管柏拉图与叙拉古诸位统治者之间的大多数信件如今已被斥为后世杜撰，但柏拉图与叙拉古王廷间的联系仍然表明，在这个时期，穿越地中海的不仅是希腊的货物，还有希腊的思想。

狄奥尼修斯一世与迦太基缔结了和约；但在公元前 398 年再次与迦太基发生冲突的也是这位狄奥尼修斯，他夺取了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宝城摩提亚。城内居民遭到屠杀，甚至妇孺也被处死而不是被送入奴隶市场以免于灾难；生活在那里的希腊商人因被视为叛徒而惨遭迫害。⁷ 这是摩提亚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一场剧烈冲突的开端：前 396 年，一支大规模的迦太基舰队抵达叙拉古海港。叙拉古城再次面临灭顶之灾；叙拉古人也再次利用其港口的布局击退了敌人的舰队并同时攻击了登陆的敌军。迦太基的指挥官希米尔科（Himilco）眼见失败难以避免，于是与狄奥尼修斯达成秘密协议，尽其所能地撤走迦太基士兵，抛弃了来自伊比利亚、西科尔以及利比亚的盟军。体毛较重的伊比利亚人是职业雇佣军，他们被吸纳到了叙

拉古的军队中。更糟糕的是，此时迦太基在北非的属地发生骚乱，聚集在突尼斯的大量奴隶与起义军显示出了将要推翻近在咫尺的迦太基的势头。起义者最终溃散了，但迦太基毕竟经历了一场政治动荡。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与叙拉古的僭主和解，将在之前的和约中约定应由迦太基掌控的希腊城市让给叙拉古，不过这种屈辱并非十分彻底，因为西西里布匿居民仍然在迦太基人的控制之下。狄奥尼修斯的扩张野心转向了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前 384 年，他袭击了皮尔吉，这是位于伊特鲁里亚的卡埃里的出海口。狄奥尼修斯从这里带走了价值一千五百塔兰特的财物，这笔钱足以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他可能需要这场胜利带来的声望，当年他的使者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饱受羞辱，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和波斯王一样糟糕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叙拉古帝国，他只想不择手段地树立个人权威；雅典人对此心照不宣，他们在信件中称他为“西西里的执政官”（*archon of Sicily*）。⁸他还决心夺回对整个西西里岛的控制权。叙拉古与迦太基间的一系列冲突在前 375 年达到顶峰，当时一支 15000 人的迦太基军队被消灭，其中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贩卖为奴。随后，迦太基人迅速振作起来，击败狄奥尼修斯并消灭了一支 14000 人的叙拉古军队。最终，过去由迦太基人长期统治的西西里西部仍然由其控制，他们甚至还收复了一些之前被汉尼拔征服的希腊城邦。

171

2

尽管迦太基与叙拉古的关系以敌对为主，这些战争却将迦太基与希腊世界紧紧联系起来。如今，这座城市在各个方面都

与腓尼基渐行渐远；对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迦太基来说，相较于与赫拉斯、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间再度密切的关系，它与推罗和西顿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性值得质疑。迦太基人将麦勒卡特神与赫拉克勒斯联系起来。他们还相信自己因洗劫了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德墨忒尔神庙而冒犯了这位女神，因此他们将对这位女神的崇拜引入迦太基，甚至打算在当地希腊居民的帮助下按照希腊人的礼节来操办神庙内的祭拜仪式。⁹ 迦太基人学习希腊语——在双方关系恶化时，迦太基人一度下令禁止学习或使用希腊语，这有力地证明了希腊语已成为当地精英的第二语言。这些精英积极开发北非的肥沃海岸，很多人在离海岸线不远处拥有丰饶的庄园，里面种满了谷物、水果和葡萄。腓尼基人沿北非海岸建立的众多小型城镇此时均沦为迦太基的属地。迦太基人还愈来愈频繁地与当地人通婚，这种趋势也蔓延到了迦太基的显赫家族，他们有的与当地的柏柏尔王室联姻，有的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望族通婚。此时的迦太基已发展成一座拥有二十万人口、广袤的郊区，以及众多商港和军港的国际大都市。

在整个公元前4世纪，迦太基人始终关注叙拉古。他们希望争夺对非洲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以及西西里岛的控制权。公元前344~前343年，科林斯的海军将领提木良（Timoleon）
172 拯救了叙拉古，科林斯海峡的价值因此得到彰显。提木良的声望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为了成为科林斯的僭主，他密谋暗杀了自己的兄弟。据普鲁塔克记载，在他的两名同谋杀害他的兄弟时，提木良掩面痛哭。¹⁰ 因此，对于心怀不满、希望反抗狄奥尼修斯王朝的残暴统治的叙拉古贵族来说，提木良是一位理想的盟友。由于叙拉古城最初是由科林斯人建立的，因此当地

人仍然觉得他们可以向科林斯寻求帮助，尽管此时的科林斯已经不再是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领袖，且只能派遣一小支援助舰队。迦太基派出船只阻挠提木良的到来，但提木良另辟蹊径，成功突破了封锁，结果迦太基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毁灭性战争：在前 341 年的战役中，三千名迦太基士兵阵亡，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回国后被钉上十字架，这是针对那些战场上的无能者的标准刑罚。迦太基并没有失去其在西西里岛西部的领地，但提木良把他自己塑造成了该岛的领导人，在岛上几乎每一座希腊城邦中推行贵族政体。在之后数十年间，僭主政体都没有再出现过；更重要的是，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似乎理解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¹¹

到普鲁塔克（亡于公元 120 年）生活的时代，提木良已被奉为英雄与诸神的宠儿，他“切断了僭主的神经”，将西西里岛从布匿蛮人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提木良与他之前的诸位僭主并没有明显不同。他凭借雇佣军的支持夺得大权；通过对岛上诸多小僭主进行镇压，他声称自己拥有了长期存在争议的叙拉古主权。但他也有可取之处：他在年老时因受白内障困扰选择了辞职，这一行为得到了叙拉古民众的赞誉。另外，在其统治时期，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城市被重建，包括毁于迦太基战争中的一些城市：阿克拉加斯与杰拉恢复了活力；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希腊人的小城镇再次繁荣发展。西西里岛东南部的斯科纳瓦赫（Scornavacche）建立在一座希腊小镇的遗址上，这里曾在前 405 年被西科尔人的袭击摧毁，但如今的它已经成为陶器制造业的中心。¹²这一复兴是由新移民与土著的西西里 - 希腊人（Siculo-Greek）共同完成的。提木良可能从希腊本土以及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

178 引入了六万名移民。西西里岛与雅典之间的谷物贸易在前4世纪后期愈发稳定；根据大量发掘于西西里岛的这个时期的科林斯货币，我们可以推断，此地经爱奥尼亚海与科林斯有非常密切的商业联系，西西里岛的农产品正是经由该商路销往希腊的。¹³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繁荣完全归功于提木良的努力。在前4世纪的地中海中部地区，商业复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暴发的瘟疫的致命性此时已经降低，人口数量开始恢复。迦太基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之间的长期和平也使东西方的商业联系获得重建。迦太基从与雅典的商业联系中获益，同时充分利用其与西班牙的联系。

公元前311年，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爆发。迦太基在西西里西部的指挥官哈米尔卡遭遇了强劲的对手阿加托克利斯（Agathokles），后者已成功地推翻提木良的制度，自己成了叙拉古的僭主。与其前辈一样，阿加托克利斯也试图将整座西西里岛纳入叙拉古人的控制范围。哈米尔卡认为迦太基的最高利益只能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即叙拉古可以主宰西西里岛的东部和中部；迦太基人担心阿加托克利斯可能对阿克拉加斯产生非分之想，因为那座城市距离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部的居住区非常近。前311年，阿加托克利斯率领庞大的军队进攻阿克拉加斯，但一支由五十艘或六十艘战舰组成的迦太基舰队前来挫败了阿加托克利斯的进攻。次年，哈米尔卡率领14000人登陆（其中只有七分之一是真正的迦太基人）。他在当地厌恶阿加托克利斯野心的地方势力的支持下，扫荡了整个西西里岛。阿加托克利斯意识到，自己已走得太远，已在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争中落败。如今，其辖区仅剩叙拉古一地。但他还拥有金钱和军队：3000名希腊雇佣军，以及

从意大利重金引入的 3000 名雇佣军，他们由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Samnites）、凯尔特人组成。利用这些军队，再加上从叙拉古当地招募的 8000 名士兵，他装备了一支包含六十艘战舰的舰队，并于前 310 年率领舰队经由一座迦太基人控制的海防工事驶往迦太基附近的海岸。阿加托克利斯破釜沉舟，在登陆后将舰船全部焚毁（因为他带领的人员有限，难以留下足够的人来守卫舰船），随后他率军挺进迦太基，就在突尼斯附近安营扎寨。¹⁴ 这样一来，迦太基遭到叙拉古人的围困，而叙拉古同时也处于迦太基人的围困之中。

迦太基拥有通往海洋的便利通道，因此若没有足够规模的海军是不可能将其围困的，所以阿加托克利斯对北非海岸的围困未能迫使迦太基投降。不过，迦太基失去了周遭肥沃的土地与果园，这还是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就在阿加托克利斯率军登陆并对迦太基人发起进攻时，他的利比亚盟友（可能有 10000 人）纷纷逃亡，还有 3000 名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雇佣兵在战斗中阵亡。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即阿加托克利斯“既没有亚历山大的天赋，又没有他的智谋”。¹⁵ 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达成和解了。不出所料，西西里岛的版图重新回归到过去的样子，即迦太基人统治西部，希腊人控制东部和中部。¹⁶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失败并未终结阿加托克利斯的统治。他自称“西西里国王”，这一新称号来自希腊人，自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以来，希腊的国王们一直都是东地中海的统治者。如今，阿加托克利斯将建立帝国的野心指向其他地方，亚得里亚海成为其首要目标。他通过联姻与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os of Epeiros）结盟，后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堂弟，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他又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结成秦晋之好。他控制了爱奥尼亚海的克基拉岛和莱夫卡斯岛 (Leukas)，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至曾两次征讨的意大利。然而，阿加托克利斯并没有留下突出的遗产：他未能如愿建立一个王朝，且随着他本人在公元前 289 年遇刺身亡，他的海洋帝国也瓦解了。¹⁷

阿加托克利斯的真正遗产是其宿敌迦太基人的继续存在与繁荣。罗马人曾在公元前 509 年与迦太基签署商贸协议，如今要求续约。在前 509 年的迦太基人眼中，罗马人只是自己的朋友伊特鲁里亚人的作用有限的邻居；但如今，这些罗马人在意大利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且在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把迦太基人的势力彻底驱逐出西西里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发展变化，我们有必要再次回溯之前的历史。

3

至公元前 300 年，罗马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成就与辉煌，实际上是一系列陆上战役的结果。罗马并没有成为一支海上力量的野心，他们与迦太基于前 348 年重新修订的协议表明，那些
175 穿越海洋的罗马人只是商人，而非武装士兵。这些协议确保罗马人不会闯入迦太基的势力范围，特别是西西里岛；然而在几次严重饥荒中，如发生于前 493 年的那一次，谷物也被特地从西西里岛运往罗马。¹⁸ 早期罗马人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其邻近的民族，如沃尔西人 (Volscians)，沃尔西人正沿着亚平宁半岛下行，希望在罗马南部的拉丁姆 (Latium) 的开阔地带定居。前 390 年，罗马人还面临高卢入侵者的严重威胁，但比较出名的传说称，罗马人被晚间啼叫的白鹅所救。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但

前 396 年，罗马彻底摧毁了伊特鲁里亚人的最大城市之一维爱，开启了其征服伊特鲁里亚南部地区的第一个阶段。¹⁹在与罗马相距不过数里的维爱陷落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其他城市并未被摧毁，而是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前 253 年，富有的卡埃里在被击败后成了附属于罗马的盟友，失去了对部分海岸线的控制权，包括皮尔吉港，这里曾是希腊商人和迦太基商人的聚集与定居之地。因此，在几十年间，罗马沿伊特鲁里亚南部不断扩张，组织了大规模船队，并将迦太基海军力量赶出西西里岛，并不是非巧合。除了获得伊特鲁里亚海岸上的补给站外，罗马人也开始在奥斯蒂亚（Ostia）建立自己的输出港，尽管这些港口最初的职能是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伊特鲁里亚的货物引入台伯河，并为罗马提供给养。²⁰

商船来来往往，但罗马全副武装的战船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罗马人积极回应海上威胁：公元前 338 年，来自拉丁海岸安提乌姆（Antium）[今安其奥（Anzio）] 的沃尔西海盗侵袭了台伯河口，但被击退，且罗马人将其击毁船只的“鸟嘴形船首”（*rostra*）作为战利品带回家。这些船首被放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演讲者站立的地方被称为 *rostrum*。²¹几年以后，也就是约前 320 年，罗马人与斯巴达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塔拉斯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罗马人不能驶入塔兰托海湾。通过这项协议，塔拉斯人确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保护了此时已经在南意大利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是“意大利同盟”（*Italiote League*）领袖的塔拉斯的贸易利益。²²尽管协议本身意味着双方的亲善，但对这份协议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罗马人在陆地上与萨莫奈人及其他敌人进行的征战，使罗马军队与希腊城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因

此在地图上标识各自势力范围变得很有必要。和约、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书常常会提出多种可能，但它们不能反映当时的情况，有时甚至并不属实。此时仍然没有证据表明罗马打算配备大型战舰，不过前311年“两名海军将领”（*duumviri navales*）受命组建一支“舰队”（*classis*），并且需负责对它们的正常维护，²³但这支舰队的规模可能非常小。

在与萨莫奈人的战争中，罗马人想要包围规模庞大、具有战斗力的萨莫奈军队，却被拖得越来越深入南部。当公元前282年罗马人指挥的十艘战舰驶入塔兰托海湾时，他们遭到了来自塔拉斯的希腊人的袭击，他们的小型舰队损失过半。但是罗马人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前往塔兰托海湾的图里伊（Thourioi 或 Thurii）设置防线，之前当邻近的卢卡尼亚人（Lucanian）入侵图里伊时，图里伊人曾向罗马求助。塔拉斯人之所以与罗马为敌，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罗马人控制这片海域，罗马人的十艘战舰与希腊人的海洋城邦所拥有的数百艘战舰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真正令他们感觉到威胁的是，罗马人出现在这个地区会破坏他们的意大利同盟，导致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彼此为敌。²⁴出于对罗马人的担忧，塔拉斯人穿过亚得里亚海，向伊庇鲁斯的皮洛士求助。皮洛士宣称自己是阿喀琉斯的后人，其远征罗马是在仿效特洛伊战争之先例，当时的罗马亦在自夸其城邦的建立者是特洛伊之埃涅阿斯的后人。至于皮洛士是否视自己为未来的地中海主人，是否想如其在东部建立帝国的表兄弟亚历山大那样建立一个广阔的西部帝国，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是希望从这些人手中得到丰厚的酬金，因为他的雇佣军方阵极为强大，还配备了象兵。正如塔拉斯人担心的那样，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已经在选择是支持罗马和还是支持

皮洛士。当皮洛士在意大利取得进展时，那些已经选择支持罗马的城市又见风使舵地投靠了皮洛士。前 280 年至前 275 年间，皮洛士掌控着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事务。皮洛士式的胜利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益处，几年之后他愤怒撤军，然后罗马接管了塔拉斯。南意大利的希腊城市则继续自治，但在少数特殊事务上仍需获得罗马的认可（如发行一种印有罗马女神像的特殊钱币）。²⁵只要罗马人仍将自己看作植根于拉丁姆的陆上力量，他们就没有控制意大利南部城市的渴望，也没有控制的能力。他们只建立了少数据点：那不勒斯南部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伊特鲁里亚的科萨（Cosa）和阿里米努姆（Ariminum）[今里米尼（Rimini）]。这些据点均是沿岸补给站，它们保障了经由意大利沿海地区的陆地和海洋上的商贸往来，但重点是保护内陆地区，例如将归顺于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现在的贝内文托（Benevento）] 的新殖民地的萨莫奈边缘地带。²⁶

177

布匿战争将罗马从其意大利保护壳中拖了出来。迦太基曾加入反对皮洛士的战争，并于公元前 276 年在海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将皮洛士一百多艘船的船队击沉了三分之二。²⁷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在西西里岛和非洲，罗马的影响力首次穿越公海向外扩展；第二次布匿战争（主要是陆战）则将罗马人引至西班牙，但汉尼拔经阿尔卑斯山的入侵导致主战场仍在意大利；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深入非洲内陆，最终于前 146 年摧毁了迦太基。奇怪的是，至少在最开始，罗马人缺乏明确的目标。罗马人并未打算彻底摧毁迦太基，他们在很早以前与迦太基签订了契约，且双方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²⁸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间隙，双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当时

他们间的关系即使谈不上信任，至少可以说得到了修复。最终，罗马作为一支地中海势力出现，不仅将统治权扩展至战败的迦太基废墟，而且于同年占据了大片希腊土地。这可能又是一个“一不留神”便建立庞大帝国的例子。当罗马人意识到要进行第一次布匿战争就必须有大型船队之时，他们才开始组建。两座城市均陷入了一系列战斗，其中包括古代最大规模的海战。在这些海陆战斗中，有数以万计的人战死。历史学家们经常将这些战争的爆发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进行比较，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系列相对小的突发事件也点燃了席卷整个地区的战火。²⁹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德国与英法联盟间的冲突，布匿战争也不仅仅是迦太基与罗马的冲突，其他利益集团很快浮现出来：伊比利亚诸城、北非诸王、撒丁岛的酋长，以及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汉尼拔所对抗的罗马军队中也有高卢、
178 伊特鲁里亚和萨莫奈的士兵。罗马派出征讨迦太基人的船队中有大量（可能大多数）战船是由希腊人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其他友邦提供的。用“布匿”描述这些战争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它们主要是迦太基和罗马间持续的、不死不休的对抗。³⁰

4

布匿战争的长期性、紧张程度和残酷性深深地震撼了古代的历史学家。撰写罗马崛起历史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得到一位参加过布匿战争的将军的支持，波利比乌斯认为第一次布匿战争是过去所有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它从公元前 264 年持续到前 241 年，在时间跨度上轻松地超越了特洛伊战争。而

第二次布匿战争（前 218 ~ 前 201 年）同样是漫长的浩劫，导致了农业的荒废。³¹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源于远离罗马的纷争，而且对于任何一方来说，介入这样的纷争是否符合其最大利益，仍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危机始于西西里岛边缘的墨西拿。有一支来自坎帕尼亚（Campanian）的雇佣军此时占领了墨西拿，他们此前曾为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利斯效力，被称为马迈尔丁人（Mamertine），即“战神之子”（men of Mars）。他们在前 3 世纪 80 年代到达这里，并臭名昭著地将西西里岛东部的城镇劫掠一空。罗马人之所以被卷进来，是因为他们在意大利的战事进展顺利，在前 270 年占领了位于墨西拿对面的希腊城市雷焦。西西里岛于是进入了罗马人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意入侵该岛。在叙拉古的新统治者希伦在战场上击败马迈尔丁人后，这帮雇佣军极为恐慌，分别派使者向罗马与迦太基寻求军事援助。希伦是一支值得关注的势力。他与埃及的托勒密统治者维持着商业与外交联系，而且他遵循悠久的传统，不仅赞助奥林匹克运动会，还亲自参与竞赛。恰好附近的利帕里群岛有一支迦太基舰队，舰队的指挥官成功说服马迈尔丁人让他在墨西拿驻军。³³

马迈尔丁人不喜欢有人对他们指手画脚，于是有了异心；他们转投罗马，请罗马人帮助自己对抗迦太基人。但要说服罗马的元老院很难，他们不愿意介入这样一场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争端。波利比乌斯称，许多罗马人担心迦太基人会控制整个西西里岛，担心他们随后会介入意大利本土。³⁴ 有一种说法称，元老院不愿意采取行动，公民大会却投票同意参战。即便如此，这场战争针对的也并非迦太基。被派往西西里岛的罗马将军同时攻击希伦和迦太基人。他的任务是保卫墨西拿，抗

击马迈尔丁人的敌人迦太基人。认为他打算征服西西里岛并肃清岛上的迦太基军队是荒谬可笑的。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的势力恢复平衡。最终，马迈尔丁人成功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迦太基人的驻军驱离墨西拿；而迦太基的将军在回国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儆效尤。罗马人发现，要想越过墨西拿海峡十分困难，因为在利帕里群岛驻扎着强大的迦太基舰队，而且罗马的将军也缺乏在意大利与西西里岛之间的风暴区作战的经验。因此，罗马人向马迈尔丁人提供的帮助断断续续，这一点都不奇怪。罗马人最终抵达了墨西拿，但这迫使叙拉古的希伦与迦太基结成了邪恶的联盟。罗马人严重缺少战舰，于是他们的指挥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从塔拉斯、韦利亚（Velia）、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希腊城市招募了一支舰队，该舰队包括三列桨战船以及装备五十支桨的撞角战船。据说，迦太基人彻底击败了这支罗马舰队，然后他们向罗马送去一则傲慢的信息：接受条件，否则尔等永远不得插手海上事务。³⁶即便如此，迦太基仍希望和解。

罗马人十分自负，没把此事放在眼里，到公元前 263 ~ 前 262 年，他们已经在西西里岛投放了至少 4 万名武装人员。叙拉古的希伦受到震动，决定支持可能的胜者，他背弃了迦太基而转而支持罗马（后来他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大规模跨海输送人员的难题，运来的并不都是罗马人或拉丁人，许多人来自意大利的盟邦；而迦太基人在阿克拉加斯的营帐中也有大量来自伊比利亚、高卢和利古里亚的雇佣兵。罗马人获得了胜利，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将城中的 2.5 万人贩卖为奴，然后开始着手实施将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岛这一具有现实性的计划。³⁸然而，这并不是说

罗马人视自己为殖民西西里岛的主人。他们并没那么大的野心。罗马人将乐于见到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供应得到确保，因为罗马城的人口已迅速增加。尽管数代以后的罗马精英大多鄙视商业活动，但就这场战争而言，只要能够取得胜利，就仍有充分的商业理由参战。³⁹ 180

罗马需要一支真正的海军舰队。波利比乌斯称，直到此时，罗马人才开始组建自己的舰队。⁴⁰他们做出了重要的调整，原先罗马人严重依赖希腊盟友及伊特鲁里亚属地提供的船只，现在他们使用一种更大的战舰，相当于“两名海军将领”常使用的舰只的10倍或12倍大。这种转变是怎样实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比斯巴达人船队的建立还要神秘。斯巴达可以借鉴其希腊城邦的专长，其中一些城邦还处在斯巴达人的控制之下。现在，在公元前261年或前260年，罗马决心建造100艘五列桨战船和20艘三列桨战船。罗马曾俘获了一艘迦太基的五列桨战船，把它作为自己的造船模型。⁴¹罗马人如何操作他们建造的船只？他们从哪里获得穿行第勒尼安海以及爱奥尼亚海的变化莫测的水域所必需的航海技巧？他们如何做到成功破解造船的秘密，将各种横梁和成形的木料拼接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如何成功地在六十天里完成了从切割木头开始的所有程序（后来的老普林尼如是说）简直就是个谜。如果直接使用未经风化的新鲜木头，木材变干后的收缩就会产生很多可怕的问题。波利比乌斯诚恳地评论道，那些船“造得很糟糕，难以移动”。⁴²此外，还需要准备沥青和绳索。据说，在出海之前，罗马水手要在陆地上进行严苛的训练，在他们敢于出海前须在无水的环境中先学习划桨技术。有一项发现提高了快速建造战舰的故事的可靠性：考古者发现了迦太基战舰的残骸，残

骸所用的木料上带有布匿字母（这些字母也有编号的作用），因此迦太基的舰船似乎是按照编号组装起来的。罗马人的战船组装线是在奥斯蒂亚还是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一定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罗马全身心地投入与迦太基的战争；然而，罗马人的预期目标仍不明确。在战场上拼搏成为一种荣誉。

181 这支舰队的战斗力如何还是个问题。舰队的首次参战发生在利帕里群岛，结果却是一场灾难：罗马指挥官被封锁在利帕里的海港之中，而他的水手惊恐万分，四散奔逃。不过罗马人很快就在一种被称为“乌鸦”（*korax*）的新锚固装置的帮助下，于同一水域内的米莱（Mylai）取得了一场胜利。这种装置很短命，但十分有名，它有一个可升降的坡道，且可向任意方向转动，弥补了罗马船只缺乏机动性的不足；在坡道下方是一个重磅铁制尖钩，它不仅能抓住敌船，还能切入敌船甲板。⁴³使用这种装置的目的是使罗马船员能够登上迦太基人的船只，进行其最为擅长的肉搏。罗马人仍不信任海洋，试图把以船只撞击为主的海战变为人为的陆战，使船只成为士兵战斗的平台。年复一年，双方舰队的规模不断增加，杀伤力也越来越强。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在公元前256年发生于西西里岛西部的埃克诺姆斯角（Eknomos）大规模海战中，230艘罗马战舰直面迦太基的约350艘（更可能是200艘）战舰以及15万名士兵，这“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⁴⁴在战争后期的前241年，西西里岛以西的埃加迪群岛也发生了一场关键性战役，当时参战的舰船数量只略有减少。这表明尽管双方都在风暴和战争中损失了很多船只，而且海上的长时间作战也会导致船只的自然损耗，但造船厂竭尽全力建造的船只仍能对其及时

补充。参战船只成百上千的数量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古典作家们在这些数字的记录上的相互矛盾反映它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夸大。现代历史学家们也经常沉迷于确定舰船总量，而不只是造型优美的三列桨战船以及五列桨战船的数量。他们把运送水手、马匹以及关键补给的船只也算了进来，因为若没有新鲜的水源和丰厚的食物补给，战舰将仅能坚持数日。（通常，超出配给的水与食物可从立场中立的商人处购得，他们抱着迅速获利的希望，停泊在能远望战争的海滨，等候前去做生意的时机。）

埃克诺姆斯角战役是罗马人的巨大胜利，这要归功于“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乌鸦”。罗马舰队还很快学会了如何在战斗中结成紧紧相连的编队，此时他们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战斗最白热化时还能使队伍保持整齐划一。显然，这样的编队刻意模仿了陆上战斗中的编队，使罗马人在面对排列得比较稀疏的迦太基海军时拥有优势，因为布匿的海军将领考虑的是如何更便利地操作舰船，以及如何展开追击。迦太基人的优势在于速度，更愿意迅速接近敌船的侧翼或尾端，撞击敌人以使其沉没。在埃克诺姆斯角战役中，布匿人的舰队可能打算包围罗马舰队以对其侧翼和尾端发动致命性的撞击。⁴⁵换句话说，埃克诺姆斯角战役之所以在海军战斗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因为双方投入舰船与水手的数量之多，还因为它是两支拥有不同海战理念的舰队进行交锋的典范。⁴⁶

182

埃克诺姆斯角战役中的胜利为罗马人打开了从西西里海峡前往非洲的通路。此时的大计划是入侵迦太基帝国的腹地。但罗马人想要进攻迦太基并不等于他们要占领该城，更等于要摧毁它。在公元前 256 年，一支罗马舰队运送 1.5 万士兵在迦太

基以东不远处的阿斯皮斯（Aspis）登陆，对附近的农田和小镇进行侵扰，据称在这次行动中有2万名奴隶被俘，不过其中有许多是从前被俘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此时他们终于获得了解放。但罗马军队此时还没有能力在非洲维持一个据点，因此在前255年7月只能灰心丧气地撤退，带着至少364艘舰船返回西西里岛。⁴⁷这时，对海洋的不熟悉带给罗马人的灾难，远大于迦太基海军造成的威胁。舵手们坚持称在这样的时节靠近西西里海岸是不安全的，因为这是西西里海域一年当中风暴最变幻无常、最剧烈的时候。罗马的指挥官们否定了舵手们的意见，这些舵手显然不是罗马人。罗马人想要展示他们的战旗，想要以武力使西西里岛南岸的城镇屈服。猛烈的风暴将海水倾泻到舰船低矮的船舷上，这支庞大的舰队中只有80艘船幸免于难，超过10万人葬身大海，可能占据意大利劳动力的15%。波利比乌斯记载道：“此前从未有过比此次灾难更严重的海难记录”。⁴⁸

183 战争的最后一幕是公元前241年发生在西西里岛以西的埃加迪群岛附近海域的海战。在这场战役中，重建的罗马海军击沉或俘获约120艘迦太基战舰；迦太基人意识到他们只能缔结和约。罗马对迦太基施以严厉的惩罚，但这并不表示迦太基从此失去了生存的权利。战败方被迫支付20吨白银作为赔款，需要在十年内还清，更重要的是，迦太基被迫放弃它在西西里岛及附近群岛的所有权利。迦太基承诺不向意大利海域派遣舰船，不向叙拉古的希伦，也就是此时已成为罗马人坚定盟友的叛徒发动攻击。⁴⁹事实上，希伦是最大受益者，罗马人信任他，将西西里岛日常事务的管理权托付给他。罗马并不打算直接管理西西里岛。战争的目标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即使到战争末

期，罗马人的预期也不过是让迦太基保持中立而已。迦太基的商船可以继续往来于地中海；事实上，由于需要向罗马支付巨额赔款，他们必须这么做。

5

我们需要反思第一次布匿战争，因为此次冲突标志着罗马舰队的诞生。古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自然结果。迦太基战败后，来自周遭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北非内陆的努米底亚（Numidian）统治者不断施压；另一方面，以撒丁岛人为主的雇佣军发生了严重暴动。雇佣军杀死了迦太基的指挥官以及撒丁岛上的迦太基人，在新的军队被派往撒丁岛镇压叛乱后，这些军队竟然也加入了暴动的队伍。但雇佣军最终被驱逐了，他们来到伊特鲁里亚，向罗马寻求帮助，且罗马的元老院也愿意提供这种帮助。令罗马人愤怒的是，迦太基人竟然抓捕了五百名曾秘密资助叛乱者的意大利商人。迦太基本来想要恢复其在撒丁岛部分地区的统治，但得知罗马人反对的决心后，迦太基人屈服了。公元前 238 年，他们不但向罗马人缴纳了一千二百塔拉特白银，而且放弃了撒丁岛。⁵⁰因此，罗马人在地中海的两座最大岛屿上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且他们仅靠武力威慑就获得了撒丁岛。迦太基已经没有争辩的力气。对于撒丁岛，罗马要求的是否只有布匿商人经常到访的海港和沿海据点，至今仍无定论。撒丁岛难以征服，因为岛上有成千上万个围绕石塔形成的聚落，聚落中的人接受好战的军事首领的指挥。对撒丁岛人来说，其与罗马人的关系并不比与迦太基人的关系更亲密，直到前 177 年，罗马才对撒丁岛人取得了大胜。⁵¹罗马感兴趣的主要是撒丁岛的

战略位置，拥有它就能够保证对整片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控制。他们渴望得到的不是整座岛屿，而是其海岸线，要保证其海港不受海盗以及迦太基战舰的威胁，因为这些海港可以为罗马人的舰队提供补给。如此一来，罗马就开始有意识地按照控制海洋的原则来制定他们的地中海战略。

6

罗马人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占领——或更确切地说，将迦太基势力从这两座岛屿上驱走——迫使迦太基人将其野心转向西部。如今，迦太基掌控之地仅剩马耳他岛、伊维萨岛以及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一些商站。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创建的帝国的所在地就是西班牙，该帝国的规模和野心远远超过了数个世纪之前腓尼基人创立的商业网络。哈米尔卡致力于建立陆上领地。古代历史学家们曾提出一个疑问：在哈米尔卡眼中，西班牙究竟是他个人的领地，还是迦太基人扩张的新舞台（这种扩张包括对古代塔特索斯的银矿的控制）。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哈米尔卡所在的巴卡家族极为显赫，但在迦太基的共和国体制下他们的影响力不是没有遭受质疑。关于发行于西班牙的迦太基领地的希腊风格货币上的图案究竟是麦勒卡特，还是希腊式的头戴花环的统治者，至今仍存争议。巴卡家族有意将自己打造成新的亚历山大家族，他们要在西部建立王权统治。⁵²哈米尔卡致力于将迦太基从罗马的枷锁下解救出来，一则出名但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诉求：公元前 237 年，哈米尔卡在前往西班牙前，为神祇巴力·哈蒙（Baal Hamon）准备了一场献祭，他将其幼子汉尼拔叫至跟前，要求汉尼拔将手放在牺牲上，并发誓“永远不要向罗

马表达善意”。⁵³

顺理成章的，哈米尔卡关注的首先是获取对富含银矿的西班牙南部的控制权。就像在撒丁岛一样，对“控制”的概念必须小心操作。他与伊比利亚以及凯尔特 - 伊比利亚（Celtiberia）的首长们结盟，逐渐扩充他的军队，因此到公元前 228 年，他已经将 5.6 万人输送到战场。巴卡家族 [因为最初继承西班牙的是哈米尔卡的女婿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哈斯德鲁巴被暗杀后才轮到他自己的儿子汉尼拔] 还建造了一些城市来加强控制。哈米尔卡监督建造了阿克拉莱克（Akra Leuke），普遍观点是它就埋在现代的阿利坎特（Alicante）城址之下，约前 227 年，哈斯德鲁巴想要在南部更靠近海岸、更接近银矿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迦太基人在给人和地方命名时极度缺乏创意，他们有数不尽的汉尼拔和哈斯布鲁克。哈斯布鲁克将他的新城命名为“新城”（*Qart Hadashit*），在这里叫卡特赫纳（Cartgena）。但从波利比乌斯时代开始，历史学家们为了避免把这座城市与迦太基母邦搞混，经常称其为“新迦太基”，也就是“新的新城”。⁵⁴哈斯布鲁克为确保人们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在该城所在地的山丘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更重要的是，从北非前往卡特赫纳极为便利，卡特赫纳于是成为连接迦太基与西班牙一系列港口与堡垒的关键纽带。

185

事实上，迦太基与罗马的冲突继续在西班牙北部上演，也就是现在巴伦西亚海岸以北的萨贡托（Saguntum）。经过漫长的围城之后，公元前 219 年底，汉尼拔洗劫了这座受到罗马保护的城市。罗马人对这样一个距离其政治和商业区域如此遥远的地方产生兴趣，本身就意味着，迦太基人在十八年的时间里不断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的举动，引发了罗马人的担忧。这又是

一个战略性问题：罗马人不想被迦太基人包抄，但又拒绝让迦太基回到撒丁岛或西西里岛继续经营。在早些时候，哈斯德鲁巴曾带领迦太基，就布匿人对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控制，与罗马达成共识，之后迦太基人便可停留在埃布罗河（Ebro）以南的地区，此地 在萨贡托以北很远处。⁵⁵ 罗马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阻止迦太基势力的复苏。汉尼拔决定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将战争引到罗马的家门口，为的是将冲突从巴卡家族控制的西班牙，或二十三年前迦太基曾经落败的水域转移。不过这未能阻止罗马人对西班牙发动攻击。罗马人的统帅是格奈乌斯·普布利乌斯·西庇阿（Cnaeus Publius Scipio），他率领 2.5 万名士兵乘船抵达西班牙，在古代的商站恩波里翁登陆。他赢得了对迦太基人的海战胜利，但与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参战的罗马舰队规模相比，此时的舰队太小，只有三十五艘战船。然而，不久之后，与他们结盟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变节，导致罗马人陷入挣扎。

战争的另一个新舞台是希腊北部。马其顿的统治者腓力五世震撼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Cannae）取得的大胜（公元前 216 年），也拿起武器反抗罗马。罗马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同一时间在许多战场作战，腓力在阿尔巴尼亚沿岸水域取得了一些胜利。罗马人再一次以其在意大利的战略为基点考虑了马其顿问题。他们非常担心会失去对亚得里亚海南部海岸的控制，于是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布伦迪西厄姆 [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Brindisi）] 阻止马其顿人登陆。⁵⁶ 马其顿人坚决抵抗，罗马无法迫使其投降。罗马人逐渐意识到，其地中海领地的扩张必然会使他们与从前未进入他们视野的周边民族建立联系，甚至发生冲突。

关于西西里岛，西塞罗写道：“它是我们帝国王冠上的第

一颗宝石，是第一个被称为行省的地方。”因为罗马人开始发现，对像西西里岛这样的地方进行非正式的帝国管理不再能够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叙拉古的希伦受到礼待，被允许在公元前 237 年对罗马进行国事访问；更重要的是，他给罗马人带来了二十万蒲式耳^①西西里岛出产的谷物。他可以自由统治西西里岛的南部与东部，但到前 227 年，西西里岛的北部与西部，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曾经数次激烈海战之地，被交由罗马的执政官管理。岛上设置了军事要塞并驻有军队，但这些军队需要给养，在地中海中部巡逻的舰队同样需要食物补给。于是，罗马人决定在西西里岛实行更加正式的谷物征税制度。在前 215 年老迈的希伦去世后，问题爆发了，叙拉古发生了暴动。⁵⁷叙拉古城中敌视罗马的小集团幻想与布匿人结盟，希望确保叙拉古对整座锡拉岛的统治权，仿佛迦太基会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们。⁵⁸迦太基终于重回西西里岛，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以万计的士兵，阿克拉加斯成了布匿人的主要基地。但前 213 年，罗马人将他们的陆军与海军的全部火力集中到了叙拉古。在此之前，叙拉古一直是岛上的最大城邦，而且罗马还面临补给的困难。罗马人试图封锁港口，但由于他们的船只过于分散，迦太基舰队仍然能够安然无恙地在周边水域穿行。前 212 年，迦太基人试图在一百五十艘战舰的护卫下，将一支由七百艘商船组成的船队送往叙拉古，却毫无悬念地以失败告终。但在那个年代，海军的封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一个像叙拉古一样拥有宽阔海港以及很长的防波堤的城市来说尤其如此。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在伟大的阿基米德的建议下，将罗马舰队彻底击

187

^① 蒲式耳 (*bushel*) 是一种计量单位。1 蒲式耳相当于 36.368 升。——译者注

溃。阿基米德兴奋地设计出新的机器，它们能将罗马人的船只吊出水面，将其剧烈摇晃，使船上的水手掉入大海；他还设计出巨大的镜子，将西西里岛灼热的阳光反射到敌船的木料上，使其着火。不过，顽强的罗马人最后还是在前 212 年成功地占领了叙拉古，阿基米德也惨遭杀害，据说他当时正在地上勾勒另一个天才之作的的设计图。⁵⁹ 次年，罗马人又从迦太基人手中夺走阿克拉加斯。随后的一年，罗马人吹嘘道，现在西西里岛上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迦太基自由民了。⁶⁰ 夺取西西里岛不仅有军事和政治上的好处，还有文化上的：叙拉古的珍宝被掠夺一空，希腊雕像作为战利品被送往罗马，推动了罗马人对希腊人卓越文化的热衷与学习。

战争持续了又一个十年，决定其走向的是西西里岛以外的事件，尽管若没有在西西里岛的胜利，罗马是不太可能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在西部，西庇阿意识到罗马军队可涉水穿过新迦太基城边的大潟湖，于是在公元前 209 年占领了新迦太基。然而，冲突的焦点逐渐移向非洲，罗马人最终于前 202 年在非洲的扎马（Zama）战役中击败了汉尼拔。虽然汉尼拔率军在意大利半岛上几经辗转、大肆破坏了许多年，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罗马人将数千名士兵从西西里岛运送到非洲的能力至关重要，但他们与努米底亚国王们的联盟也为罗马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事实上，罗马赢得了对海洋的控制权，这一点在迦太基最后签署的屈辱条约中也有所反映：迦太基只能保留十艘三列桨战船，他们闻名于世的五列桨战船完全被禁止。根据李维（Livy）的叙述，罗马人从迦太基的巨大圆形港口中拖出五百艘战舰，并将其付之一炬。迦太基再次被征收巨额赔款，并被剥夺了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地，甚至非洲的一些领地也被割让给

努米底亚人。哈米尔卡·巴卡小心翼翼积攒起来的西班牙领地尽失罗马。迦太基被禁止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作战，事实上沦为了罗马的附庸。这样的条款经常被强加于罗马在意大利的邻邦，但对迦太基这就等同于阉割。⁶¹ 罗马再次威风凛凛地指挥一切，赢得了从未想象过的卓越地位与荣耀。 188

7

虽然取得了对汉尼拔的胜利，但罗马仍需面对地中海中部的许多未解难题。他们与马其顿人打了两场大仗，马其顿人最终被迫接受罗马的保护；向南，他们与埃托利亚同盟（Aetolian League）交战于希腊中部；向东，与他们交战的是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军队中有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在叙利亚获得权势的希腊将领。⁶² 到公元前 187 年，罗马的边界已经从从前的西班牙巴卡领地向东跨越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黎凡特地区。当然，罗马还有潜在的对手，例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者拥有巨量的战舰，但毕竟这是整个地中海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强大政治影响，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在罗马与周边地区发生冲突时，迦太基保持静默，忠实地履行着与罗马签订的屈辱性条款。在叙利亚战争期间，迦太基人还心甘情愿地将他们仅存的战舰驶往远古祖先生活过的水域。他们从迦太基地平线以外的遥远属地带来谷物，以补给罗马的陆军与海军。⁶³ 前 151 年，迦太基人偿清了他们欠罗马的战争赔款。就在这个时刻，他们发现自己与努米底亚的八旬老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起了冲突。迦太基人认为自己此时已经摆脱了罗马人的制约，能够自行决定对马西尼萨发动攻击。而罗马的想法完全不同。在罗马人眼中，繁荣、不断复苏、能够实施自己的政策的迦太基，

间接威胁了罗马对整个地中海的控制，尽管这种威胁并没有直接针对罗马人在西西里岛、撒丁岛或西班牙的领地。罗马人加图（Cato，亡于前149年）是顽固的保守派，他曾作为迦太基人与马西尼萨的正式调解员前往迦太基。他坚信只有彻底消灭迦太基，才能保障罗马的未来。他不断地在罗马元老院的演讲中谴责迦太基，每次他要结束演讲时，无论他的演讲主题与迦太基是否相关，他都会强调：“另外，我的主张是，迦太基必须灭亡。”⁶⁴于是罗马开始了对迦太基的挑衅。起初他们要求迦太基派出人质，迦太基答应了；然后是上交包括两千支石弩在内的所有库存武器的要求，迦太基人答应了。但罗马人提的第三个要求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迦太基人被要求全部撤离他们的城市，在至少十英里以外的内陆地区任选一处迁居地。如果罗马人认为允许迦太基人选择自己的居所是慷慨之举的话，他们就是在欺骗自己。迦太基人对此表示拒绝，结果战争再次爆发。这是迦太基的生死之战，与此前的两次战争完全不同，这一点在最后的要求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也就是此前应战汉尼拔的老西庇阿的继子的指挥下，罗马军队直接行至北非。这一次双方没有在西西里岛或西班牙周旋，因为这里已经完全脱离了迦太基人十分有限的影响范围。尽管迦太基人凭借非凡的能力成功组建了一支新的舰队，但他们的城市还是从陆地与海洋遭到了双重包围，最终在前146年春被罗马人攻陷。小西庇阿将城中居民贩卖为奴，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有传言称他曾在土中撒盐，以此预示迦太基绝不能再度兴起，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布匿战争持续了将近一百二十年。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

地中海的西部与中部：在迦太基陷落的那一年，罗马人巩固了其
对希腊的控制，开启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争夺地中海东
部控制权的激烈竞争。他们与马其顿人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多
年，然后与希腊的各种城邦联盟征战，并在公元前 146 年最终
占领了科林斯。科林斯一直被视为反罗马势力的核心，但该城
及其两座海港所具有的商业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整座城市都
遭受了无情的洗劫。所有居民都被贩卖为奴。华丽且大多古老
的艺术品都被拍卖。一船一船的雕像与绘画被送往罗马，激起
贵族追捧希腊艺术的热潮。毁灭不同城市造成的文化影响是十
分不同的。布匿文明在迦太基陷落后作为北非的通俗文化苟延
残喘，而希腊文明却在科林斯陷落后向西传播。⁶⁶ 这些战争以
别的形式进入罗马人的意识。在奥古斯都·恺撒统治的时期，
维吉尔描述了建立迦太基的狄多女王与特洛伊避难者埃涅阿斯
之间的宿命纠葛。只有在火葬仪式中毁灭狄多的迦太基，这一
混乱的关系才能终结：

190

整座宫殿回响着呜咽、叹息和妇女的哀号，
一片啼哭之声响彻霄汉，
恰像敌人冲了进来，
整个迦太基或古老的推罗要陷落了，
人间的庐舍和天神的庙堂统统被卷入疯狂的烈火之中
一样。^{①67}

① 译文引自《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译林出版社，1999，第 667 ~ 671 页。——译者注

注 释

1. B. H. Warmington, *Carthage* (London, 1960), pp. 74-5, 77; R.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London, 2010), pp. 121-3.
2. Xenophon, *Hellenika*, 1:1.
3. A. Andrewes, *The Greek Tyrants* (London, 1956), p. 137;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23-4.
4. Warmington, *Carthage*, p. 80.
5. M. Finley, *Ancient Sicily* (London, 1968), p. 71; Andrewes, *Greek Tyrants*, p. 129;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126 (一则迦太基碑铭纪念了阿克拉克加的灭亡).
6. Warmington, *Carthage*, pp. 83, 87; Finley, *Ancient Sicily*, pp. 71-2, 91-3.
7. Warmington, *Carthage*, p. 91;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27-8.
8. Warmington, *Carthage*, pp. 93-5; Finley, *Ancient Sicily*, pp. 76, 78, 80, 82.
9. Warmington, *Carthage*, p. 94.
10. Plutarch, *Parallel Lives*, 'Timoleon'; Finley, *Ancient Sicily*, p. 96.
11. Warmington, *Carthage*, pp. 102-3;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36-7.
12. R. J. A. Talbert, *Timoleon and the Revival of Greek Sicily, 344-317 BC* (Cambridge, 1974), pp. 151-2; Finley, *Ancient Sicily*, p. 99.
13. Plutarch, 'Timoleon'; Talbert, *Timoleon*, pp. 156-7, 161-5; Finley, *Ancient Sicily*, p. 99.
14. Finley, *Ancient Sicily*, p. 104; Warmington, *Carthage*, p. 107.
15. Warmington, *Carthage*, p. 113.
16. Finley, *Ancient Sicily*, p. 105.
17. J. Serrati, 'The coming of the Romans: Sicily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irst centuries BC', in *Sicily from Aeneas to Augustus: New Approaches i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ed. C. Smith and J. Serrati (Edinburgh, 2000), pp. 109-10.
18. Livy 2:34.4; B. D. Hoyos, *Unplanned War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unic Wars* (Berlin, 1998), p. 28; G. Rickman,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 p. 31.
19. R. Cowan, *Roman Conquests: Italy* (London, 2009), pp. 8-11, 21-5.
20. R. Meiggs, *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 p. 24.
21. Rickman, *Corn Supply*, p. 32.
22. K. Lomas, *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350 BC-AD 200* (London, 1993), p. 50.
23. Livy 9:30.4.

24. Disagreeing with Lomas, *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p. 51.
25. Lomas, *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p. 56.
26. Hoyos, *Unplanned Wars*, pp. 19–20.
27. J. F. Lazenby, *The First Punic War: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 1996), p. 34;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62–5.
28.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07–11, 160–61.
29. E.g. A. Goldsworthy, *The Fall of Carthage* (London, 2000), pp. 16, 65, 322.
30. Hoyos, *Unplanned Wars*, pp. 1–4;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19–20.
31. Polybios 1:63; Hoyos, *Unplanned Wars*, p. 1; on devastation: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363–4.
32. J. Serrati, 'Garrisons and grain: Sicily between the Punic Wars', in *Sicily from Aeneas to Augustus*, ed. Smith and Serrati, pp. 116–19.
33.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p. 35–9;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66–8;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71–3.
34. Polybios 10:3;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 37; Hoyos, *Unplanned Wars*, pp. 33–66.
35. Polybios 20:14;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 48;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174.
36. Diodoros 23:2.1.
37.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p. 51, 55.
38. Polybios 20:1–2; Hoyos, *Unplanned Wars*, p. 113;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 60;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 81.
39. Cf. though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175.
40. Polybios 20:9;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p. 62–3.
41. Polybios 20:9–12.
42. *Ibid.* 22:2.
43.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p. 64, 66 and 69, fig. 5.1;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181–3.
44. J. H. Thiel,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in Republican Times* (Amsterdam, 1946), p. 19;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109–15; also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p. 83, 86–7.
45. Cf.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 94.
46. J. Morrison, *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339–30 BC* (Oxford, 1996), pp. 46–50.
47.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 115.
48. Polybios 37:3;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 111;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181.
49. Polybios 62:8–63.3; Lazenby, *First Punic War*, p. 158.
50. Warmington, *Carthage*, pp. 167–8; Hoyos, *Unplanned Wars*, pp. 131–43.
51. M. Guido, *Sardinia*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1963), p. 209.
52. B. D. Hoyos, *Hannibal's Dynasty: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247–183 BC* (London, 2003), pp. 50–52, 72, 74–6;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p. 2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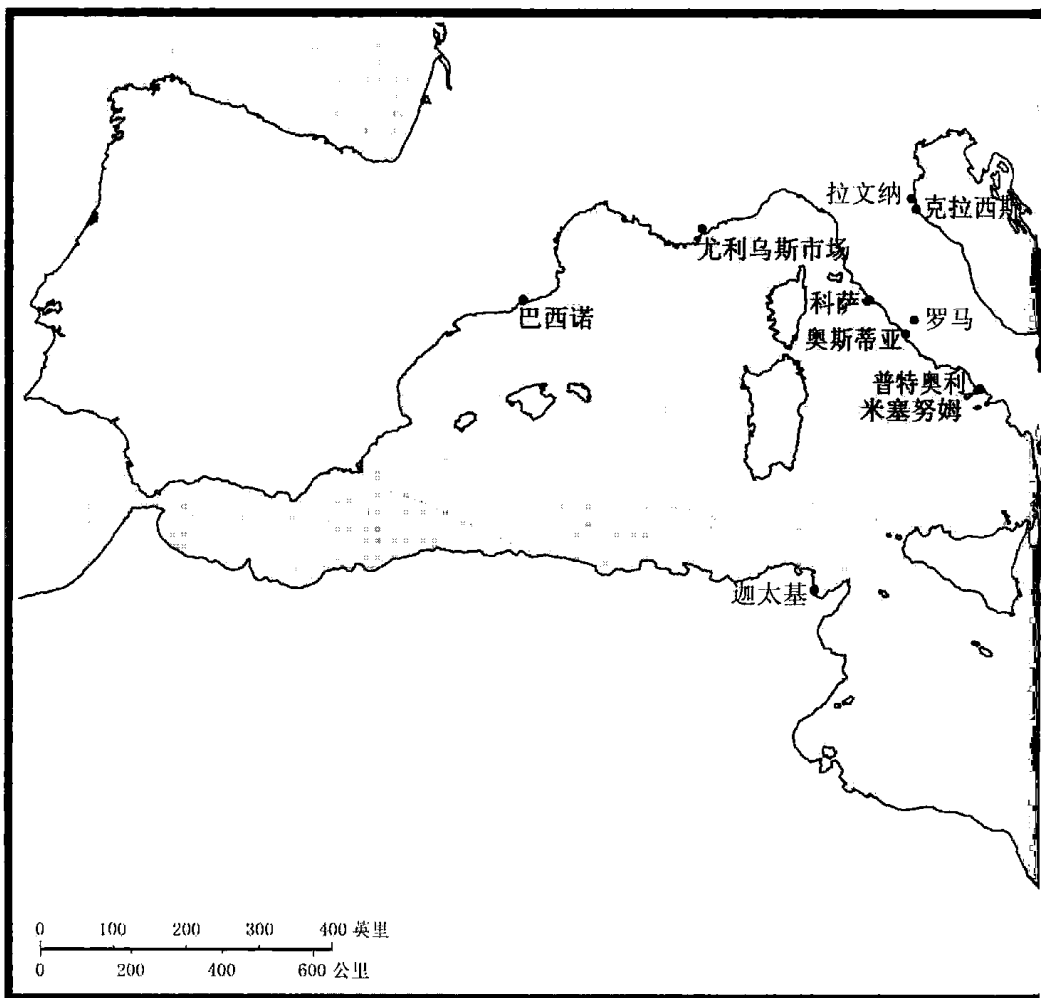
53. Hoyos, *Hannibal's Dynasty*, p. 53.
54. *Ibid.*, pp. 55, 63-7, 79-80; Miles, *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 p. 224, citing Polybios 10:10.
55. Hoyos, *Unplanned Wars*, pp. 150-95, especially p. 177 and p. 208.
56.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253-60.
57. Serrati, 'Garrisons and grain', pp. 115-33.
58. Finley, *Ancient Sicily*, pp. 117-18;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 261.
59. Thiel,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pp. 79-86;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263, 266.
60. Finley, *Ancient Sicily*, p. 119.
61.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 308.
62. Thiel,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Sea-power*, pp. 255-372.
63.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 331.
64. Warmington, *Carthage*, pp. 201-2.
65. Goldsworthy, *Fall of Carthage*, pp. 338-9.
66. Rauh, *Merchants*, pp. 38-53.
67. Virgil, *Aeneid*, 4:667-71, in Dryden's translation.

八 “我们的海” (前 146 ~ 150 年)

1

迦太基与科林斯陷落之前，罗马与地中海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关系：显然，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的影响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向东扩展到罗得岛，虽然罗马元老院这时还未对沿岸地区和岛屿进行直接管辖。另一方面是商业关系：罗马商人与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然而，元老院与商人属于两个不同群体。与荷马笔下的英雄一样，罗马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他们不会用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眼中，商业与诡计、侵占以及欺诈联系在一起。若不撒谎、欺骗、贿赂，一名商人又如何获利呢？富商都是成功的赌徒，他们的财富源于冒险和碰运气。¹可是这样的优越感没有妨碍诸如老加图和西塞罗这样的精英人士从事商业活动，当然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的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

随着罗马完成对意大利的控制，它为统治下的许多城镇的市民提供了联盟者的身份，也为退伍老兵设立了殖民地。如此一来，“罗马人”（Romanness）渐渐不再意味着生活在罗马，而且只有部分罗马城中的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并拥有权投票，妇女与奴隶被排除在外。在公元前1年前后，罗马约有二十万奴隶，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的经历是地中海地区民





提洛岛

崎岖的奇里乞亚

亚历山大

192 族史的重要部分。来自迦太基和科林斯的俘虏可能被安置在农田耕种，他们被迫忍受背井离乡的艰苦生活，对于自己妻儿的命运一无所知。伊比利亚的俘虏被迫在西班牙南部的银矿工作，其工作环境之恶劣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但那些显露了自己才能的人可以作为希腊教师生活在贵族的家中，或者为其主人充当商业代理人，甚至能够从事跨海贸易（尽管他们很可能会消失于亚历山大的销金窟中）。奴隶可以把钱积攒为私产（*peculium*）——尽管法律上它与奴隶的其他所有物的一样属于奴隶主——并用其赎回自己的自由，或者慷慨心善的主人会完全遵从其喜爱的奴隶的心意还他们自由。自由民可以成为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也能够享受罗马公民的绝大多数权益。如此一来，大量来自希腊、叙利亚、非洲和西班牙的移民来到罗马，东地中海的标准交流方式——希腊语自然就成了罗马城中许多区域的日常语言。1世纪的诗人琉善（Lucan）曾抱怨道：“城里生活的不再是罗马本地人，而是人类中的垃圾，这些不同种族混杂在一起，让我们即使想打一场内战都打不起来。”² 他的势利隐含着淡淡的自我怨恨：他生于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Córdoba），在孩童时期被带到罗马。然而，即使元老院也被这些自由民的子孙渗透，更不用说出身较好的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和拉丁人了。³ 喜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在一部剧作中，用北非的布匿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狡猾的商人和聪明的奴隶。由于罗马城及其外港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城里使用的语言变得更加混杂了。这些商人包括：推罗人，这些商人曾经生活在伟大的腓尼基，到奥古斯都时代他们已经重操旧业开始行商；犹太人，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包括大量船员和水手；南意大利人，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那不勒斯海

194

湾在罗马的补给体系里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罗马商人”一词表示“接受罗马庇护的商人”，而非“具有罗马人血统的商人”。

罗马在地中海确立的霸权依赖于三种因素：足以供养这座大城市的物资，可以为这座城市送达物资的港口，以及对商人的保护（罗马人打败了出没于东地中海的海盗，这些海盗曾严重威胁围绕亚历山大、提洛岛以及罗马的其他合作者建立的商业体系）。

2

海盗追求财富。公元前2世纪商业的繁荣发展也为海盗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尤其是自从罗得岛衰落后，无论罗得岛人还是提洛岛人都没有肃清东地中海猖獗海盗的海军力量。西地中海也与东地中海一样遭到海盗的蹂躏。公元前123~前121年，梅特卢斯·“巴利阿里库斯”（Metellus “Balearicus”）就是通过镇压像瘟疫一样盘踞在巴利阿里群岛周边的海盗而获得了自己的绰号，这个时候巴利阿里群岛已经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里的海盗总是乘着一种比救生艇好不了多少的小船在海面上横冲直撞，却能造成巨大的麻烦。⁴在布匿人的首都被毁后，再也没有迦太基商人管理这片海域。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于是认真承担起来。前74年，年轻的贵族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准备前往罗得岛学习修辞学（他本人很有学问），但在途中被海盗劫持。用这样一位显赫的贵族可以换得一笔丰厚的赎金，因此海盗对他以礼相待，但即使在被释放时，他仍然颇有勇气地嘲讽海盗，声称他将再度返回以将他们彻底消灭。他集合了一支小舰队，抓

捕了曾经抓住他的海盗，然后将他们钉上十字架。由于他们曾经的礼遇，他在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之前仁慈地先将其喉咙割断。⁵

195 海盗们小型但敏捷的舰队沿着航线掠食，他们的基地分布在克里特岛、意大利以及土耳其东南部的岩石海岸。该海岸是被形象地称为“崎岖的奇里乞亚”的危险之地，位于塞浦路斯以北及罗得岛以东数百英里。经由曾经辉煌的伊特鲁里亚城市的贸易渐趋衰落，伊特鲁里亚的船主们于是转而使用了一些不太正当的营利手段。罗得岛出土了一块石碑，它的树立是为了纪念提马克拉提斯（Timakrates）的三个儿子，他们在抗击出没于东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盗时阵亡了。⁶有时海军为搜寻某些特定敌人还鼓励海盗船参与海上巡逻。约公元前200年，斯巴达王纳比斯（Nabis）就曾这么做过，他与克里特岛的海盗结盟，而这些海盗的劫掠目标是驶往罗马的补给船。⁷盘踞在西西里岛的反叛将领，例如庞培的儿子赛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就曾出动船只试图切断罗马的谷物供应。赛克斯图斯·庞培能够轻易达成这一目标，因为不仅是西西里岛，撒丁岛也在他的掌控之下。⁸各岛以及沿海港口的统治者要对经过其海域的商船征收通行税，若被拒绝就会以武力相逼。海盗需要基地，以便将掠夺的金钱、货物和奴隶卸下，因此他们的活动需要得到小港口居民的自愿合作，例如吸引了数不清的销赃者、皮条客、非法商贩和骗子的阿塔雷亚（Attaleia）。奇里乞亚的海盗努力供养着生活在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南端的所有社群。他们讲卢维语，生活在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对男性和女性后裔一视同仁，由长者或“君主”（*tyrannoi*）管理。⁹海盗船上的水

手是移居到海滨地区的山民，但若不是得到了来自沿海地区的锡德（Side）和阿塔雷亚的水手们的帮助，他们是没法学到航海技能的。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锡德的居民允许海盗们在码头附近拍卖俘虏，尽管他们明知这些俘虏本是自由人。¹⁰对于这些海盗使用的制作简易的船只，普鲁塔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他们的船在船头都装有镀金桅杆，船帆用紫色布织成，桨柄上镀着银，仿佛他们很高兴以罪恶为荣。在整个海岸，除了音乐和舞蹈、宴饮与狂欢外，别无他物。¹¹

到公元前 67 年，海盗问题已经蔓延到罗马的门口，袭击了奥斯蒂亚以及意大利的海岸地区。¹²普鲁塔克还称：

这群海盗控制了整个地中海，致使正常的航行与商业活动无法开展。正是因为这些海盗的猖獗，罗马人的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也意识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陆地上就会因粮食不足而发生饥荒，因此罗马人最后决定派遣庞培去解决海盗问题，从海盗手中夺回海洋。¹³

此时，庞培已经在罗马的权力斗争中有了突出表现（或者说树立了很多敌人，全看评价的人支持哪一方）。¹⁴他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海盗问题。前 66 年，他将地中海分成三个区域，打算系统性地逐一清除海盗。他先处理了家门口的问题，肃清了第勒尼安海海域的海盗。他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西西里岛、北非和撒丁岛（西塞罗曾称这三处是“国家的三座粮仓”），在那

里设防，以确保罗马城的补给线的安全。¹⁵据说此项任务进行了四十天。随后，他准备突袭奇里乞亚，但他在西部取得的成果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舰队的航行速度，因此他的舰船一进入奇里乞亚海岸城镇的视野，这些城镇就纷纷向他投降了。海上及陆上的战斗规模非常有限。他抵达时可能只带了五十艘战舰和五十艘运输舰，舰队规模不大，不过奇里乞亚人的轻型船还是难以与之抗衡。罗马人还投票表决，如果他需要，罗马还可为他准备五百艘战舰。¹⁷庞培的目标不是消灭海盗，而且消除海盗行为：他没有将敌人全部屠杀，而是接受他们的投降并将其重新安置，为他们提供可耕种的农田。¹⁸元老院曾提议给庞培三年时间解决海盗问题，而庞培的行动只花费了三个月。自此以后，海盗对于罗马的粮食供给线不再是严重的灾难，而只是轻微的刺激。

庞培以对海盗的战争为跳板，开拓了罗马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领地范围，这些领地的稳定不只依赖于罗马的军队，还依赖于当地国王们的共识，即与罗马结盟是保证他们自身权势的最佳方式。¹⁹然而，庞培并不满足于只在东方拥有这一个领地。罗马人在东地中海的领地只是罗马历次激烈内战的副产品。这些内战的交战方分别是：庞培对尤利乌斯·恺撒；布鲁图斯（Brutus）对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和屋大维（Octavian）；以及马克·安东尼对屋大维，后者就是未来的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48年，庞培所代表的贵族派与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者在希腊东北部的法萨卢斯（Pharsalus）交战（“这是他们自己所希望的”，尤利乌斯·恺撒看着死去的敌人沉思，然后如此评述）。²⁰庞培逃往埃及但落入了圈套，在他以为终于到了海滨的安全之地时被

突然刺死。此时，东地中海唯一尚未落入罗马统治的大片领土就是埃及，“毁之可惜，合之危险，治之烦扰”。²¹ 尤利乌斯·恺撒对庞培紧追不舍，但他的对手在他抵达埃及的两天前被杀死了。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确立罗马在埃及影响力的良机，决定支持迷人、聪慧、狡黠（虽然可能并不非常漂亮）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帮助她赢得与她弟弟托勒密十三世的权力斗争。众所周知，恺撒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炮击亚历山大城，并要承担毁坏整个或部分大图书馆的责任。他将罗马军队驻扎于埃及，名义上是为了向仍然独立的女王提供保护。无论他是否征服了埃及，克莱奥帕特拉实实在在地征服了他，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托勒密·恺撒。女王曾带着儿子前往罗马，罗马人普遍认为他就是恺撒的孩子。一位罗马将军有一个可能成为未来的法老的儿子，这样的构想让罗马政客们警铃大作，认为恺撒也有称帝的野心，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辩称：“恺撒被刺是因其所为，而非其所将为”。²²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之后罗马政客们的相互斗争差点使埃及再次脱离罗马人的控制。尽管前42年在爱琴海北部滨海地带发生的腓力比（Philippi）战役中，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恺撒的朋友马克·安东尼一起为恺撒报了仇，但他们自己的关系也开始恶化。获胜后，领袖们封自己为“三巨头”（Triumvirs），对罗马世界进行了划分：屋大维掌管西部，马克·安东尼掌管埃及和东部，雷必达（Lepidus）管理阿非利加。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将罗马的辖区分成三份，而是维护新的政权，对行省进行重组。马克·安东尼将腓尼基人的城市、“崎岖的”奇里乞亚的城镇以及整座塞浦路斯岛（前58年被

198 罗马吞并) 转赠克莱奥帕特拉。奇里乞亚很有价值, 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 它与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一样, 是重要的木材产地。尽管如此, 安东尼还是成为臣服于克莱奥帕特拉魅力的第二位罗马伟人, 诽谤他的人坚持声称, 他自视为未来的埃及国王。或者他所希望的就是把亚历山大城变成泛地中海帝国的未来首都? 在打完了同亚美尼亚人的战争后, 他在亚历山大城的街道上举行了一场罗马人的凯旋式, 这是从未有过先例之举。此后, 屋大维与安东尼间的不信任日益凸显, 他们的权力之争变为公开的战争。

屋大维在公元前 31 年获得了公开大胜, 不过不是在埃及, 而在希腊西北部靠近爱奥尼亚群岛的亚克兴角 (Actium) 海域。安东尼拥有更大规模的舰队, 拥有通向埃及的畅通无阻的补给线; 他所缺少的是那些他视为盟友的人的忠诚。这些盟友在遭遇屋大维战船的包围后就开始逃跑, 而安东尼带着四十艘战舰脱围而出, 逃回亚历山大。²⁴ 这场战役是否真的规模极大, 至今尚无定论, 但屋大维却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宣传价值。

年轻的恺撒, 身着闪亮的盔甲, 立于船尾,
在这里引领着罗马人与他们的神明投入战斗:
他所尊奉的宏伟壮丽的神庙将光辉射向远方;
看啊, 他的头上还悬挂着恺撒的荣耀之星。

另一边则是罪大恶极的安东尼:

安东尼率领着军队一字排开, 遥遥相对,

他得到蛮族的帮助，带着东方诸王的军队，
有附近的阿拉伯人，远方的巴克特里亚人，
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人联合一致参战：
身在吵吵嚷嚷的中心，穿着华丽长袍，
还有他的厄运——埃及的妻子——在旁追随。²⁵

在此后的千余年里，亚克兴海战作为世界史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被传唱。这场战役的结果为屋大维在意大利赢得声望与支持，这些正是他此前缺少的。他的胜利保证了东地中海在未来的三个世纪中仍与罗马联系在一起，直到新罗马在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这种局面才被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取代。

安东尼在回到埃及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屋大维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他最终兵败自刎。数日后，埃及的最后一位法老克莱奥帕特拉也选择了同样的结局。她是否用一条角蝰把自己毒死的问题不过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如今屋大维才是埃及的主人。他立刻表现出对被占地区文化传统的理解。他愿意像法老那样统治，为的是将埃及变成他的个人领地。他通过总督管理埃及，总督直接对他负责，而非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对于埃及来说，后者只有理论上的权威。²⁶屋大维明白，埃及最宝贵的财富不是绿宝石或斑岩，而是产自尼罗河流域的麦上的麦穗。

由此一来，针对海盗的战争、东地中海大片土地的获得、罗马的内战，都对地中海产生了明显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从此以后，罗马人就需要保证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整片海域的安全。地中海完全成为罗马的内湖。这个过程花费了一百一十六年的时间。第一阶段从迦太基

与科林斯的陷落持续到公元前 66 年的奇里乞亚战役。第二阶段较短，以屋大维得到埃及告终。在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后，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恺撒，罗马世界的第一公民（*Princeps*）或领袖。在如维吉尔、贺拉斯和李维等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宣传下，他在内战中的胜利经常被看作新秩序确立和罗马帝国诞生的时刻。但是，这种新的帝国秩序也是罗马统治向远至埃及的东方扩张的结果。地中海已经成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但“我们”指的是一个更大概念上的罗马，而非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本身。罗马的公民、自由民、奴隶以及同盟遍布地中海，商人、士兵和俘虏纵横来往于这片海洋之上。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这种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罗马社会 [例如维吉尔、普劳图斯和特伦斯（Terence）等诗人与剧作家都借用了希腊式的概念、内容与韵律]。这种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一些来自东方的主题，亚历山大城的大街小巷已经对这些主题习以为常，此时在罗马城中它们也广为流行：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他的滑稽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中提到的伊西斯（Isis）崇拜，以及在 70 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之前就已经被犹太商人和俘虏带到罗马的犹太教上帝崇拜。罗马就位于这一网络的中心，它现在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性都会，这里有着数百万居民需要供养。获得埃及确保了罗马的粮食供给，因此也保证了民众对帝国统治的支持。

3

对于罗马商人来说，谷物贸易不只是获利的手段。公元前 5 年，奥古斯都·恺撒将谷物分发给三十二万名男性公民。他

骄傲地将这件事记录在一块纪念他的胜利与成就的巨型石碑上，因为赢得罗马公民的支持与在海上与陆上赢得胜利同等重要。²⁷“面包与竞技场”^①的时代开始了，培养罗马人是项艺术，许多皇帝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直到3世纪，皇帝奥勒良（Aurelian）才用面包代替谷物，正式将烤好的面包分发给公民]。²⁸到前1世纪末，罗马控制了地中海地区一些最为重要的谷物产区，即西西里岛、撒丁岛和非洲等庞培仔细加以保护的地区。其后果之一是中意大利谷物种植的衰落：在前2世纪晚期，罗马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就曾抱怨称，伊特鲁里亚如今遍布大地产，那些大地主们饲养牲畜以获利，而不是从土地上获得利润。²⁹罗马不再需要倚仗意大利古怪的气候来获取食物，但要控制遥远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也非易事，与叛军指挥官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冲突就是明证。交易体系越来越复杂，确保了谷物和其他货物能被及时运送到罗马。随着奥古斯都改造罗马城，随着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建立起雄伟的宫殿，罗马对奢侈品——来自印度洋的丝绸、香水、象牙，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的精美雕像、玻璃器皿、雕花金属器物——的需求也逐渐增长。在早些时候，也就是前129年，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接待了一支来自罗马的使团，使团由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率领。当托勒密八世身着丝绸（可能来自中国）制成的轻薄长袍慷慨地宴请来客时，罗马人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们透过那衣料不仅可以看到埃及国王肥胖的身躯，还能看到他

① “面包与竞技场”（bread and circuses）指以小恩小惠获得民意支持，而不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编者注

的生殖器。但西庇阿式的朴素生活在罗马贵族中业已过时。甚至同样简朴的老加图也曾经从航运投资中购买百分之二的股份，将他的资金分散到多次航海活动中，而且他还派遣一名很得他欢心的自由民昆提奥（Quintio）作为他的代理人参与这些航行。³¹

从提洛岛被建成一座自由港（公元前 168 ~ 前 167 年）到 2 世纪是海上交通的繁荣期。我们已经知道，海盗侵扰在前 69 年以后显著减少，航行变得更加安全。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超大型船只（二百五十吨以上）都是在前 2 ~ 前 1 世纪出现的，而在所有时期，大部分船只的排水量都不少于七十五吨。较大型的船携带着武装卫队，虽然它们的速度逊于较小的舰船，但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海盗袭击。随着海盗的衰落，小型船只变得更受欢迎。这些小型舰船最多能装载约 1500 只双耳罐，而大型舰船则能装载 6000 只或更多，这种规模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才被超越。³² 货物的统一性传递出商业活动的规律性：大约半数以上商船携带着一种货物，可能是葡萄酒、橄榄油或谷物。穿越地中海的大宗货物数量越来越多。港口附近的沿岸地区能够专门经营其土壤适合种植的某一特定产品，日常所需的基本食物则由到访的商人供应。“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这种和平则是在镇压海盗以及罗马的统治覆盖整个地中海后确立的。

在距离伊特鲁里亚海岸不远的一处海岬上有一座小港口科萨，这里的考古发现为了解这个时期的环地中海货物运输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这里的作坊在帝国早期的贵族家族“塞斯提”（Sestii）的鼓动下制造了成千上万只双耳罐，他们

把自己的家乡变成了一个成功的手工业制造中心。马赛附近的大康格鲁岛（Grand - Congloue）发现的沉船上有来自科萨的双耳罐：一千二百只罐子大多带有 SES 的标记，这是塞斯提家族的标记。它的下面还有另一艘公元前 190 ~ 前 180 年的沉船，装载了来自罗得岛与爱琴海其他地区的双耳罐，以及数量极多的准备运往高卢南部或西班牙的南意大利产餐具。这类商品可以经远程运输运往内陆，大量的食物则在海岸线或海岸附近就被消费了，因为除非可以采用河运，在内陆运输这些食物非常困难且成本极高。比起陆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费用便宜很多。我们后面会看到，即便像罗马这样距离海洋很近的城市也面临海路运输的问题。³³

谷物是主要食物，特别是产自西西里岛、撒丁岛、阿非利加和埃及的硬粒小麦（*triticum durum*），硬粒小麦比软粒的更干燥，因此更易于保存。不过，内行更青睐一种被称为西里戈（*siligo*）的小麦粉，它由脱皮的斯卑尔脱（Spelt）小麦磨成。³⁴以面包为主的食物只能填饱肚子，面包的“伴随物”（*companaticum*），如奶酪、鱼或蔬菜则使饮食更加丰富。蔬菜不宜运输，除非经过腌制；奶酪、油和葡萄酒却可以在地中海的各个市场中找到；经海路运输的腌肉则主要供应罗马军队。³⁵用鱼的内脏制成的臭鱼酱越来越受欢迎，它被盛放在双耳罐中售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考古学者在据巴塞罗那大教堂不远处发现，在中等规模帝国城镇的诸多建筑中，有一处规模相当大的臭鱼酱工场。³⁶在顺风的情况下，从罗马前往一千海里外的亚历山大城需要十天；若天气不好，从亚历山大城返回罗马则需要花费六倍多的时间，虽然船员们都希望在约三个星期后就回到罗马。从 11 月中到 3 月初，人们一般会避免海上

航行；在9月中到11月初以及3月到5月底，海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在整个中世纪，这种“禁航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遵守。³⁷

《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中关于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的描述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冬季穿行地中海的失败航行。保罗当时为罗马人的囚犯，被安置在一艘亚历山大城的谷物船甲板上，该船从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海岸的米拉(Myra)出发驶往意大利。时值航行季的末期，船被狂风耽搁，当他们最终离开克里特岛时，海面已经变得危险重重。船长没有选择在克里特岛过冬，而是鲁莽地决定冒险驶向风暴频发的海面，他的船因此在海上悲惨地颠簸了两个星期。船员们“为减轻船重将小麦倾入大海”。水手们驾船驶往马耳他岛，在那里把船拖到岸上，但船被撞碎了。保罗称，船上的旅人得到了生活在岛上的“蛮族”的善待。没有人死亡，但保罗和其他人在马耳他岛上耽搁了三个星期。根据马耳他人的传说，保罗利用这段时间使岛民皈依了基督教；在保罗笔下，马耳他人却是轻信、原始的——他治愈了地方首领生病的父亲，因此被当地人奉为神明。航行条件好转后，另一艘来自亚历山大城并在岛上过冬的船搭载他们一起离开了此地。于是保罗依次抵达叙拉古、意大利南端的雷焦，以及距雷焦一天路程的那不勒斯湾的普特奥利港，或许最初那艘谷物商船的目的地便是该港。他从普特奥利港出发前往罗马（依据基督教的传说，他最终在那里被斩首）。³⁸

203

奇怪的是，罗马政府并没有像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那样建立一支国有商船船队；多数搭载谷物驶往罗马的商人从事的都是私营贸易，他们有时还在皇帝在埃及或其他地方的私人地

产装运谷物。³⁹约公元 200 年，谷物商船的平均排水量是 340 ~ 400 吨，可以搭载 50000 摩底 (modii)^① 谷物 (1 吨相当于 150 摩底)。部分船的排水量高达 1000 吨，但海面上同时还穿行着难以数计的小型船。罗马每年需要约 4000 万摩底的谷物，因此 800 艘载重量为平均水平的船须在春季到秋季间抵达罗马。1 世纪，约瑟弗斯声称阿非利加每年提供的谷物可满足罗马八个月的需求，埃及的供给可满足四个月的需求。⁴⁰这完全能满足 20 万男性罗马公民 1200 万摩底谷物的需求。⁴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北非中部就开始成为罗马的补给来源地，从这里到意大利的路途更短、更快捷，自然比始于亚历山大城的远距离运输更加安全。⁴²

大量的商人从出产谷物的北非海滨城镇前往奥斯蒂亚，抵达后他们聚集到现在被称为合作广场 (Piazzale delle Corporazioni) 的柱廊周围。⁴³当时非洲土地还未遭受干旱与侵蚀的破坏，燥热的夏季之后便是冬天的雨季，这种气候循环对于土壤十分有利。⁴⁴皇帝本人也觉得非洲有很多机遇：尼禄 (Nero) 曾将属于六名超级大地主的地产没收，老普林尼相信他由此获得了阿非利加行省的一半土地 (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突尼斯)。⁴⁵从前这块富饶的土地主要为非洲的城市提供供给，尤其是迦太基；在这一时期，它开始向广阔的地中海中部，尤其是罗马和意大利地区提供粮食补给。被纳入这一网络的不仅是罗马治下的土地，还有一些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n) 诸王掌管下的自治领土。当然，也有其他货物从非洲被运往罗马：罗马富人餐桌上的无花果 (老加图称其可在三天内抵达)、松

① 摩底为古罗马的容积单位。——译者注

204 露和石榴，以及斗兽场所需的狮子与猎豹。⁴⁶从公元2世纪开始，皇帝鼓励阿非利加的农民去开发偏远的土地，因为意大利的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连意大利人口的需求都无法满足，更不用说帝国的其他地区了。哈德良时期驻北非的官员写道：“我们的恺撒为满足人们的需求，以不知疲惫的狂热要求人们耕种所有适合种植橄榄、葡萄、谷物的土地。”⁴⁷人们修建灌了溉渠道与堤坝，以收集、分配冬季的雨水，这套系统在11世纪阿拉伯人侵袭前一直运作；一种混合型农业经济繁荣起来，陶器制造业同样如此——出口到海外的非洲赤陶为罗马帝国晚期的贸易特征提供了重要证据。⁴⁸因此，非洲农业的集约化与商业化应归功于罗马人的推动。随着罗马人的统治与影响力扩展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在这片海洋上形成了十分完备的贸易体系。

从帝国财政的角度看，埃及谷物在很多方面都优于阿非利加谷物。埃及不只向罗马一地输送谷物，还一直供养东地中海及爱琴海的大片区域。因为尼罗河河水每年定期泛滥，亚历山大城被视作一个高度可靠的粮食来源；而来自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地的粮食供应则不太稳定，人们必须从多个中心获得所需谷物。⁴⁹最重要的是，在该时期，饥荒不时突然降临西西里岛这类肥沃之地，但罗马帝国并不只是依靠单一、脆弱的粮食补给来源；埃及经历的饥荒比西西里岛还少，但更为恐怖。⁵⁰由于帝国有了来自整个地中海的粮食补给，缺粮问题并不严重。罗马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皇帝们在他们的货币上纪念谷物的分配。公元64~66年，尼禄直接在一些格外考究的铜币上刻下了与谷物供应有关的图案（对于这位自命不凡之人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出人意料）：谷神席瑞斯（Ceres）手持麦穗，面朝丰收女神安诺纳（Annona），

安诺纳手持象征丰收的羊角；中间的祭坛上放置了称量谷物的秤，背景是一艘运粮船的船尾。⁵¹

4

一旦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抵达意大利，它们就会被运往距离海岸十英里的罗马。这种运输需要台伯河上风向的配合，且罗马也缺少好码头。奥古斯都时期，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谷物先运送到那不勒斯湾，那里的普特奥利是一个有遮挡的大型港口，它就位于今天那不勒斯郊区的波佐利（Pozzuoli）。谷物在此地将被装上小型船；由于从伊特鲁里亚的科萨到拉丁姆与坎帕尼亚边界上的加埃塔（Gaeta）没有适宜的港口，因此这些船需要沿坎帕尼亚与拉丁姆的海岸驶往台伯河。尼禄（公元68年去世）于是计划在奥斯蒂亚与那不勒斯湾之间修建一条可容纳两艘五列桨战船通行的大运河，以避免沿意大利海岸航行时的不便与可能遇到的危险。当这项工程还在筹备阶段时，有人提出将台伯河入海口的各个港口扩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斯蒂亚。这座港口的庞大遗址今天仍在向我们展现当年它与非洲、高卢以及东方的贸易往来。我们稍后再详细介绍奥斯蒂亚。

205

普特奥利提前得知运粮船队即将抵达的消息：

今天，亚历山大城的通信船（*tabellariae*）突然出现了。这些船总是提前出发，前来通知舰队即将抵达。坎帕尼亚人对此非常欢迎。普特奥利的所有人都聚集到码头附近，试图通过船上的缆索来指认哪些船来自亚历山大城。⁵²

他们之所以能做出判断，是因为亚历山大城的运粮船队都会使用一种特殊形制的船帆，“所有船都把船帆高挂在桅杆之上”。盖乌斯·卡里古拉（Gaius Caligula，公元41年去世）以停泊在普特奥利的亚历山大舰队为荣。他劝说犹太王希律·阿格里帕（Herod Agrippa）不要经布林迪西、希腊和叙利亚返回犹大地（Judea），而改由普特奥利乘船出发，因为亚历山大城舰队的船长们开起船来就像是在赶马车一样。希律王在离开普特奥利几天后就抵达了埃及。⁵³普特奥利由火山灰制成的水泥远近闻名，整个意大利都用它来做混凝土。最重要的是，这种水泥还被用于建造码头和防波堤，以容纳最大型的航船。普特奥利已经成为奢侈品贸易的中心，此地的商品既有希腊的大理石，也有在埃及被罗马控制后大量运抵港口的莎草纸和玻璃。普特奥利的商人们在提洛岛非常活跃，那里有一个南意大利商人的代表团。与提洛岛的联系使许多奴隶经普特奥利进入意大利。与罗马一样，普特奥利的居民成分也十分复杂，有来自推罗的腓尼基商人，有来自巴勒斯坦以东沙漠地带的纳巴泰人，也有引入萨拉皮斯神崇拜的埃及人。⁵⁵腓尼基人曾经是普特奥利的势力，但到174年他们已经生活艰难。他们曾向母城推罗写信求助，希望推罗帮他们支付事务所与货栈的巨额租金，他们称自己要交的数目远远高于其民族：

前些日子，生活在普特奥利的推罗人负责港口的保养，当时的推罗人十分富裕且数量庞大。然而我们的人数现在已经大幅缩减，且需要支付在神庙祭拜我们民族的神祇的开支。我们没有可以帮助我们缴纳驻地租金的必要资源了，我们每年都需要缴纳十万迪纳里。⁵⁶

在“亚历山大、亚洲和叙利亚经商的人”也为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建造了神庙。⁵⁷在城市中最富有的家族的资助下，人们建起了精美的公共建筑。尼禄的朝臣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在其撰写的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中提到了一座位于坎帕尼亚的城市，虽然他没有给出这座城市的名字，但它很可能就是普特奥利。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名为特里马乔（Trimalchio）的自由民，他在海上赚了钱，结果又失去了这些财富 [“海神尼普顿（Neptune）一天就吞噬了三千万塞斯特斯（*sesterces*）”]，他只好再次白手起家，退休时已经拥有了数百万塞斯特斯的资产。⁵⁸

无论是否真的存在像小说中的特里马乔那样成功的自由民，自由民都在港口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庞贝城出土了一套举世瞩目的蜡版，上面的记载证实了普特奥利的银行世家苏尔皮奇（*Sulpicii*）家族的财务状况。共有一百二十七份文献留存至今，它们记载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公元 35 ~ 55 年。⁵⁹其中一份是一张一千迪纳里的借据，借款人是来自小亚细亚卡利亚（*Caria*）的希腊自由人墨涅拉乌斯（*Menelaus*），贷款人是奴隶普利姆斯，他是商人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塞维鲁的代理人。塞维鲁的名字还被刻在了盛放鱼酱的双耳罐上，这些鱼酱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口到罗马的。墨涅拉乌斯拥有属于自己的货船，他贷款的目的是为一批从普特奥利运往罗马的鱼酱预支运费。⁶⁰以上事实均表明了普特奥利是如何与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它是一位希腊船长的家乡，该船长与从事西班牙鱼酱贸易的罗马富商保持着联系。由一位远离罗马的奴隶充当居住在罗马的塞维鲁的代理人，这种情况在当

时十分寻常。在雅典的鼎盛时期，希腊的银行家们就已经熟悉此时在普特奥利通用的信贷技巧。与从前不同的，是如今这些信贷活动遍布了从西班牙鱼酱工场到埃及的整个地中海。赊账（credit）不仅指用货币或商品支付的预付现金，这个词（拉丁语中表示“他相信”）还传达出了一种信任的意味。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代，合作与信任的建立更为简单，也更为有效。

真正为普特奥利带来财富的是谷物。据估计，在每年的这个时期，大约有十万吨谷物在这里中转。⁶¹由于这里的谷物需要搬运或处理，奴隶和有偿劳工在这里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无论是简单地成袋搬运谷物，还是需要将其重新倒入另一容器，都需要从抵达意大利的船只卸下谷物，重新装载上前往罗马的较小船只或驳船。在罗马城，有人会重新检查谷物的品质并对其征税。这些谷物要么存放在港口，要么存放在罗马城中，而谷物的储藏并不简单，必须要避免谷物发霉、生虫，要防止老鼠啃噬，这意味着谷物储存地必须保持通风、温度适宜。⁶²谷物商人需要租用库房中的仓库，有些库房的规模特别巨大：罗马的加尔巴纳库房（Horrea Galbana）的第一层有仓库一百四十多间，而奥斯蒂亚海岸的格兰迪库房（Grandi Horrea）的第一层有六十间仓库。⁶³对于正在为东方的奢侈品（如从亚历山大城运来的印度商品）寻找市场的商人而言，普特奥利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里是元老院贵族们在夏季前往巴亚（Baiae）、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以及斯塔比亚（Stabiae）避暑时的必经之地，此外它还紧邻此时仍欣欣向荣的那不勒斯，以及那不勒斯的众多卫星城，如庞贝城。

位于台伯河入海口的奥斯蒂亚地位逐渐上升，最终取代普特奥利成为搭载货物前往罗马的船只聚集的主要港口。奥斯蒂

亚城的建立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罗马与维爱正在争抢台伯河入海口的盐田；但很长时间以来，奥斯蒂亚始终只是河口的一处停泊地。在奥古斯都时期与提比略时期，奥斯蒂亚都有过建设计划，但直到克劳狄乌斯治下，一座靠近罗马城的易于通行的港口才真正开始修建。42年，人们开始在台伯河以北两英里处建造一座新的港口，它的名字极为简单，就叫“波图斯”（Portus，意为港口）。建造这座港口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普特奥利，而是为了在向罗马运送谷物时有一条安全通道。不幸的是，克劳狄乌斯的防波堤显然不够结实：62年，停泊在港口里的两百艘船被突然降临的暴风雨损毁。在后来的一个世纪，皇帝图拉真（Trajan）在克劳狄乌斯的港口内又修建了更安全、更壮观的六边形港口，以加固奥斯蒂亚。他的继任者哈德良对货栈和商铺所在的大片区域进行了重建。奥斯蒂亚有很多砖瓦结构的多层公寓楼，一直到4世纪，这些建筑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中层阶级的气质，而许多较为贫穷的移民在来到码头后只能转而前往罗马寻找租住之地。⁶⁴

208

5

在屋大维赢得权力之后，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及所有海岛都落入了罗马人的统治，或在罗马人的影响范围之内，地中海实实在在了成了“我们的海”。屋大维的胜利开启了地中海地区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期。当然，海上不时也会有海盗出没，例如在罗马控制薄弱的北非西端的毛里塔尼亚人：公元171~172年，摩尔海盗侵袭西班牙和阿非利加，于是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扩充罗马舰队以应对这一威胁。但罗马海军的作战地通常都不在地中海，因为他们在不列颠以及莱

茵河与多瑙河流域驻扎着大批海军，他们在这些地方抵御着不断发动侵扰的日耳曼人。帝国核心部分的动荡也没能从根本上摧毁地中海的和平。在 68 ~ 69 年，也就是尼禄自杀后混乱不堪的四帝内乱期，皇帝奥托（Otho）为解决竞争对手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带来的威胁招募了数千名水手，但维特里乌斯最终获得了胜利。奥托倚仗的是两支意大利海军，他们的基地就在距离普特奥利非常近的拉文纳（Ravenna）和米塞努姆（Misenum）。69 年，最后的胜利者韦帕芻（Vespasian）也利用了海军力量，但方式不同：他切断了从其基地埃及到罗马的谷物补给线，然后在自己抵达罗马后再将这些粮食发放给罗马人，以表现自己的慷慨，这种做法对维特里乌斯造成了致命打击。⁶⁶后来，海军还帮助皇帝将陆军运到阿非利加，以镇压当地的起义。115 ~ 116 年，图拉真派遣舰队前往昔兰尼加、埃及和叙利亚去镇压犹太人的大规模起义。⁶⁷有时船员们希在抵达目的地后还被要求在陆上作战，而像布匿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海战是文学创作的素材，而不是水手们所期望的体验。

罗马海军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比不上希腊海军以及以无情、残忍著称的罗马陆军。一种猜想是罗马海军对“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做出太多贡献。在海军中服役显然比不上在陆军中服役。⁶⁸但公元 2 世纪时，一名军团的士兵决定要转到海军，并因这一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遭到处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海军中服役是令人骄傲的事。2 世纪早期的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上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叫塞姆普罗尼乌斯（Sempronius）的人极为悲伤，因为他听说有人劝儿子盖尤斯（Gaius）放弃了加入舰队的计划。他告诉儿子：“务必要坚持，否则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只

要坚持下去，你就能得到好的机会。”⁶⁹舰队的新兵招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地中海的水手们来自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有的人来自如（多瑙河流域的）潘诺尼亚（Pannonia）等内陆地区，当然还有很多希腊人和埃及人（这里的埃及人指的不是那些生活在埃及的希腊人，而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这些人还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在罗马海军中，水手不管有无埃及人血统，都普遍崇拜萨拉皮斯神：“萨拉皮斯神在海上极受欢迎，商人与军舰都要接受他的引导。”⁷⁰不同的神混在一起是罗马世界的典型特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类人种的混合也会带来压力。如果军队中的指令是以拉丁语来传达的，那么新兵就需要起拉丁名字，使自己变得拉丁化和罗马化：

阿庇安（Apion）向父亲大人埃皮马库斯（Epimachos）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我先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也祝愿我的姐姐、她的女儿、我的弟弟一切顺心。我要感谢萨拉皮斯神，当我遭遇危险时，他及时拯救了我……我在信中附有一张尤克莱蒙（Eukremon）为我画的小像。现在我的名字是安东尼乌斯·马克西姆斯（Antonius Maximus）。⁷¹

数年后，他结了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起的是拉丁名字，另一个起的是希腊名字。此时“安东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对萨拉皮斯神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因为他在“这里的神明”面前为他的姐姐祈祷。⁷²

罗马海军的声望并不显赫，因为他们更像警察，而不是战

商船多为私营，部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但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民用航线的安全。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努姆、拉文纳，以及同普罗旺斯的“尤利乌斯市场” [Forum Julii，即今天的弗雷瑞斯 (Fréjus)] 一样的许多沿海商站长期驻扎着海军，他们足以确保航线的安全。迦太基在公元前 29 年被重建成为一个行政和商业中心，其正式名称是“和谐的尤利亚迦太基殖民地” (*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虽然此时它已经发展成为北非（除亚历山大城之外）的主要罗马城市，但罗马的舰队没有选择在此地驻扎。⁷³ 然而，在此地以西的凯撒里亚 [Caesarea，今切厄切尔 (Cherchel)] 有一支罗马海军驻扎，因为更靠西的毛里塔尼亚会不时发生动乱。⁷⁴ 在地中海人的眼中，“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是一个镇压敌人以强加胜者的和平的积极过程（塔西佗曾讽刺派驻欧洲北部的罗马军队“先破坏，然后称其为和平”），而更多是一种良性存在。至少在 3 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需要常常对舰队进行维护。船只仍是古典晚期的传统型四列桨战船和五列桨战船，直到拜占庭时期，船身的设计才出现重要的变化。因此海军依然困扰于传统的问题：船舷太低，高出水面的距离不过四米，导致它们无法航行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也无法在冬天航行。⁷⁵ 舰队还承担着运送官员前往帝国各地的职责，但（与中世纪的舰船不同）这些大帆船并没有被同时用作商船，部分是受限于它们的设计，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皇帝并不想成为十足的商人。

将米塞努姆与拉文纳建设成主要指挥中心的想法可以追溯至奥古斯都时期。米塞努姆是西地中海各地的行动控制中心，但它的指令可以传至更远的东部。由于从埃及运送谷物的船只停泊于普特奥利，而普特奥利就位于米塞努姆附近，因此在米

塞努姆可以密切监控这条航线的沿途活动。米塞努姆背后的内湖经过疏通后与海岸相连，这样一来，舰队就拥有了一个安全的内港。港口周围成排矗立着罗马富豪的别墅，提比略晚年时也曾在这里休养。⁷⁷另外，从拉文纳派出的舰队监视着总是窝藏海盗与盗匪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爱琴海也在他们的照看范围内。拉文纳被一圈潟湖包围（现代的海岸线与古代海岸线相聚数英里），并不是理想的海港选择，因此它的港口建在两英里以外的一处被称作克拉西斯（Classis）的地方，意为“舰队”，一条运河将克拉西斯与拉文纳连接起来。由于拉文纳一直是重要港口，它的景象被保留在了公元6世纪的拉文纳镶嵌画中。如今，我们唯有通过用镶嵌画装饰外墙的克拉西斯的圣阿波里纳尔大教堂（Sant'Apollinare in Classe）一窥克拉西斯过去的荣光，该教堂建于6世纪。罗马人从第勒尼安海以及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基地就能够监控整个地中海的安全，这种能力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公元2世纪的商人可能有时也会思考，还有什么可能打破地中海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政治统一；是允许商人们自由穿行地中海进行贸易的经济统一；是希腊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文化统一；在很多方面，地中海甚至是一个宗教统一体，或者说呈现出信仰多样性的统一体，因为地中海各地的人（除犹太人或基督徒外）在崇拜神明一事上相互借鉴。对“我们的海”进行的单一统治确保了通行的自由，使地中海区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文化融合。

注 释

1. N. K. Rauh, *Merchants, Sailors and Pirates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 2003), pp. 136-41.
2. Lucan, *Pharsalia*, 7:400-407, trans. Robert Graves.
3.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 pp. 78, 83-8.
4. 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1999), pp. 92-6.
5. L. Casson, *The Ancient Mariners: Seafarers and Sea Fight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Ancient Times* (2nd edn, Princeton, NJ, 1991), p. 191; de Souza, *Piracy*, pp. 140-41, 162, 164.
6. Cited in de Souza, *Piracy*, pp. 50-51.
7. Livy 34:32.17-20; Polybios 13:6.1-2; both cited in de Souza, *Piracy*, pp. 84-5.
8. de Souza, *Piracy*, pp. 185-95.
9. Rauh, *Merchants*, pp. 177, 184; 但很有可能这些“君主”(非伊特鲁里亚人)是在罗德岛附近活动的第勒尼安人(Tyrrhenoi), 这两个词很容易被弄混。
10. Strabo, *Geography*, 14.3.2; Rauh, *Merchants*, pp. 171-2.
11. Plutarch, *Parallel Lives*, 'Pompey', 24.1-3, trans. John Dryden.
12. de Souza, *Piracy*, pp. 165-6.
13. Plutarch, *Parallel Lives*, 'Pompey', 25:1, trans. John Dryden.
14. Syme, *Roman Revolution*, p. 28.
15. Cicero, *Pro Lege Manilia*, 34; G. Rickman,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 pp. 51-2.
16. de Souza, *Piracy*, pp. 169-70.
17. Rickman, *Corn Supply*, p. 51; Syme, *Roman Revolution*, p. 29.
18. Plutarch, *Parallel Lives*, 'Pompey', 28:3; de Souza, *Piracy*, pp. 170-71, 175-6.
19. Syme, *Roman Revolution*, p. 30.
20. *Hoc voluerunt*: Suetonius, *Twelve Caesars*, 'Divus Julius', 30:4.
21. Syme, *Roman Revolution*, p. 260.
22. F. Adcock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 (Cambridge, 1923-39), vol. 9, *The Roman Republic, 133-44 BC*, p. 724; Syme, *Roman Revolution*, pp. 53-60.
23. Syme, *Roman Revolution*, pp. 260, 270.
24. *Ibid.*, pp. 294-7; C. G. Starr, *The Roman Imperial Navy 31 BC-AD 324* (Ithaca, NY, 1941), pp. 7-8; J. Morrison, *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339-30 BC* (Oxford, 1996), pp. 157-75.
25. Virgil, *Aeneid*, 8:678-80, 685-8, in Dryden's rather loose version.
26. Syme, *Roman Revolution*, pp. 298-300; Rickman, *Corn Supply*, pp. 61, 70.
27.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ed. P. A. Brunt and J. M. Moore (Oxford, 1967), 15:2.
28. Rickman, *Corn Supply*, pp. 176-7, 187, 197, 205-8.

29. Ibid., p. 12.
30. Rauh, *Merchants*, pp. 93–4.
31. Plutarch, *Parallel Lives*, ‘Cato the Elder’, 21.6; Rauh, *Merchants*, p. 104.
32. Rauh, *Merchants*, p. 105.
33. Rickman, *Corn Supply*, pp. 16, 121.
34. Ibid., pp. 6–7; also P. Erdkamp, *The Grain Market in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y* (Cambridge, 2005); P.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Cambridge, 1988).
35. Rickman, *Corn Supply*, p. 16.
36. Museu de la Ciutat de Barcelona, Roman section.
37. Rickman, *Corn Supply*, pp. 15, 128.
38. Acts of the Apostles, 27 and 28.
39. Rickman, *Corn Supply*, pp. 17, 65.
40. Josephus, *Jewish War*, 2:383–5; Rickman, *Corn Supply*, pp. 68, 232.
41. Rickman, *Corn Supply*, pp. 61, 123.
42. Ibid., pp. 108–12; S. Raven, *Rome in Africa* (2nd edn, Harlow, 1984), pp. 84–105. Other sources included Sicily: Rickman, *Corn Supply*, pp. 104–6; Sardinia: *ibid.*, pp. 106–7; Spain: *ibid.*, pp. 107–8.
43. Rickman, *Corn Supply*, pp. 67, 69.
44. Raven, *Rome in Africa*, p. 94.
45.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18:35; Rickman, *Corn Supply*, p. 111.
46. Raven, *Rome in Africa*, pp. 86, 93.
47. Ibid., p. 95.
48. Ibid., pp. 95, 100–102.
49. Rickman, *Corn Supply*, pp. 69–70 and Appendix 4, pp. 231–5.
50. Ibid., p. 115 (AD 99).
51. Ibid., pp. 76–7, and Appendix 11, pp. 256–67.
52. Seneca, *Letters*, 77:1–3, cited in D. Jones, *The Bankers of Puteoli: Finance,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Roman World* (Stroud, 2006), p. 26.
53. Jones, *Bankers of Puteoli*, p. 28.
54. Ibid., pp. 23–4; and Strabo, *Geography*, 5:4.6.
55. Jones, *Bankers of Puteoli*, p. 33.
56. Cited in R. Meiggs, *Roman Ostia* (Oxford, 1960), p. 60.
57. Jones, *Bankers of Puteoli*, p. 34.
58. Petronius, *Satyricon*, 76; Jones, *Bankers of Puteoli*, p. 43.
59. Jones, *Bankers of Puteoli*, p. 11.
60. Ibid., pp. 102–17.
61. Ibid., Appendix 9, p. 255.
62. Rickman, *Corn Supply*, pp. 21–4, 134–43; G. Rickman, *Roman Granaries and Store Buildings* (Cambridge, 1971).
63. Rickman, *Corn Supply*, p. 23; Rickman, *Roman Granaries*, pp. 97–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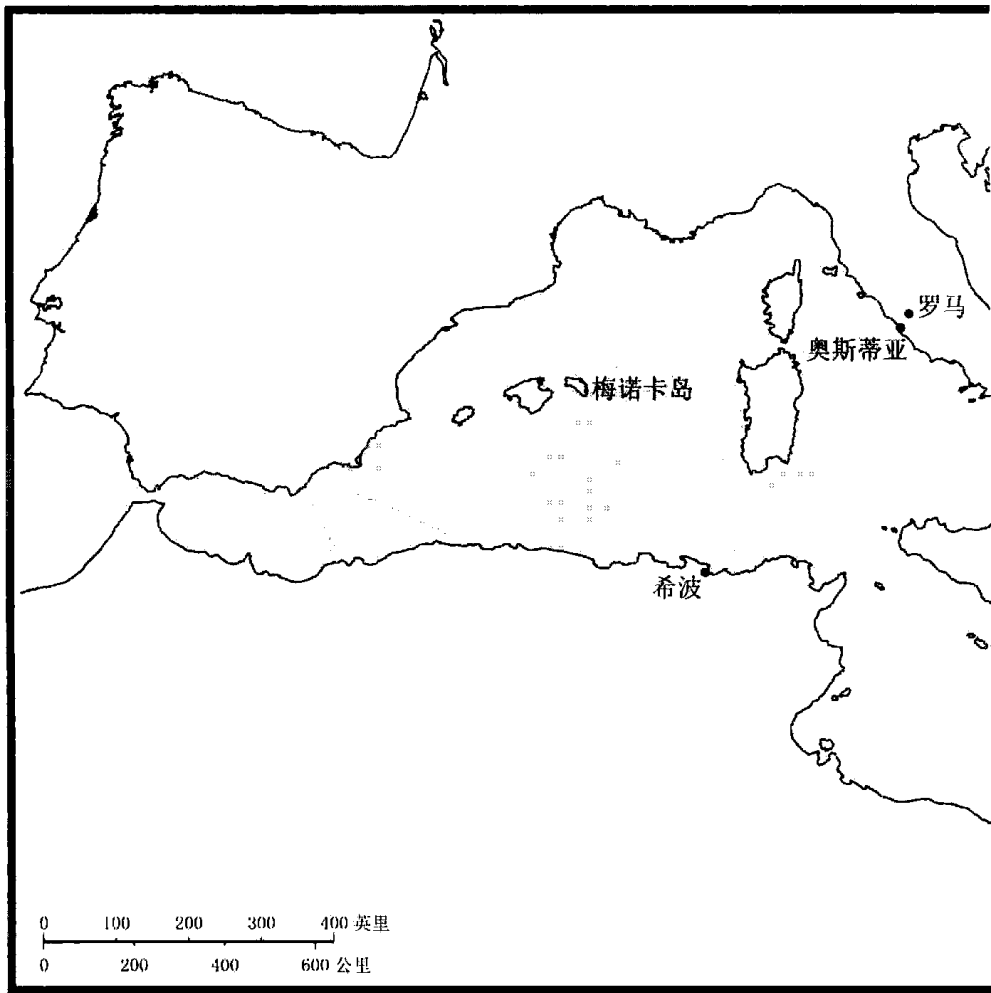
64. Meiggs, *Roman Ostia*, pp. 16-17, 41-5, 57-9, 74, 77.
65. M. Reddé, *Mare Nostrum: les infrastructures, le dispositif et l'histoire de la marine militaire sous l'empire romain* (Rome, 1986).
66. Tacitus, *Histories*, 3:8; 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p. 181, 183, 185, 189; Rickman, *Corn Supply*, p. 67.
67. 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 188.
68. *Ibid.*, p. 67.
69. Cited *ibid.*, p. 78.
70. Aelius Aristides, cited *ibid.*, p. 87.
71. Oxyrhynchus papyrus cited *ibid.*, p. 79.
72. *Ibid.*, pp. 84-5.
73. Reddé, *Mare Nostrum*, p. 402.
74. Raven, *Rome in Africa*, pp. 75-6; Reddé, *Mare Nostrum*, pp. 244-8.
75. Reddé, *Mare Nostrum*, pp. 139, 607, and more generally pp. 11-141.
76. Tacitus, *Annals*, 4:5; Suetonius, *Lives of the Caesars*, 'Augustus', 49; Reddé, *Mare Nostrum*, p. 472.
77. Reddé, *Mare Nostrum*, pp. 186-97; 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p. 13-21.
78. Reddé, *Mare Nostrum*, pp. 177-86; Starr, *Roman Imperial Navy*, pp.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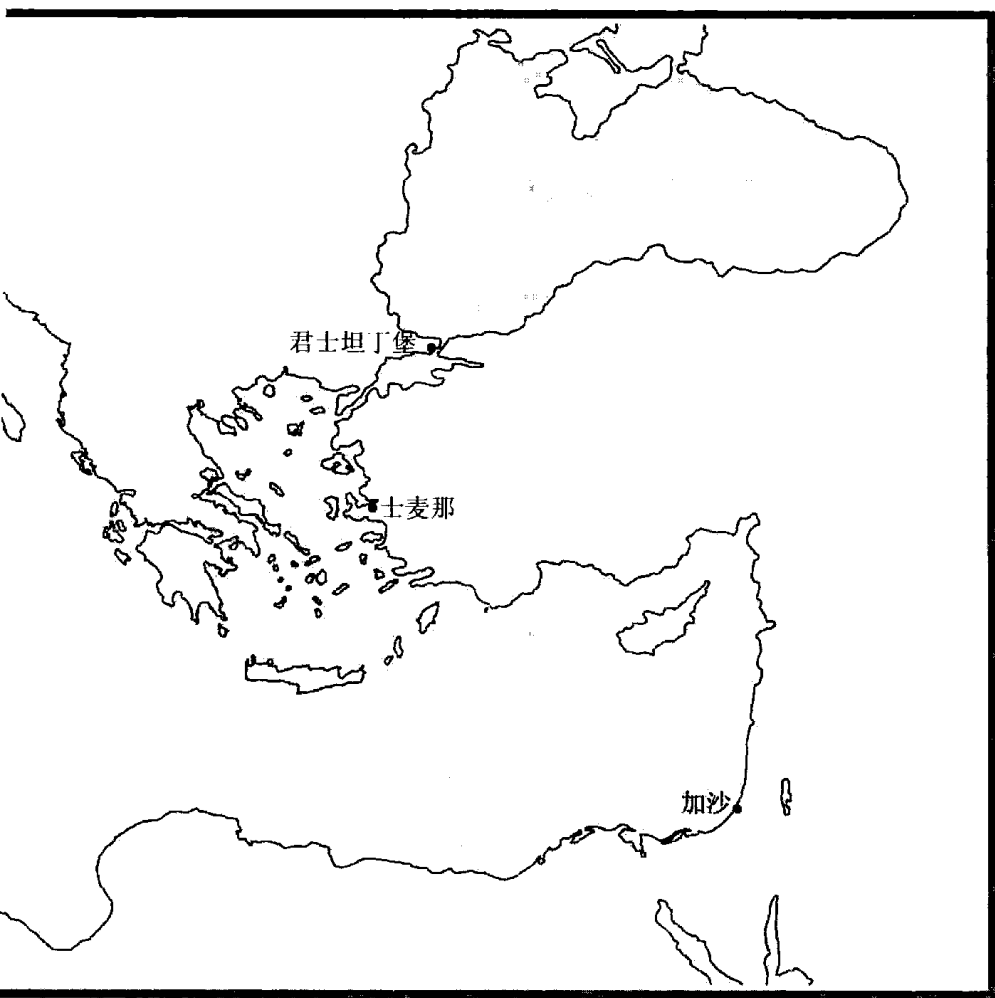
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 (1 ~ 450 年)

1

212

同罗马世界内的任何其他港口城市一样，奥斯蒂亚的人口十分混杂。1961年，一个特别的考古发现是奥斯蒂亚近郊的犹太会堂，当时这里在修建一条连接罗马与非乌米奇诺机场（Fiumicino airport）的道路，该机场是这一地区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这座会堂是欧洲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会堂结构，它最早修建的部分时间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但它在4世纪时经历了修复或者部分重建。这间会堂被犹太人至少持续使用了三百年。据此地一则2世纪铭文的记载，供奉犹太人律法经卷的约柜是由某位名为闵迪斯·福斯特（Mindis Faustos）的人资助修筑的；这则铭文主要由希腊文书写，这是因为罗马的犹太人与东方保持着联系，他们一直把希腊语用作日常语言。该会堂建筑和其附属部分占地856平方米，所有考古证据都显示，这是由上千名犹太人组成的繁荣社区所使用的主会堂。4世纪时，此地不仅有会堂，还有一个烤炉，可能是为了在逾越节烘烤无酵饼；另外还有一处行圣礼的水池。会堂区域有一些偏殿，可能用于讲习经文、召开犹太人会议和进行拉比法庭庭审。一处横梁上雕刻有圣殿中竖立的大烛台、在新年吹响的羊角号，还有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s）





君士坦丁堡

士麦那

加沙

的符号——香木缘和装饰用棕榈枝。¹ 在奥斯蒂亚，犹太人并不是拥有众多信奉者的唯一东方宗教。城中还有一座小型砖砌神庙，经鉴定它是供奉萨拉皮斯的神殿。在该神殿内，黑白相间的镶嵌画展示了尼罗河的场景。大量碑铭都提到了伊西斯崇拜。这里还有一些密斯特拉神（Mithras）的神龛，此神在罗马军队中颇有人气。西布莉（Cybele）女神（她也在奥斯蒂亚受到崇拜）的男性信徒在进入出神（ecstasies）状态后，据说会阉割自己。²

沿着商路，古代的信仰体系由犹大地或尼罗河流域移植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并因当地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文化的联系而发生了变化。有时，一些人带着他们的新信仰而不是旧信仰横穿地中海。塔尔苏斯的保罗（Paul of Tarsus，即圣保罗）曾经前往罗马；在罗马城内还发展出了一个与之一脉相承的宗教团体，该团体的创立者是另一位来自东方的旅行者西门·彼得（Simon Peter，即圣彼得），彼得与保罗为同道之人。在前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途中，保罗传道，一个被其门徒称为犹太人的弥赛亚（Jewish Messiah）的人，事实上是上帝的化身（God Incarnate）。伟大宗教革命慢慢成熟的种子已经在地中海播撒开来。

2

地中海在罗马帝国晚期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日耳曼人的入侵与罗马皇帝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在众多异教与犹太教的强烈反对声中，基督教化缓缓发生。东方的信仰轻易地在地中海各地传播开来，但对于罗马人来说，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无法与异教信仰相比。犹太人与基督徒被看作“无神论者”，

因为他们直接否认异教诸神的存在。他们拒绝供奉被神化的皇帝。然而，罗马人在夺取东地中海的统治权后，将犹太人作为例外谨慎对待；犹太人通过献祭他们自己的上帝来尊崇皇帝，他们被理解为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表示忠心。其他所有臣民都需要按照要求向被神化的皇帝献祭，于是基督徒的拒绝违背了法律，因此他们只能被扔到斗兽场承受横死的结局。圣保罗及其继承人在犹太人以外的社区积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基督徒社区逐渐形成，罗马人也无法再将这些人划归为犹太人的支派。基督徒们不遵从犹太人的戒律，讲求心灵的割礼，而非身体的割礼，并把禁食猪肉解释为禁止过猪一样的生活。迫害反而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崇敬那些被罗马人处死的人，尊其为殉道者，抛弃了犹太人关于死者尸骨不洁净的概念，发展出对殉道者遗骸的崇拜。按照一些狂热者的观点，甚至他们所遭受的折磨都是幻觉，因为耶稣基督会让他们在狮子的利爪之下变得麻木；还有一些人为这种痛与折磨感到兴奋，因为这将证明他们赢得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并获得了永恒的生命。³ 214

尽管从总体上讲，犹太人的宗教自由能得到保证，但罗马人无法做到政策始终如一。在罗马曾发生了一起诈骗案，有四名骗子以为圣殿募集资金的名义行骗，提比略皇帝于是将四千名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转移到撒丁岛，那里是传统的流放地。四个人中还有一个是一名元老的妻子，该元老对犹太教持同情态度（这并不罕见）。克劳狄乌斯同意为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恢复公民权，疯狂的皇帝盖乌斯·卡里古拉在位时剥夺了该权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离散的犹太社群曾团结一致反抗当权者；亚历山大城街道只要发生冲突， 215

那么它的起因一定是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长久以来的互相憎恶，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希腊人反而认为政府太偏向犹太人了。然而，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受到镇压，他们于是被迫或主动地离散到地中海各地。从地中海历史学家们的视角来看，公元70年提图斯（Titus）摧毁圣殿以及131年哈德良摧毁耶路撒冷的重要意义，只在于一个词——“离散”（diaspora）。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认为：罗马人不太可能在70年镇压犹太人起义时，就开始打算摧毁犹太人的圣殿；但在圣殿已经被焚毁、被劫掠后，新任皇帝韦帕芎与其子提图斯从中看到了政治利益——他们可以带着从圣殿中获得的财宝游行。纪念这次游行的浮雕被刻在了提图斯凯旋门上，它至今仍然矗立于罗马广场的南端。⁴大量的犹太奴隶被流放到意大利及以外的地区。

颇不寻常的是，罗马人不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继续祭祀。攻占圣殿并不意味着这座巨大的圣殿及其柱廊法庭（其围墙的大半部分幸存至今）将被完全摧毁。对圣殿进行大规模修复后，信仰活动本应该恢复如故。仁慈的老皇帝涅尔瓦（Nerva，公元98年去世）愿意减免犹太战争后强加于犹太人的特别赋税，恢复耶路撒冷的礼拜似乎已经为期不远了。⁵但他的继任者图拉真是士兵出身，实行强硬政策；在其统治末年，也就是115~116年，他还残忍地镇压了叙利亚、埃及和昔兰尼加的犹太人起义——随着犹太人分散到地中海各地，以前大多局限于巴勒斯坦与亚历山大城的紧张局势如今变得更加普遍。事实上，当这些起义发生时，巴勒斯坦相对平静。图拉真的继任哈德良采取了一种毫不退让的解决方案：他把耶路撒冷彻底重建成献给卡皮托利山的朱庇特的埃利亚卡皮托里纳

(Aelia Capitolina)^①；他还禁止施行过割礼的男性进入该城。哈德良下定决心反对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上帝，这完全有悖于罗马尊重其他宗教的传统。132 ~ 136 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起义，此次起义极为激烈，但同样没有希望。犹太人曾取得短暂的胜利，收复耶路撒冷，甚至可能恢复了献祭礼拜，但最终惨败结束，他们遭到哈德良军队的恐怖屠杀，约有六十万人因此丧命。⁶ 这些事件同样对地中海造成了深远影响：大量的犹太人向西流散，有的作为奴隶，有的是逃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世纪后，有大量犹太人生活在西班牙。⁷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失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和人口层面。在圣殿时代后期，由于法利赛（Pharisee）等教派挑战了旧圣殿时期祭司的权威，犹太人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圣殿的毁灭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由有学识的世俗人士拉比（rabbi）领导的，而不是圣殿祭司；犹太会堂本身并非新鲜事物，此时却成为犹太人学习与祷告的中心。

217

对基督徒的迫害同样一波接着一波。公元 1 世纪时，尼禄曾指控基督徒在罗马放火，这场火灾使他有将部分罗马城区重建得如镀金般富丽堂皇。3 世纪中期，皇帝再次对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进行迫害。在托斯卡纳的科萨港纪念碑上，皇帝德基乌斯（Decius）被称为“神圣事物的光复者”（*restitutor sacrorum*），这种提法显然指的是他对基督徒的积极捕杀。一个可以避免迫害的方法是表面妥协，在公开场合祭拜罗马神，而私下里仍坚持信仰。对这种策略是否有效产生的分

① 埃利亚卡皮托里纳意为“埃利乌斯献给卡皮托利山的朱庇特之城”，埃利乌斯是哈德良的族姓。——译者注

歧，以及对将经文“上交”（*donaverunt*）给罗马政府的祭司阶层是否有效这一更严重的分歧，引发了严重的对骂与分裂：4世纪时活跃于非洲的多那图斯派教会（Donatist Church）在绥靖者面前自诩真正信仰的坚持者。基督徒摆脱罗马当局所设困境的另一种方法是伪装自己为犹太人：“星期六去犹太教会堂，星期日去基督教教堂”。这种立场在4世纪90年代安条克（Antioch）的反犹太集会中遭到强烈谴责。当然，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占据了上风，但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对于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基督教和犹太教间的界线非常模糊，远不如基督教正教的愤怒先知们，如圣居普良（St Cyprian）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分明。对犹太教的辱骂出于一种激烈竞争的意识，而非想要痛打落水狗。双方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然而，广大公众对教义细微处的差别并不太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可能是伦理规范和宗教抱负，而在这两方面，基督教和犹太教并没有很大不同——双方都倡导爱邻人，且主张如果这一世遭遇不公，那么上帝会在另一个世界给予回报。许多犹太人可能在遵从宗教规则方面是相当随意的，而且巴比伦的塔木德学院还在对这些规则进行细细雕琢，这种状况使宗教与宗派之间的来回改宗更为简单。

218 在德基乌斯的迫害中，一位牺牲在了士麦那的基督教殉道者名叫皮奥尼乌斯（Pionius），一篇关于他的生平与受审的记述经常提到“希腊人、犹太人和女人”，这些人在他被捕时聚集在士麦那公共广场上对他恶语相向。皮奥尼乌斯拒绝参与异教的祭祀活动，而当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在欢庆他们的节日 [可能是犹太人的普珥节（Purim）和异教徒的酒神节（Dionysia），在这两个节日人们都可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样

的场合中，虽然拉比们无数次地下达禁令，但犹太人与异教徒的庆祝活动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融合。⁹ 在士麦那以及其他地方，有一些较受尊重的大型犹太社区吸引了许多皈依者，还有一些“敬神者”参加犹太人的祭礼但不皈依，因此犹太人从种族上讲是相当混杂的。¹⁰

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与犹太人的成功同样令人烦扰的还有他们自己中的异端。当然，一个人认为是异端的可能在另一人眼中却是正统。然而，显然也有非常激进的运动。在被钉上十字架后，垂死的皮奥尼乌斯发现自己旁边是名马西昂派（Marcionite）信徒，马西昂派是由基督徒发起的运动，马西昂派信徒将犹太人的上帝视为撒旦，拒绝承认希伯来人的《圣经》。¹¹ 虽然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歧，但主流基督徒还是接受希伯来人的《圣经》的，且并不打算对其进行修正；他们从《圣经》中先知们的故事预见到基督的到来，对它高度评价，但在理解上却与犹太人有着较大差异。对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公元430年去世）来说，犹太人是神圣经书的拥有者，作为仆人受命照看主人的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所保护之物。¹²

在地中海的海面上，犹太人与基督徒也建立了联系。海上有一些船东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常常到访加沙。拉比曾就一个问题深入讨论，即加沙的犹太人是否可以参与当地为尊崇一位希腊神明而召集的市集，这一讨论再次揭露出在晚期希腊化世界与罗马世界中，犹太人与异教徒社区间的界线是模棱两可的。¹³ 然而，有些当海员的犹太人一丝不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公元404年，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主教从亚历山大乘船前往他的教区。在亚历山大，犹太人有自己的船东行会（*navicularii*），

拥有并经营着大量航船。该主教所乘之船的船长名叫阿玛兰图斯（Amarantus），他和他的水手都是犹太人，他们正是这位主教的嘲讽对象。在周五的夜幕降临后，船长让船工停下工作，任由船在海面上漂荡，这让这位主教十分担心自己的性命。在安息日（Sabbath）前夜，乘客们都处于危险之中，这时这位

219 主教才获准驾驶船（他是这样讲的）。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犹太人的所有律法都可以暂停奉行。该主教记录下来关于那艘船的一切，不禁让人奇怪，它究竟是如何抵达目的地的：船上的缆索断了，所以船帆无法展开，船长还将备用锚卖给了别人。在同一个时期，《塔木德》（*Talmud*）中记录的拉比的讨论又显示，犹太人曾经非常频繁地进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他们除了考察商业法中的条例外，也探讨了让犹太人在安息日参与跨海航行是否正当，以及什么样的行为在安息日才能获得允许（例如打水或在甲板上散步）。¹⁴

3

传统上，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也许与他的一场胜利有关：公元312年10月，就在罗马城郊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但后来又过了十三年，他才把自己变成罗马世界的唯一主人。事实上，他在337年临死前才接受洗礼，但313年的米兰敕令已经取消了对基督教崇拜的禁令，他在君士坦丁堡建成的新罗马也将是一个基督教中心，一座没有被异教神庙玷污过的城市。325年，他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纷争不断的基督教大公会议，试图在皇帝（没有神学家）的调解下解决关于三位一体性质的神学难题。会议在已经存在分歧

的教会中造成了进一步分裂，尽管《尼西亚信经》（Nicaean Creed）后来成了正教的教义基础。他把自己看作“教会以外的主教”，但同时又是帝国的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可能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宗教变革必须缓慢进行，可能由于他自己对于异教以及基督教的信仰比较迷惑，君士坦丁平等对待异教与基督教的崇拜活动，甚至在新罗马的落成仪式上，太阳神的战车上竟然奇怪地出现了基督的十字架。在旧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仍然巍然矗立，上面雕着繁复的纹饰，但丝毫没有提到他的新信仰，元老们对这种信仰无论如何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也为那座伟大的基督教大教堂奠基，该教堂为圣彼得修建，无情地横穿了一处异教徒的墓地，该墓地就位于圣彼得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鸟铳之地下。这种矛盾还进一步体现 220

在：君士坦丁在位时发行的货币上刻有 SOLINVICTVS，意为“未被征服的太阳”；他以死刑禁止私人求问脏卜师（即伊特鲁里亚人的预言家，依据被献祭牲畜的内脏来解读信息），但同时又要求当罗马皇宫遭遇雷击时必须向脏卜师求教。皇帝还努力将异教徒和基督徒拉到一起：他命令军队向为皇帝以及皇帝敬畏神明的儿子们带来胜利的神祈祷，而不需特别强调究竟是哪位神。君士坦丁之所以动作缓慢是出于实际需要；对皇帝的信仰发展得很成熟，作为一名进行了将近二十年权力斗争的统治者，他不可能使其信仰异教的追随者们放弃他们的祭礼，因为这样的祭礼生动地表达了信徒们对被神化的皇帝的忠诚。¹⁵

有一点毋庸置疑：君士坦丁的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中海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然而，限制性因素同样存在。帝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而非正统教派，他们拒绝承认由君士坦

丁认定的《尼西亚信经》。他们中有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派 [特别是科普特 (Coptic) 教会] 信徒, 欧洲大陆上信仰阿利乌斯派 (Arian) 的蛮族——在正教眼中, 这些另类否认了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的平等地位。接着, 又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小教派, 如马西昂派、多那图斯派, 他们与周围的基督徒间争论的根源是在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件。所有这些教派运动也都出现在地中海, 并四处传播, 有时传播者是蛮族雇佣兵或商人, 而当迦太基或安条克或亚历山大城中一个教会攻击另一个教会时, 一起逃离迫害的朝圣者和难民则成了传播者。

另一个问题是异教信仰的坚持。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 只有具有多重色彩的朱利安 (Julian) 放弃了基督教。朱利安曾在雅典学习新柏拉图主义, 到公元 360 年成为皇帝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基督教。由于对基督教的厌恶, 当犹太人要求重新在耶路撒冷开展祭祀活动时, 他选择了支持。他还同时下令重开异教的神庙,¹⁶ 目的在于重建带有高级祭司的异教“教会”。这也是对基督教主教们的间接恭维, 因为主教们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帝国各地组织信徒们的信仰的。¹⁷ 朱利安的统治时间很短, 221 在此期间还要忙于在东方与波斯人的战事; 但异教并没就此安歇或死亡。6 世纪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 I) 关闭了雅典的古典学校与学园, 此时从异教角度研究哲学文献的实践才算正式终结。对于“异教”最好的理解, 不是把它看作系统化的宗教信仰, 而是各有特色、混杂、动态发展且没有任何教义或神圣文献的地方崇拜。这个复数的“异教”很难被基督教击败, 虽然基督教提供的道德法则——其重点在于慈善, 希望将“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与自由人”都涵盖在内——很有吸引

力。在地方上，基督徒的崇拜仪式中包含了异教的因素，一些地方性神明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东方的武士圣徒带有强烈的赫拉克勒斯色彩）。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也没有那么严格，在地中海沿岸的地方社会中异教信仰仍然很强势：在约700年时，它们在伊斯兰教扩张后的北非和西班牙悄悄地隐匿起来。

处理非基督徒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摧毁他们的神庙和会堂。在公元400年前后，加沙还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学术中心，这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处于从地中海经贝尔谢巴（Beersheba）和佩特拉（Petra）前往阿拉伯沙漠中的纳巴泰诸镇的商路之上。¹⁹和其他地方一样，皇帝要求关闭神庙的命令在这里被无视；地方利益集团可以凌驾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命令之上，而加沙城中的大多数市民仍是异教徒。²⁰当地奉行严格苦修的主教波菲利（Porphyry）不得不屈辱地独自维持着教堂，而异教徒仍然在许多大型神庙中进行礼拜，这些神庙分别供奉着太阳神、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一位名叫玛纳斯（Marnas）的神。玛纳斯是宙斯的一个化身，他的神庙马尼翁（Marneion）特别宏伟壮观，是一栋由两排柱廊围绕着的圆形的带穹顶建筑。在波菲利就这一情况向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就是可怕的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抱怨后不久，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就下达了一道关闭神庙的命令；但皇帝派去的使者接受了贿赂，默许马尼翁神庙继续开放。波菲利感觉有必要直接向皇帝请愿。他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皇后尤多西娅（Eudoxia）对此十分重视，于是一支军队在402年受命前往加沙。他们花了十天时间积极地把一些不太重要的神庙劫掠一空，然后推倒、焚烧。接着，他

们的注意力终于转向马尼翁神庙，异教徒们聚集于此将所有的大门封锁，准备保卫这栋建筑。皇后派来的士兵将猪油和沥青泼到大门上，然后点火。士兵们洗劫了这座神庙，然后清除了加沙城中的所有偶像。皇后尤多西娅特意拨款要求在马尼翁神庙的废墟上建造一座教堂。更令异教徒感到愤怒的是，马尼翁神庙的大理石板被用来铺路，这样一来，异教徒们就不得不每日踩踏在他们圣所的遗迹上。尤多西娅特意从埃维厄岛运来三十二根绿色大理石石柱，该教堂在407年的复活节正式落成。波菲利的圣徒行传记载，与此同时，许多异教徒改宗基督教。²¹异教徒依然诉诸武力进行抗争：有一次，波菲利被迫不得不在加沙的屋顶上奔逃（他可能是位苦修僧人，但对殉难没什么兴趣）。²²基督教只是加沙城中的一种信仰，这座城市中生活着大量异教徒、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基督教徒既不是数量最多的，也不是势力最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优势不过是官方的支持；而异教徒和犹太人所倚仗的却是帝国的庞大规模。通常，加沙或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的事件是不在君士坦丁堡的视线范围之内的。

4

基督教扩张所遭遇到的第三种阻力是犹太教的自信。有种倾向认为，在提图斯和哈德良摧毁耶路撒冷，特别是在君士坦丁选择了基督教以后，犹太教已经是强弩之末。然而，它的古老传统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它与基督教在道德伦理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正如与耶稣同时代的拉比希列（Hillel）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全部律法，余皆评注”。犹太教很欢迎改宗皈依之人（也包括奴隶，不过奴隶经常被迫

改宗)，而不关心皈依者是否学识渊博、善于观察。²³ 因此，毫不出人意外的是，一直到公元 5 世纪，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夺取最高权威的争斗仍持续不断。信奉基督教的诸位皇帝试图禁止奴隶施行割礼，并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5 世纪初的帝国法律将犹太教视为强弩之末，否定犹太人兴建新犹太会堂的权利，不过他们原有的会堂可以保留。²⁴ 从表面上看，犹太教衰落了。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有一位朋友，223名叫塞维鲁（Severus），是梅诺卡岛的主教，他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公元 418 年五百四十名梅诺卡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事情，展现了发生在地中海偏远角落的这场灵魂争夺之战的实质。²⁵ 塞维鲁所强调的是犹太人是梅诺卡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而不是梅诺卡并不是一座重要的岛屿（这座岛是“最荒凉的土地，因为其规模极小、干燥且崎岖不平”）。犹太人以该岛东部的马格纳（Magona），也就是现代的马翁（Maó 或 Mahón）为基地；而基督徒则聚集在西部的亚摩纳（Jamona），也就是今天的休达德亚（Ciutadella）。塞维鲁还提道，犹太人不得进入亚摩纳，一旦他们尝试这样做，就会被疾病击倒，甚至还可能被雷击。即便如此，岛上最杰出的人仍然是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狄奥多鲁斯（Theodorus），此人是马格纳的“所有犹太人以及所有基督徒当中，无论在财富还是名望上都最为出众的人”。²⁶ 狄奥多鲁斯的弟弟梅莱蒂乌斯（Meletius）娶的是利托里乌斯（Litorius）伯爵的女儿阿特米西亚（Artemisia）。这位利托里乌斯是才能极为出众的将军，在 5 世纪时曾是仅次于罗马最高将领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的副总指挥，还曾率领一支匈奴雇佣军在高卢获得胜

利。²⁷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托里乌斯本人是犹太人，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帝国法律不允许将这样的高官授予犹太人；无论他信奉何种宗教，他的女儿遵循的是犹太律法。塞维鲁特意强调岛上犹太人和基督徒间的紧张关系，但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在四百年之前，岛上的两大社群仍能和睦相处。塞维鲁不断提到“我们所熟知的古老习惯”“我们长久以来的感情所系”，虽然他总是声称这些行为是罪恶的。²⁸君士坦丁堡制定的法律并没能取代狄奥多鲁斯及其犹太家族在岛上的领导地位。

这个时期的西地中海很不稳定。公元410年，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攻陷罗马。后来，西哥特人的军队入侵西班牙，而其他蛮族部落——汪达尔人（Vandal）、苏维汇人（Suevi）、阿兰人（Alan）——也正向西罗马帝国进军。这些蛮族都没有海军，但梅诺卡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416年，新发现的圣斯蒂芬（St Stephen）的遗骨抵达梅诺卡岛，激发了马格纳地区基督徒的狂热，他们自诩这些圣骨的所有者。²⁹圣斯蒂芬是基督徒的“首位殉道者”，被奉为“第一位向犹太人发难的人”。圣斯蒂芬当年从耶路撒冷（人们发现他的遗骨之地）出发，穿越地中海，计划前往西班牙和北非。他曾因当地的一场革命而在梅诺卡盘桓数日。他的骨骸的发现曾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用来对当地的犹太人施压；在这些遗骨被发现之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长老伽玛列（Gamaliel）已经被剥夺了其传统的优先权，即与帝国的行政长官平起平坐的特权，而且还不得对皈依者施行割礼，也不得兴建新的会堂。据说，414年，亚历山大城的牧首将城中的犹太人驱逐，整个东地中海的犹太人都被迫改宗，其会堂被没收。³¹随着梅诺卡岛上圣斯蒂芬遗骨的到来，基督徒变得更加自信。基督徒（包

括塞维鲁)和犹太人狄奥多鲁斯都梦想着,这位主教一定已经预知了犹太人的皈依。当时社会上弥漫着末日气氛:犹太人的皈依难道真的预示着基督的再次降临吗?塞维鲁写道:

使徒所预告之时或许已经到来,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①可能主希望从大地边际点燃这一火花,以便整个大地都沐浴在爱的光芒之下,以焚毁那不信者之林。³²

基督徒使用的方法还谈不上狡诈。他们指控犹太人私藏武器,打算以此对付基督徒。公元417年2月2日,亚摩纳的基督徒聚集起来,一起穿越整座岛屿,步行三十英里,但我们相信这段路程并不痛苦,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光荣的目标。塞维鲁要求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搜查武器,犹太人虽不情愿,但表示接受,不过在搜查开始之前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基督徒冲入会堂,然后付之一炬,同时掠走了会堂内的珍宝,包括会堂的银器(后来归还了)以及托拉圣卷(被基督徒扣下)^②。后来证明私藏武器完全是想象。塞维鲁承认针对犹太人的暴动是由一名贼头贼脑的基督徒开始的,“不是因基督之爱而起,而是因强盗之爱”。次日,第一名犹太人选择皈依基督教,他名叫流便(Reuben)。其余的犹太人犹豫了三天,狄奥多鲁斯试图通

① 这段话源自《新约·罗马书》11:25,26,中译参见《圣经》和合本。——译者注

② 托拉(Torah)是犹太人对《圣经》中前五卷的称呼,也称“摩西五卷”,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按照犹太律法,托拉必须由受过训练的文士用羊皮纸手抄而成。——译者注

225 过与基督徒辩论来分辨哪种信仰是真理，但最后他逐渐被对方的论据说服，那些论据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因为流便力劝他：“如果你真的希望得到安全、受到尊敬、过得富足，那么信基督。”只是狄奥多鲁斯的皈依是有前提的，即他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愿意与他一起接受洗礼，后来的发展也如他所愿。³³有些人拖得更久：狄奥多鲁斯的弟妹阿特米西亚逃到一个山洞，在她丈夫皈依基督教后想要更坚定地坚持信仰，但她在从仆人带来的水中喝出蜂蜜味后，意识到这是神迹，于是也选择随大家一起皈依基督教。³⁴

由于塞维鲁的记录是我们了解这些事件的唯一资料，很难进一步分析他的描述文字下面的真相。事件当中有一些要素让人印象深刻：犹太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犹太女人的突出地位。当基督徒从亚摩纳长途跋涉前往马格纳时，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侵略意图，因为有一则评注曾提道，当犹太人听到基督徒队伍诵唱的《诗篇》第九段时，还因“听起来极为甜美”而加入队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在圣斯蒂芬的遗骨到来之前，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但实际上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而这恰恰是主教们所反感的。暴力行为促使梅诺卡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但彼此的熟悉则减轻了皈依后心灵上受到的冲击。尼西亚会议后，一神论在地中海逐渐取得胜利，但其排他性不仅将异教徒，也将其他不同的一神信仰推到了敌对阵营。

注 释

1. B. de Breffny, *The Synagogue* (London, 1978), pp. 30-32, 37.
2. R. Meiggs, *Roman Ostia* (Oxford, 1960), pp. 355-66, 368-76.
3. R.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AD to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London, 1986), pp. 428, 438, 453.
4. M. Goodman, *Rome and Jerusalem: the Clash of Ancient Civilisations* (London, 2007), pp. 26-8, 421, 440-43.
5. *Ibid.*, pp. 469-70: coins inscribed FISCI IVDAICI CALVMNIA SVBLATA.
6. *Ibid.*, pp. 480, 484-91.
7. S. S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London, 2009), pp. 130-46, 该文献严重低估了离散规模。
8.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pp. 450, 482.
9. *Ibid.*, p. 487.
10. Sand, *Invention*, pp. 171-2.
11.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p. 492.
12. A. S. Abulafia, *Christian-Jewish Relations, 1000-1300: Jews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ians* (Harlow, 2011), pp. 4-8, 15-16.
13. R. Patai, *The Children of Noah: 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J, 1998), pp. 137-42.
14. *Ibid.*, pp. 70-71, 85-100.
15.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pp. 609-62.
16. G. Bowersock,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 1978), pp. 89-90, 120-22; P. Athanassiadi, *Julian the Apostat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1992), pp. 163-5.
17. Bowersock, *Julian*, pp. 79-93; R. Smith, *Julian's Gods: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 1995).
18.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p. 31.
19. G. Downey, *Gaza in the Early Sixth Century* (Norman, OK, 1963), pp. 33-59, 此书中有多处无聊的长篇大论。
20.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p. 270.
21. Downey, *Gaza*, pp. 17-26, 20-21, 25-9.
22. For his career, see Mark the Deacon, *Life of Porphyry Bishop of Gaza*, ed. G. F. Hill (Oxford, 1913); Marc le Diacre, *Vie de Porphyre, évêque de Gaza*, ed. H. Grégoire and M.-A. Kugener (Paris, 1930).
23. Sand, *Invention*, pp. 166-78, 但此书的论述过于夸张了。

24. Severus of Minorca, *Letter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ed. S. Bradbury (Oxford, 1996), editor's introduction, pp. 54-5; J. Amengual i Batle, *Judíos, Católicos y herejes: el microcosmos balear y tarraconense de Seuerus de Menorca, Consentius y Orosius (413-421)* (Granada, 2008), pp. 69-201.
25. C. Ginzburg, 'The conversion of Minorcan Jews (417-418): an experiment in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S. Waugh and P. Diehl (eds.), *Christendom and its Discontents: Exclusion, Persecution, and Rebellion, 1000-1500* (Cambridge, 1996), pp. 207-19.
26. Severus of Minorca, *Letter*, pp. 80-85.
27. Bradbury, *ibid.*, pp. 34-6.
28. Severus of Minorca, *Letter*, pp. 84-5.
29. *Ibid.*, pp. 82-3.
30. Bishop John II of Jerusalem, *ibid.*, p. 18; also Bradbury's comments, pp. 16-25.
31. Ginzburg, 'Conversion', pp. 213-15; Bradbury in Severus of Minorca, *Letter*, pp. 19, 53.
32. Severus of Minorca, *Letter*, pp. 124-5.
33. *Ibid.*, pp. 94-101.
34. *Ibid.*, pp. 116-19.
35. *Ibid.*, pp. 92-3; but cf. Bradbury's comment, p. 32.
36. Bradbury, *ibid.*, pp. 41-2.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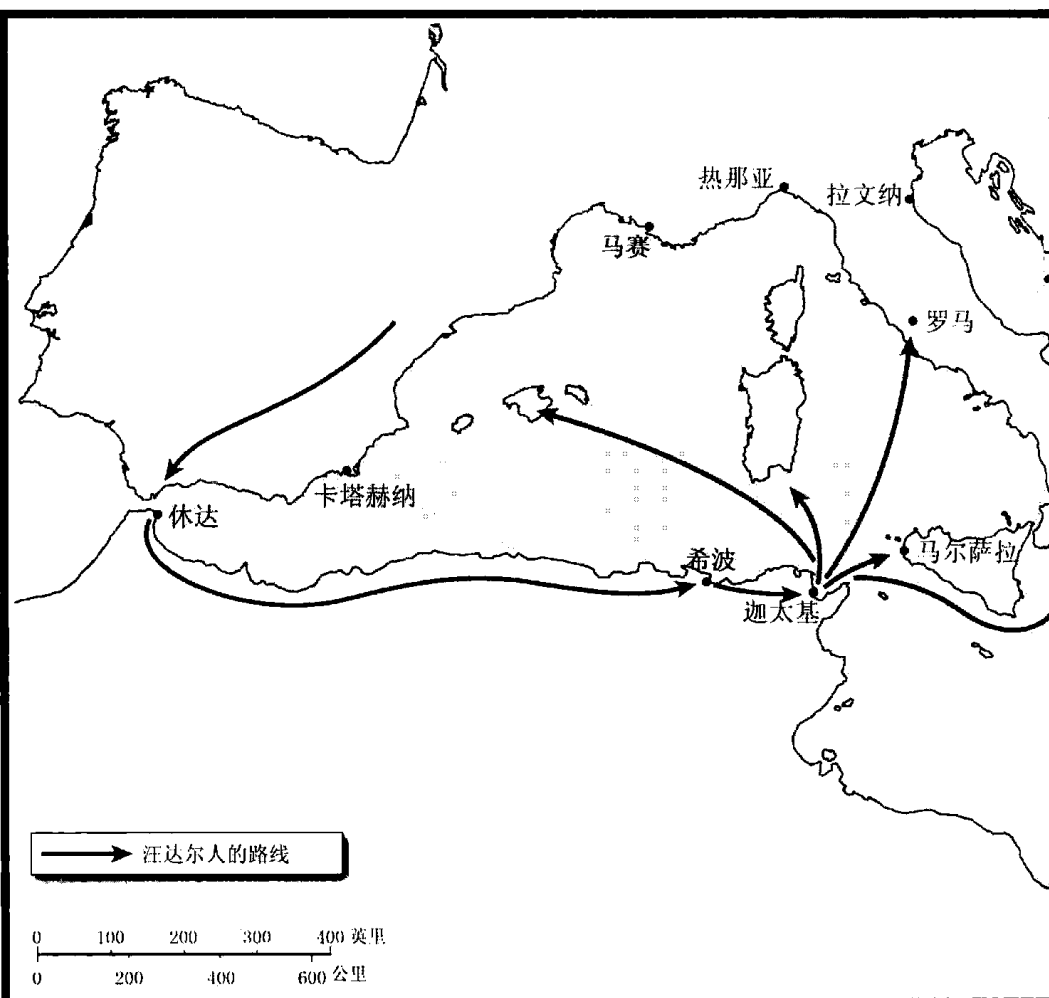
(400 ~ 6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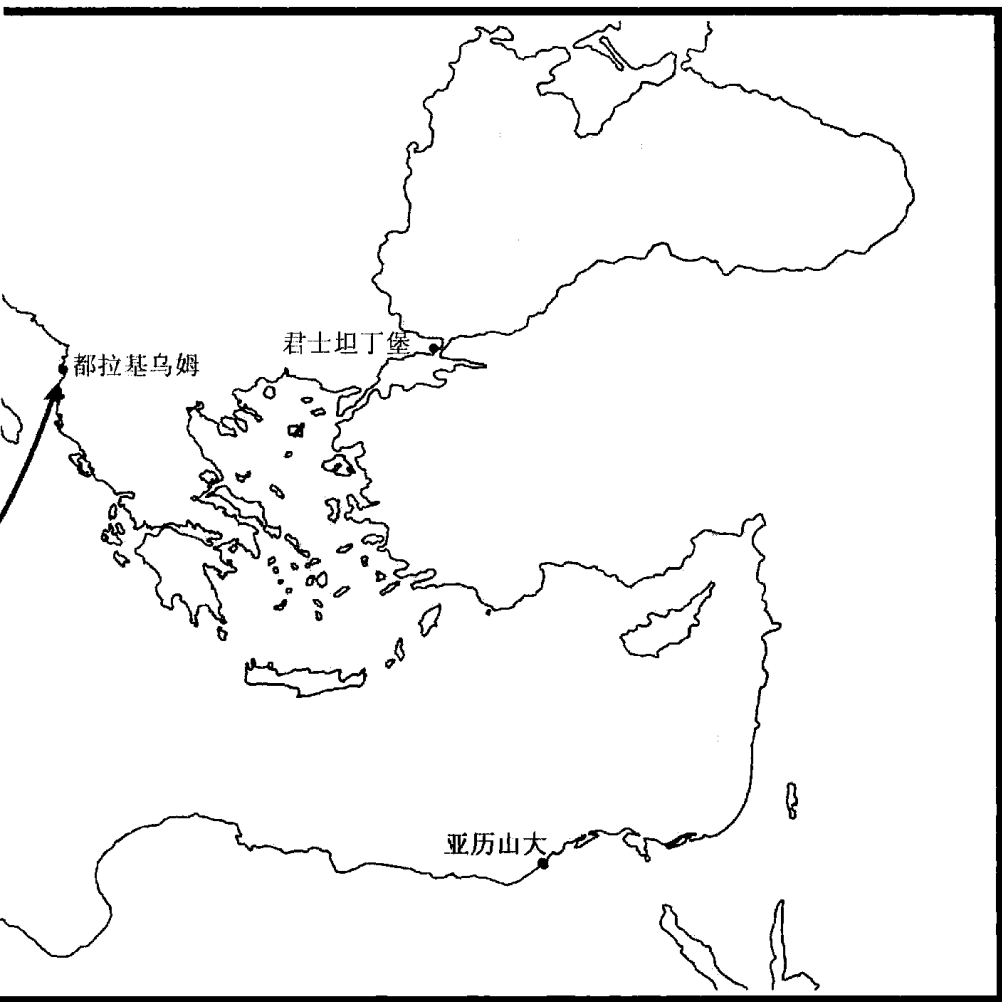
1

自从爱德华·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来,伟大的罗马帝国为何、何时以及是否衰落的问题,就成了历史学家们孜孜不倦进行探讨的对象。目前人们至少提出了二百一十种解释,有些说法(“闪米特化”、同性恋问题、男子气概下降)坦率来说是非常荒诞的。¹关于蛮族入侵摧毁了罗马——既指罗马城又指罗马帝国——的观点曾不再流行,后来又再度受到推崇。²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罗马的衰落”本身就是伪命题,而强调罗马传统的延续性。³然而,从地中海的角度看,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片伟大的海到公元800年时已经分裂了。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持续了数个世纪,也留下了数个嫌疑人:5世纪及之后的日耳曼蛮族,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者,8世纪的查理曼及其法兰克军队,以及内斗——罗马帝国的将军们争权夺利,有的要夺取地方领地,有的要夺取皇位。很明显,罗马的衰落不是单独“某个原因”导致的;无数问题的积累导致了旧制度的终结,撕裂了“第二代地中海”。

226

在公元400年到800年的漫长岁月中,地中海在经济及政治上都陷入分裂:罗马的皇帝们意识到,统治地中海周围地区,以及欧洲大陆上莱茵河西部和多瑙河南部的大片土地,这





一任务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从 284 年开始统治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东部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eia）
227 为基地，将帝国的管理交给由共治皇帝组成的团队，其中最先出现的是西部的另一位“奥古斯都”，后来从 293 年到 305 年又有两名副皇帝或“恺撒”被委任，这套制度称为“四帝共治”。⁴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驻地本身是后来君士坦丁于 330 年建立“新罗马”的前奏；君士坦丁曾考察过特洛伊这座罗马人视为自己起源地的城市的遗址，后来却选择了商业中心拜占庭，拜占庭拥有极佳的港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地处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商业要道。当然，另一个惊人的变化则是君士坦丁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而在此前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一直是地下宗教。

公元 476 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名为罗慕路斯（Romulus）的“小皇帝”（Augustulus），被日耳曼人的军事首领奥多阿克（Odoacer）废黜。在此之前，意大利依然是西罗马皇帝的驻地，但权力中心已经向东转移，这一变化恰恰是对地中海经济发展现实的适应。在东方，希腊化时期与托勒密时期的商业世界仍然繁荣，这里以亚历山大、加沙和以弗所（Ephesos）等繁忙港口为中心，通过贸易往来以及共同的希腊文化联系在一起。强调以城市为主体的东方和以农村为主体的西方间的对立会过于简化，因为东部的的主要人口仍是农民和牧民，且东地中海沿岸密布的乡镇以及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缔造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当代之人仍能在博物馆看到罗马帝国晚期的埃及精美织物；大量的奢侈品当时在西西里岛东部流通。更为日常的货物在供应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响之一是埃及谷物的目的地从旧罗马转向新罗马。⁵330 年时，

这似乎是一个无害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罗马所需谷物的三分之二都由非洲供应。那是个繁荣的时代，当时迦太基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继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如果说帝国人口在3世纪末到4世纪可能由于疫病而大幅削减，那么北非诸行省的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可以继续为西罗马首都提供补给的。罗马与迦太基的元老和骑士阶层扩大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产。⁶船东们的世袭行会得到帝国的保护，行会成员可享受减免税收的特权，被赋予了骑士身份。尽管帝国财政并不直接干涉船东行会的管理，但它对船东的保护保证了谷物航线仍然活跃。非洲的农民也种植橄榄树和葡萄树以获得收入，非洲也因向意大利和其他地区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而繁荣起来。非洲赤陶不仅成为地中海的主要陶器，而且已深入高卢内陆乃至不列颠地区。返程的船只带回了意大利的砖块。这当然不是因为非洲人不会制砖，而是因为谷物商船船员在将谷物卸载后需要用砖块来压舱。⁷这是非洲，尤其是迦太基的黄金时代。这座城市布局合理，街道纵横交错，还有漂亮的建筑——迦太基人特别喜欢自己的斗兽场，甚至蛮族人的入侵威胁也无法打断他们对这种娱乐的热衷。迦太基人以其港口为傲，因为古迦太基的圆形港口被重建，图拉真时期还有一座漂亮的六边形外港建成。这座港口与皇帝在奥斯蒂亚附近建造的波图斯构成了双子港，如今“布匿港口”的轮廓仍依稀可见。⁸

228

229

非洲也是一个和平之地。从公元3世纪开始，远离帝国中心的边境地区就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在遥远的不列颠，“撒克逊海岸的伯爵们”组织防线抵御跨越北海而来的日耳曼入侵者。在400年左右，成群结队的哥特人、苏维汇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侵袭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罗马城在410年也遭到

洗劫，但即使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非洲看起来仍非常安全。⁹阿非利加学者奥古斯丁（Augustine）——他后来成为希波的主教，并于430年去世——因罗马被劫而感到震惊，然后在这种刺激下撰写了他的不朽名篇《上帝之城》。在书中，他描述了一座天国的“城市”，它远远优于脆弱的尘世之城和罗马帝国。然而，至少希波和迦太基似乎得到了海洋的保护。人们都知道蛮族人是很好的士兵，但不是优秀的水手。哥特人被限制在意大利，甚至无法跨越卡拉布里亚海湾前往西西里岛。其他蛮族，也就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则向西进入了西班牙的群山之中。很难说他们这样做可能带来什么威胁。

汪达尔人属于日耳曼民族，他们曾生活在今天波兰南部的某地，与大多数蛮族一样信奉阿利乌斯派的基督教，其教义主张：圣子与圣父并非同性，亦非同样不朽，而是圣子由圣父所出。后来“vandalism”这个词成为破坏的同义词，但在公元1794年它才由一位法国主教造出，当时这位主教因革命者造成的破坏而感到深深的绝望。¹⁰可以肯定的是，汪达尔人乐于看见财物逐渐增加，因此汪达尔国王极不情愿将积攒的金银用于发展经济——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称为“囤积”（*thésaurisation*）。与此相对的是，阿兰人源于高加索地区，从那里向欧洲东南部迁徙，他们的语言属于伊朗语族，习俗与汪达尔人相去甚远，例如他们并不蓄奴。这些看起来很不协调的盟友一起进入并瓜分了西班牙，但416年，他们遭到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瓦利亚（Wallia）的攻击与屠杀，后者所打着刚刚组建的哥特-罗马同盟的旗号，这个同盟非常短命。这些蛮族相互攻击的频率远远高于对罗马人的侵袭。据说，生活在贝蒂卡（Baetica），也就是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的汪达尔人被全部消灭。

但在这场惨败之后，幸存者必须寻找其他土地生活。他们的目的是征服与安居，而不是劫掠与消失。这次他们选择了非洲，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因为那里距离他们最近。429年夏，在他们那瘸腿、无情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的率领下，他们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丹吉尔（Tangier）周边的廷吉塔纳（Tingitania）由西班牙进行管理，这里是罗马的土地但实际由毛里塔尼亚国王控制，这些国王在总体上与罗马谨慎地保持着友好关系。相比于北非的其他地区，这里对罗马的价值没那么高，罗马对于这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也比较满意。¹¹同样，盖萨里克的兴趣也在于控制非洲最富庶的区域。迦太基位于神眷之地，有着丰美的麦田与橄榄园，看起来比西班牙南部还要富足。¹²盖萨里克需要将十八万士兵与妇孺送到海峡对岸（这个数目表明贝蒂卡的汪达尔人几乎被歼灭的说法过于夸大了），¹³但他没有船，而且在这片海域摆渡的船只最多能搭载七十人。如果他真的能够筹集到数百艘这样的小船，那么他手下这些人也要大约一个月才能横渡海峡。但他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到哪去筹集这么多船。盖萨里克选取的路线是从大西洋一侧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从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Tarifa）前往丹吉尔与休达之间的海滩。这是一段短暂的航程，但即使在夏季，所经水域也相当危险。经过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往返后，盖萨里克终于将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带到了廷吉塔纳，但他们并未在廷吉塔纳长期逗留，而是向东穿过陆地，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在公元430年5月或6月到达了希波。希波坚持抵抗了十四个月，这是因为汪达尔人并不擅长攻城战，而且希波的罗马城墙也比较坚固。这样的罗马城墙很好地展现了罗马人

的深谋远虑，因为在经历漫长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后，城市的防御极易被忽略。那些身在城中向外张望的人当中就有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他在围城期间逃离了。他可以进行反思：此前信奉异端的蛮族给罗马带来的破坏，如今威胁到了他所在的行省。

希波沦陷后，新的阿利乌斯派教规建立起来，将近五百位大公会主教因为遵循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立场而被驱逐出他们规模通常较小的主教区。这标志着阿利乌斯派终止了对大公教会的容忍。此后，迦太基也被征服，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盖萨里克是颇有耐心的：这座城市于公元439年陷落，在那时迦太基周边的所有地区都已经落入汪达尔人之手。迦太基成为汪达尔王国的新首都。然而，非洲的汪达尔人并不是破坏者，大多古老的传统与秩序都被他们承继下来。盖萨里克意识到，他不能只统帅自己的臣民，不能仅仅像其正式尊号“汪达尔人与阿兰人的国王”（*rex Vandalarum et Alanorum*）所描述的那样。¹⁶442年，汪达尔人与罗马人缔结和约，其条款规定汪达尔人的国王负责整个地区的统治。尽管盖萨里克把搜刮的大量黄金囤积在国库中，但没有证据表明汪达尔人的统治导致了经济的衰退。新的建筑工程还在进行；东方的商人带着拜占庭的货币来到迦太基；北非商人继续到东方经商；迦太基的美丽海港也得到修缮。¹⁸在汪达尔统治时期，出口到迦太基的东地中海双耳罐数量显著增长。迦太基人也使用本地出产的赤陶精品进餐。事实上，北非的谷物不再被征用以补给罗马，而是由当地商人经营，这推动了经济的发展。¹⁹汪达尔人喜欢东方的丝绸，喜欢浴场、宴会和戏剧，还热衷于划船。他们赞助罗马诗人的创作，与生活在意大利的哥特人一样被罗马化，那些哥特人也开

始美化他们在拉文纳的统治中心。²⁰虽然拉丁语和使用范围更小的布匿语是非洲的通用语言 (*lingua franca*)，但汪达尔人与哥特人一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保留着自己的日耳曼名字 [古萨蒙德 (Gunthamund)、瑟雷萨蒙德 (Thrasamund)，等等]。汪达尔人的征服并未扰乱乡村的生活，这一点可由汪达尔统治中心发现的木制地产记录板证明，它们被称为阿尔贝蒂尼记录板 (Alebertini tablets)。²¹事实上，古老的制度不但没有行将就木，反而生机勃勃、充满能量。非洲西北部的罗马人、布匿人和摩尔人靠海运为汪达尔人提供各种补给，以维持汪达尔王国的存续。²²船只用于贸易，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还需要运送军队。533年，汪达尔国王盖利默 (Gelimer) 将他拥有的一百二十二艘舰船派往撒丁岛镇压岛上总督的起义。汪达尔人并没有修建传统式样的战舰；当他们越过海洋前去征服其他地方时，船只仅发挥了运输马匹和武器的作用。²³

汪达尔王国的范围远不止罗马帝国时的阿非利加行省。早在侵入阿非利加之前，汪达尔人已经派兵攻击巴利阿里群岛；公元455年，他们正式吞并该群岛。²⁴在功勋卓越的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于454年去世后的第二年，无能的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 (Valentinian III) 被暗杀，这为汪达尔人提供了新的机遇。²⁵455年6月，汪达尔人开始了一场极为大胆的远征，军队被派往罗马。远征不是阿利乌斯派对大公教会的圣战，而是劫掠：汪达尔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要破坏，不要屠杀，只需寻找珍宝，特别是皇帝的珍宝。他们带着丰厚的战利品满载而归，还包括相当多的奴隶 (他们处理奴隶时毫不留情，直接把夫妻、父母及子女拆散)。根据一些记录，他们掠夺的珍宝包括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的烛台与其他各种金器，它们作为

战利品一直被保存在迦太基，直到 534 年拜占庭人收复该城。²⁶ 盖萨里克还在 455 年或 456 年夺取了科西嘉岛，作为其造船业的木料来源地，而大公教会被流放的主教们被迫在岛上砍伐木头。与此同时，汪达尔人还曾征服撒丁岛，不过大约在 468 年他们失去了该岛，直到 482 年前后才收复。他们在岛上定居，与那些从非洲来到此地的摩尔人一同居住，这些摩尔人被称为“蛮族”（*Barbarikinoi*），撒丁岛东北部荒无人烟的山区因此被命名为巴尔巴吉亚（*Barbargia*）。在征服西西里岛方面，汪达尔人也毫不迟疑，从 440 年就开始对西西里海峡无情地发起攻击，之后从 461 年或 462 年起年复一年地劫掠该岛。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削弱了罗马人对西西里岛的控制，但就在盖萨里克去世（经过半个世纪各种征战之后终于在 477 年去世）不久前，汪达尔人与日耳曼将军奥多阿克达成协议。奥多阿克在数月前废黜了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以意大利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奥多阿克为西西里岛向汪达尔人纳贡，但只将马尔萨拉（*Marsala*）附近的西部岬角交由汪达尔人直接控制。尽管如此，汪达尔人此时看来似乎马上就要将西地中海的三座粮仓——阿非利加、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全部收入囊中。在盖萨里克统治的末期，汪达尔人感到他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获得了足够多的东西，于是开始侵袭希腊和达尔马提亚沿岸，蹂躏了爱奥尼亚群岛中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

汪达尔人创造的海上帝国极具个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支持了公海上的海盗行为，他们的国王对商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很清楚，在控制帝国的谷仓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扼住了罗马的咽喉。汪达尔人对谷物运输的介入加剧甚

至直接导致了大约发生于公元 450 年的意大利饥荒。他们并没有与罗马帝国的舰队发生冲突，因为那种类型的海战当时已经很少见了（不过，在 5 世纪 60 年代盖萨里克成功地摧毁了两支拜占庭舰队）。汪达尔帝国的巅峰是其创立者盖萨里克的统治时期，在他 477 年去世后的六十年间，汪达尔人一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到 500 年，信奉阿利乌斯派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统治着意大利，信奉阿利乌斯派的汪达尔人控制了北非，信奉阿利乌斯派的西哥特人（Visigoths）统治着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在新罗马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地中海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版图发生了彻底改变。分裂正在发生。

2

对于这种分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可以理解为西地中海逐渐与东地中海分离；可以理解为东西两边都爆发了一系列危机，东部遭受严重打击，但比西部恢复得更快、更果断。大规模入侵在早期对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西罗马的皇权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东罗马的皇权却在哥特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大规模侵袭下幸存下来，即使入侵者在公元 7 世纪一度在君士坦丁堡兵临城下。7 世纪时，希腊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斯拉夫部落的控制之下。整个地中海的经济同样遭到破坏，但造成这种结果的是此前没人见过的袭击者。6 世纪 40 年代，地中海遭遇瘟疫，它可能是腺鼠疫和肺鼠疫，在病理上与 14 世纪的黑死病比较相似。²⁸与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夺去了大量人口的生命，约占拜占庭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并且以城镇居民居

多。地中海东部冬季的寒冷与干燥导致了干旱和饥荒，而在更往东的地区，类似的气候变化可能使原先盘桓在东亚的瘟疫被释放出来，开始向西传播。²⁹此外，罗马帝国晚期经历的寒冷气候也导致土地退化，而原先种植葡萄以及橄榄的梯田被逐渐荒弃，引发了山体滑坡和土壤侵蚀。但这里同样存在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葡萄园和橄榄园的荒弃意味着需求的减少，那么一定有某种因素导致了需求降低。另一种观点认为地中海周边的人口膨胀导致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因为大量人口需要更多的谷物，原本种植树木和其他植被的土壤因此裸露出来，导致表层土壤被河水带到河口，进而引起了河口的淤塞。如此一来，一系列生态问题（因为当时的人们尚无法正确评价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导致了饥荒与干旱。因此，有人认为早在瘟疫发生之前，地中海周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萎缩的现象，所以在瘟疫到来后，已经相当脆弱的人们遭到了沉重打击：经历食物短缺后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十分低下，致命性不那么强的地方瘟疫也不时暴发。³⁰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在北非、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希腊的奥利匹亚、撒丁岛的诺拉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卢尼，都出现了这种河口淤塞的情况。³¹

虽然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发生了瘟疫，但他仍然积极重建地中海范围内的罗马秩序。在瘟疫暴发之前，查士丁尼已经收复了迦太基（公元534年），向那座城市投入大量金钱：他在过去著名的圆形海港处又建了一座新的港口，还重建了城市的城墙和护城河，因为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便是地处非洲的城市也会遭到陆上袭击。在攻陷汪达

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的大将贝利撒留（Belisarios）接着在意大利发动了哥特战争。拜占庭的军队驻扎在西西里岛，就在迦太基陷落的两年后，他们凭借一个经典的计策经由一条引水渠拿下了那不勒斯。查士丁尼认为意大利的收复事关自己的声望，曾经是东哥特诸王根据地的拉文纳再次成为帝国的官员，也就是总督的驻地，该城位于克拉西斯的外港也再次成为拜占庭的海军基地。那不勒斯海港兴建了防御工事，因为当贝利撒留为皇帝夺回该城时，其敌人哥特人还在继续暴乱。³²拜占庭的力量甚至延伸到了热那亚附近的海岸——这个中世纪的伟大贸易中心出现了经济活动的最早迹象。³³查士丁尼毫不担心同时在数条战线作战的压力，还派军队前往西班牙南部，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了卡塔赫纳周边地区的控制权。随着撒丁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重新被拜占庭控制，一条商业纽带把拜占庭的核心地带同休达和直布罗陀海峡连了起来。

查士丁尼重建泛地中海罗马帝国的尝试耗尽了君士坦丁堡的资源，并一度引起经济危机。意大利在战争与疾病中遭到了严重破坏。³⁴虽然瘟疫过后人口大幅削减，但查士丁尼仍积极地改善港口并加强港口城市的防御工事。为了增强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他在都拉基乌姆（Dyrrhachion，古代的埃比达姆诺斯）的周围建立了一圈宏伟的城墙与高塔，今天仍可看到这些建筑的部分遗迹。都拉基乌姆城位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也就是艾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的终端，但科林斯为经由爱琴海的海路也建造了类似的工事，尽管在严重瘟疫的袭击下该城的大量居民已经逃往爱琴海上的艾伊娜岛。³⁵关于迦太基，我们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港口的建立并没有激发迦太基的经济活力。拜占庭收复迦太基之后，来自东

方的双耳罐数量急剧减少。奇怪的是，在来自东方的政治势力控制该地后，当地与东方的商业联系反而减少了。商业的衰落可能是国家打算重新控制谷物贸易造成的。³⁶

对于东地中海来说，公元6世纪同样是一个命运多变的时代。以弗所同雅典和德尔斐一样经历了严重衰落；而亚历山大在6世纪中期之前仍然十分繁华，约有十万居民。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显示了新的活力：在一场地震后，克里特岛上的戈提那（Gortyna）在7世纪新建了很多漂亮的建筑，成了一个成功的制陶中心。克里特以及塞浦路斯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入侵的斯拉夫人并没有抵达这些岛屿。7世纪早期的大量金币可以证明，这些岛屿一直非常繁荣。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例如萨摩斯和希俄斯，成为人们逃避斯拉夫人的避难所，在其他地区人口大幅削减的时候，新居民的到来使这些地区变得生机勃勃。³⁷《罗得海商法》（“Rhodian Sea Law”）成为拜占庭内外使用的标准海洋法。³⁸除了北方的蛮族之外，拜占庭还面临着希腊世界的老对手——波斯诸王的威胁。波斯人的入侵对地中海沿岸诸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616年以前，萨迪斯一直是很有气势的地区首府，拥有大理石铺成的街道、各式柱廊以及地中海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之一。这座城市后来被波斯人摧毁，只留下被焚烧后的废墟，此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被重建。曾经因图书馆而享有盛名的帕加马（Pergamon）也有着类似的命运。³⁹

尽管遭遇了灾难，一些传统的商贸网络仍很活跃，甚至重焕生机。在拜占庭重新掌控拉文纳后，波河流域的谷物从克拉西斯向外地输送。另一方面，那不勒斯与曾为它提供大量谷物的非洲的联系减弱了。那不勒斯的考古地层反映了这一点：公

元6世纪的地层中有大量的非洲赤陶，而在这个时期其数量已经大幅减少。⁴⁰与非洲赤陶的减少构成对比的，是那不勒斯出现的大量来自东地中海的陶器，包括来自萨摩斯的双耳罐。萨摩斯是在斯拉夫人统治下的希腊本土迅速衰落的大背景下繁荣发展的岛屿之一。⁴¹事实上，罗马、拉文纳、叙拉古和迦太基出土了约六百件萨摩斯的陶罐，因此这些位于意大利和非洲的新收复地很显然与东地中海保持甚至加强了联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交往，且伦巴第人统治下的南意大利地区能够铸造金币。对于拜占庭来说，亚得里亚海是一个偏远的湖泊，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泥泞的港口初现端倪，它们后来发展成了威尼斯。而在更往西的地区，形势更加严峻。卢尼严重衰落且未能复兴。在600年前后，卢尼的居民只能制作铅币。⁴²拜占庭与热那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似乎更多是政治联系而非商业联系。马赛依然是西地中海商业中心的领头羊，但只是过去那座伟大希腊城市苍白无力的影子而已。来自东方的双耳罐的数量在6世纪锐减，以至于到600年，其数量只有500年前后的四分之一；到7世纪，这样的双耳罐彻底消失。与之相对，非洲双耳罐的数量在6世纪出现了复苏，由此可知西地中海的中程贸易仍要经过马赛。与东方的联系并未完全终结。图尔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也就是为高卢可怕、残忍的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诸王编史的历史学家，曾提到来自加沙和劳迪西亚（Laodicea）这两处叙利亚 - 巴勒斯坦地区的港口的葡萄酒。⁴³一艘格列高利所处时代的沉船很好地印证了这份记录，沉船遗迹发现于法国南部克罗港（Port Cros）的周边水域。船上装载了来自爱琴海和加沙的双耳罐，罐中盛放了葡萄酒。⁴⁴

在现在发现的沉船中，可确定为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有八十艘。公元 600 年前后，一艘船在法国南部海岸沉没，船上装载了沥青、北非的陶器、加沙的双耳罐，以及胡乱刻着希腊字母的大水罐。该船相当简陋，船板很薄，各个组件契合度也不高，所以它的沉没令人感到毫不奇怪。这艘船并不大，排水量不超过五十吨，最多能装载八千摩底麦子，这个重量只占罗马谷物商船载重量的一小部分。⁴⁵6 世纪和 7 世纪的船只小于罗马先辈们使用的船只。在土耳其附近的亚西·阿达（Yassi Ada）出土了一艘约 626 年的沉船，该船使用的钉子比罗马人造船用 238 的钉子轻很多。这艘船的排水量超过五十吨，制作相当廉价，“其寿命只能持续到开始获利的那一刻”。⁴⁶然而，在这样一艘船上还有一间贮藏丰富食品的厨房，而且它的屋顶还是瓦制的，房间中的碗、盘子和杯子表明该船来自爱琴海或君士坦丁堡。⁴⁷偶尔，一些装载贵重物品的船只也会遇难：西西里岛附近的“马扎梅尼号”（*Marzameini*）沉船就携带了三百多吨的绿色和白色大理石，其沉没时间约在 540 年。这艘船装载的是用来装饰教堂的内部饰物，拉文纳和利比亚有类似的教堂。这些精美的器物被装载上船，作为彰显宗教统一的宣传物越洋过海：教堂装饰风格的统一可以体现的是一位皇帝（即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一种教义。⁴⁸来自东地中海的沉船是对岛屿城市和海岸城市间紧密联系的进一步反映。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伊斯坎迪·布尔努（*Iskandil Burnu*）出土了一艘约 6 世纪末的沉船，船上装载了来自加沙的葡萄酒，还有一种经鉴别属于符合犹太教教规的洁净砂锅，因此很可能这艘船的船主是位犹太人（就像之前阿玛兰图斯的故事中那位 5 世纪初的犹太船长）。⁴⁹

在账务收支方面，拜占庭既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也体

现了持续的发展活力，后者集中体现为东地中海的岛屿经济。当然，这种局面在瘟疫造成人口骤降后才显现。地中海的商业版图被重新勾勒，古老的商业中心走向衰退，而新的中心迸发了活力。幸存下来的经济活力的种子散播在拜占庭统治下的地中海，为8世纪和9世纪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性。而在更遥远的西部，复苏的速度更慢，难度也更大。

注 释

1. B. Ward-Perkins,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Oxford, 2005), p. 32.
2. *Ibid.*, pp. 1-10; P.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5), p. xii.
3. C. Wickham,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London, 2009).
4. Heather,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130.
5. G. Rickman,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 pp. 69, 118.
6. B. H. Warmington,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1954), pp. 64-5, 113.
7. Ward-Perkins, *Fall of Rome*, pp. 103, 131.
8. Heather,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p. 277-80.
9. Warmington,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p. 112; S. Raven, *Rome in Africa* (2nd ed, Harlow, 1984), p. 207.
10. H. Castritius, *Die Vandalen: Etappen einer Spurensuche* (Stuttgart, 2007), pp. 15-33; A. Merrills and R. Miles, *The Vandals* (Oxford, 2010).
11. Raven, *Rome in Africa*, p. 171.
12. C. Courtois,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1955), p. 157.
13. *Ibid.*, p. 160; cf. H. J. Diesner, *Das Vandalenreich: Aufstieg und Untergang* (Leipzig, 1966), p. 51 for lower estimates.
14. Courtois, *Vandales*, pp. 159-63; Castritius, *Vandalen*, pp. 76-8.
15. Courtois, *Vandales*, pp. 110, 170; Wickham, *Inheritance of Rome*, p. 77.
16. A. Schwarcz, 'The settlement of the Vandals in North Africa', in A. Merrills (ed.),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New Perspectives o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Aldershot, 2004), pp. 49-57.

17. Courtois, *Vandales*, p. 173; A. Merrills,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understanding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in Merrills (ed.),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pp. 4–5.
18. Merrills,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pp. 10–11.
19. R. Hodges and 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1983), pp. 27–8; also Wickham, *Inheritance of Rome*, p. 78: 'the Carthage-Rome tax spine ended'.
20. J. George, 'Vandal poets in their context', in Merrills (ed.),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pp. 133–4; D. Bright, *The Miniature Epic in Vandal North Africa* (Norman, OK, 1987).
21. Merrills,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p. 13.
22. Diesner, *Vandalenreich*, p. 125.
23. Courtois, *Vandales*, p. 208.
24. *Ibid.*, p. 186.
25. Heather,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373.
26. Castritius, *Vandalen*, pp. 105–6.
27. Courtois, *Vandales*, pp. 186–93, 212.
28. Some authors reject the bubonic explanation; see W. Rosen, *Justinian's Flea: Plague,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London, 2007).
29. A. Laiou and C.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 2007), p. 38; C. Morrisson and J.-P. Sodini, 'The sixth-century economy', in A. Laiou (e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3 vols. (Washington, DC, 2002), vol. 1, p. 193.
30. C. Vita-Finzi, *The Mediterranean Valleys: Geological Change in Historical Times* (Cambridge, 1969); Hodges an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pp. 57–9.
31. C. Delano Smith, *Western Mediterranean Europe: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taly, 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since the Neolithic* (London, 1979), pp. 328–92.
32. Morrisson and Sodini, 'Sixth-century economy', p. 209; P. Arthur, *Naples: from Roman Town to City-state*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12, London, 2002), pp. 15, 35; H. Ahrweiler, *Byzance et la mer* (Paris, 1966), p. 411; J. Pryor and E. Jeffreys, *The Age of the Δρομων: 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 2006).
33. Morrisson and Sodini, 'Sixth-century economy', p. 173.
34. Arthur, *Naples*, p. 12.
35. Morrisson and Sodini, 'Sixth-century economy', pp. 173–4; G. D. R. Sanders, 'Corinth', in Laiou (e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 2, pp. 647–8.
36. Hodges an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p. 28.
37. Morrisson and Sodini, 'Sixth-century economy', pp. 174, 190–91; C. Foss, *Ephesus after Antiquity: a Late Antique, Byzantine and Turkish City* (Cambridge, 1979); M. Kazanaki-Lappa, 'Medieval Athens', in Laiou (e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 2, pp. 639–41; Hodges an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p. 60.

38. W. Ashburner, *The Rhodian Sea-law* (Oxford, 1909).
39. C. Foss and J. Ayer Scott, 'Sardis', in Laiou (e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 2, p. 615; K. Rheidt, 'The urban economy of Pergamon', in Laiou (e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 2, p. 624.
40. Hodges an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p. 38; J. W. Hayes, *Late Roman Pottery* (Supplementary Monograph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London, 1972) and *Supplement to Late Roman Pottery* (London, 1980);
C.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2005), pp. 720-28.
41. Arthur, *Naples*, p. 141; Morrisson and Sodini, 'Sixth-century economy', p. 191.
42. Hodges an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p. 72.
43. Morrisson and Sodini, 'Sixth-century economy', p. 211.
44. F. van Doorninck, Jr, 'Byzantine shipwrecks', in Laiou (e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vol. 2, p. 899; A. J. Parker, *Ancient Shipwreck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Roman Provinces*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vol. 580, Oxford, 1992), no. 782, p. 301.
45. Parker, *Ancient Shipwrecks*, no. 1001, pp. 372-3.
46. Van Doorninck, 'Byzantine shipwrecks', p. 899.
47. Parker, *Ancient Shipwrecks*, no. 1239, pp. 454-5.
48. Van Doorninck, 'Byzantine shipwrecks', p. 899.
49. Parker, *Ancient shipwrecks*, no. 518, p. 217.

三千多年来，地中海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一处伟大中心。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是第一本完整叙述地中海历史的著作，书中讲述的地中海故事对世界历史发挥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在时间上它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马耳他神庙的建立一直讲到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在空间上从直布罗陀一直讲到雅法、热那亚与突尼斯，还生动记叙了朝圣者、海盗、苏丹、海军将领等人物的经历。

2011 The Mountbatten Maritime Prize

2013 British Academy Medal

人物形象丰富多彩……阿布拉菲亚轻松且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

——西蒙·库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英国）

这是一项可以为普通读者接受的非凡学术成就。任何一个因分散的地中海历史碎片而产生兴趣的人在阅读此书后都将获益匪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出现能够与本书抗衡甚至类似的作品。

——罗杰·克劳利，《文学评论》

一本具有轰动效应的书……这部恢宏的历史著作展现了一片狭长的海域是如何变成人类文明的交汇之地的。

——汤姆·霍兰，《观察家报》

在世最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者。

——安德鲁·罗伯茨

在评价阿布拉菲亚取得的成就——他对史诗场面的描绘、对细节的敏锐观察与清晰的语言风格——时，任何评论都显得苍白。他在书中描写了大量无畏的探险者、焦虑的朝圣者、勇于进取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战战兢兢的难民……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人文关怀和洞见……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9112-7



定价：168.00元（上、下）